

红旗

HONGQI

1

一九六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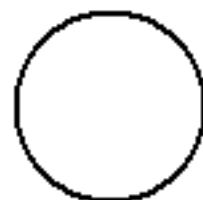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

目 录



社論：**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 (1)

革命的辯证法和对帝国主义的認識 ……邵铁真 (9)

既要重視政治 又要重視专业……聞师潤 (17)

是共产主义呢，还是个人主义？ ……牧 惠 (27)

不能把糟粕当作精华 ……公 盾 (33)

——談评价我国文学遺產的一个問題

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的討論，

在哪些方面前進了？ ……苏 星 (37)

★ 一月五日出版 ★



——社論——

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

被偉大的列宁所闡明的馬克思主义的基本革命原理，作为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

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就在于繼續发展馬克思恩格斯的学說，科学地分析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加剧了的矛盾，进一步丰富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和策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偉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其他許多国家的人民繼續十月革命的事业，又取得了一連串的胜利。这是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曾經指出：馬克思的“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战斗”^①。同样，列宁主义也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每一次新证实和新胜利，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連續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見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②。

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往往借口所謂“經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群众，閹割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却打着“馬克思主义”的旗号。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形式重复着。現代修正主义者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口口声声說“忠于列宁”，其实，他們恰恰也是在那里借口历史发展的某些“新材料”来迷惑人們，毀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說，攻击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即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說，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和策略。

現代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样，竭力掩盖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寿命不长的資本主义，并且簡直把現代帝国主义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特別美化帝国主义、壟断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他們把帝国主义国家和一般資本主义国家的所謂国有化政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国家干預經济等，說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什么“計划經济的实现”、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开始”，等等。他們大談其“逐漸的变化”、“革命与改良的統一”、“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但是，却絕口不談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須实现打碎

①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頁。

② 《給印涅薩·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8頁。



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列宁所努力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正是这个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因为没有这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一些空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列宁说得好，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①。

这里包含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看法的根本分歧。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②的时候，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之上的，立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像远避瘟疫一样地远避这个观点，歪曲十月革命的经验，谎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他们实际上把我们的时代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重视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必须发动群众，全力领导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运用那里已有的民主权利，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来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暴力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应当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行广泛的民主，也就是说，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人民民主，以保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总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历史地对待民主问题的，从来不谈什么“抽象民主”，或者说什么“一般民主”。

列宁着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服从于自己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目标，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③。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使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剥夺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权利而使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排斥民主，这不过是一种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论断”^④。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一切借口抹煞民主的阶级性，抹煞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们宣扬所谓“一般民主”或“全民民主”，实际上只是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崇拜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出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

②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③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3页。

④ 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7、224—231等页。



发，他們尽量把革命和改良混为一谈，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约束在资产阶级专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他说：“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①列宁的这个论点，不但对十月革命说来是正确的，而且对后来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却正是列宁所批判过的这种谬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借口所谓“一般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企图一步一步地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于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下一步一步地复辟。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同样是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了极点，完全糟蹋了列宁主义。

自从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列宁本人起，都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应当经过和平的方法，不应当用武力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张，不但经常见之于我们的言论，而且坚定地表现在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中。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执行者。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这些事实，是枉费心机的。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并没有取消世界上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要争得世界和平，要争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不能无视或者掩盖这些矛盾，像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政治庸人们所企图做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从各方面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足，缩小帝国主义者活动的地盘，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能够争得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加以制止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一直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两件事，是两类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不能否定后者。资本主义国家内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页。



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斗争，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现代修正主义者虚伪地以要求“和平”、要求“和平共处”为名，企图限制、削弱以至否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适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而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像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伎俩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攻击列宁主义。远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就这样写过：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列宁在六十年前所描绘的这种景象，不是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了么？不同的，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不择手段。例如，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教条主义者”主张“用战争来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端无聊的诽谤，不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卑鄙的献媚，又是什么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叫做“教条主义者”）“否认”某种必要的妥协。我们愿意告诉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笼统地否认妥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问题是什么样的妥协，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如何实现妥协。列宁说得非常对：“‘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②也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那一种妥协是允许的，有利于人民事业的；那一种妥协是不允许的，是叛卖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这样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政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1页。



策，一直就是按照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論点制訂的。

但是，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現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用各种誹謗的办法，来中伤我們。应当知道，历史上沒有任何革命党派不遭受敌人和他們的代理人的誹謗的。偉大的布尔什維克就遭受过敌人的无数誹謗。“他們攻击布尔什維克，一直把布尔什維克說成是‘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①。現在，国际上一切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很可惜，陶里亚蒂同志竟然也参加了这种攻击。

中国共产党被現代修正主义者加上了許多罪名。为什么？难道不就是因为我們坚决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难道不就是因为我們决不拿原則来讲交易，决不作理論上的让步？难道不就是因为我們既坚决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既坚决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又坚决反对“左”傾机会主义；既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又坚决反对冒險主义；既坚决反对无原則的迁就主义，又坚决反对脫离群众的宗派主义；既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又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动民族主义？

有些人努力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用可耻的歪曲，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論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論点，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論断而形成的，是根据中国长期的革命經驗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經驗而形成的。这一論点，同列宁所說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外强中干的敌人”、“沒有力量奈何我們的资本主义野兽”等等說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經常吹嘘要按照列宁的准則办事，实际上，他們总是离开列宁的准則，离开列宁主义的精华，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問題上，不是很清楚地暴露出他們远远地离开列宁主义的眞面目么？那些肆意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个論点的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在替帝国主义帮腔，竭力向要求革命的人民宣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反抗不得的，帝国主义制度是推翻不了的，任何革命都是要不得的，沒有希望的。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伙伴多年来向全世界人民进行这样的核訛詐：誰不服从我的統治，誰就要遭到毀灭。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关于核武器問題的各种煽动，完全是根据美帝国主义这种核訛詐的腔調进行的。一切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內，一貫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坚决主張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曾經多次建議建立包括美国在內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一向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所吓倒；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的力量，自己的正义的政策，它根本不应当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賭博。現代修正主义者明明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正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5頁。



确主张，但是他们却硬要制造谎言，欺骗群众，说所谓“教条主义者”希望“把人类推到核战争的边缘”。现代修正主义者经常在讲什么“道德”。他们在制造这种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又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连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完全忘记了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歪曲和攻击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和主张，而故意散布一系列的谎言，其目的就在于不许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进行解放斗争。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在存在着原子武器、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条件下，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为，都是违背“活命的逻辑”的。他们的所谓“活命的逻辑”，实际上是奴隶的逻辑，就是要各国人民磨灭掉革命的意志，捆绑住自己的手足，驯服地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奴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奴隶的逻辑，主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设独立自主幸福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抵抗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分，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都是“教条主义”的了。总之，他们在实际上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全部列宁主义的学说，都抛弃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谁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说话和行动，谁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谁就是“攻击”和平共处政策，谁就是“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列宁曾经指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说他们“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①。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系列的说教和政策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命运，是由几个大国的“首脑人物”所主宰，由他们的明智或不明智所主宰，而不是决定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力量和联合斗争。有些人甚至一心想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坐在一条船上，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光荣”，却不愿意同各国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这样的人竟然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中，岂不是一件怪事么？

列宁说过：“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②。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过也正是这样。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5页。

②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1页。



列宁說：“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当修正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的“聪明”，夸耀自己的“創造性”，夸耀自己的观点是“最新的理論”。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謂“最新理論”，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的謬論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罢了！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愚弄人民的濫調的翻版罢了！

修正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修正主义的派別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修正主义的思潮总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当第二国际在事实上理論上都宣告破产的时候，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宁曾經預言：“我們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諾夫、謝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調和派考茨基之流……”^②。历史证实了列宁的預見。事实上，在列宁逝世以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发生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傾冒险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这个斗争交織在一起，毛澤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左”傾冒险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前我們面临到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則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列宁分析过的那些引起修正主义的一般原因今天依然存在。列宁說过：“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們从本民族资本的利潤中分得一点油水，他們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緒。”^③这种情形我們在目前不仅依然看到，而且显然还比过去更加触目。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按照他們的需要，他們对付人民群众的策略，有时候用直接的暴力，有时候用某种改良的方法；有时候施用断然的威胁，有时候仿佛稍作表面上的让步。这两种方法或者互相交替使用，或者錯綜复杂地結合使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资产阶级也就往往会采取更狡猾的政策，以便在工人运动内部引起某种幻想，引起机会主义的反应。

①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頁。

② 《世界政治的轉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5頁。

③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頁。



列宁說：“资产階級策略上的轉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間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內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① 列宁这句话，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永远有着警戒作用。

現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上空蒙罩着一片修正主义的烏云。現代修正主义者公然在进行分裂的活动。出現了現代修正主义，这当然是件坏事。但是，現代修正主义的出現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已經客观存在着，那末，它公开地表现出来，使人們看到，認識清楚，懂得其害处，坏事就会变成好事。現代修正主义者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似乎在洋洋得意。但是，真理終將战胜謬誤，馬克思列宁主义終將战胜現代修正主义。現代修正主义者尽管喧囂一时，胡說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了，但是最后取得胜利并且得到发展的，必将是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符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現代修正主义。这是有过去的历史为证的。

現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境况比过去好多了。有十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有强有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有更加觉醒的世界人民。有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欧亚两洲的丰富經驗以后，又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极其重要极其輝煌的經驗。这些經驗进一步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庫，在思想上武装了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这些經驗都是現代修正主义的对立方面。它們是客观历史事实，現代修正主义者企图加以篡改、歪曲，是完全徒劳的。

革命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紀末叶进行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階級偉大革命搏战的序幕。今天以列宁主义为偉大旗帜的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更会是無产階級偉大革命运动和一切人民革命运动在更廣闊的範圍内发展的标志和信号。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擋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階級学說获得更大的胜利。”^② 在我們目前这个革命的偉大新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各国建設不断取得胜利的偉大新时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偉大新时代，在欧美工人階級和被压迫人民出現新觉醒的偉大新时代，可以預卜，也定会使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胜利。

在偉大的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讓我們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高举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国和苏联的偉大友誼和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旗帜，高举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推进人类进步、正义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0頁。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4頁。



革命的辯證法和對帝國主義的認識

邵 鐵 真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階級鬥爭的發展進行科學的分析，並用這種科學分析來指導無產階級和一切要求解放的人民的革命鬥爭。當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人民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時候，他們的力量總是比長期處於壓迫者、統治者地位的地主、資產階級小得多，但是因為他們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所以他們的力量是能夠一天一天壯大起來的。只要他們堅持不懈地用正確的方法進行鬥爭，並且敢於在決定的關鍵爭取勝利，他們就終於能夠戰勝反動的、腐朽的統治力量。真正強大的力量究竟是誰：是新生的人民力量呢，還是腐朽的反動力量呢？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新生的人民力量，而不是腐朽的反動力量。這是一個具有深刻的科學性的回答，也是一個具有高度的革命性的回答。

所以，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人民在同階級敵人鬥爭的時候，首先必須在全局上正確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要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雄心，要堅信表面上弱小的革命力量一定會戰勝表面上強大的反革命力量。正如列寧說：“在觀察各個階級和各個國家時，不應當認為它們處於靜力學上的狀態，而應當認為它們處於動力學上的狀態，也就是說，

不應當認為它們處於靜止狀態，而應當認為它們處於運動的狀態（這個運動規律是從每個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中產生出來的）。觀察運動時又不僅要看到過去，而且要看到將來，並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緩慢變化的‘進化論者’的庸俗見解進行觀察，而是要辯證地進行觀察。”^①

顯然，只有像列寧所說的那樣，用革命的辯證法的觀點來觀察階級力量對比的关系，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在同暫時強大的敵人的鬥爭中，才能正確地規定自己的戰略部署，一步一步地勇敢前進，一直到最後勝利。

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在革命活動中，正是這樣對待階級敵人的。在一百多年前，整個世界還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共產主義者只有馬克思、恩格斯等少數幾個人，他們既無政權，又無軍隊，但他們敢於向舊世界挑戰，他們用烈火般的語言宣布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死刑。他們說，“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

^① 《卡爾·馬克思》。《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5頁。



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獲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①在一八四八年德国的“三月革命”中，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弱小，革命的果实被资产阶级夺取了，资产阶级自以为很了不起。这时，马克思用蔑视的口吻说：“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龐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旧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他们“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頹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②

列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时，一次被敌人逮捕了，警察局长审问他：“小伙子，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你的前面是一堵墙。”列宁毫不在乎地回答：“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塌的。”^③二十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列宁以充分的材料为依据，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做了科学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了反动联盟，对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并大力支持白卫匪徒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企图趁苏维埃政权还年幼的时候，就把它活活绞死。列宁坚定地指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经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④在十月革命二周年的时候，列宁回顾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说：“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

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形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⑤。列宁还说，国际资本主义已是个“衰老垂死、病入膏肓的老头子”。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身上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结合。他们能够透过一切表面现象看出似乎强大的反动势力的虚弱的实质，因此他们敢于率领无产阶级同暂时还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作斗争。也只有这样，才敢于在那些庸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向帝国主义发动像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样的冲击。

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的命运，都是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它们的强大，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可怕的，在革命人民的斗争下，它们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死亡。俄国的沙皇，从表面上看来是很强大的，但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風暴，就把他吹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年差不多吞并了半个世界，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在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他们在人民面前宣布了投降。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9、504页。

②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3、127页。

③ 参看《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④⑤ 《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8、107页。



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理論，尤其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总结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經驗，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它的强大只是外表的，实际上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并不可怕。这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看待階級敌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澤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紙老虎这个論点，是远在十六年前提出的。那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范围内的階級力量出現了重新組合，德、意、日法西斯强盜被打敗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势力被削弱了，社会主义陣营开始形成，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正在发展起来。但是，美帝国主义却代替德、意、日法西斯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和堡垒。美帝国主义依仗着在大战中发橫財积聚起来的經濟力量和单独占有的所謂“原子彈的威力”，集合各国反动势力，收罗法西斯残余力量，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陣营，反对社会主义力量和一切民主势力，妄图独霸和奴役全世界。这时，在国际和国内出現了一股似乎强大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逆流。在中国，蔣介石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发动了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企图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在人民群众中竭力散播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話。

在这緊張、尖銳的階級斗争形势之下，怎样估計階級力量的对比？革命力量能不能战胜反革命力量？这些，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所密切关注的問題。毛澤东同志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場上，运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毛澤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間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尖銳、更加扩大了。这些矛盾在美帝国主义身上表现得特別突出。美帝国主义在大战期間增加起来的經濟力量，在战后遇到了不稳定的日趋縮小的国内和国际的市場，这种市場的进一步縮小，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新的經濟危机。在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腐朽了，在国内开始推行法西斯統治，民主自由的影子在逐漸消失，这就引起了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既然把各国的反动势力糾集于自己的周圍，作为統治和压迫这些国家人民的工具，这就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国内国外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时每刻都威胁它自己，随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毛澤东同志說：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虛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脫的經濟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①

根据上述分析，毛澤东同志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动派，而是屬於人民。”接着，他又进一层地說：“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

^①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1頁。



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①毛泽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为革命人民制定了一个根本战略思想，武装了革命人民的头脑，使人民加强了打败反革命力量的胜利信心。这个思想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为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许多事实所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反动派把内战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优势是在蒋介石反动派方面。他们拥有四百多万人的军事力量，统治着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地区，接受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并且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巨大援助。而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远不及蒋介石的军队，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万人。解放区也比国民党统治区小得多。但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结束了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

越南人民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的八年中，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在美国支持下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的北部结束了法帝国主义八十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伊拉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一九五八年推翻了外国帝

国主义所支持的费萨尔王朝，打断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开始不过只有三千人的游击队。尽管法国殖民者投入了八十万人的军事力量，仍没有挡住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洪流；经过七年的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独立，结束了长达一百三十年之久的殖民主义统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虚弱的，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强大的，是能够战胜它的。

同美国近在咫尺的古巴，是一个七百万人口和十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土地的岛国。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起初只有十二个人和七条枪杆子，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斗争，把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巴蒂斯塔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推翻了，在美帝国主义一向横行霸道的西半球上，打断了美帝国主义者拉丁美洲的锁链的一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痛恨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古巴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七百万人的古巴，因为正义是在古巴人民方面，因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是在古巴方面。美帝国主义唯恐古巴的革命影响整个拉丁美洲。两个月前，美帝国主义者在加勒比海上制造紧张局势，企图扼杀古巴革命。但是，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英雄的古巴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保卫了主权，保

^①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



卫了革命。

正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于客观事实，所以这个论断迅速地为广大革命人民所接受。这使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受到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者时时刻刻担忧全世界人民看穿他们是纸老虎，不把他們看在眼里。因此，他們总是利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解，表白自己并不是纸老虎，而是强大的真老虎。但是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帝国主义者的辩解，只是更加证明了纸老虎的论断击中了他們要害，揭露了他們的本质。

有些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理解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他們說，既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为什么还会对外侵略，发动战争呢；或者说，既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而把它消灭掉呢。这说明了他們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再三教导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质，要从大量现象的东西中找出本质的联系，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列宁說：“就本来的意义說，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①。毛澤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作纸老虎，是从它們的本质說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方面是“老虎”，它可以吓唬人，吃人；另一方面它又是“纸”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毛澤东同志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規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②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所以是銳利的思想武器，就因为它能够在現存的事物中看出它的不可避免的死亡的痕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直到他們最后死亡以前，总是要“吃人”的，是对人民凶狠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如实地指出了正在張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在本质上說来，不过是纸老虎，从而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革命辩证法对于任何有觉悟的工人和在革命斗争行列中的普通战士，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思想。他們从不会說，既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它就不会压迫人民和对外侵略，只要用手指头一戳就可以破碎；恰恰相反，革命的人民正因为看穿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就充满信心地更加英勇坚决地进行斗争，用人民的力量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推向死亡。

不承认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人，被帝国主义的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对帝国主义抱着敬畏的心情；他們以为，如果对强大的帝国主义采取蔑视的态度就是違背了现实。应该指出，他們所看到的现实只是机会主义庸人眼中的现实。列宁曾描写这种机会主义者說：他們“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他們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馬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頁。

② 《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的題解。《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90頁。



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要強調先进階級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現存制度中發現推翻这种制度的因素。”^①

机会主义者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不相信人民力量，不相信暫時处于劣势的人民力量会壮大起来，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他們也就不能接受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这个論断。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相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人民力量是最强大的，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切革命斗争，只要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他們充分发动起来，使革命斗争真正成为他們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个力量无敌于天下，能够摧毁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列宁就是从信任人民力量的观点出发，而把帝国主义看作“泥足巨人”的。他說：“誰的后备多，誰的人力多，誰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誰就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所有这些东西我們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我們比他們多，是因为我們能够从过去受資本主义压迫、不論在哪里都占居民絕对多数的那些階級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汲取这些东西，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更深入地从他們当中汲取这些东西。”^② 列宁把人民的力量看作最丰富的“后备庫”，他指出：“我們的敌人，不論是在俄国資產階級还是世界資產階級，都根本没有稍微近似这个后备庫的东西，他們的基础愈来愈不穩了”^③。帝国主义是紙老虎的观点，同样出发于对人民力量的信任。毛澤东同志指出：“我說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

反动派統統不过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脱离人民。”^④

帝国主义总是以它們手里掌握的武器来吓唬人民，但不管什么武器，也不能改变它們脱离人民的这个致命弱点。决定人类命运的从来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人民群众。世界上最有威力的不是核武器，而是人民的力量。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来恐吓人，进行核訛詐，在革命人民看来，也不过是紙老虎之类的东西，是吓不倒人民群众的。

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学說的同时，早已开始了对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这个論点的攻击。他們歪曲这个論点的含义，說它是“杜撰出来的預言”。叛徒铁托集团否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是不足为奇的。他們已經远远脱离了人民，而且和帝国主义在一起，阻止人民的革命运动。他們膜拜于帝国主义威力前面，向人民群众散布对帝国主义的恐惧情緒，企图使人民群众也和他們一样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膝下。因此他們無論如何不敢和不願承认帝国主义是紙老虎。

毛澤东同志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認識出发，根据我国多年的革命斗争經驗，制定了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略和战术的思想。毛

① 《革命教导着人們》，《列宁全集》第9卷，第135頁。

②③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們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6、57頁。

④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4頁。



澤东同志說：“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們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說，在战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敌人。也就是說在整体上我們要藐視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問題上我們要重視它。”^①

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就是說，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不管阶级敌人在一时是如何的强大，它最終会死亡；不管革命力量在暂时是如何的弱小，它最終会胜利。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因此，我們要敢于同敌人斗争，敢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統治，并且敢于取得胜利。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将要結束的时候，教导我們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山。照《列子》书上說，太行山和王屋山是很高很大的，但有一位愚公，相信他和他的子子孙孙能把这两座山彻底鏟平。这位愚公是懂得在战略上藐視“敌人”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毛澤东同志指出，人民的“小米加步枪”，将会比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他又說：“蒋介石軍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暫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着优势。人民解放軍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② 这种在战略

上对敌人的藐視，是彻底的革命精神的表現。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胆略，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并把这种革命热情同科学精神結合起来。

在战术上重視敌人，就是說，在每个局部上，在每个具体斗争問題上，要重視敌人，采取謹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毛澤东同志用通俗的比喻來說明在战术上要重視敌人的思想。他說：“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③。我們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时候，毛澤东同志一方面把他們看做紙老虎，指出反动派終将失敗，人民終将胜利；另一方面，在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始終严肃謹慎，讲究斗争艺术，反对任何輕敌傾向和冒險主义。对每一次具体斗争，总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两倍、三倍、四倍，有时五倍、六倍于敌人的兵力，以便全部歼灭敌人，取得胜利。毛澤东同志还指出，同敌人斗争时，不仅要估計到好的可能性，而且要設想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可能出現的最大

①③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第23、24頁。

②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246頁。



的困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是艰巨的，复杂的，不付出相当代价是不能得到胜利的。革命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有时会遇到困难和挫折，需要某种迂回或暂时退却。在遇到不利的形势时，革命的人民更需要坚持战胜敌人的总的战略方针，以便继续进行斗争，使不利形势转变为有利形势。如果不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不但在不利的形势下，会丧失革命意志，而且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也会由于丧失革命意志而不敢利用时机，争取胜利，以致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正因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如果在具体斗争中轻率、鲁莽，也会使革命受到损害。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方面必须辩证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一切真正要革命和要争取胜利的人们，对敌人就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能采取别种态度。在革命斗争中，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就会犯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错误。如果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而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那就必然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不重视敌人，那就既要在战略上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要在战术上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许

多次的成功和失败的經驗而得到的結論。只有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站在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打击敌人，一直到全部战胜敌人。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必要前提。战术是受战略指导的。在具体斗争中，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的战术，但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不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不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那就会或者放弃革命斗争，对敌人作片面的妥协和迁就，以至可耻地投降；或者在某一具体斗争中采取鲁莽、轻率的冒险主义的步骤。这两种情形，当然都说不上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以，只有真正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真正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一方，这一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不断地高涨起来。当前，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是主要危险。不敢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做纸老虎，也就是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不敢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不敢同它们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肃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帮助人民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增强革命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的任务。



既要重视政治 又要重视专业

聞 師 潤

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必须拥有科学家、科学技术干部、教授、教员、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这支队伍既包括新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的、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建立这样一支数量很大的、水平较高的、各个方面齐全的、并且拥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

为了建立起这支队伍，我们党向广大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号召，要求他们既要重视政治，又要重视专业。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应当达到的初步要求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知识分子达到了这两条政治要求，他们就能够心情舒畅地从事对人民有利的许多工作。要真正达到这个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密切联系工农群

众，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一边。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应当表现在努力钻研业务上面，表现在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达到了上述的初步要求以后，还应该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包括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等等。这是一个更长期的、更艰巨的和逐步实现的过程。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应当达到的基本要求是，精通本行业务，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研究实验工作中要积极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开展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的革新，不断地提高专业水平，尽最大努力来解决我国工农业生产 and 国防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努力争取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对于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工作人员，要求他们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有独创的贡献，并积极指导、培养新生力量；对于青年科学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刻苦钻研业务，在专业知识上打好基础，



迅速获得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党所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号召，向知识分子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 * *

在政治和专业的关系中，政治是统帅。任何专业都是在一定的政治领导下的专业，都是为一定的政治、为一定的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服务的。政治最集中地表现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知识分子必须用他的专业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就是政治统帅专业。知识分子生活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他究竟为谁工作？他的工作前途如何？他的工作究竟对人民有利、无利或者有害？这些问题都和政治，和阶级斗争有密切关系。掌握专业的人，是用他的专业来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呢，还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必须有所选择，这种选择就是知识分子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用自己的专业为什么政治服务的问题。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懂得，政治是脱离不了的。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可能走向反动的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能陷入反动的政治立场。”^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严重的意义，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任何时候，我们强调加强专业工作，都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而总是以政治挂帅作为前提的。

无阶级的政治，对于专业可以起巨大

的推动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使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的才智贡献于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求幸福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政治理想，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最壮丽的理想，它推动革命者去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最艰巨的事业；它使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个理想也必然会推动知识分子积极地去钻研业务，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把自己最好的生产成果或工作成果贡献给人民。当知识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以后，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六亿人民的幸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工作，而不像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那样为个人的名利、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工作；他们就会看到自己工作上的每一分成绩，和集体的成绩汇合在一起，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不像旧社会许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潦倒终生；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在和人民大众一道前进，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会在集体的关怀和支持下得到解决，而不像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那样“孤军作战”。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看清楚了工作的崇高目的，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就会用自己全部力量去做好自己的专业。

既然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可以推动专业，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视政治，必

^①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須重視思想改造，更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建国以来，经过历次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革命运动，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的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起来。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除了极少数至今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自觉地、愉快地、愉快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但是，知识分子决不能因此自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内，还会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在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根本问题上，要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面前，知识分子是热爱社会主义呢，还是留恋资本主义？是站在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呢，还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是积极地、自觉地、愉快地用自己的专业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开辟道路呢，还是在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过程中采取消极

态度呢？对于自己头脑中的旧社会的思想意识，旧传统和旧习惯，是采取积极改造的态度呢，还是“讳疾忌医”，把它们掩藏起来？这些问题，都会在政治上考验知识分子。除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外，还存在着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疯狂地反对我国，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在这个斗争中，知识分子也将受到政治上的考验。我国知识分子在过去曾经经受了多次政治斗争的考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但是，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因此，政治考验也会不断地发生。旧的考验过去了，还会有新的考验。知识分子必须经受住这些考验，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判断是非，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一边，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才能够说自己真正解决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可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的进步只是初步的，必须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进步。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过思想斗争，逐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这种转变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息息相关的。正是社会阶级斗争引起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斗争，然后影响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在激烈的社会革命运动，如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深



刻的阶级教育，思想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以后，才逐渐提高认识，转变其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愈是直接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实践，这种转变的过程越快，转变也越彻底。从今后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分子继续在政治上进步，当然也离不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

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分子有更加直接的联系。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首先有一个和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进行斗争的任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担负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不能不直接反映到他们的工作中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直接反映一定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总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前哨。自然科学家所揭示的自然界的事实和规律，是客观的自然现象，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当自然科学家在解释这些事实和规律的时候，当他们从其中引出某些哲学上的结论的时候，却必然带有一定阶级的观点。在解释自然界现象的范围内，自然科学家常常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影响。由此可见，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可以和阶级斗争不发生联系，研究自然科学专业可以不过问政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 *

社会阶级斗争反映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形成思想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但是，这个斗争向什么方向发展，是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还是资本主义思想战胜社会主义思想，却决定于主观努力。在思想斗争中，政治立场转变得快或慢、彻底或不彻底，也决定于主观努力。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极其伟大的社会变革。对于这个变革，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没有思想准备或者思想准备很少的。在旧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痛心于中国的积弱贫困，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感到悲愤填膺，因而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这个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他们的脑子里是模糊的。他们脑子里所构成的新中国的蓝图，是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要求民主和自由，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但是这种革命要求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当时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即首先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是，当我国完成了民主主



义革命任务，轉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阶段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識分子面对着一次新的革命。他們对这个革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不仅如此，而且知識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階級思想直接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发生抵触，引起冲突。

經驗证明，知識分子要增强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要确立无产階級的立場，增强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不断努力提高認識水平，了解社会发展規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規律。站稳无产階級的立場，能够更好地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懂得了客观規律，并且自觉地去适应这些規律，又有利于政治立場的轉变。在解决立場問題和認識問題之間，解决立場問題是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从留恋資本主义轉变为憎恶資本主义，从对社会主义感到陌生轉变为深切关怀社会主义，从被动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轉变为主动地积极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这对于知識分子來說，最为重要。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們曾經看到这样的現象：当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工人階級中間最坚定的分子立即感到气味不对头，非常愤怒，难以忍受，希望立即起来进行斗争，而有些知識分子却没有这种感情，他們或者同情右派的言論，或者对这场严重的階級斗争漠不关心，好像这场斗争絲毫和他没有关系。这些知識分子平时在口头上尽可以承认他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也可能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坚定的，可是，在激烈的階級斗争发生的时候，他的思想感情却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不同。可見，坚

定地站在无产階級立場的人，必然热爱社会主义，而不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决不能說已經解决了立場問題。

无产階級的坚定立場，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具有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願望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知識分子真正解决了立場問題，也一定会对社会主义产生这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勇于挑起担子，奋不顾身地去完成；凡是有关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問題，不辞劳苦，千方百计去解决。他們就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社会主义，对于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都势不两立，坚决与之进行斗争；他們就会自觉地担負起捍卫社会主义的責任，随时提高警惕，决不容許任何資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发生；当他們发现自己身上有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也会迅速地加以克服；他們能够勇敢地冲破自己思想意識中的旧思想、旧傳統、旧习惯的网罗，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有了坚定的无产階級立場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就会使知識分子易于在复杂的階級斗争中判明是非，不致迷失方向。

立場的变化，思想感情的变化，归根結底是思想改造的結果。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早就指出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变化，“是由一个階級变到另一个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說：“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



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要求我们“要最坚决地打破”各种旧观念，值得我们重视。它意味着必须对各种旧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人们思想意识中，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或者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战胜无产阶级思想，二者必居其一。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如果不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敌人，对它坚决采取决裂态度，而仍然对它感到亲切可爱，留恋不舍，在灵魂深处还牢固地保持着它的地盘，那末，资产阶级思想就一定会泛滥发展，侵占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引导一个人在政治上逐渐从落后走向反动。只有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这个阵地，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才会不断地增长。当然，思想斗争的胜利，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改造过程，是一个长期实践锻炼的过程。但是，自觉地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一种决裂态度，有意识地以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增加了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却是一种极大的愉快。

* * *

在政治和专业的关系中，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决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专业。知识分子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的领导，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但是，仅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还要解决一个服务得好不好的问题。比如一个歌唱家解决了为人民歌唱，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他还要唱得优美动听，使听众受到鼓舞，发生共鸣，他的歌声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②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对于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是适用的。知识分子在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有了正确的方向以后，必须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这种决心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精通自己的专业，又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对于精通专业的重要性，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凭借船坚炮利，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掠夺我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科学技术文化落后，经济建设落后。现在我国人民虽然已经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力争尽快地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和超过现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尽快地掌握现代最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1页。



的科学技术，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文化，我们就不能够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也不能够说，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已经丝毫没有问题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和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分不开的。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今天我国有成就的专家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有些现代科学技术还不是钻得太深，而是太浅，迅速地掌握现代最新科学技术，以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还是一项严重的任务。我国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自己肩上担负的重大责任，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决心去攻克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堡垒。

我们党历来不仅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而且关心他们在专业上的进步。我们党总是鼓励知识分子精通专业，总是帮助他们，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在专业上做出成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懂得搞好专业的重要作用，善于发现人材，培养人材，善于团结和组织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很好地推动他们搞好自己的专业，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决不能忽视专业，削弱专业，降低专业的水平。

一切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勇敢地担负起国家所规定的各种科学研究工作任务，服从国家的需要，埋头苦干，进行艰苦的工作，下决心拿出研究成果来推动国家建设。应当看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的任务很艰巨，而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各方面的人材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必须认定目标，集中主要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可能克服这个矛盾。任何各行其是、分散力量的做法，都是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①“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他举例说，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需要定季节而产生了天文学。天文学要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而引起了对数学的研究。农业的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研究力学。测量田亩的需要是几何学产生的客观原因。防治疾病的需要，使医学得以出现，而由此又引起了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归根结底，是生产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科学研究课题并决定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当生产中或阶级斗争中提出某个科学课题需要人们去解决时，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人，就会对科学、对人民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国建设事业要求知识分子认定一种专业，把它当作终身事业，专心地干一辈子，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例如，农业科学家研究螟虫，就应该下决心和螟虫打一辈子的交道，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6页。



把它的生活规律彻底搞清楚，找到更有效的消灭虫害的方法，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医生研究癌症，要立志把一生献给这个事业，从一切可能的途径去增长知识，研究癌症发生和变化的规律，并找到更多的有效的防治方法；工程师和技术员，就要用一生的精力去研究一个工艺过程、一种技术、一部机器，使自己确实能够对提高生产作出新的贡献。没有这种献身事业的精神和苦心经营的干劲，就不可能取得成就。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人要精通一门专业，并在这门专业上有新的建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一个人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具有韧性战斗精神。攀登科学高峰要比攀登一座高山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那是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持续前进，经历无数次困难和挫折的过程。它需要一个人具有更大的勇敢和毅力，需要人们长时期在思想上和心灵上坚强不屈。在科学工作上具有韧性战斗精神，不因失败而后退，不因挫折而灰心，终身持续地向困难作斗争，这正是科学家应有的宝贵的品质，也正是许多科学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发展史证明，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发明，都不是一举成功的，而是在长年累月中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试验，在试验中吸取失败的教训，排除了各种错误的假设以后，才找到正确道路的。在几十次、几百次试验失败的情况下，往往使人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前途还不清楚，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而困难看来又似乎是难以克服的。这时，一个科

学家有没有韧性战斗精神，就成为他能否达到目的的关键所在了。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科学文化事业中，有些人稍为取得一点成就，就自满自足，停顿下来，不再继续上进了。例如，有些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朝气蓬勃，经常动脑筋，抓题目，辛勤地积累资料，刻苦地钻研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直至得出研究成果才肯罢休。他们有一股冲锋陷阵的锐气，有一种勤于动脑动手、不辞劳苦、不怕困难的精神，因而在专业上长进很快，能够不断拿出研究成果来。但是，他们在取得一些成就以后，往往就自满起来了，停滞下来了，钻研科学的锐气消失了，不那末愿意花苦功搜集资料、认真读书、亲自动手做具体的研究、实验、总结研究成果等等工作了。鲁迅曾经指出过一种用“敲门砖”的办法来对待科学文化研究工作的错误态度，说这种人“门一敲进，砖就可以抛弃了”^①，“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②鲁迅在三十年前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告诫。

* * *

政治与专业的关系，应当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我们既要重视政治，又要重视专业。如果只是空谈政治，不去努力钻研业务，就可能变成空头政治家；如果只是埋头于业务，不过问政治，又可能变成迷失方向

^{①②}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6页。



的实际家。这两种倾向都必须反对。对知识分子来说，重视政治和重视专业也应当是统一的。只重视政治而忽视专业固然不对，只重视专业而忽视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的锻炼，也是不对的。

拿知识分子如何对待自己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要求人家如何对待这种成就为例来说，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某些成就，当然是一作好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要求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鼓励人们在专业上取得成就，尽量为人们创造取得成就的良好条件。人们取得的成就越多越大，对国家、对人民的好处越大。同时，知识分子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成就，也表明了他们在科学事业上是认真的，愿意下苦功夫的。对于任何人在专业上取得的成就，党和人民都会给以重视和支持，根据成就的大小，做出公正的评价，给以适当的奖励。这是完全应该的。另一方面，有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对待个人成就，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即应该看到，每个人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是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工作中取得成绩，固然说明我们前进了一步，但是如果用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的工作，又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力求对人民有更多、更好的贡献。同时，还应该看到，个人在工作中取得成就，除了个人努力以外，还利用了前人的劳绩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依靠了国家和人民在各方面的支持，取得了周围同志的协助。个人的劳绩中总是包含着—部分集体的劳绩在内。

因此，人们有了一点成绩，更要谦虚谨慎，更要发奋努力，更要注意和别人合作。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内，多数知识分子对待个人成就都是采取这种正确态度的。但是，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态度：有些人稍为取得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起来，自以为贡献很大，功劳很高，失去了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摆起架子，把个人成就当作“私有财产”，借以向国家和人民索取名利。当然，这种人在我们国家内是不多的，但是这种不好的倾向却值得引起每个知识分子的警惕。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到，有些人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工作中取得了某些成就，在社会上有了—点名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认为是特殊人物，用个人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一切事情，要求社会上—切事情都适合他们的口味。这样，他们一直发展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堕落的“经历”，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教训：一个人如果对个人成就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就可能放纵个人主义的发展，而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使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就可能引导一个人迷失政治方向，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对个人成就持有不正确态度的人都会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指出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自觉性，采取谦虚的态度。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要下苦功学习，认真钻研业务，良好地掌握各种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



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只‘红’不‘专’，是不能作好工作的。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各种专家都应当下定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这就是红色专家。”^①“又红又专”的要求，就是我们党对一切知识分子的要求。

当然，科学家和职业的政治活动家是有分工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积累的知识也不同，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既成为专业的科学家，同时又成为政治活动家。科学工作者为了加强政治锻炼，有必要学习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党的某些基本方针政策，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好专业，他们主要的时间应该用在钻研业务上面，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必须注意质量和效果，占用的时间不宜过多。我们党要求各种专业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都重视政治，并不等于要求他们都成为政治活动家。我们绝不能把科学家重视政治误解为可以用大部分时间去读大量的政治书籍，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误解为可以丢掉专业去从事政治活动。科学家学习政治，是为了明确钻研业务的政治目的，提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而不是为了做政治活动家。在科学工作上实行政治挂帅，主要表现在积极组织科学家去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组织科学家进行必要的政治学习，

但是政治学习不应该妨碍科学研究。必须看到，政治决不会妨碍专业，而用过多的时间去学习政治和参加政治活动却可能妨碍专业；要求科学家提高政治觉悟，不会妨碍他的专业，而要求科学家同时成为政治活动家，就可能妨碍他的专业。对科学家个人来讲，又应该看到学习政治的重要性，不要把学习政治和钻研业务对立起来，放松必要的政治学习。

* * *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②。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表达了我们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知识分子肩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应该树立雄心壮志，向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做一个优秀科学技术专家的目标前进，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专业水平，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艰苦的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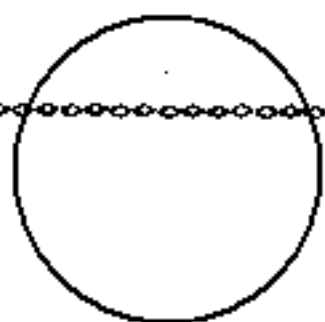
^①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13页。

^② 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第1页。



是共产主义呢，还是个人主义？

牧 惠



从高尔基的《母亲》开始，革命的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艺术的最基本的主题。在社会主义艺术的画廊中，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们给我们塑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具有最优秀的工人阶级的品质，他们大公无私，勤劳勇敢，刚毅坚韧，对人民无限忠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顽强地斗争。这些崇高的英雄形象，启发人们的思想，激动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觉悟，鼓舞人们的斗志。歌颂这些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优良传统。

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艺术或者起着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提高人们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的作用，或者起着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质的作用。或者是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或者是磨灭人们的革命斗志，特别是磨灭青年一代的革命斗志。要区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以什么态度塑造怎样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达哪一阶级的思想感情。

和社会主义艺术歌颂革命英雄的传统相反，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艺术作品中，开始用他们自以为“新颖”的笔触来描写另外一种

“英雄”。这些“英雄”据说是在追求“自由”、“幸福”、“人道”等等东西，但是，拆穿了看，他们所追求的其实不过是个人的物质享受。他们要穿得美，吃得好，住得舒适。他们对个人利益极其敏感，而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则不感兴趣。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都是些个人主义者；但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笔下，他们却成为了了不起的“英雄”。这种个人主义者是非常肮脏的，他们身上散发着腐朽的资产阶级气息。为了美化他们，现代修正主义者采取种种“巧妙”的手法，为他们涂脂抹粉。

社会主义艺术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鼓舞人们革命斗志的一种力量，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具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生活过得好，他们首先关心着集体的幸福，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因此，他们绝不同于那些满足于个人的物质享受而不想革命的工人贵族。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仅仅用物质福利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把共产主义理想降低到只是自己穿得美，吃得好，住得舒适。现代修正主义艺术作品中描写的“英雄”人物，正是



同这种政治观点相适应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宣称：人们追求个人幸福，追求生活舒适，想穿得好，想有一宅好房子，一套雅致的家具和漂亮的杯盘，这完全没有什麼不好。因为据说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就得努力工作，努力劳动，生产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发展了，人人也都会过着丰裕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知不觉地到来了。

事实果然是这样的吗？当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使一切劳动者过着幸福而丰裕的生活。同旧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生活何止幸福千百倍。但是，只要有了丰盛的物质生活，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社会吗？要是说丰盛的物质生活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古代的帝王，现今的肯尼迪，不是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吗？他们的个人物质生活，又何止穿得好，有一宅好房子，一套雅致的家具和漂亮的杯盘呢？而且，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人们都只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甚至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损人利己、损公私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滋长起来，生产就可能遭到破坏而不能得到发展，到头来劳动人民的个人幸福也只会成为泡影。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已经证明，仅仅从个人的物质享受来理解共产主义，是一种只能使资本主义复辟，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的非常有害的做法。

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南共纲领，是为个人主义作辩护的急先锋。它宣称：“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最高目的’，

因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个人幸福。”在这种修正主义纲领的思想支配下，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来宣传个人幸福如何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对立着。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这样的一种观点：社会利益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才是具体的。在他们的作品中，社会主义目标被描绘成破坏个人幸福的根源。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党和国家在发展集体的公共利益的时候，关心和照顾着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集体利益的受维护，正是满足人民群众个人利益的基础。这里并没有什么抽象和具体的对立。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可能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为了捍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这个最高的目的，总是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作为党的宣传武器的社会主义文艺，总是通过形象来宣传这种社会主义目标同个人利益的一致，歌颂那些在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社会主义目标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英雄人物。那么，为什么在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那里，个人利益却同社会主义目标对立起来了呢？原来，除了劳动人民正当的个人利益之外，在社会主



义社会里，还有一种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个人主义者所要求的“个人幸福”。这种“个人幸福”，同劳动人民正当的个人利益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个人幸福”，拒绝服从任何集体的利益，而要求集体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个人主义者的利益。它同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的确没有任何一致性，的确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共产主义事业当然是一定会破坏这种“个人幸福”的，社会主义文艺当然是没有什么义务去为它作辩护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故意把这种所谓“个人幸福”同人民群众正当的个人利益混淆起来，从而“证明”似乎劳动人民正当的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的矛盾也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正是为那种同社会主义集体利益相对抗的个人利益作辩护。他们认为，解决这种对抗性矛盾的办法，不是个人主义者取消他们损害集体利益的个人要求，而是必须放弃“抽象的”集体利益，来满足“具体的”个人利益，必须让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服从个人主义者的“个人幸福”。而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这种个人主义者的作品，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们把这种作品诬蔑为“用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冷酷和残忍”，“准备为了事业而忘掉人”的作品。

这里就有必要谈谈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常常鼓吹的所谓“关心人”、“爱人”的口号。这些口号，乍看起来似乎不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阶

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人们，克服人们脑海中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个人主义思想，这样，劳动者的个性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才是真正关心人的正确的态度。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关心人”、“爱人”，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宣称，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是人，“需要对人比对他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更加尊重”。因此，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既然是人，也就要“一视同仁”地关心他们，爱他们。而怎样关心他们、爱他们呢？那就是关心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甚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爱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这种“关心”，这种“爱”，将引导个人主义者走向什么地方去呢？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走向什么地方去呢？难道那不明明白白是一个愈陷愈深的资本主义泥坑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个人主义，除了鼓吹物质生活上的自私自利之外，还提倡精神生活上的自由放荡。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作品中的个人主义者，对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认为，老一辈的革命家，头脑里只有留声机和录音机，走着事先由别人安排好了的老路。而他们是要走不同的路的。他们自命为走的是由自己决定的“自由自在”的路。他们要求“无限的自由”。他们否定过去与未来，认为只有眼前和“自我”才是确实的存在。他们中甚至有人公然认为，他们的“理想”就是冒险，流浪。他们宣称：情愿做一个流浪汉，遭到失败，也比做一个



完成別人的使命的人強。这不明明是阿飛式的、“垮掉了的一代”的那種沒落資產階級執紉子弟的“理想”嗎？然而，現代修正主義者却認為宣傳這種自由主義“理想”的作品，是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典範作品呢！據說，雖然在作品里沒有可能找到這種“培養”作用，但是作家寫這些人物却是帶有讓他們去“撞一撞”生活，以便使他們同生活取得更嚴肅更負責的關系的“美好的意圖”，因而是“充滿了教育和教導的激情”的。

為了教育和培養新的一代，有必要讓青年人到實際生活中去，到勞動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去參加實踐，參加鬥爭，去認識生活，接受生活的嚴峻考驗，不要使青年人成為溫室中培養出來的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弱草嫩花。社會主義藝術家通過自己的作品，展示出青年一代在實際鬥爭中如何逐步成長的歷程，給那些因為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而一時迷途的青年指出正確的方向。這同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的所謂“撞一撞”是迥然不同的。我們提倡青年人到實際鬥爭中去鍛煉，那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有領導地讓青年人到群眾鬥爭中去磨練。他們却提倡青年人盲目地受資產階級思想支配，嘗試資產階級的放蕩的生活，讓他們在“撞一撞”中碰得頭破血流。也許有人以為，現代修正主義者在他們的作品中是為了樹立一個反面的形象作為青年人的告誡吧？其實並不如此。在那些作品里，是用欣賞的調子來描寫主人公的放蕩行為的，他們雖然在生活中碰到某些釘子，但是，這些釘子並不足以使

他們有絲毫的改悔。那麼，剩下來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和教導的激情”呢？是告訴青年人不要跟着這些放蕩漢走呢，還是引誘青年人以他們為榜樣，也去“撞一撞”？是那微不足道的釘子起作用呢，還是放蕩漢這種“冒險”精神更有吸引力？在他們的作品中，把這些放蕩行為寫得那麼“美”，那麼“勇敢”，在他們對於這些作品的評介中，對於這些放蕩漢的瞎撞又持着那樣公然贊美的態度，這一切所起的只能是引誘青年人走入歧途的作用。

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於這些放蕩漢的瞎撞是以什麼理由來肯定的呢？他們認為，這樣的人，才是“有性格”的人，有着自己“獨立生活道路”的人，有着“獨立人格”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是提倡獨立思考，堅持真理，反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初版序言中，曾經引用過但丁的詩句：“走你的路，讓人家去說話。”作為自己堅持真理的銘言；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少數派，但這並沒有使他們放棄自己所堅持的真理；魯迅在反動派的“圍剿”中，“橫眉冷對千夫指”，始終沒有在反動派的壓力下屈服過。這些，就是獨立思考的光輝典範。進步的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曾經熱情歌頌過那些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叛逆性格。這些作品的主人公反映了時代的要求，站在真理的立場，為堅持自己正確的理想而鬥爭。這種精神當然是值得贊揚的。可是，現代修正主義藝術作品中那些放蕩漢所堅持的究竟



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他们把集体的事业看作是“束缚”，要求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的脑子是留声机和录音机，他们要求不受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约束而走“独立”的路，他们认为兢兢业业地完成革命使命的人是“傻瓜”，……够了，这还不明白吗？他们坚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的“性格”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性格”，他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勇士”。这种所谓“性格”、“勇敢”，不过是坚决反动、拚命放荡的别称罢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们当然要把这些有“性格”的放荡汉们吹捧上天，以便引诱青年一代同他们一样地走上背叛的道路。但是，人们都知道，现代修正主义者即使在篡改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没有什么“创造性”，那只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们的旧调变新；放荡汉的“性格”，也同样是从没落的现代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花样。

当人们指出这些放荡汉的“性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现代修正主义者抗议说：“你们从表面来评价一个人！”他们说，他们作品中的“英雄”虽然是花花公子的形式，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果然让某些放荡汉干出诸如为了救助一个朋友而牺牲自己的事情来。

这不过是骗人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可能发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一定的条件决不会发生这

种变化。这里，必要的条件之一是彻底地否定原先的丑恶的思想和生活。那些放荡汉渗透着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感情，按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过日子，并且自始至终对这种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采取肯定的态度，他们怎么会奇迹地发生什么转变呢？这种转变不过是捏造出来的转变。作家之所以要捏造出这种转变，只是为了给他们所十分怜惜和同情的花花公子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虚伪的形式。

“你们不信任人，不相信人能够改善他自己，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会培养出许许多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新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可能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改造成集体主义的劳动者。但是，这里需要有培养和锻炼，需要经过思想改造，需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因为事实并不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了。事实恰好相反。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存在，现代修正主义艺术作品的出现，以及这些作品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英雄”的产生，在在都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过去，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危险并没有过去。因此，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甚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不经过任何教育和改造自然而然地就会抛弃他们的有害的思想，那是极端错误的。这里的所谓“信任人”，不过是主张取消



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教育作用的一种借口罢了。

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辩护，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政治领域中，正在用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来迷惑群众，特别是迷惑青年一代，用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用本位主义反对全局观点，用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用这些荒谬思想来磨灭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涣散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人民中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散布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以达到取消革命的目的。文艺是服从于政治的。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就是这样“自由”而“真诚”地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政治服务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就成为了典范性的代表，被认为是开辟了“新道路”的了不得的“杰作”。它们的作者由于“对束缚艺术发展的公式主义和冷冰冰的政治说教进行冲击”，而被加上了“革新”、“有才华”、“有风格”等等耀眼的“桂冠”。

这是什么样的冲击？这是以修正主义文艺来代替社会主义文艺的冲击，是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优良传统的冲击。社会主义文艺主张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政治说教”，他们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种腐朽的思想去腐蚀人们，瓦解人

们的斗志。社会主义文艺主张以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和建设者作自己的主人公，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却认为这是“束缚艺术发展的公式主义”，因而把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作有“性格”、有“人的魅力”的“英雄”放在主要的位置，着力渲染和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社会主义艺术家在塑造出许许多多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曾经写过那些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但那是为了批判他们，揭露他们，鞭撻他们；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却认为这不是“关心人”、不“信任人”、不“爱人”的一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应该歌颂他们，欣赏他们，赞助他们。……他们在吹嘘自己的“艺术的基调”的同时，竭力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文艺作品，公式化啦，政策的图解啦，英雄人物没有感情、没有人的魅力、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啦，……总之，一钱不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艺术家，就被戴上了“过时”、“教条主义”、“粉饰家”等等的帽子。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诽谤和资产阶级的诬蔑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动摇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根毫毛。我们并不讳言，除了许许多多写得成功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之外，在年轻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中，也有一些写得不很成功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但是，这些作品写得不够成功，绝不是因为作者歌颂了新时代的英雄人物而没有去歌颂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克服这些作品的缺点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深入劳



动人民的生活之中，向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艺术大师们学习，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学遗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前进，而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那样，抛弃无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向西方没落的文艺“取经”。人们知道，尽管现代修正主义艺术家吹嘘他们在开辟着什么新的道路，但是，这却是所谓象征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曾经走过的旧道路，是现代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家所走着的愈陷

愈深的泥潭小道。这是后退而不是前进。高尔基说得好：“燃烧就是酸化，而因为腐烂也是酸化，所以许多腐烂着的人以为他们是在燃烧着明亮而鲜艳的火呢。”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如此这般地“误会”着他们正在发出明亮而鲜艳的火花。事实已经证明，而且今后会更进一步地证明：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辩护的文艺，必然像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本身一样没有好的下场。

不能把糟粕当作精华 · 公 盾 ·

——谈评价我国文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为了正确评价我国古代文学遗产，分清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我们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告诉我们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①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批判，如果不把思想倾向放在首要地位来考察，只是从艺术表现形式来衡量作品的好坏，就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准确的评价，也弄不清什么是民主性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糟粕。只看到某些古代作品艺术细节上的长处，而看不到它们倾向性上的根本缺陷，就有可能鱼目混珠，把沙粒当作黄金，这样，我们对古代文学遗产的学习和继承就会走上岔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倘若认

为任何一部作品里只要有些艺术细节可取，便为其大吹大捧，那么“简直是没有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②

最近有些文章，对于我国六朝时代的上层贵族的宫廷文学表现过分的赞赏的态度。我们不否认，六朝时代的某些宫廷权贵，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作了些探索，对于唐代诗歌艺术形式的创造起了一定的作用。《隋书·经籍志》中所列集部，由汉至隋有文集的作家不过四百多人，其中出于梁代人之手的竟有八十儿家，这与梁代几个皇帝文人如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71页。

②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3页。



肖衍(梁武帝)、肖綱(簡文帝)、肖繹(元帝)等比較注意提倡学术、編纂文集，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认为，肖綱、肖繹所倡导的“宫体詩”是可以称頌的东西。肖綱留下了二百七十几首詩歌，如果再加上他所写的杂著、賦、詔、頌、教、表、疏、序、銘、碑、誄等，可以說，在皇帝文人中，他所遺留下来的創作是較多的。然而，只要稍微涉猎一下肖綱的“宫体詩”，人們就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如《美女篇》、《艳歌曲》、《咏美人观画》、《和武帝宴詩》、《斗鸡》、《药名詩》、《卦名詩》等，都是以充滿腐朽气味的宫廷貴族的审美观来描写妇女，或者以一些华丽辞藻，来美化上层宫廷貴族的吃喝玩乐，或以文字游戏來冒充風雅。他一方面像乃父肖衍那样，大力宣揚佛家思想，写什么《懺悔詩》、《戒詩》、《十空》……；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却充斥着“丽姬”、“妖嬈”、“舞女”、“蕩妇”、“倡家”的描写，甚至对于像《从軍行》这样严肃的主题，写的仍然是“侍婢初笄解郑声”的靡靡之音。連肖綱自己也說这些作品是“伤于輕艳”^①。至于肖繹的一些作品，其基本情調也与肖綱如出一轍。《隋书·文学傳序》认为，肖綱、肖繹所提倡的“宫体詩”虽有“新巧”，却流于“淫放”；唐杜確的《岑嘉州集序》中，也把“宫体詩”看作是“輕浮綺靡之辞”的“妖体”；《隋书·李諤傳》上写道：“江左齐梁，其弊弥甚，……遂复遺理存異，寻虛逐微，竞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状。”古人已經指出过“宫体詩”以

及齐梁时代文風的不良傾向，我看这些評价都是比較中肯的。肖綱、肖繹的“宫体詩”在写景状物以及讲究声律辞采方面，固然有一定的艺术技巧，但按其内容來說，則是粉飾反动統治階級的卑劣行为和丑恶面目。这些作品，正如列宁評俄罗斯一些宫廷歌剧所說的，是“充斥着宫廷浮华的情調，是地主階級特有的产物”^②，是典型的封建地主貴族的文艺。誠然，对于六朝宫廷文学“宫体詩”的声律、辞采的技巧方面作某种探索研究，也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一般地把“宫体詩”看作既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甚至強調其中有一些“清新之作”，而对它們在总的傾向上的腐朽思想内容及其階級基础却不作应有的批判。

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③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当然也要这样。把古代文学中好的看作一切皆好，坏的看作一切皆坏，而不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这当然是錯誤的；但倘若认为凡是古代作品，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优点，也有缺点，即它們都是优劣掺半的东西，而不去分清其中占主要方面的是什么，或者表面上似乎也談到作品的主要和次要方面，但涉及到具体評价时，实质上仍然是主次不分，不在研究中找主流，其結果也是要使自己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迷失方向的。

^① 見《梁书·簡文帝本紀》。

^② 轉引自《回忆弗·伊·列宁》。《列宁論文学艺术》第2卷，第924頁。

^③ 《整頓党的作風》。《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29頁。



有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延续了二千多年，社会制度没有改变，因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领域，不会有根本反动的东西大量出现。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这种说法看来是把我国连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当成是平静的、没有社会矛盾、没有变动的历史。但实际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断地进行着，而且在有的时候，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通过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而反映出来。早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魏文帝曹丕就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是相当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的。我国封建时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他们一方面，对于进步的文学艺术实行摧残、迫害、篡改、禁止；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并通过御用文人又时刻利用文艺这个武器，大写其美化荒淫无耻生活和麻醉毒化人们心灵的东西。历史事实说明，只要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存在，只要封建的意识形态占着统治地位，那么，在文学艺术中的反动的东西，以及根本反动的东西就会产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在我国，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留下不少奉诏应制、代“圣”立言和宣扬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

有的文章认为我国古代反动作品大都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好像有艺术性的大都不

是反动作品。是的，那些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动作品，绝大部分都是迂腐可厌，在今天看起来，特别令人噁心。但是，如果认为任何封建时代的反动作品，都没有什么迷惑欺骗人的艺术技巧，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上面说的六朝的“宫体诗”，不是就曾经使一些人受到迷惑了吗？以明末攀附魏忠贤阉党发迹的南明福王时代的宰相“戏曲家”阮大铖的作品为例，这个无耻文人留下的著作相当繁多。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等戏曲创作，都是通过相当华丽的辞藻，以离奇曲折的情节，写“缠绵的艳情”。这些作品，宣扬了极其腐朽荒唐的反动思想，为没落的南明小朝廷歌功颂德，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誉为“中兴之乐”。它们不但流传下来，并且还被一些人称赞为“深得玉茗（按：即汤显祖）之神”。汤显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传统封建礼教，把汤显祖和阮大铖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清代俞仲华所写的与施耐庵《水浒传》针锋相对的《荡寇志》一书，是一部站在封建地主官绅立场，百般美化“剿匪”官军，并挖空心思恶毒诬蔑农民起义的极端反动的小说。但它在行文、布局方面，却不是很粗糙的。此外，如通过封建反动官僚彭朋出巡查案故事、宣扬封建奴性思想的《彭公案》，歌颂效忠封建反动统治的施仕纶及其随从黄天霸的《施公案》，污蔑以唐赛儿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女仙外史》等旧小说，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人受其迷惑。以上事实说明，封建时代的一些反动文学作品，也有一定艺术技巧，因而



是能蒙蔽一些讀者的。

毛澤東同志說，“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①我們要排斥這些封建反動文學作品，就要通過分析批判，使其起反面教材的作用，讓“毒草”來“肥田”。對那些思想上反動而帶藝術性的反動作品，批判得越深刻、徹底，越是能夠剝下它們的外衣，使其在讀者面前喪失欺騙、麻醉的作用，並從而達到消毒的目的。

我們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批判精神來從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工作。對我國古代文學遺產中有益成分，採取粗心大意，以至一筆抹煞的錯誤傾向，我們當然是要堅決反對的；但是如果對於我國古代文學遺產，只講繼承，不講批判，只要前人曾贊賞過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只要在藝術技巧上有一點可取的，便不看它們的思想性而大吹大捧，甚至把我國古代文學中的糟粕也奉為至寶，這實質上跟那些開口閉口“古聖先王”、“祖宗成法”，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言必三代有什麼兩樣呢？這種對我國古代文學遺產無批判地肯定的錯誤傾向，我們也是要堅決地加以反對的。列寧在《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一文中指出，“保存遺產，並不像檔案員保管員保存故紙堆那樣”^②，而應當認識什麼是值得保存的，什麼是必須唾棄的。我們在從事我國古代文學的批判研究中，也一定要做到這樣。

文學史上的各種現象往往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正確的東西，也往往是在與錯誤的東西的鬥爭中發展壯大的。因此，對於

我國文學史的研究工作者來說，為了深入研究我國封建時代階級鬥爭在文學藝術中的反映，為了深入了解我國封建時代文學藝術的消長情況，就需要緊緊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適當注意研究古代文學中的反動作品，特別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動作品。古語說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了解古往今來敵對營壘的反動文學的消長情況，也就不能深刻地了解文學藝術歷史長河中進步文學藝術的發生和發展。適當地批判研究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反動作品，不但有助於我們弄清封建反動統治階級怎樣通過他們的御用文人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來歪曲現實、毒害人民；同時，也可以使我們看到古代進步文學是怎樣在跟反動文學互相矛盾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我國歷史學家章學誠說過，“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粕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這話說得很好。在階級社會里，文學藝術是階級鬥爭的武器。我們十分重視我國古代文學中的民主性精華，十分重視優秀的偉大的古典遺產，同時也要深入地批判古代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反動作品。我們既要研究古代文學中的進步的革命的一方面，也要適當研究其落后的反動的另一方面。這樣，我們對文學藝術之作為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的武器，才能得到全面、深刻的認識。

① 同本期第33頁注①。

②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頁。



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的討論， 在哪些方面前進了？

· 苏 星 ·

最近讀了一年來討論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涉及到的問題很廣泛，主要有：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社会主义制度下簡單再生产和擴大再生产的關係，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等等問題。作為一個讀者，我想在這裡談談讀了這些文章以後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這些文章表明，我國經濟學界，一年來對於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的研究，是有進展的。

關於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係討論了下列問題：黨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社会主义擴大再生产的關係；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關係和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係的一致性和差別性；用什麼樣的指標來判斷工業和農業之間的比例是否協調；怎樣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順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等。

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黨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是馬克思關於擴大再生产的理論在我國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個總方針的提出，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着極為深遠的意義。

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很早。在經濟學界，對於這個思想的認識，是隨着社会主义建設實踐的發展，逐步加深的。最初，只是認識到，發展工業，必須以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商品糧食、原料、勞動力 and 資金，提供多大的市場為前提。隨後認識到，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序列進行綜合平衡，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意義。再進一步又認識到，工業的發展方向，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方向，必須是首先為農業服務。這樣，就逐步打破了過去經濟學界曾經存在過的，對工業農業關係的認識上脫離農業、片面強調重工業的觀點，加深了對以農業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的認識，從而把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的研究，提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

從文章上看，討論中對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問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大多數文章指出，重工業基本上屬於第一部類，農業、輕工業基本上屬於第二部類，就是說，這兩種劃分，在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重工業同第一部類之間，農業、輕工業同第二部類之間，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實際上，農業、輕工業



部門不仅生产生活資料，而且生产生产資料；重工业部門也不仅生产生产資料，而且生产生活資料。这三个部門，都在进行两个部类的生产。

根据上述情况，我們要深入地探索农业、輕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就不能只用两大部类的关系来做简单的类比，必須运用再生产的原理，具体地分析农业、輕工业、重工业本身的內在联系和它的发展趋势。例如，农业和輕工业之間的內在联系怎样？农业和重工业之間的內在联系怎样？重工业和輕工业之間的內在联系怎样？将来，生产力发展了，这些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究竟用什么样的指标来判断工业和农业比例关系是否协调，还没有一致的意見。有的同志主張用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有的同志主張用剩余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同工业劳动者消費的农产品的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也有的同志主張，同时使用总产值和淨产值两个指标。这个问题正在进行討論。至于怎样按照农业、輕工业和重工业的順序进行综合平衡，安排国民經济計劃，虽然已經发表了几篇文章，討論还没有充分展开。

关于积累和消費的关系，討論了下列問題：确定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的客观依据；确定积累率时如何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累基金的分配和使用，等等。

如何确定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如何确定积累率，过去在經济学界提出过如下的观点：（一）根据历史上形成的水平，参考其他国家

的經驗，定出积累率的界限。（二）在一般情况下，积累的规模，要保证人民生活略高于、至少不低于上一年的实际水平。（三）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大体上反映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这次討論，没有人否定这些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对于在实际經济工作中确定积累率还是重要的依据。同时，进一步提出怎样从再生产过程的內在联系上，寻找积累率的界限的问题。例如，这次討論，有的文章提出，应当为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找到一个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也有的文章提出，根据剩余产品中实际提供多少积累基金来确定积累的比率。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問題，可以启发人們更深入地探索确定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的內在联系。

在确定积累率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这个原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有些文章也从理論上对这个原则作了些論述。看来这个问题和前面的問題关系密切，因为符合客观规律的积累率，大体上也就会符合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討論中，有些文章探討了积累基金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文章指出，在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已經确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如何分配和使用，对于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对于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相同数量的积累基金，按农业、輕工业、重工业的順序安排，还是按重工业、輕工业、农业的順序安排；多安排固定资产的积累，还是多安排流动资产的积累；多安排生产性的积累，还是多安排非生产性



的积累，結果是不同的。这方面的討論，虽然还是剛剛展开，看来很有发展前途。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討論了下列問題：簡單再生产的范疇对于社会主义經济的意义；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同生产和基本建設工作之間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簡單再生产的問題，过去經济学界注意的比較少。有的书讲社会主义再生产，根本不提簡單再生产这个范疇。在这次討論中，大家认为，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不是为了区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类型，就是說，不是为了区分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是簡單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出发点，研究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間的內在联系，从而为国民經济綜合平衡工作提供某些根据。

許多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所謂簡單再生产，实际上是指維持上一年的生产規模和生产水平。增加积累，扩大基本建設，都是以这个規模和水平为出发点的。认真研究这个問題，有助于更切实地掌握积累的規模和速度，更准确地安排整个国民經济的資金和物資的平衡，并且把現有企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設的关系問題处理得更好。

在討論中，大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不能把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同生产和基本建設的关系等同起来。簡單再生产固然主要依靠現有企业的生产，但

是，也需要进行基本建設；扩大再生产必須有計劃地进行基本建設，但是，就每一年來說，很大一部分还是要依靠挖掘現有企业的生产潜力。运用簡單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原理解决具体問題，必須进行具体分析。

关于国民經济綜合平衡，除了討論过农业、輕工业、重工业的平衡，积累和消費的平衡問題以外，还接触到下列問題：財政、信貸、物資平衡，居民购买力同消費品供应之間的平衡，地区經济平衡，等等。

財政、信貸、物資平衡問題，居民购买力同消費品供应之間的平衡問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而且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論中的一个重要問題。但是，对于这方面的問題的討論，还没有充分展开。对于地区經济平衡的問題从理論上进行探討，也只是从最近才开始引起經济学界的注意。

上面所举的，只是最近討論中提出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仅就这几方面的問題来看，經過討論以后，有的确实深入了，有的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有的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討論，但問題已經提出来了。因此，我认为，經济学界关于再生产問題的研究是有进展的。

第二个印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問題是一个很寬广的研究領域，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拿运用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原理，探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总方針这个問題來說，就有許多問題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这包括：社会



生产两大部类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和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系；工业和农业以及工农业部门内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内在联系等一系列的问题。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原理本身也有许多要研究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些基本范畴（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在存在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社会产品的流通问题；怎样根据固定资产补偿的周期性探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平衡问题；在再生产过程中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运动规律，等等。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是理论的抽象。他在分析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对比关系时，曾经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有机构成提高、价格变动和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运用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原理，更具体地考察社会生产各部门（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流通，考察有机构成高低、价格涨落，对外贸易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影响等，都是重要的课题。

除此以外，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个印象是，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的内容来看，比较多的还是对于基本原理的演绎，和对于方针、政策的一般解

释，真正从实际出发，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的文章还不多。

再生产的原理是抽象的原理。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似乎单从原理的演绎中就可以使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前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马克思的原理是科学的抽象，但是，它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马克思经过多年苦心研究，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马克思说过：“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①我们不能只注意马克思的说明方法，而忽略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再生产的基本理论，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但是，这种钻研，不是为了记诵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而是为了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说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研究工作，不能从原理到原理，从图式到图式，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出发，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页。

張
正



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规律性，至少要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初步研究，要详细了解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样，才便于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性的经验，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同时，还需要详细了解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参考。这是一般的要求。具体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搜集更多的专题资料。

马克思写《资本论》，对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发展史是仔细地研究过的，他不仅研究过许多国家的经济史，而且研究过技术史。他到了晚年，还专门研究过俄国经济，特别是俄国的农业和土地问题。列宁也很注意俄国和欧洲各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早期写的《论所谓市场问题》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就是应用马克思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俄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范例。列宁在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研究方法时说过：“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承受叙述枯燥无味的责难，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统计资料的研究。”^②这句话，是发人深省的。

逻辑过程从来都是历史过程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而前者是第二性的。当人们

没有深刻了解历史过程的时候，就很难谈到发现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发现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性。

读关于讨论再生产问题的文章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许多文章的观点重复。

在学术讨论中，是不是可以提倡这样一种学风：写文章，分清哪些是别人的观点，哪些是自己的观点，吸取别人的观点或者批评别人的观点，尽可能注明出处。这样，不但督促自己非去看别人的文章不可，而且可以避免重复，也容易看出，自己在哪些方面前进了。

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首先叙述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在整个《资本论》的写作中，对于什么人先提出某个观点也总要加以注明。恩格斯指出：“在这场合，抄引的目的，只在指明，在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特别的经济思想，是最先在何处，在何时，由何人明白表示出来。”“这种抄引，不过是为本文从经济学史借来的注解，并从时间与发明人两方面，指出经济学上一些比较重要的进步。”^③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在序言里说明，哪些材料和观点是属于莫尔根的，哪些观点和材料是属于他自己的。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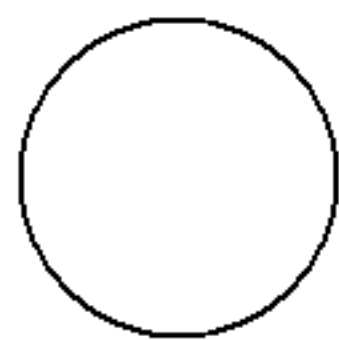
②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8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编者第3版序，第23—24页。



红旗

HONGQI



2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

目 录

古巴卡斯特罗总理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

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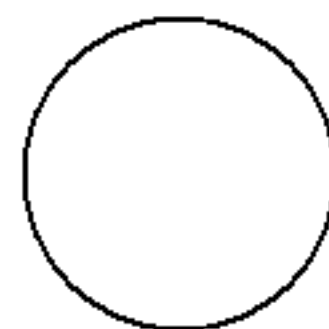
更高的水平…… 许辛学 (13)

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 …… 林一舟 (19)

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 …… 戴松恩 (25)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李践为 (35)

★ 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



古巴卡斯特罗总理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统一革命组织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一月十六日在“卓别麟”剧院举行的美洲妇女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的演说（根据革命政府速记文本），全文如下：
美洲妇女们：

访问我们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姊妹代表们：

首先我想说明——这一点我已经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同志们说过了——这次会开始得晚了一点，这不是我的过错，（欢呼声）因为由于今年是“组织年”，（欢呼声）我九点差三分的时候曾在剧院里，（欢呼声）我九点差三分的时候曾在剧院里。（欢呼声和掌声）我们打算在这个“组织年”里使一切准时进行。情况是同志们、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讨论的东西很多，因此我以为你们大约一直要讨论到七、八点钟。据说要到八点多，（欢呼声和笑声）所以这次会就开始得晚了一点。我只想说明，这不是我的过错。

古巴能成为这个代表大会的会址，这是我們，是我們国家莫大的光荣。我們懂得，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事件，是一个庄严的事件。

我們曾經想了解一下情况，閱讀了向大会提出的各种报告，而实际上我們的印象是，所有这些报告都具有严肃精神，正确地说明了問題，提供了大量关于我們大陆现状的材料，因而具有巨大价值。

当然，代表大会讨论的题目只是同妇女利益有关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今天在现代社会上有什么事与妇女无关呢？在我们的社会问题中，有什么事是与拉丁美洲妇女和美洲妇女无关的呢？

在讨论有关妇女权利和妇女愿望的问题时，我們看到如果没有革命，在我們的美洲就不可能有妇女的权利，不可能有儿童的权利、母亲的权利、妻子的权利。（掌声）因此，在美洲妇女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里，妇女必须成为革命者！（掌声）

为什么必须成为革命者呢？

在人类社会里，革命者是哪些人呢？在历史上哪些人曾经是革命者呢？很简单，是被剥削者和被歧视者。因为妇女在为一个进行剥削的垄断公司，为剥削阶级社会劳动时，不仅作



为工人遭受剥削，而且女工在工人中是最受剥削的，得到的工资更低，条件最为恶劣，在她们们的社会职能、作为妇女的地位和她们们所遭受的剥削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因此，妇女当然是革命者。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大陆上，妇女必须是革命者。因此，我国的妇女是革命者！（掌声）因为在我国，很多妇女曾是被剥削的女工，她们们作为从事劳动来使一个阶级发财致富的工人受到了剥削，而且还在工人中遭受歧视。许多妇女那时甚至没有参加劳动的門徑，没有劳动的机会。

在比耳馬同志的报告中，叙述了古巴妇女在革命中进行的活動以及古巴妇女在革命中得到的好处，这个叙述很长，但是即使这样，在这一叙述中可能还略去了一些东西没有谈，因为革命为妇女做过的事还要更多。革命并不认为一切都已經做完了，远不是这样，但是它提出要继续为妇女而斗争。

在我国，妇女已經像黑人一样不再遭受歧视。事实上，革命对古巴妇女來說有很大的意义。

在革命中，革命领导当局努力为妇女开辟愈来愈多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把出售鞋子、衣服和五金用品的大中企业收归国有后，曾經指定对内貿易部选拔妇女担任这些企业的管理員。（掌声）已經任命了約四千名妇女做管理員，也就是說她們是大約四千个商店的管理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目前由妇女管理。（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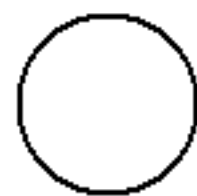
例如，还有另一个关于妇女参加过去实际上她們被摒棄在外的各項活動的人数增加的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在报告中沒有提到这个材料。这就是，例如在某些专业中，如医学，过去在大学中参加这个系学习的妇女数字可能不到百分之十。而現在，在基础医学专科学校，即医学院一年級学习的百分之五十是妇女。（掌声）

这些事实是一个简单的证明，它說明了在革命的四年中妇女是如何真正地参与了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的生活，参与自己國家的生活，参与她們在那里生活和展开活動的集体的生活。

例如，一月二日，妇女們也和我們的士兵們一起参加了游行，她們是妇女营的队伍。在我們的軍隊里，有一系列的工作是由妇女們在那里工作和服务的。

在我們的国家里，关于妇女的资产阶级观念已經消失了。在我們的国家里那种侮辱和歧视妇女的观点已經真正地消除了，妇女群众們为自己赢得了这一现实。偏見已經被一种新的思想所代替，这种新思想对妇女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品质給以应有的估价，在某些社会工作中她們显示出了特别的长处。在妇女們的面前，已經开辟了一个广闊的活動場所。

如果你们們把古巴代表团的报告同拉丁美洲其他代表团的报告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例如说，是如何使妇女从家务奴隶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如何创造使她们能尽可能最广泛地参加生产的条件，依靠这一点，妇女和革命正在赢得胜利。

因为在一个像资本主义这样存在失业、成百万的男人找不到工作的社会里，常常要把妇女限制在有限的经济活动中，这是自然的。而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由于一切国家资源以及计划经济的全面发展，生产人手愈来愈感到不足，自然，革命正在关心创造这些条件，因而尽可能建立大量的幼儿园成了今天革命所关心的事情，革命关心建立学校食堂以及创造使妇女不再成为厨房的奴隶的那些条件。（掌声）关心建立洗衣店的事。（掌声）

自然，这些机构中的某几种，例如幼儿园的最高限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到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的。因此，今年正强调在古巴各主要工厂里建立工人食堂，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把重点放在建立学校食堂的工作中。（掌声）

这些机构的发展，将允许妇女愈来愈多地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和参加国家生活。不仅是参加各项经济活动，而且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掌声）

今天，这些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妇女们是有条件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的。

古巴代表团也谈到了革命在教育战线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关于这个问题几乎都不需要说什么了，只要看一看就够了。因为这个运动是可以感觉到，是看得见的。这个运动正在为古巴缔造伟大的前途，这个运动表明了计划好的革命的努力，特别是走向未来的努力，由于这种努力已经使得在校儿童数量成倍增加，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成倍增加，文盲被扫除，并将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在优秀的青年人的创造努力下向前迈进，这些青年人是应该继承革命为这青年一代正在创造的各种条件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赢得进行这一切的权利，而是如何把这一切做得最好，尽可能地做得最完善。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美洲各国妇女的处境与古巴妇女的一个区别在于，古巴妇女有机会进行这一切，而美洲妇女还没有这种机会。

我们的问题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做这一切，我们如何能把这一切做得更好。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例如说——使近十万青年学生享受国家公费的问题，而是如何组织他们，如何使他们学习的那些学校日益提高效率，如何培养师资，如何进行好这项任务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多工作，恰恰相反，在革命中工作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革命在前进过程中创造着愈来愈多的人力资源。说明如何创造这些人力资源的一个例子是，前几天曾经必须在我们的首都接待来自奥连特省的约一万名农村女青年。（掌声）由谁来担负这项任务呢？妇女联合会站到了这项工作的最前头。但是，妇女联合会承担了接



待所有公費学生的工作，沒有足够的干部，但是虽然如此，有一所培养教員的学校，这所学校是由那些在一九六一年参加过偉大扫盲运动的女扫盲队员中挑选出来的人組成的，在这所学校里有一千一百名青年为了当女教員而进行着学习，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领导这所学校的同志是一位偉大的女教育家，因为她知道怎样培养人才。她就是埃倫娜·希尔同志。（掌声）她开始时培养了三百名女革命教导师，（掌声）就是說在自願到山上去教书的几批青年中培养了三百名女教員。她开始时为三百名女教导师而工作，培养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姑娘們讀書的夜校中任教的三百名革命教导师。（掌声）

这就是第一所学校，第一批的三百人。依靠这三百人組織起了夜校。随后又有了另外的三百人。她們的人数达到了六百。在这些女青年的帮助下建立了馬卡連科师范专科学校，（掌声）于是有了一千一百人，从这一千一百人中选出三百人学习了特殊的課程，依靠这三百人和其余的姑娘們組織起了接待来到这里的一万名女农民的学校。（掌声）

我們現在已經有干部了，那些进行扫盲运动的姑娘們，这些姑娘們已經学习了一年，她們已經具备紀律性和責任感。

走过从前百万富翁居住的这些大街，看到一群群穿着制服的姑娘們，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事。农村的姑娘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她們可能是去吃飯或是去上課，有一个穿着公費生制服的姑娘同她們走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她們比那些农村妇女要年輕，但是她們是领导人，她們站在一小組人的前头，站在她們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的前头，此外还是她們的教員。她們工作和学习。請想一想，这些女青年将怎样成长起来，她們已經担負起了这个責任，她們已經承担了严肃的任务，她們正在完成这些任务，她們有一个工作方法，她們把工作和学习結合在一起。这表明，得到培养的人数将会愈来愈多。

現在，我們應該建立一所学校，一所师范学校，一所高等学校，因为革命改变了培养教师的方法，在过去，教师只是在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培养的。革命改变了这种办法，建立了一个进行选拔和給予所有願意当教师的男女青年以實現願望机会的制度。这一工作是从山区开始的。（掌声）

因此，目前我們在山区有五千名青年开始为了当教师而进行第一年的学习。之后，这些青年人将再到一所学校里去学习两年，最后到一所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两年。这些女教师中許多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女青年熟悉山区和农村。

同时，我們正在筹办农村姑娘的学习班，这些姑娘們是四、五年級的学生并且願意开始学习当教师。在这一万名农村女青年中，我們將选择有才能的女青年，提高她們的水平，使她們能够进入那些学校去学习。

不久我們將有我們自己的拥有六千名学生的高等师范学校。我們可以动員这六千名学生，



使他們同时进行教学，把学习同工作结合起来。（掌声）

这一任务的完成要依靠在教育阵线上工作的一定数量的人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人多不多呢？不，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不多。但是当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项时，他就创造着我們能够称之为所学校的一切，这是一种工作作风。

我們这里像埃倫娜那样的人还不很多，但是将来我們会有成百上千个埃倫娜，她們将是埃倫娜培养教导出来的好姑娘。（掌声）我們的中小学校、我們的高等学校将一天比一天多，我們的教育部門需要很多干部，来負責筹办和领导这些学校。

革命就是这样靠着青年人得到发展。能够做到这样。我們爭取到了开始实现这一切的条件。拉丁美洲的同志們在这里为我們描绘了一幅本大陆的真实图景，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們认为，应当把她們的全部报告集印成一册，在我們这里和国外散发；（掌声）在我們这里和国外，在拉丁美洲散发。

她們提供的数字令人心情異常沉重，她們說明了有多少孩子沒有学校、沒有老师，有多少孩子营养不良；全部儿童有多少，而有多大的百分比能念到六年級，有多大的百分比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有多大的百分比能上大学。

她們提供的数字还說明了婴儿死亡率，这是不卫生的居住条件、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不好的結果。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这种情况，因为今天我們已經能够說，我們这里沒有一个害脊髓灰白质炎而致殘廢的孩子；（掌声）我們可以說，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得到治疗而活了命。国家的公共卫生計劃不断地扩大，我們医院的床位数目几乎增加了两倍；公共卫生事业的撥款增加了四倍。

今天这已經不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还是整个大陆的問題。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以滿足各种各样的需要，根除帝国主义剝削遗留下来的貧困。这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工作是艰巨的、費力的、困难的，在帝国主义魔爪还时刻威胁着我們的时候，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始終仇視我們的时候，实现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如何进行这项工作，这就是我們的問題，如何保卫革命和我国主权，同时繼續前进，这就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这不是你們美洲妇女的問題。

你們的問題，你們本国人民的問題是，如何爭取到像我們一样进行这种工作的条件。（掌声）我們确信，我們將繼續前进。我們确信，不論牺牲是多还是少，我們迟早会战胜困难。我們确信，帝国主义者打敗不了我們，（掌声）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会有屈服者。（掌声）人們宁可倒下牺牲，決不屈服。（掌声）

假如美帝国主义者有朝一日竟决心投入它的全部人力物力，企图消灭我国，他們充其量



只能說：我們消灭了它，然而沒有能打败它。（掌声）

我們了解籠罩在我們头上的危險，但是我們也了解，存在着整个大陆，存在着整个世界，我們并不仅仅是古巴人，我們是拉丁美洲人！（掌声，群众喊革命口号）我們还不仅于此，因为我們不仅是拉丁美洲人，而且我們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掌声）重要的是人类的胜利。（掌声）我們了解，我們在反抗帝国主义者、坚定地反击美帝国主义者的同时，就是保卫人类的权利。（掌声）

我們古巴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今天——我再說一遍——我們的問題是工作和斗争，你們的問題是为以后工作而斗争。（掌声）因为这里有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是阴森森的、可怕的。这些数字是联合国教科文組織、或粮食和农业組織、或其他联合国組織作的統計，这些数字說明有多少人如何如何，另外多少人又如何如何；說明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有多少儿童不能上学，多少家庭沒有房子住，多少人营养不良，生活水平指数是多少，这些指数只等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剝削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半。这里有一些数字，包括死亡者的数字，这个数字比任何一次革命中死的人都多。（掌声）

在拉丁美洲一年內死亡的数字、在一年內餓死和由于沒有医疗而病死的人的这个数字要比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将为解放自己而死的人多。（掌声）

因为在这里，斗争夺去了两万人的生命，但是拯救下来的人比两万人多好多倍。（掌声）

我們可以等待和繼續积累数字，这些数以百万計的倒霉的人、不幸的人、被剝削的人和受苦受难的人——数字在这里——是封建剝削和帝国主义剝削造成的。数字的問題不应局限于把这些数字写进一个图表或一个小册子，而是應該考虑怎样改变这种形势。（掌声）

有些人是数字专家，但是他們應該成为改变形势的专家，成为引导人民走向革命的专家。（掌声）革命者的艺术就在于此，必須学习和必須发展怎样引导群众投入斗争的这种艺术。因为群众創造历史，但是为了使他們能够創造历史，就必须引导群众投入斗争。

这就是领导人和革命組織的任务，发动群众，使群众投入战斗。（掌声）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做过的事。（掌声）这就是越南南方爱国志士們正在做的事。（掌声）他們以正确的方法、以正确的策略使群众投入了斗争。他們使尽可能多的群众卷入了斗争。这就是我們做过的事情，因为夺取了政权的并不是我們从前有一天处于分散状态的四、五个人或六、七个人，而是为反对暴政而斗争的群众运动，这一斗争最后取得了人民的胜利。

关于这些問題，我們想对一种概念进行澄清，因为有些老朽的理論家說，在古巴发生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曾經有千万名战士牺牲了生命。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一支出自人民內部的军队打败了为美帝国主义所武装和訓練的現代化军队。（掌声）等于否认在我們农民的头上、在我們的城市和村鎮，曾經落下带有“美国制



造”标记的炸弹和燃烧弹。等于否认我国人民的巨大的斗争。等于否认“吉隆滩”以及在那里牺牲的烈士们。(掌声)

这不是什么和平过渡，而是战斗的过渡，没有这个战斗，在我们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渡。没有这一英勇的斗争，没有古巴人民的这一武装斗争，那么在我们这里就会仍然存在着美国制造的巴蒂斯塔先生。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至少在有关我们真实历史的问题上，我们有发言权。而不要某些远方的理论家来告诉我们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却从来也没有到这里来过。(掌声)

不要为讲出这些事情红脸，不要小声讲，要大声讲，好让人们听到，让人们真的听到，让各国人民听到，因为这样曲解历史势必造成正合帝国主义心意的顺从心理，造成听天由命思想和改良主义，造成在进行革命的问题上无限期地等待的政策。

这样曲解历史是不符合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的，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客观条件，帝国主义者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缺少主观条件。

应该创造这些主观条件，应该依靠历史真实，而不是靠歪曲历史来创造这些主观条件。说古巴存在天赐的和平过渡，并不能创造出主观条件。

这不是由于他们胆小，而是由于他们糊涂，在认识上有错误。我们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仍然期待着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我们不否认这点，是因为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

我们知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不断地在变化。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指出这里不曾有过和平过渡，我们要反对利用古巴的例子来造成其他国家革命者的思想混乱，在那些国家中存在着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古巴做得到的事那些国家也能做得到。(掌声)

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一心一意希望世界上没有革命者，这是当然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力图诽谤古巴革命，造谣欺骗，散布骇人听闻的流言，造成人民对革命的恐惧。但是，如果有人企图从革命立场出发制造顺从心理或对革命的恐惧，那是荒唐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宣扬顺从心理，革命的理论家要宣传不害怕革命。(掌声)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在哈瓦那宣言中就是这样说的，这一宣言在某些兄弟国家中得到某些革命组织的尊重，得到了“塞入抽屉里的尊重”，而其实应该把它广为传播，这是它当之无愧的。那样做就像我们把你们在这里讨论的一切塞入抽屉中一样，当然，如果我们不想让群众知道，那是应该塞入抽屉中的。但是如果告诉群众，形势就是这样，那么就告诉他们该走那条道路，应该引导他们去斗争，因为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走这条道路比古巴当年要容易得多。



为了不使那些理论家发火，我想说明我们不是在不负责任地一概而论。我想说明，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因此我们没有一概而论，而是说大多数情况。我们知道也有例外，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不存在这些客观条件，但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存在这些客观条件。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有责任在这里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在四十年后，我们不再像今天这样生活在争吵中，我们的子孙和你们的子孙不再争论同样的问题。（掌声）

我国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和巨大的危险。不应该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应该正视事实真相。我国正处于一个充满各种危险的、有着巨大危险的阶段，我们一方面面对着美帝国主义这个最侵略成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已把摧毁我国革命定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存在着有害和不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情况。

首先我想说，对我们说来，加勒比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掌声）我想说，我们的意见是，我国革命领导的意见是，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没有赢得和平，这是不同的。

难道迫使我们采取我们曾经采取的那些措施和迫使我们采取我们曾经采取的那些步骤的一切情况不是依然存在吗？难道美帝国主义者公然宣称的敌视和侵略我国的政策不是依然存在吗？我们不相信肯尼迪的话，但是，此外，肯尼迪并没许下什么诺言！如果说他曾经许了什么诺言，那么他已经取消了。

因此，我们说，对我们说来，并不存在符合我们由于那次危机而提出来的五点要求的令人满意的保证。（掌声）

在这些有所争论的尖锐问题上，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应该是明确的。如果说我们仍然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援而没有被摧毁的话，这是实话。如果说我们仍在这里是由于肯尼迪的诺言，这就不是真实的。

由于那种声援，我们已经抵抗了四年。现在，好吧，那么什么是对我们的和平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和平呢？自从肯尼迪在奥兰季博尔发表谈话以来，帝国主义特务犯下了四次谋杀罪行。他们杀害了一个享受公费在特里尼达德度假的农民。他们在拉斯维利亚斯省活活烧死了一个工人，一个从事造林工作的工人。他们在圣安东尼奥·德拉斯维加斯杀害了一个十一岁的儿童。他们还在马坦萨斯省杀害了革命领导委员会的两个同志。美国特务佩带美国武器，执行美国命令；帝国主义者公开宣布的颠覆政策。

我们当时是怎样说的呢？我们说，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企图通过饥饿来扼杀我国、孤立我国，在空中和海洋的一切航线上施加压力，企图断绝我们的基本原料物资的供应，在我国制造饥饿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不顾国际法、不顾联合国要求的原則而执行这一封锁我们、给我们制造各种不可设想的困难的政策的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扰乱社



会秩序、运送武器和派入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对这些人进行训练和组织雇佣军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组织海盗集团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有权霸占对准我国心脏的我们一块领土的话，怎么能使问题获得解决呢？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要求撤走朋友的武器而保留安置在古巴祖国领土上的敌人的武器呢？这是进行侵略的武器，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这样干？（掌声）

肯尼迪先生在危机以后发表的三次谈话中使用了威胁性的欲言又止的语言，坚持他的使用经济、政治和其他种类的压力来反对古巴的政策，他说如果我们不策动颠覆活动，他就保证不入侵。

可是，对肯尼迪说来，这就是颠覆。我们是“很讨厌的”。有一个妇女代表大会在谈论拉丁美洲的饥饿和可怕的贫困，这就是颠覆。

肯尼迪在奥兰季博尔向雇佣军讲话的时候说，他将在哈瓦那把雇佣军的旗帜交还他们；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讲话时说，美国没有承担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如果说美国曾经作过保证的话，那么仅仅是就最近的局势而言，与它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作的保证无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哪里还有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呢？美国国务卿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没有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好像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所有准则都不能约束他们不侵略我国似的。显然，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利侵略我国的。

他们在这样说的时侯，除了否认不入侵的保证外，还再次否认他们根据国际法有不进行侵略的义务。此外，他们还证明了美国统治者的强盗和海盗的本性。（掌声）

我认为不需要陈述很多理由。讲过的话在这儿，事实也在这儿。因此我们说避免了一次战争，这是好的；但是，没有赢得和平，这不好。局势就是这样。

帝国主义者产生了某种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反映在他们的估计中。我认为这种乐观情绪是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的，它只不过是对于世界现实的低估，对各国人民力量的低估。

当然，他们希望在拉丁美洲连一根指头都不要动一动。他们希望各国人民不要起来斗争，例如，英雄的委内瑞拉人民的榜样对他们说来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他们希望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在更加惨无人道的剥削的基础上为其长远统治奠定各种基础，因为所有这一切纲领总是以所谓的节约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使劳动者更加贫困，使群众忍受更多的牺牲。

谁也不会怀疑，“争取进步联盟”决不会得逞。因为很简单，这是一种剥削的、统治的和落后的政策，这个“联盟”的伙计们是像斯特罗斯纳、吉多、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索摩查



家族以及秘魯猩猩派委员会那样的人物。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进步人物”。

美国帝国的“联盟”就是同这些“进步人物”的联盟，同拉丁美洲最落后、最反动和最腐朽的阶层的“联盟”。

这是行不通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帝国主义为进行欺騙和混淆视听的一个絕望企图。

肯尼迪先生在他的一篇讲话中说，“让我们把古巴和‘争取进步联盟’比较一下。”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那么肯尼迪先生是失败了。因为尽管帝国主义进行了各种宣传，而在这里事实是，每个儿童每天都保证得到一公升牛奶。（掌声）

我们必须实行定量供应，简单地說这是因为就业人数大量增加了，近五十万人开始工作了并有了自己的收入，农民不再支付地租，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教育全部免费，医院业务增加了四倍，人民无可比拟地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每个家庭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他们需要的物品。因为在这里还有一大批有钱人，他们足以进行各种投机活动。

如果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这是价格问题的话，那就让他们用价格来解决吧。如果每公升牛奶上涨到两比索，只有那些拥有两比索的人才能得到；如果每磅大米上涨到三比索，那么也只有那些拥有三比索的人才能得到，如果肉上涨到五比索，也只有那些拥有五比索的人才能得到。那就不会有定量分配，情况会坏的多。有钱的人可以得到一切，而没有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可是他们却企图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制造混乱。

我曾说过，我国面临着由于两种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首先，我国是美帝国主义当前的主要攻击目标；其次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的分裂，或者像有人多少有点乐观地所称的分歧。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会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我认为，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的人企图危害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掌声）

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这一现实是令人痛心的，是严重的。我们说过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任务是：不要对这些分歧火上加油，而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根据原则的团结而斗争！（掌声）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争取团结。（掌声）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丰富的思想财富和經驗，足以从中找到克服这些困难、克服这些障碍的适当方式。这是一个是否打算这样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斗争，为这种团结而斗争，我们根据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论点而打算这样做。是沙文主义者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掌声）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它就在这里，它有危险性，有侵略性。不发达世界还存在，而且就在这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在



这里，在安哥拉、在越南南方、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个地方进行着斗争！这一斗争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力量团结起来！（掌声）

遗憾的是，十分遗憾的是，出现了这些分歧。在这些分歧面前应该斗争，因为团结是首要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掌声）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毕生不倦和不懈地为这一联合而斗争。这就是我们、我们的政治领导当局、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要说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掌声）联合起来对付阶级敌人，对付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对付侵略者，对付好战分子。

这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立场，我们全国领导当局和我国人民的见解，我国人民已经在困难的时刻，在困难环境中取得了前进。因为我国人民在这几天通过了重大考验：面对肯尼迪的威胁、面对他威胁把我们变成原子目标的勇气的考验。肯定地说，我国人民的神经不像美国五角大楼将军们的神经震动得那么大！

有个别的人发出了抨击。很自然，有一些好心的感到困惑的人，或是居心不良的迷惑不清的人，就古巴自从危机发生以来在视察问题和海盗飞行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批评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对这些人来说，好像我们应该让人来视察，授权帝国主义者宣布我们可以和不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使这个国家退回到由普拉特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是由美国政府代替我们做出决定的。

接受视察就是表示同意必须向美帝国主义者报告我们在我们国土上可以和不可以拥有哪些武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这等于放弃我们的主权，等于承认我们国家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中低人一等。所以，我们现在不接受、将来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掌声）

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人还认为，应该让他们登陆而对他们不放一枪，因为走这条道路可以落到这个结局。而走这样的道路，革命就不能取得政权，走这样的道路，就不能在吉隆滩保卫住革命，而所有这些都只有走坚定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另一种道路才能取得。

但是看来，这些人以为我们应该不下达开火命令而让美国飞机在我们的高射炮头上“俯冲”飞行。这一点，我们也永远办不到，因为每当敌人侵略我们时，等待着他们的将永远是战斗，而不是变节！（鼓掌并高呼：“菲德尔，坚定，狠狠地打美国佬！”）

不会没有人说、不会没有人企图说我们反对和平政策。仍然是同一个回答：我们要的是拥有权利、拥有主权和拥有尊严的和平！（掌声）我们要和平，但决不会不干革命，决不放棄革命！

当我们同入侵吉隆滩的人、同轰炸我们的人、同进攻我们的人战斗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在保卫和平；当我国人民组织起来，决心在我们受到进攻时同帝国主义者战斗到最后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在保卫和平，因为抵抗侵略就是为和平而



斗争。向侵略者投降是战争的道路，是奴役各国人民的道路。我们在保卫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权利的同时，就是在保卫和平。

当我们向拉丁美洲人谈话，向他们说存在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们是在保卫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越弱，它的危险性就越小；帝国主义越弱，它的侵略性就越小。而解放事业，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削弱着帝国主义者，削弱他们的侵略性，减少他们的危险性。各国人民维护自己的主权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就是维护和平的斗争。

我们认为，如果和平是人类的基本目标，那么让我们在沿着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解放的道路前进的同时，为和平而斗争吧；我们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而斗争的同时，就是在为和平而斗争。（掌声）

我们是战争的敌人，正是帝国主义者把战争强加给人类。帝国主义者越是觉得自己强大，他们的危险性就越大。因此，每个为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人民都在保卫着和平。

我们紧密团结一致的古巴革命者就是这样想的。那些以为可以“混水摸鱼”的人错了。有些人以为在我国人民团结、坚定和尊严的意志面前可以机会主义地制造混乱，可以怀疑古巴革命领导的正确性，很遗憾，他们弄错了，因为这表明，他们不了解古巴人民，不了解我国人民的品质。那些利用祖国曾经经历过和目前正在经历着的各种困难促进分裂的人，正在犯一种令人遗憾的背叛革命的错误，群众将制止阴谋家，制止分裂主义者，并追随我们党的路线，追随革命领导机构为他们制定的路线！因为他们将说：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就是我们领导人的路线，我们对这种路线抱有信心！（掌声）

这将是我国人民的态度，将是我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他们不灰心丧气，他们不害怕斗争，他们不害怕任何困难的环境。这里将不会出现分裂。这里将出现团结，因为我们需要团结，因为我们面前还有企图毁灭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我们需要团结以便斗争，我们需要团结以便取得胜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团结以便大踏步前进。只要我们保持团结、保持坚定以及坚持我们的路线，我们就将继续前进，战胜任何困难，战胜任何障碍。我们将行使按照自己的见解进行思考的权利，我们将坚持我们的革命思想。（掌声）这种思想的头一条座右铭是：反对帝国主义敌人、同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战斗，继续前进，决不在祖国的历史上后退一步，在革命队伍中决不动摇！在帝国主义者面前继续前进。

帝国主义者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美洲的敌人。

我们将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誓死保卫祖国！

我们必胜！（掌声和欢呼声）



把工业支援农业的 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 許 辛 学 ·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国工业各部门支援农业的工作，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就是：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为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它将决定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充分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马克思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这个原理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同时，工业必须在农业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因为要发展农业，就需要有工业的大力支援，使农业实现现代化。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保证工业有相应的发展，要使工业现代化。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它的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地保证供应农业在技术改革方面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工业的发展，怎样才算以农业为基础呢？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发展的规模，要同农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等条件相适应，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所提供的这些条件；第二，工业的发展要以我国拥有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积极地为农业技术改革和农民生活服务，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工业部门才有可能真正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把我国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大家知道，我国已经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这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把我国的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因此，必须供应集体农民以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以及生活必需品，以保证广大农民能够正常地进行生产，发挥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5页。



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在这个伟大任务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工业部门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愈好，工业的主导作用就愈大，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就愈快，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愈快。

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不仅是农业的需要，而且也是工业本身发展所需要的，是我国工业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从为农业的技术改革服务来着手发展我国工业，工业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而不会是慢一些。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①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

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国工业的发展，凡是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时候，发展就快一些；哪些行业正确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哪些行业的发展就快一些。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

工业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两大生产部门。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关系。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措施，使我国国民经济得以顺利地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我国大规模地展开工业建设以后，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当时的个体农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矛盾。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决定，迅速地实现了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初步地顺利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使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同工业现代化的步骤相适应，为顺利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提出了以加强农业为主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工业同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

我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经过近两年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力量也加强了。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现代化大工业，其中包括现代化的拖拉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机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农药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材料工业、燃料工业等等，并且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技术改造服务的小型工业。同时，为农业提供的工业产品的数量也比过去增多了。例如，一九六二年化肥的产量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分配给农业用的木材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小型铁木农具已能基本满足广大农村的需要，其他一些重要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并且已经为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在同近几年来严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工业对于农业的支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的工业部门的工作都已经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了呢？不能这样说。应当看到，要真正做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真正做到能够供应集体农业以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还距离很远。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经过一段极为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我国工业经过近二年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并且获得了一些宝贵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同党所提出的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要求来衡量，已经做的还只是这一工作的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调整工作；至于说供应集体农业以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则还需要做更多更多的工作。

支援农业，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

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各工业部门，必须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树立正确的、全面的支援农业的思想，严格要求、积极主动，克服一切错误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快工作的进程，把工作做好。自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把工业部门的工作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任务以来，我国各个工业部门的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已经获得了一些重大的新成就。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少数人思想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有人认为，支援农业主要是那些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业部门的事，与非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某些工业关系不大。的确，在工业中，有一部分同农业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例如，农业机械工业、化学肥料工业、农药制造工业等等。这一部分工业，当然它的全部任务就是为农业服务。另外有一些工业，我们主要指的是原料、材料的基本工业，不是那样直接为农业服务。但是，绝不能说，这一部分工业同农业关系不大。它们不是直接为农业服务，但是，它们是更重要的，没有原料、材料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就建立不起来。例如，钢铁工业的产品，主要的不能直接用于农业生产，但是，农业机械和农具必须依靠钢铁工业提供原料和材料，没有品种齐全的钢铁工业，就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工业和其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的需要。其他许多原料、材料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类工业在支援农业的工作中，必须发挥更大的积极



性。这类工业越主动，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就越有条件把工作做好。如果认为不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就与农业关系不大，显然就不能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就一定会影响整个工业支援农业工作的进行。

有人认为，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工作，就算是已经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了。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解决了。应该承认，的确有一大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他们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他们从思想认识到具体措施，都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并且做出了成绩，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一部分企业应该更进一步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必须看到，仍然还有一部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虽然他们是为支援农业而生产，但是，他们还没有转得很彻底。有的企业还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农业服务，他们的措施还不够有力。例如，有的企业怕产值小、赚钱少，只愿制造而不愿做农业机械等十分需要的修理工作，对农业机械、农药、化学肥料如何使用、如何才能能在农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的技术传授工作做得很差，有的对农民服务的态度不积极、不热情，有不少工业企业支援农业的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品种少，不受农民欢迎，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已经完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部门，仍然必须把工作提高一步，才能适应农业技术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需要。如果认为，凡是为农业直接服务的工业部门，他们的工作就算是已经转移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就满足起来，那

么，这就妨碍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认真地采取措施，解决还存在的问题。显然，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农业的技术改革。非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特别像机械工业，还必须做更大的调整工作。

因此，必须进一步在广大职工群众中，进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教育，树立全面支援农业的思想。为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中，工业部门在明确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之后，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

正确的计划，是做好工业支援农业工作的第一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需要以工业的现代化为前提，两者是不能分割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工业；在积极发展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的同时，要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原料、材料的基本工业。这就是说，规划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时候，必须要有综合平衡。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工业同农业之间需要有正确的比例，在工业内部也需要有正确的比例。否则，工业就不可能长期有效地支援农业，也必然会妨碍工业本身的发展。因此，整个国民经济、各地区、各工业部门都应该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实际需要，制订出支援农业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有效地支援农业，并且可以既使农业得到发展，



又能相应地发展工业，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高涨。

在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中，各工业部门增加产品品种、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有着重大意义。

农业技术改革所需要的机器、工具和设备是多种多样的，制造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成千上万。据统计，仅二十种农业机械和轻工业产品所需要的钢材规格，就达三千四百九十一一种。制造一架“东方红”牌拖拉机需要三百七十二个规格的钢材，制造一辆“解放牌”汽车需要七百三十八个规格的钢材。没有品种、规格齐全的材料，就很难制造出质量良好的农业机械、工具和其他各种设备，甚至根本造不成农业机械。我国虽已建立了一些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并且经过近二年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各种产品的品种、规格增加了。但是，要完全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对我国的工业来说，还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我们经常说要自力更生，首先应当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产品品种、规格的增加，标志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有赖于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成。但是，集中力量早些解决那些农业技术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工业产品的品种、规格，是十分必要也是有可能的。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要领导重视和集中力量，就有可能更快地做到这一点。也只有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更多更快地制造出质量优良的农业技术装备。

产品质量的好坏，是考核每个工业企业支援农业成绩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家知道，质量同数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质量好的机械和工具，使用的時間就会长，可以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费用，否则，机械设备使用的寿命就要短，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生产费用。对产品不仅应计算数量多少，而更重要的要计算这种产品的使用時間，一种产品生产十件，它的使用時間如果每件只是一千小时，远不如生产五件而每件使用時間是两千小时。特别是随着工业为农业制造的机器设备日渐增多，质量的问题将显得更加重要。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使产品质量有了极大的改进。但是，现在仍然有些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很低，或不适合农民需要，不受农民欢迎。因此，拿出更多的质量好的产品供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仍然是各工业部门的一个严重任务。很多工业企业提出产品“质量第一”，有些工业企业提出“质量不好不出门”，这些口号都是必要的。每个企业都应该切实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拿出质量优良的产品支援农业，从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些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部门，往往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认为提高产品质量主要决定于所使用的原料、材料的质量，而放松本部门的努力。这显然是不对的。质量良好的原料、材料是生产质量良好的产品的重要条件之一，每一个工业部门都应该强调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原料、材料的



部門，應該供應製造機器和農具的部門以質量良好的原料、材料。對每一個工業部門說，產品質量的好壞，決定因素主要在於本部門的工作，特別是技術管理工作。人們有這樣的經驗，如果自己工作做得不好，好的原料、材料，也有可能製成質量不好的產品；如果技術管理好，用一些質量並不很好的原料、材料，也可以做出質量好的產品。

工業部門在支援農業的工作中，不僅要拿出質量好的產品，而且應當拿出成本最低的產品。這對加速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有著重大作用。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很多，所需要的資金也是很多的。但是，我國是一個窮國，農業現代化的資金必須從農業的發展中一点一滴地積累起來。集體農民只能用有限的資金向工業部門購買各種工業產品。工業支援農業的各種產品，如果成本高，同樣的資金可以買得的機器設備和其他工業產品就少，這樣，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時間就長；相反，如果支援農業的各種機器、設備和其他工業產品成本低，農民用同樣的資金就可以買到更多的機器、設備和其他工業產品，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時間就會加快。因此，不斷降低產品成本，用價廉物美的產品供給農業，是工業戰線上廣大職工的一個極為光榮的任務。這裡值得指出的是，應該糾正這樣一種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認為，降低產品成本與提高產品質量之間是矛盾的。他們說，要提高產品質量就要用價格高的原料和材料，因此，就不能降低產品成本。否則，就不能提高產品

質量。這樣看問題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有些質量好的產品用的原料、材料的價格較高，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產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很多工業產品的成本高，並不是因為原料、材料的價格較高，而是由於企業的管理不善和勞動生產率不高所致。因此，一切工業部門應該加強企業管理，加強經濟核算，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這樣，才能降低產品成本。

貫徹執行黨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實現我國農業的現代化，是一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國工業部門，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把支援農業的工作大大提高一步。它要求工業部門根據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繼續貫徹執行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整個工業中，把那些與實現農業現代化有重大關係的、最迫切需要的工業放在首要地位。例如，當前應該特別努力發展煤炭、有色金屬、石油、化工產品和木材等工業，一切工業部門都應該把支援農業的工作切實地放在首位，進一步加強企業管理，加強經濟核算，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為農業生產出數量更多、質量更好、成本更低、更適合農業需要的產品。只要這樣，我國的工業就一定能在國民經濟中起到更大的主導作用，迅速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實現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並且更快地發展我國的工業，全面提高我國的經濟水平。



加強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

林 一 舟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全党全民在党中央的方針政策的指导下，正在积极动員起来，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經濟。这一形势，对于人民公社做好各項工作是空前有利的。同时，这一形势，也对人民公社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公社应当迅速地把自已的各項工作切实加强起来，尤其是要切实加强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發揮内部潜力。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都要在这里贯彻执行，人民公社集体經濟的优越性要通过公社各級的活动特别是生产队的活动体现出来。做好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党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就能使集体經濟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發揮，农业生产更加迅

速地发展。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它涉及生产、分配、交換、消費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制約，不可分割。无论哪一个环节上的工作做不好，都会影响集体經濟的巩固和发展。其中，組織好生产和分配是最重要的环节。

人民公社生产队要組織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要正确合理地組織劳动，另一方面，要正确合理地使用生产資料和現金。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制度为充分發揮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要使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能够充分發揮出来，在加强对社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有賴于合理地組織劳动。对于劳动組織的問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經予以高度的重視，他說：“各大企业和农村公社的劳动組織，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①。人民公社生产队对于劳动力組織和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7頁。



使用得好，就可以充分发挥集体劳动中分工协作的优越性，创造出伟大的“集体力”。相反地，如果组织和使用不好，不仅不能产生“集体力”，还可能造成窝工浪费，降低劳动生产率。合理地组织劳动，就是要使劳动者在生产中能够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一方面使每个社员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中应当做的工作、应当负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又使每个社员都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且互相得到良好的配合。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不断地提高组织劳动的能力，建立适合自己情况的各种劳动组织，加强生产中的责任制度，在安排活路的时候，尽量做到适合各人的体力、技术等状况，并做好按劳计酬的工作。

生产资料和现金能否得到正确合理的使用，对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生产好坏、劳动生产率高低，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同样的土地，种这种作物还是种那种作物，种一季还是种两季，连作还是轮作；同样的农业机械，使用时间是长是短，利用率是高是低，保管与护养是好是坏；同样的肥料，使用时是否适合土壤的性质，是否适合作物生长的需要，使用方法是否科学；同样数量的现金，投入这一项目还是投入那一项目的生产，投入当前生产还是投入基本建设，投入收效快的基本建设还是投入收效慢的基本建设，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不同的效果，正是经营管理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不断地提高使用和安排生产资料和现金的能力，处处事事讲求经济效果，充分发挥所有生产资料

和现金的最大效用，防止损失和浪费。

人民公社生产队要做好分配工作，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重要的指示。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①人民公社生产队首先要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农副产品的任务，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根本利益。生产队也要有一定的积累。没有积累，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就不能发展集体经济，因而也就不能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但是，积累不能过多。积累过多，就必然要缩小用于社员消费部分的比重，这就会影响社员的当前收入，不利于发扬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怎样才能处理得正确，这要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生产队生产规模的大小、生产条件的好坏、人口的多少以及年成的丰歉等等。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正确地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样，就能有力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社员的收入。

做好生产队分配工作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各尽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人民公社生产队只有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原则，才能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发挥每个人的劳动技能，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地，如果这个原则贯彻执行得不好，采用平均主义的或者其他错误的分配方法，那就势必会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生产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做好一系列的组织和思想工作，尤其是要做好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劳动的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的工作，同时也要以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精神教育社员，使有实际困难的社员得到适当的照顾。

做好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首先需要树立正确对待经营管理的观点。

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得到最终的巩固。农村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农业部门正在以很大的注意力来抓农业的技术改革，抓发展生产力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加强对农业技术改革的领导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人民公社生产队经营管理的领导，而应当正确地处理农业的技术改革和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这两方面工作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力和调节生产关系密切地结合起来。

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做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一方面，农业技术改革的实现，是一个

长时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农业生产还不能不依靠原有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正确合理地组织现有的生产力，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仍然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只有在生产发展、收益增加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生产队才有力量购置和使用现代化的生产资料，才能够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做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正是为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创造条件；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正是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推进，人民公社生产队将愈来愈多地使用新式农具和现代机器、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上来。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就需要生产队具有更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应用现代机器、现代技术，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知识，需要有一套严密的科学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应地做好其他一系列的工作。以拖拉机为例，要把它使用好，就要懂得它的性能、它的耕作原理，就要有一套使用、保养、维修制度，就要采用与拖拉机耕作相适应的耕作制度，就要创造条件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等等。如果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不健全，国家支援的许多生产物资和资金不但不能很好地发挥效用，反而可能被损坏或浪费，以致国家和集体经济本身都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现代机器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也将给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组织工作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机器操作与其他许多专门技术措施的采用，将使农业劳动分工愈来愈



細，要求有更为良好的配合与协作。由于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由于机器操作广泛代替人工操作，劳动力在农业各部門之間以及在各部門內部的配置状况，将会发生变化。这些都要求不断地改进經營管理工作，創造更完善的生产管理方法和劳动組織方法。

现阶段我国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經濟組織。它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經濟。在人民公社集体經濟中，主要生产資料（包括土地、农业机器和大农具、耕畜等）归集体所有，統一使用；在国家計劃指导下，統一制訂生产計劃，統一安排生产，实行集体劳动，統一調配和使用劳动力；产品和現金收益归集体所有，統一分配。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只有坚持这些原則，才能發揮集体經濟的优越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集体經濟。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經濟条件、工作基础以及领导水平不同，各人民公社生产队所采用的經營管理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也就会带有自己的特点。在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原則的前提下，这种多样性，是应当容許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只有因地制宜地采用适合自己情况的經營管理的具体形式和方法，才能真正使經營管理工作适应生产的需要。但是，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經濟的原則为前提的。如果借口因地制宜而离开社会主义集体經濟的原則，那就必然会走上錯誤的道路。

目前，有些人民公社生产队，在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方面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如經濟

力量比較薄弱，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具有一定自然科学和經濟科学知識的人材比較缺乏，以及部分农民觉悟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管理集体經濟的經驗还不足，等等。对于这些困难，应有充分的估計，不能有絲毫忽視。不然，就不能很好地去克服这些困难。但是，这絕不是說，生产队的經營管理工作在現有条件下就不可能改进，不可能做得更好。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先进的生产队，条件并不比其他生产队好一些，有的甚至还差一些，但是，这些生产队經過頑强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經營管理工作却做得很好，劳动生产率、生产水平以及社員生活水平都比其他生产队显著地高。可見，生产队从現有的条件出发，进一步改善經營管理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管理好社会主义集体經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統总结已有的經驗。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虽然只有六、七年的历史，但是，广大干部和社員已經积累了不少的經營管理集体經濟的經驗。有一批先进的生产队已經建立和采用了一套比較科学、比較完善、比較适合当地情况的經營管理制度和方法。例如，在生产上，在国家計劃指导下，有計劃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經營；逐步采用先进的輪作制度、土壤耕作制度、土壤施肥制度、农田灌溉制度等等。在劳动管理上，建立了各項生产的責任制度和較为合理的劳动組織，实行定額管理。在财务管理上，建立了严格的財務會計制度、收支审批制度、实物保管制度，实行民主理財，勤儉办社。在收益分配上，既



注意公共积累的逐步扩大，又使社员收入有更多的增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使有困难的社员得到适当照顾，鼓舞了社员发展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等等。这些经验是十分可贵的，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因地制宜地学习和推广，对于普遍提高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做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求农村工作干部树立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地、经常地去抓这项工作。要蹲下来，钻进去，加强对生产队干部的领导，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能力，及时发现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找出改进和解决的办法，建立完善的制度，并且一贯到底地坚持执行。如果蹲不下来，钻不进去，只是远远地望一望，表面地抓一抓，或者有时抓有时又不抓，当然不能把经营管理工作做好，不能使经营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即使建立了一些制度，也会流于形式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做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还必须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群众的行动、群众的监督，是谈不到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他们的迫切要求，经营管理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群众也是看得最清楚的。认真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就能够及时发现经营管理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就能够找到改进和解决的办法，就能够逐步形成符合当地情况的、更加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并在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下，得以坚持执行。发动和依靠群众，首先是发动和依

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树立他们的优势，这是办好生产队的关键，也是做好生产队经营管理工作的关键。

事实证明，凡是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地方，真正下苦功夫，把工作做得扎实、深入、经常的地方，生产队就办得很不错，反之，即使有着比较优越的条件，生产队也不会办得很出色。

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需要做很多具体工作。根据许多人民公社的经验，当前特别需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是加强发展生产的计划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全面安排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有的人民公社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条件制定了一个几年的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计划，以及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这种做法对促进生产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其次，是建立和健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生产责任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需要建立作业组，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严格检查验收，认真实行评工计分制度。第三，是认真做好产品和现金收益的分配工作，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持少扣多分，尽可能地增加社员收入。第四，是建立和健全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一切财务开支都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并且定期向社员公布收支账目。

做好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执行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坚持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并加强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和监察



员的监察工作。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干部都要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学会走群众路线，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要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本领，克勤克俭地操持队务。

目前人民公社还有一批生产队，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所指出的，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这类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一般还没有走上轨道，应当帮助它们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首先要帮助它们充实领导核心，加强集体领导，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帮助它们建立和

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并使这些制度得到贯彻执行。着重地做好这一批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是各地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在，各地人民公社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整社工作。许多人民公社都把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作为整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当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经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地、一批一批地把所有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挖水渠（木刻）

刘 斌 明



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

戴 松 恩

作物良种是农业生产上的一种重要生产资料。选用良种是农业增产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项经济有效的技术措施。在其他农业增产技术措施不变的情况下，选用良种可以获得增产，增产的幅度也比较大。一般的情况是，在大面积生产上能够增产百分之十左右，在病虫害严重的地区，推广抗病抗虫的品种，有时竟能增产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至更多。

一般所说的作物良种，包括优良品种和优良种子两个方面。由于天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在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量的作物品种。这些作物品种，在形态、适应能力、生产能力和品质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在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和育种学发展以后，通过系统选择、杂交育种、杂种优势利用等研究工作，改造了大量的老品种，并创造了许多新品种。因此，优良品种的数量不断增加，品质不断改进。

作物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作物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对提高产量，增强作物对病虫害和其

他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改进产品品质，改变作物成熟期以适应种植制度，改进作物某些特性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和农业机械化方面的要求等，都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作物良种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它的产量较高。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良种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栽培条件而直接提高产量，或者抵抗不利的自然条件而减少损失，稳定产量。如碧蚂一号小麦、南大二四一九小麦、南特号水稻、岱字十五号棉花等，在大面积生产中一般都能比原有品种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这些良种生产能力的组成因素是互不相同的。如碧蚂一号小麦所以比当地品种蚂蚱麦丰产，是由于穗子和粒子较大，千粒重较重，麦粒皮薄，出粉率高，茎秆较硬，耐肥能力较强，不易倒伏，抗散黑穗病、抗春寒能力较强等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作物良种能够具有抵抗病虫害及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常有不同程度的病虫害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特别是病虫害的发生更为经常。如果选用能够抵抗病虫害或其他自然灾害的良种，就可以在人力、物力消耗较小的情况下，收到大面积防治的效果。例如，在东北的春小麦地区，



由于秆锈病为害严重，原有小麦品种几乎不能种植，一九五四年开始大量推广甘肃九六、合作二号等抗秆锈病品种，小麦产量因而得到稳定和不断提高。作物良种所以能够抗病，主要是因为有生理上过敏的作用，叶子表面气孔开闭的作用，细胞组织老化的作用，细胞中化学作用和外界条件的作用等等。有些小麦良种的叶子，当锈菌侵入后，产生一种过敏的作用，侵入点周围的细胞很快死亡，使病菌缺乏养分而不能生存。有些小麦品种受到锈菌侵袭时，叶子表面的气孔（即植物体内和外界交换气体的孔道）就关闭着，使病菌无法侵入。也有些小麦品种，在苗期由于细胞组织鲜嫩，病菌容易侵入，因而感病，但到了抽穗开花时，细胞组织老化，因而能够抗病。此外，有些作物良种还具有抵抗其他自然灾害的特性。如小麦良种南大二四一九和西农六〇二八，由于穗部内外颖壳扣合紧密，阻止了小麦吸浆虫产卵，因而表现了抗虫性；在广东省育成的矮株水稻良种矮脚南特、广场矮、江南矮等，都能抵抗台风。我们如能掌握住作物产生抗性的基本原因，对寻找抗性强的良种会起重要作用。

作物良种能够具有较高的品质。如小麦出粉率和蛋白质含量的提高，花生、大豆、油菜籽等含油量的提高，甘蔗、甜菜等含糖量的提高，棉花纤维长度和整齐度的提高，以及玉米籽粒中维生素甲含量的提高等等。改进作物品质对于提高产量具有重大意义。苏联育成一种新的向日葵品种，比原有品种含油量提高一倍左右，即使籽粒产量和原品

种相似，产油量就已提高了一倍。我国解放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棉花换种（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换种除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五左右外，纤维长度提高二至四毫米；第二次换种除了产量继续提高以外，纤维长度有的地区继续提高二至三毫米。棉花品质的改进不仅能提高纱布的质量，同时由于纤维整齐度的提高，棉花纤维的利用率也提高了。良种的品质特性一般不仅能够遗传下去，而且通过先进的鉴定方法进行选择，可以不断提高。以糖用甜菜为例。一七四七年世界上栽种的甜菜的含糖量只有百分之六。以后根据外部特征进行选择，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含糖量才提高到百分之九点八。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用新的旋光测定法进行选择以后，含糖量迅速提高，一八六八至一八八八年間所育成的甜菜新品种的含糖量平均提高到百分之十三点七，一九〇八年提高到百分之十八点一，一九二八年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一了。

作物良种能够具有早熟或中、晚熟的特性，以适应改变种植制度的要求。我国耕作制度多样化，复种指数又高，作物的前后茬衔接得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作物品种成熟早晚的不同，特别是利用早熟的作物品种，对于保证农业增产、提高复种指数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使原来不能种植的作物能够种植，或者多种一季作物。例如水稻农家优良品种石狩白毛，能够适应于无霜期只有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五天的黑龙江省北部地区，种植这种早熟品种，就可以充分利用当



地的自然条件来增种高产的水稻作物。又如，在华南、华中的双季稻地区，实行早、晚稻连作逐步代替早、晚稻间作，并复种一季冬作或绿肥，形成了一年三熟制；有的地区把单季早稻或晚稻插入其他后作，形成了二年五熟制。这些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培育出了适合于当地需要的早熟、中熟、晚熟的作物品种。

作物良种还能够具有其他特性，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固然要求农业机械能够适应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和条件；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使品种和栽培技术尽可能地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例如，要适应机械化收割的要求，水稻、小麦等作物必须是秆壮不易倒伏，不易落粒；棉花必须植株紧凑，棉铃比较集中；大豆结荚部位必须较高而且比较整齐；玉米结穗部位必须比较适中，结穗方向必须比较一致等等。这些要求是可以通过优良品种的选育而达到的。在生产上我们已经开始应用水稻、小麦、棉花、大豆等良种满足机械化收割的要求，就是很好的证明。

充分利用和推广现有良种

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已经选育出七百多个各种作物优良品种，其中有四百多个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育成推广的，但推广的面积还不够大，今后这些优良品种大有扩大推广的可能。根据已有经验，在良种推广工作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根据良种的地区适应性进行调

种。每个良种有它自己独特的生长发育规律和各种独特的性格，它们对外界环境条件产生极其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通常称做适应性。良种的适应性问题，一般地说，生育期长短（即成熟早晚）、耐肥耐瘠和耐湿耐旱如何、抗病与否等特性最为重要，对越冬作物来说，耐寒与否也很重要。一般作物可分为短日照作物（如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等）和长日照作物（如冬小麦）。北方日照较长，南方日照较短，把北方小麦品种引到长江流域种植，生育期一般延长；相反地把长江流域小麦引到北方种植，生育期一般缩短。北方地区的冬小麦品种耐寒，也耐春季的干旱，而南方地区的小麦品种耐湿，不耐寒和干旱。所以，南北地区互相引种小麦，虽然在生育期上可以调节利用，但是由于适应性有很大的不同，必须根据多年引种试验结果来决定。病害的发生是有地区性的，引种良种时必须因地制宜地注意到作物品种的抗病性问题。总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耕作、轮作、复种制度不同，栽培条件不同，引种良种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复种指数高的地区，就需要早熟品种；肥沃的水浇地区，就需要大穗大粒、多花多实、大叶、壮秆不倒的品种；旱薄地区，就需要植株矮小叶细、成熟早的品种等等。

最可靠的调用良种办法是通过试验。一般地讲，调用的良种要在有代表性的基点上，至少进行二、三年的区域试验，而后经过大面积的生产对比试验，才能将本地区内需要的良种肯定下来。这样做，主要因为自



然条件是多变的，可能今年多雨，明年干旱，没有一个良种在一定地区内能够年年适应，有的年份可能早熟品种丰产，有的年份可能晚熟品种丰产，有的年份改良品种丰产，有的年份农家优良品种丰产，经过二、三年的区域试验和一、二年的生产对比试验，就可以测定在大多数年份中表现最好的品种作为本地区的良种。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做太慢了，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表面上看似乎是如此，但实际上，区域试验资料已开始积累，并且如果年年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对比试验，工作就可以走上轨道，每年就可为生产提供良种。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试验，草率调用良种，快是快了，却不能取得增产的效果。

第二，要考虑良种所需要的栽培条件。由于培育条件和地区条件的差异，每个良种都需要一定的栽培条件。有的品种在较高的肥、水条件下育成，一般只能适应于条件优越的肥地。有的品种在中等的肥、水条件下育成，能够适应大面积生产的要求，也有可能是在肥地上和较瘠的地上获得比较好的收成。有的品种受着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特别适应于旱薄地。有些农家优良品种，它们的适应性虽然不广，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抗逆性特别强，能胜过改良品种，也是良种。所以，在较差的条件下，不要盲目推广良种来代替农家优良品种。在旱薄地上，如果推广需要肥、水条件比较高的良种，由于不能满足它对肥、水的要求，不仅不会增产，而且还会减产。因此，所谓良种是在一定条件下生长良好，并

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生长良好的。

第三，选用良种不仅要考虑到良种本身的产量，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轮作周期中所有作物的总产量。在农业生产中，提高一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轮作周期中的总产量。四川、湖北、江苏等省曾推广过产量较高的胜利油菜（大油菜），代替容易受病毒病为害、产量较低的小油菜，但是始终推广不开，主要是由于胜利油菜成熟晚半个来月，收获后不能及时种植水稻，使水稻产量大大降低。在江苏省南部种植的小麦农家优良品种抢水黄，虽然它的产量不及该地区推广的小麦良种南大二四一九，但是由于它成熟较早，收割后随即种植当地成熟较早的水稻良种黄壳早二十日，可获得较高的水稻产量。这样，小麦的产量虽然减少了一些，但是由于增加了水稻的产量，从而增加了全年粮食的总产量。

第四，选用良种后，还需要经常注意它在生产中的表现，及时利用好的变异，并解决发生的问题。一个良种的优良特性，在多数情况下，是相当稳定的。一个优良新品种一经育成，就可以用上十年八年，有的更长。如南大二四一九小麦，在生产上已经利用了二十多年，现在仍然受着长江流域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自然条件是多变的，这就必然会对作物品种的不同特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作物品种的特性经常发生变异。因而，一个优良新品种也可能没有利用多久，就会发生问题。作物品种的特性的变异，有的能够遗传下去，有的不能够遗传下去，在



这里，时间是决定性因素。短期的环境影响，如增施肥料、合理灌溉等等能够促使当代生长良好，如小麦抽穗多，穗子大，粒子大，千粒重高，因而产量特别高；如果下一年种在旱薄地上，抽穗就少，穗子和粒子就小，产量不高，这一类的变异是不能够遗传下去的。另一类变异是由于长期的环境条件的影响，或者由于作物品种群体的内部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自然产生的特性变异，或者由于天然杂交（即在自然界里互相串花）而分离出来的、经过天然选择的作用而稳定下来的新类型，这些都是能够遗传的变异，这些变异都是培育新品种的宝贵材料。利用这些能够遗传的变异类型，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选育出了无数的优良品种。所以，充分利用现有良种的同时，还应随时注意和利用许多能遗传的好的变异，为增加作物产量服务。此外，特别像抗病性这一特性，由于病菌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它的致病能力，或者由于病菌逐渐适应于它的寄主，或者由于品种本身在环境改变的影响下丧失了抗病能力，一个抗病品种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变成感病品种。因此，有必要经常注意一个良种在生产中的表现，如发现问题，应及早研究解决。

防止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

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是农业生产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一个良种，如果对它不注意选择，尤其是对它不注意繁育，品种和种子就会变坏，出现退化和混杂现象，造成减产，严重的可达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甚至更多。品

种退化和种子混杂还会降低产品品质。因此，选用良种后，还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以充分发挥品种和种子的生产能力。

品种退化是指品种原有的优良性状变劣，生活力降低。退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抗病抗旱等能力的消退，种子的变小，蛋白质含量的下降，油料作物含油量的降低，糖料作物含糖量的降低，纤维作物如棉花纤维整齐度和衣分的下降等。这种劣变不合乎人类的要求，而且能够遗传下去，所以这种现象叫做退化现象。

品种退化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天然杂交，农民称为串种或串花。这是常异交作物（大部分花朵是自交的，但有一小部分花朵是异交的，属有性繁殖）和异交作物（用其他植株的花粉来授粉，属有性繁殖）退化的主要原因。天然杂交后的种子所产生的植株常常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像原来的植株，有的像串花的植株，有的属于中间类型具备双方特性的一部分。如果已经混杂的植株再发生天然杂交，年复一年，出现的情况将是非常复杂的。天然杂交的结果，由于双亲或更多亲本的优良性状都混在一起和杂交后代的分离现象，后代中有好的个体出现，也有坏的个体出现，在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栽培条件下，具有不良性状的植株常常占着优势。

其次是不利的栽培条件和不良的自然因素，常常会引起品种的不良变异。如在粗放的栽培条件或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作物植株就矮小，穗子少而小，花少结实也



少，粒子小等等。这种不良变异，一部分由于长期的连续影响而能够积累起来遗传下去。品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包含着环境条件作用的性质、强度，特别是持续的时间。由于一时一地的环境条件的短期影响而产生的暂时性的不良变异是不遗传的，应该和可遗传的不良变异区别开来。但是必须指出，无性繁殖作物如马铃薯，如果在平原种植，由于结薯时期正值夏季高温，一般会由高温而引起病毒病。用这种薯块留种，下一年就会退化，一年严重一年。

第三是自然变异，即品种群体的内部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自然产生的性状变异。这些自然变异有的能够遗传下去，有的不能够遗传下去。能遗传下去的变异有两种可能发展的方向，一种是朝着作物品种本身生存所需要但不适合人类要求的性状发展，一种是朝着人类所需要的性状发展，前者就产生所谓退化现象。

防止品种退化的办法是：选择，特别是连续选择；改变作物生活条件，改进栽培技术；使作物在地区上或时间上隔离；人工辅助授粉等。混合选种（即片选、穗选或株选混合起来留种）是一般通行的、各类作物都适用的防止品种退化的选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我国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人民公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种子的主要内容。由于混合选种的增产效果比较显著，历年来各地都广泛采用。为防止马铃薯在平原地区种植退化，有不少地方每年都从纬度高、气温较凉爽的山区调运大量的种薯

播种，很不经济。因此，就有必要采用改进栽培技术的方法，以防止马铃薯退化。如采用春播早收或夏播留种以及春播、夏播相结合的两季栽培方法，使种薯在较低的温度下形成，可以大大减轻或基本防止退化。异交作物的玉米和十字花科蔬菜品种，以及常异交作物棉花和高粱等，都容易串花退化。为了克服这类作物的品种退化现象，除采用连续选择外，实行地区上或季节上的隔离繁殖，使不同品种在距离较远的田块上或在不同的季节里生长，就可以防止串花退化。十字花科蔬菜品种进行隔离繁殖，还可以防止先期抽苔，增加包心的比例。玉米实行人工辅助授粉，可以促使多结实，籽粒饱满，增加产量。

种子混杂是指不同类型、特别是不同品种的种子混合在一起。种子混杂会造成同一块田里作物生长发育参差不齐。如晚稻田里混杂早稻品种，晚稻收割时早稻的谷粒大都脱落。种子混杂的原因主要是机械混杂，常常由于播种、收获、脱粒时疏忽或缺乏防止条件而产生的。这种混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得到避免的，但是一般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如几种品种在同一块场地上打场，就很难打扫干净，因而常常引起品种混杂，年数越多混杂越严重，若不进行选种和定期的换种是无法克服的。还有一种机械混杂是由于从产区粮食仓库中调种造成的，这种“种子”常常是由许多品种的“种子”混合起来的，混杂程度一般是很高的。种子混杂的次要原因是天然杂交。由于天然杂



交，一方面造成一个品种退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个体的出现，造成种子混杂。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是有区别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着的。品种退化开始时，表示一个品种的生活力减退，它的种子一般不混杂；种子混杂开始时，表示在一个品种的种子内混杂着其他品种的种子，它的生活力一般不降低。到了以后，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的后果就难于分清了，因为退化的品种也开始表现种子混杂了，混杂的种子也开始表现品种退化了。

防止种子混杂的办法，主要也是选择。这种选择是通过一定的良种繁育制度来实行的。人民公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种子，可以对水稻、小麦等自交作物（即用同一朵花里雄蕊上的花粉在雌蕊的柱头上授粉，没有其他花朵里的花粉来串花，属有性繁殖）的种子保纯起相当大的作用；可是对于棉花、高粱等常异交作物的种子保纯的效果就不那样大了；至于对玉米、黑麦等异交作物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因此，对于水稻、小麦等自交作物和棉花、高粱等常异交作物，生产队可以根据某品种的特点进行大量优良单穗或单铃的选择，把它们混起来播种在种子田内，供下年大面积生产之用。这种做法是应该提倡的。但必须指出，它只能使某一品种维持在一定的质量水平，而不能进一步提高。对于以玉米为代表的异交作物，繁殖技术要求更高。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应该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良种繁育机构和制度。选育某一优良新品种的机构，要有足够的土地繁

殖“纯原种”（过去有的叫“原原种”），供应由国家经营的原种繁殖场繁殖大量“原种”。这些“原种”一方面供应良种繁殖场进一步繁殖大量的“良种”，直接作为推广或作为生产队种子田繁殖之用；另一方面，也可每隔若干年（假定三、四年）供应生产队作为种子田繁殖良种之用。如果良种供应不敷应用，还可用“良种”进一步繁殖“推广种”，供大面积生产应用。这样做，就需要有相应的四级种子繁育工作，即“纯原种”、“原种”、“良种”、“推广种”，统由国家掌握，以补生产队“自繁、自选、自留、自用”留种方法的不足。

不断选育出优良新品种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发展，对良种工作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迫切需要选育出各种优良品种。

目前优良品种数量还不够，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甘薯等作物的良种还需要提高，其他作物的良种还很少，有的作物甚至没有良种。大豆这样一种重要作物，除了东北春大豆地区还有些推广良种外，在广大的华北平原一直到江苏和安徽北部的夏大豆地区，就还没有育成良种供生产上应用。目前在生产上应用的许多作物品种中，农家优良品种的比重比较大，而它们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急需改良提高。目前在大面积上推广的良种，有不少已经开始发生问题，如碧蚂一号小麦已经丧失抗锈能力，南大二四一九小麦也在部分地区开始感染锈病，岱字十五号棉花在有些地区也开始表现退化等等，都需要



尽快地选育出新的良种来逐步代替它们。为了将来的需要，也要开始进行一些为了特殊目的的新品种选育工作，如选育特殊早熟的良种，以适应轮作、复种的需要；选育茎秆特别硬的良种，以抵抗倒伏，既能保证丰收，又利于机械收割；选育能够同时抵抗几种病害或虫害的良种，以便在较大程度上获得稳定丰收等等。育成这些新良种对于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既需要较长的时间，又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必须及早开始并作出妥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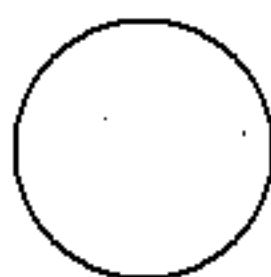
系统选择、品种鉴定和引种是在近几年内提供大量良种的好办法。系统选择就是在品种内选择有变异的优良个体，进行系统比较而后选出最优良的品系繁殖推广。扁穗麦、老来青水稻、矮脚南特水稻等良种，都是用这个方法选育出来的。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般约需五、六年就可以育成一个新良种，比原有品种的水平提高一步。这个方法经济有效，可以长期采用，因为自然界里不断产生无数的变异类型，其中少数是好的变异，只要能把它们选出来，就可以成为一个优良新品种。除组织科学研究机构加强这方面的育种工作外，可以鼓励和支持有经验的农民，在现有农家优良品种和推广良种中选择突出优良的单株或单穗进行“一穗传”的选种工作，这也就是系统选择法。

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运用混合选种和“一穗传”的方法，选育出了大量的作物品种，它们就是全国各地的农家优良品种。

这些农家优良品种在当前及今后生产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如水稻生产上应用的良种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农家优良品种；其他没有改良品种的作物，也全部采用农家优良品种。这些农家优良品种的适应性大小和优缺点有所不同，可以对它们进行品种鉴定，即用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农家优良品种在大田进行评比和在小区进行对比，鉴定它们的生产能力，而后确定和繁殖推广最好的品种。小麦农家优良品种平原五〇就是用这个方法评选出来的。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二年时间，效果虽然不大，但是收效快。在育种工作没有很好开展的作物中或在一定的地区，可以首先采用此法。

引种是指从国外或从国内其他地区引入优良品种进行品种比较或区域试验，而后选择在当地最适应的良种繁殖推广。小麦良种南大二四一九、棉花良种岱字十五号等就是用引种法选育出来的。引种，特别是国外引种，工作简单，需时短，效果大，如引进的品种数目少，只有几个，能在大田里进行比较，那末二、三年就可以肯定优良品种，进行繁殖推广。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方法，因为可以直接利用别人已经育成的优良品种，也可以在别人先进材料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产生更优良的品种。

除此以外，还应当采取品种间杂交和杂种优势利用的方法来育成新良种。对已有较好育种工作基础的主要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等，可以开展大量的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品种间杂交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种



的优良特性汇合到一个新的个体中去。如将一个丰产但不抗病的品种和另一个抗病但不丰产的品种交配起来，在后代中进行系统选择，从而获得稳定丰产而又抗病的新良种。著名的碧蚂一号小麦就是用此法育成的。品种间杂交是创造新品种的最通行的方法，比较容易做，也容易成功，简单的约需七、八年时间，复杂的要十几年。

对不能采用品种间杂交育种法的异交作物，如玉米，必须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利用杂种优势。杂种优势利用也有简单的和复杂的两种方法。简单的方法一般就是利用品种间杂交的第一代；复杂的方法就是利用四个自交系进行两次杂交而产生双杂交种。简单的方法增产幅度较小，但是人民公社可以自己留种，容易推广；复杂的方法增产幅度大，但必须由国家设立玉米良种繁育场来负责供应种子。这两种方法可以结合应用，目前在大面积上着重用简单的方法，以获得普遍增产的效果，同时在小范围内用复杂的方法，做出榜样，打好基础，以后逐步扩大。

在选育新良种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育种目标不能太高，采用的育种方法要适当，不能片面强调选育“千粒穗”、“万粒斤”及采用远缘杂交方法来选育特殊优良的新品种。事实证明，育种要求过高往往不能实现。远缘杂交如果是“种”间杂交，有可能获得优良的新品种。世界上抗锈病能力特强的小麦品种大都是用此法育成的。但是，这个方法比较复杂，需时长，收效慢。至于“属”间杂交成功的就很少，例如小麦和

黑麦杂交，在国内外做了许多试验，还没有成功地获得在生产上应用的小黑麦良种。唯一突出的成功例子是苏联齐津院士用小麦和鹅冠草杂交的方法，育成了一八六和五九九等小麦新良种在生产上应用。但是得到这些新良种是极不容易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钻研和细致的育种工作的结果。如果远缘杂交超过了“属”间的关系，如大豆和蓖麻，属于两个不同的“科”，它们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遗传上的关系极远，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成功的例子，这样远的远缘杂交是不宜提倡的。当然，对一般的“种”间和“属”间的远缘杂交，可以安排少许力量，作长期打算，选育较为理想的新良种。

第二，选育新良种所用的肥、水培育条件不能过高。在过高的肥、水条件下选育出来的新良种，一般只能适应于小面积的肥地，而不能适应于一般肥力水平的大面积土地。如在推广中的早洋麦、有些双交种玉米，在一般肥力水平的大面积土地上生长并不好。所以育种工作有必要着重在中等（或略高）肥力条件下进行。这样选育出来的新良种可以适应于大面积生产，也可能适应于较肥和较瘠的土地。当然，为了将来的需要，安排一些力量在高的肥、水条件下进行育种工作，也是必要的。

第三，育种工作在注意产量的同时，应该注意质量。因为质量的提高实际上也意味着产量的提高。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加强先进的质量鉴定设备，以便在大量的鉴定材料中选育出我们所需要的优良品种。



加强育种科学研究工作

改良作物品种和种子的科学就是作物育种学，是农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这门科学不仅在农业生产上极为重要，而且在生物学上也非常重要。作物育种学是许多基础学科的综合（如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又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了发展作物育种学，必须加强育种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加强作物特性的遗传规律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作物有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从而加强对有机体的控制，逐步做到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改变它的遗传组织，产生新品种。通过育种实践和掌握育种理论，可以使许多不同类型的作物互相杂交，加以培育和选择，把许多优良性状组合或复合起来，产生预期的杂交后代，使能适应于某种特定的环境条件或适应于较大的地区。实际上，育种是生物进化研究的发展，它对生物进化过程提供了实验基础。一个新品种的育成就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结果。因此，作物育种是在人们控制下生物进化中的重要一环，是应该加强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加强育种的科学研究工作，就要明确育种工作的方向与任务。育种工作主要是为不同地区、不同作物当前大面积生产的要求和不断发展的农业技术改革服务的。因此，选育新品种必须适应某一地区内当前生产上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并照顾到改善生产条件后的长远要求。

要加强育种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形成

全国范围的各种主要作物的育种中心，并不断培养新生的育种研究力量。目前我国作物育种工作的力量在农业科学中是较为雄厚的，但是人力的使用比较分散，有些研究工作又有不必要的重复现象。今后在配备研究力量、改善研究条件和拨用经费方面，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需要，进行重点安排，逐步形成各种育种中心。与此同时，要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国内外育种材料的收集、保存、研究、利用的工作。育种成就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育种材料的好坏和多少，如果育种材料好而多，就容易选育出优良新品种。如南大二四一九小麦是从一千七百多个国外材料中选出来的；农大一八三小麦的亲本之一是从国外收集来的许多材料中选出的比较早熟、丰产、抗锈病的品种。

有了好品种，还必须有好种子，才能真正发挥良种的增产作用。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加强良种区域试验，迅速测定现有良种和新育成良种的地区适应性和明确它们所需要的栽培条件，使现有良种和新育成良种早日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育种专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品种区域试验工作中去，因地制宜地评定出各地区最适宜的良种，供生产单位繁殖推广。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良种繁育技术的研究，并探索提高品种特性、播种质量、繁殖系数（即增加单株产量）的简易方法。此外，还需要研究和提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各种作物优良种子的检验技术和标准，以促进良种选育和繁育事业的发展。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李 踐 为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結合我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工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題，能够正确地認識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正确地规划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規律。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們党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經驗，有优良的傳統，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們正确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接受群众的监督，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軌道前进。我們党有长期和各种錯誤进行斗争的經驗，这种經驗能够帮助我們及时发现錯誤和克服錯誤。我們党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有严格的組織紀律和組織生活，我們党对广大党员經常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也是許多党员可以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績的重要原因。

我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鋒队，我們的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們忠心耿耿地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把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他們决不容許自己有任何損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而力图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設的实践，在工作中正确的方面总是占主流的地位。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所以仍然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錯誤，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錯誤的发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認識上的原因。

共产党人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識，必然要直接間接地反映到党内来，与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这是許多共产党人犯錯誤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不免有許多人要投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加入党内，“他們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①有些人还带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加入党内。許多共产党人，在

^① 《反对党八股》。《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4頁。



沒有很好地改造思想以前，当他們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发生抵触时，不能以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能導致他們在行动上犯錯誤。还有一些人，在組織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未入党。他們在党内頑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場，企图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党的面貌。这些人的思想必然和党的无产阶级思想发生严重冲突，他們必然会在党内犯严重的錯誤。

思想是指导行动的。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指导行动。但是，人們要正确地認識客观世界，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实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客观世界是可以为人们所認識的，一切真知之所以可靠，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但是，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錯綜复杂、千头万緒的，因而人們对于客观世界的認識，必然是一个逐步提高、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沒有充分暴露，由于实践經驗的不足，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人們的主观認識同客观实际，就可能发生不一致的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跟着出現，这个事物被認識了，那个事物还有待于我們去認識。人們的主观認識和客观实际既然发生了不一致，在行动上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錯誤。毛澤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实践論》中，和一九四二年二月在《整頓党的作風》的报告中，曾經一再地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证关系上，深刻地

揭露了党内有些同志发生主观主义錯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共产党员犯錯誤既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和認識根源，而且这两个方面常常是交錯在一起的，这就不难理解，錯誤总是难免的，过去难免，現在难免，今后也仍然难免。正如列宁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并不是聰明人。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錯誤的人。犯了錯誤但錯誤不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而容易地糾正錯誤的人才是聰明人。”^①也如毛澤东同志所說：“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錯誤总是难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②

正确和錯誤的矛盾，是我們在工作中經常遇到的矛盾。在我們的工作中，对于正确和錯誤的矛盾解决得好，人民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解决得不好，人民的事业就后退，就遭受挫折。我們党对于工作中发生的任何錯誤，是一貫地采取严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們党尽一切可能来防止各种錯誤的发生，对已經发生的錯誤，又决不放縱，决不迁就，而总是坚决地、迅速地、实事求是地同各种錯誤現象进行斗争。

在我們党的生活中，当一个同志犯了錯誤的时候，我們通常可以看到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对党内的同志犯了某些錯誤，漠不关心，熟視无睹，听任錯誤自流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頁。

②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頁。



地发展，不愿意积极地帮助同志改正错误。持这种态度的同志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和自己没有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用庸俗的“息事宁人”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对同志的错误采取敷衍调和的态度，不能够坚持原则，分清是非，从党的利益出发来克服错误。持这种态度的同志，看不见党内同志犯了错误，无论错误的大小，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程度不同的损失，都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帮助一个同志克服错误，不仅是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尽的责任，而且将会增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另一种态度是：对同志所犯的错误不加分析地抱着简单的决裂的态度。他们和犯错误的同志“势不两立”，不惜滥用组织手段来惩办同志，企图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最严厉的处分，企图一下子就把犯错误的同志驱逐出党，而不让犯错误的同志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些同志不了解，错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简单地和犯错误的同志决裂，并不能克服党内的错误；这些同志也不了解，我们党和各种错误现象进行斗争，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克服已经发生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教育全党同志，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错误。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改造旧世界的工作，其中也包含着教育和改造党员的工作在内。显而易见，采取以上这两种不正确的态度，既无助于克服错误，也无助于增强党的团结。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党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方针，是最能有效地克服错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教育同志，团结同志，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二

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共产党员犯错误，就像一个人的肌体生了疾病。医生治病必须首先判明病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把病治好。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也和治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弄清楚犯错误的环境，错误的情节、性质、轻重以及发生错误的原因，然后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在了解同志的错误的时候，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要严格地分清楚是一般性的错误，还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作风上的错误，还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全部错了，还是局部错了；是一贯性的错误，还是偶然性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错误，还是难以避免的错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对于同志的错误，只有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严格区别是非轻重，分别对待，而不致于混淆是非轻重，笼统对待。批评同志的错误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而这一目的，只有对于同志的错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摆



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达到。批评同志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当然，这只是说，在提出批评的时候，要力求全面，力求客观；而绝不是说，不提出批评则已，要批评，就得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我们党的根本作风。和在其他工作上一样，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斗争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最好的榜样。例如，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当他们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期间，虽然使党的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但是，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仍然强调要对他们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能否定一切，一概抹煞。他说：“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①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要克服错误，必须依靠犯错误的同志的思想自觉。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真正有进步的愿望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又是可以留在党内改正的，即使他们的错误很严

重，也还要采取等待和帮助的态度，以便更好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等待和帮助，就是耐心等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充分的改过自新的时间；就是向犯了错误的同志伸出手来，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尽快地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个人的认识往往有局限，只有经过同志的帮助，吸取力量，才能很好地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犯了错误的同志，往往思想障碍较多，需要有人帮助，才能放下包袱，解除顾虑，唤起自觉。采取等待和帮助的态度，还要善于看到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微小进步，欢迎、鼓励并爱护他们的微小进步。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一向采取这种等待和帮助的态度。例如，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虽然曾经给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但是，在党的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他们以严重的惩罚，仍然分配给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等待和帮助的态度，也就是采取与人为善，允许革命，欢迎革命的态度。事实证明，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有采取这种态度，而不是采取冷若冰霜，不留余地，不许革命的态度，才有利于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团结一致。但是必须指出，犯了

^①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



錯誤的同志必須有改正錯誤的自覺性，真心誠意地願意改正錯誤，黨才有可能對他進行幫助。如果犯了錯誤以後，仍然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特別是在黨指出了他的錯誤以後，不但不改，反而和黨對抗，在黨內搞派別活動，向黨進攻，這樣，黨就不可能通過教育和幫助的方法來挽救他，而必須執行黨的紀律處分，直到把他開除出黨。

為了有效地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我們黨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還一貫堅持了“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

批判同志的錯誤必須嚴肅。原則問題必須明確，是非界限必須分清，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絕不模稜兩可，含糊其詞。求醫是為了治病，治病是為了救人。毛澤東同志指出，為了真正救人，首先就要敢於告訴病人有病。“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①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只有嚴肅認真，鄭重其事，而不是遷就姑息，敷衍了事，才能使犯了錯誤的同志很好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但是，這決不是說，在批判同志錯誤的時候，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語句講得愈嚴厲愈好，面孔擺得愈森嚴愈好。更不能夠把非原則性的問題提高為原則性的問題。在批判同志的錯誤時，只有嚴肅認真，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才能真正找出產生錯誤的原因和改正錯誤的方法，才能使犯錯誤的同志比較迅速地改正錯誤。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在組織處理上，就應

當從寬，不輕易給以紀律處分，更不允許濫用組織權力，實行懲辦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團結更多的人，一道工作。當然，組織處理從寬，並不排除對於錯誤的性質比較嚴重，或者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人，給以必要的紀律處分。黨的紀律必須嚴格地執行，犯了錯誤而應當受到黨的紀律處分的，必須給以處分，決不能把“組織處理從寬”誤解為可以鬆弛黨的紀律。紀律處分的目的，也仍然是為了教育同志，團結同志共同工作。因此，紀律處分必須在充分的思想教育的基礎上進行，使受處分的同志理解他之所以受處分的原因，得到教育。

思想批判從嚴和組織處理從寬的基本精神，在於強調認識上的問題要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強調依靠組織手段去糾正認識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學習和時局》中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②這是對於我們黨內鬥爭的重要總結，是正確進行黨內鬥爭的重要指導思想。

^①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4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41—942頁。



从上述几点中可以看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决不是宽容错误，迁就错误，而是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有效地去克服错误，取得积极的效果。

三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向犯了错误的同志指出了他们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

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即使再轻微，也是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力求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尤其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的发生。但是，一个同志犯错误既然是难免的，因而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善于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当错误一旦发生，就要敢于承认、敢于正视错误，并且千方百计地尽快克服错误，务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绝不能采取与此相反的态度。如果以为工作中的错误既然是难以避免的，就不尽力去防止错误，或者犯了错误以后不去认真地尽快地改正错误，这是和一个革命者的称号不相符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自己错误的严肃态度背道而驰的。

错误是坏事。但是，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错误也能变成好事。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预防注射可以增强免疫力，跌过跤子才能学会走路。没有反面的经验，就不能深刻理解正面的经验；不懂得怎样做不对，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怎样做才对。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以前的四次路线错

误，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但也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教育了每一个革命同志，使我们深刻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真正地懂得了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极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步伐。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对于全党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革命同志来说也是这样。那种认为犯了错误就见人不得人，就不能在群众面前工作了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实践证明，一个革命者的成长，正面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只有正面经验，没有反面经验是不够的。一个革命者，既要善于向正面教员请教，又要善于向反面教员请教；既要重视成功的经验，又要重视不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正确地去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坏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变成好事。坏事变好事，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实现。没有一定的条件，坏事只能是坏事，或者变成更坏的事，而不会变成好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错误变成好事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认真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革命者，不可能是一个毫无过失的十全十美的人，但他必须是一个勇于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人。自我批评和听取同志的批评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为了有效地改正错误，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努力争取并善于听取同志的批评意见。对于同志的批评，凡是正确的，一定要“从善如流”，虚心接受，



絕不能躲躲閃閃，諱疾忌醫。即使批評者的意見不夠全面，不夠客觀，也要本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擇其善者而從之”。對於批評中的不正確的地方，可以解釋清楚，絕不能因為批評意見有某些缺點，就拒絕批評，使自己得不到幫助。那種堅持錯誤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革命者的，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克服錯誤，這是向自己的舊思想、舊習慣、舊作風挑戰，是在自己思想領域內除舊布新，是一種嚴肅的細致的自我鬥爭，自我改造，因而這種方法的採取，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只有採取這種方法，才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水平，真正達到克服錯誤，改進工作的目的。

* * *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唯一正確的方針，同時也為犯錯誤的同志指出了改正自己錯誤的正確方向。這個方針是建立在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嚴格區別之上的。這個方針的提出，是毛澤東同志對解決黨內正確和錯誤的矛盾問題的一項重大創造，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的一項重

大貢獻。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我國人民革命勝利發展的過程中，從黨內運用到黨外，逐步地形成為一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一文中，回憶黨的第一次整風運動的歷史經驗時所指出的：“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裡，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係，都採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①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同志又指出：“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②我們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當中，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經驗，以便進一步地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爭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更大的勝利。

^{①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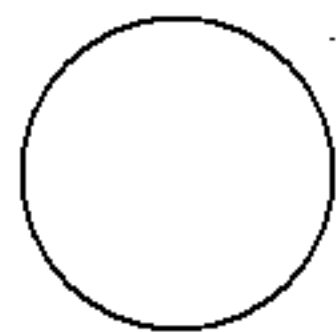
更 正

本刊第一期第十五頁左欄第四行“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和第五行“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兩句中“我們”二字的後面都應加“一定”二字。



红旗

HONGQI



3-4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三、四期合刊 ★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

同我們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問題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 引言 (1)

二 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爭論的性质是什么? (2)

三 当代世界的矛盾 (5)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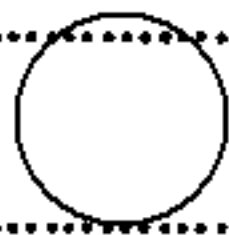
 連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7)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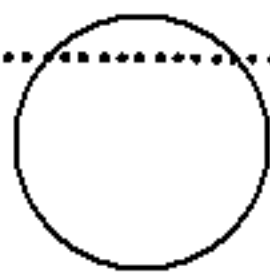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11)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14)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6)
几点简要的结论	(20)
四 战争与和平	(22)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22)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24)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27)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29)
离奇的提法	(33)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	(34)
五 国家与革命	(37)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37)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39)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43)
当代的“议会迷”	(46)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 工具”吗？	(49)



記住偉大列宁的教訓	(55)
六 在战略上藐視敌人, 在战术上重視敌人	(58)
历史的分析	(58)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60)
偉大的范例	(62)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66)
一面鏡子	(67)
七 在两条战綫上的斗争	(68)
現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	(68)
“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	(71)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	(74)
原則性和灵活性	(77)
八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80)



☆ 三月四日出版 ☆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 同我們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問題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引 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爭論。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发表了許多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錯誤言論。对这些錯誤言論，我們一直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是，过去我們沒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爭論。我們从来主張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我們从来主張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則来处理兄弟党之間的关系。我們从来主張在兄弟党之間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內部协商的途徑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談或者兄弟党會議的办法来解决。我們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責，更不用說，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誣蔑和攻击了。我們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張團結的。我們沒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們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开爭論，我們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緘默不言嗎？难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嗎？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回答。他們迫得我們沒有別的路走，我們只好公开回答他們。为此，我們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的社論。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論很不滿意，他們又接連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們。他們說我們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



感”^①；說我們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沒有确切的了解”^①；說我們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②；說我們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詞藻掩飾自己的机会主义”^②，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爭論繼續下去。那末，好吧，就繼續爭論下去吧。

現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錯誤言論，更詳細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們对他們連續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們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們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說我們“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嗎？还要說我們“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嗎？还要說我們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沒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嗎？还要說我們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詞藻掩飾自己的机会主义”嗎？待我們看一看再說吧！

总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沒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們共产党人之間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說道理的态度，而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僕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結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說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結起来。如果只許主人向僕人揮舞指揮棒，口中念念有詞，說是“团結，团結”，那其实說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們要的是团結，坚决不允許一小撮人鬧分裂。

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爭論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現代修正主义者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論問題、根本路綫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展开一場大規模的論战。這場論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論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內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迴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論

① 見意共《团结报》1963年1月10日陶里亚蒂：《讓我們使討論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② 見《团结报》1963年1月16日路易吉·塞哥：《政权問題》。



問題、根本路綫問題和政策問題上粉碎他們的进攻，正确地給无产階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爭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統治地位以来，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經經過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論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論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論战，这次論战把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傾冒險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大論战，这次論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闡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階級革命、无产階級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和策略。同这次論战交織在一起，我們中国共产党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澤东同志为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結合起来，同“左”傾冒險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論战。

現在出現的第三次大論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

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傳，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內部进行顛复活动。他們的这类宣傳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說。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須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①，认为匈牙利的同志們“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費心机”^①。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我們发表过《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一篇論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險，譴責現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喪失了意义”^②。铁托集团拒絕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綱領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違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協議，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語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們的語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們把斗争的鋒芒，轉移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則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① 参看南斯拉夫《战斗报》1956年12月8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

②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宣言》，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頁。



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們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竟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污。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棄得一千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蠢话，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①，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

①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1页。



中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們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們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問題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爭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問題。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們历来主張經過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爭論公开化，那末，我們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們的这种挑战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許多罪名，加在我們身上。人們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誰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

凡是讀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論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綱、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做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貫串着一条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綫索。按照这条綫索，不論在国际問題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問題上，他們都同社会民主党、現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語言。人們如果仔細地看看意共的提綱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許多提法、許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鮮，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揚的东西。

現在我們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綱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多么辽远。

三、当代世界的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計，作为提出一切問題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他們的估計，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問題上，也在意大利問題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頗为得意的新概念。

一、“应当在爭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爭范圍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經濟合作政策而斗爭，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撓更加迅速的經濟发展轉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二、“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①

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①。“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①。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②。

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沒有战争的世界”①。

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②。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②

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①

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①。

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全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②。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①。

十一、“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②。

十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②。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

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② 陶里亚蒂1962年12月2日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③ 陶里亚蒂1960年7月21日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今天有可能避免战争》。



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們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

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一次新的“变革”呢？

連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①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

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連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①。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② 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怎么可以把帝国主义力求保持自己的统治，国际形势不稳定性这类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认识问题，而不看作为资本主义规律起作用的问题呢？怎么可以假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一旦“认识正确”，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物一旦变成“明智派”，而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革命，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就能够根本改变呢？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掌握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材料的总和，必须认识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显然，只有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和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当前具体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各国工人阶级的

①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9页。

②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页。

③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政党才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而使自己的政策放在可靠的理论阵地上。可惜，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上恰恰没有严肃地正视这些矛盾，因而必然使他们的纲领根本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里也提到许多矛盾，但是奇怪的是，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陶里亚蒂同志，恰恰回避这些主要的矛盾。

意共十大提纲在讲到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罗列了这样一些矛盾：

“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强的同时，这样一种趋向也加强了，即不仅在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并且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其中的一个联盟（即欧洲共同市场）促成了西欧市场的扩大，这就刺激了若干国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大垄断资本集团领导下的、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相结合的经済一体化，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下列各方面引起了新的矛盾，即某些工业发达地区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的、甚至相对加剧的落后和衰落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与到处陷入严重困难和危机的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消费水平高的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大量财富消耗于扩军、非生产性开支和无止境的奢侈与人民群众生活和进步所必需的各种问题（住宅、学校、社会保险等等）无法得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这里列了一大堆的所谓矛盾，或者所谓“新矛盾”，但是，偏偏没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等等。他们把“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的矛盾，说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矛盾。

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承认有大垄断资本集团，还承认有国家集团，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矛盾。他们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以及“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那里抄来的，是列宁所认为的“超等废话”。

大家知道，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①的重要论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在起作用。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在这个绝对规律之外，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多年来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到一九六〇年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六一年又降为百分之四十三。

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它仍然没有完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美国力求保持和扩展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并且日益尖锐化的现实的矛盾。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以外，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必然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的尖锐化。这里交错着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交错着帝国主义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斗争。刚果事件，最近围绕欧洲共同市场问题的争吵，美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引起的争吵，就是这类斗争的突出的例子。

意共十大提纲虽然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不平衡和跳跃的发展过程，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并没有从这种新现象，看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矛盾的扩大，矛盾的加深；没有看出这种新现象会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垄断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地区上大大缩小了；此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动摇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斗争，不是比过去缓和了，而是比过去更加激烈了。

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形势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平运动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力量，无疑地大大超过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的力量。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方面；优势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方面。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估量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规律，也并没有排斥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而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界限，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各种矛盾，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說，资本主义各国的統治力量，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綱領恰恰是有着这类的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陶里亚蒂等同志身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心却放在虚无缥缈的幻梦之中。

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人，应当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世界全局出发，分析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之间的矛盾，并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正确的出路。但是，使我们感到遺憾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沒有这样做。他們只是不着边际地、无关痛痒地說些关于这类矛盾的空話，而在实际上掩盖这些矛盾，企图把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引向迷途。

陶里亚蒂同志和铁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說成是什么“两大軍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①，并且认为只要“改变这一局势”，就能够建立一个“沒有战争的”、“和平合作的”新世界^①。这样，世界两大社会体系的矛盾就会随之消失。

陶里亚蒂同志这类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尽管他天天在希望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人物“明智”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絕不会按照陶里亚蒂同志的希望，自己解除武装，自己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想法，在实质上，只能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放棄或者取消自己的防御力量，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帝国主义者从来所希望的所謂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和平演变”，或者“自行演变”。

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尖锐的。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看成是两个軍事集团的矛盾，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呢？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

必須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來說，它們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許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們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苏两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也进行国际贸易，但是，它們用不着同帝国主义国家爭夺市場，爭夺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沒有必要因为这些而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

^①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大利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資本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在那里，資本帝国主义的規律就会繼續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剝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剝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們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明”豺狼，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肥肉”而去爭夺、去吞噬。它們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地镇压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的人民斗争和起义。不論資本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是极其激烈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間爭夺市場、爭夺原料产地、爭夺势力范围、爭夺軍火利潤的斗争，也总是經常地进行着。这种斗争，虽然有时稍微緩和，有时达成某种妥协，有时甚至形成什么“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是，这种緩和，这种妥协，这种联盟，总是孕育着它們相互之間的更尖銳、更激烈、更大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在反苏的名义下，它首先向着英、法、德、日、意等国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侵略、吞并或控制；同时，还在反苏的名义下，利用第二次大战后的条件，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資本主义国家都放在美国壟断資本的直接控制下面。这种控制，包括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

就是說，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資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們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們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就是說，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极共辽阔的中间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破坏和侵略活动。

这里，我們不妨回忆一下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著名談話。他揭穿了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反苏叫嚣的烟幕，对于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概括說明：

“美国和苏联中間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沒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談不到进攻苏联的。現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統治的中国、半个朝鮮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許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軍事布置，建立軍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說，他們在世界各地已經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軍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錯，这些軍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現時，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軍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認識到真正压迫它們的是誰，是苏联还是美国。



美国反动派終有一天将会发现他們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說，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鬧得烏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們的实际目的。原来他們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瘋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屬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①

十六年前，毛澤东同志就这样用最清楚的语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如何設法建立它的世界大帝国；同时用最清楚的语言，告诉人們应当怎样去打敗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計劃，应当怎样力求人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話說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間，是一个极其辽闊的中間地带。这个中間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战争叫嚣，一方面，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間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和奴役政策，首先要遇到中間地带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实际上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引火物，燃起了这些地区十几年来連綿不断的革命烈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統治的基础，这种烈火正在蔓延，而且必将在更广闊的范围内繼續蔓延。

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間、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間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爭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間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們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騙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現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現代修正主义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① 《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1—1192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十六年来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十六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欧洲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个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

第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第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并且在继续摧毁着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的阵地。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活跃和新的发展。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重新起来，正在不同程度上图谋摆脱美国的统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它们又重新成为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西德又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美帝国主义者狭路相逢了。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也日益激化。

第六，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加剧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加剧了。

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只要各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是能够被打败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争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变化同时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愈加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愈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愈开展，那末，就愈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者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愈有可能制止新的



世界大战，保卫住世界和平。

这些变化同时还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愈尖锐，在它们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着新的斗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侵略政策，除了宣传反苏以外，近年来特别大肆宣传反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华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进行各种破坏我国、威胁我国的罪恶活动。同时，人们还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利用反华宣传去达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要控制和奴役日本、南朝鲜和整个东南亚。所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等，都是美国控制和奴役这些地带一系列国家的手段。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支持印度反动派，支持尼赫鲁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从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之一的印度，变为美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把原来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变为美元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首先需要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制造一种口实，制造一种烟幕，这就是“反华”，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虽然它们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者把尼赫鲁政府这次反华军事行动，看作是它控制印度的大好机会。在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反华”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窜进印度，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它在印度的势力。

美帝国主义者这次大规模地窜进印度，这是美国反动派在印度实行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重大步骤，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攫取市场和势力范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明争暗斗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者这个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同时也必然促使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矛盾的发展。

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除了继续出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的许多地区之外，还出现在资本主义老发源地的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角逐，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触及到西欧的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夺西欧这类工业发达的地区。由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以英国为首的由七国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美国积极策动的“大西洋共同体”，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欧市场争夺的尖锐化越来越显著了。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向四面八方开展意大利的贸易”^①，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

除了在西欧以外，最近美国限制日本棉制品进口引起的公开争吵，表明美国和日本相互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爭奪市場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了。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說，“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潰”^①，“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②。还有人說，“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統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們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經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任务了。他們的这种說法毫无事实根据。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仍然处在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国家独立了，可是它們的經濟仍然受着外国壟断資本的控制。在有些国家中，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但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新殖民主义者又闖进来了，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很多民族的生存。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沒有完成。甚至像我們中国这样已經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也还有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任务。我国的神圣領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着，許多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不承认地球上存在着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至今还被无理剝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依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

十六年来世界的变化，繼續证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擴張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別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間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間爭奪这些地区的矛盾。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时期以来，一直受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迫。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从这些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喂肥了自己。他們拿这些地区人民的血和汗作为“資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肥料”^③，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极端贫困化，并且使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物极必反。这些外来的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們长期进行的奴役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他們的仇恨，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唤醒过来，逼得他們起来，为爭取自己的生存，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直到进行武装反抗和武装起义。这些地区不願意受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資产階級，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陶里亚蒂 1960 年 7 月 21 日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③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37 頁。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不断地遭受过残酷的镇压，遭受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总是再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如何走向它的反面。在一九四九年，伟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①

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现实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胜利的偉大范例。

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继中国革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宏大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地区的斗争即使可能遇到某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抵擋不了这种斗争洪流的。

现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包围之中。这种斗争对于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极其偉大的支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资本主义国家本国的农民斗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偉大的直接同盟军。

人们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② 列宁曾经痛斥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回避了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列宁痛斥他们说：“记得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这次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而是躲躲闪闪，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③ 列宁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的矛盾”^④。斯大林也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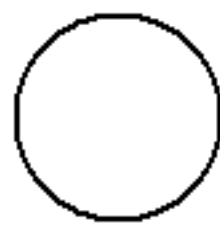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8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454页。

③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页。

④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9页。

⑤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



人們还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曾經針對着当时的情况，这样設想过：“在爱尔兰問題上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給英国統治階級以决定性的打击**”^①。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正当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論文，其中說过：“可以大胆預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拋到現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②。

列宁繼續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論点，強調了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无产階級革命胜利的偉大意义。他认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們的时代是正确的^③。他曾經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資本斗争不把被資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場騙局”^④。

斯大林繼續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問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問題的一部分的論点。他在《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

列宁主义“拆毀了橫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間的牆壁，因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联結起来了。于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問題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問題，变成了附屬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問題”^⑤。

在《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这一篇論文中，斯大林論述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时候，这样說过，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經過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綫”^⑥。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了欧美无产階級爭取解放、爭取胜利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就外部条件來說，他們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将是对于資本主义宗主国統治階級的决定性打击。

大家知道，毛澤东同志大力地闡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階級在爭取解放斗争中的两支偉大同盟軍的問題，他在領導中国革命的實踐中具体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問題和民族解放問題，保证了偉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切被压迫民族爭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頌。

① 《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3—254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4頁。

③ 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頁。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8頁。

⑤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2頁。

⑥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9頁。



虽然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本人，都沒有亲眼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像現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沒有亲眼看到一連串的勝利，但是，他們根据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經驗所揭示的規律，却愈来愈被生活所证实。第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絕不像有些人所說的，上述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已經过时，而是恰恰相反，更加证明这种原理具有偉大的生命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丰富了这种原理。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階級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階級的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結果如何为轉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轉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階級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脫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階級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階級及其先鋒队，都必須站在斗争的最前綫，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組織自己的同盟者，組織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統一战綫，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騙，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勝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也必須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綫。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階級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資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階級政党，有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們的經驗、尊重他們的革命感情、配合他們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沒有任何权利在他們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資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輕視他們，說他們“年輕、缺乏經驗”^①；更沒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誹謗、咒罵、恐吓、阻撓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場、方針和政策，那末，它們对于本国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的立場、方針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① 多列士1960年12月15日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騙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說得很对：“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①

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只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们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說：你们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们不要“对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没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输了，到那时候，你们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这种态度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完全违背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利益。

总之，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国际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几点簡要的結論

在这里，可以把以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论点，再总述一下：

第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宪兵，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7页。



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美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不但奴役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控制战时的同盟国，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国家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美帝国主义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它的狂妄野心也使它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益陷于孤立，它的力量实际上正在不断削弱，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人民、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能够在斗争中把美帝国主义打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是不妙的，各国人民的力量在上升中。

第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西欧，为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不到这点，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锐化，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这样，共产党人也就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事业的最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继续巩固、继续强大，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加不敢轻易触犯它。因为它们知道，触犯这个堡垒，对它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不仅要尝到很大的苦头，而且直接关系到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

第四，有人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简单地只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五，有人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认为只要取消他们所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①，或者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②，这种矛盾就可以在实际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融合为一。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力求加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外的竞争地位，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的这种地位。同时，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地加强军事机器，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排斥它们的国外竞争者，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加紧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少数垄断寡头对雇佣奴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暴虐专政。认为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过渡为社会主义，那里的劳动人民能够或者正在参加国家领导，因此认为“今天在资本主义

①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①。这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臆语，又是什么呢？

历史并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绝望中寻找出路。他们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苏冲突”上面。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老早就说出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最近对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攻击和诬蔑，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起劲地耍弄挑拨离间的把戏。但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未免过低估计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力量，未免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未免过高估计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起的作用。历史事实终究要使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倒霉的总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错误，就是他们的提纲、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本离开了阶级分析。

列宁曾经嘲笑民粹派说：“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剥削是‘可能’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列宁说他们“一辈子都满足于这种‘假如’和‘假若’”^②。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不能像民粹派那样吧！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提纲和报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恰恰是放在这类“假如”或“假若”的设计上面。因此，他们得出的新概念只能是一堆非常糊涂的概念。

四、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几年来，有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喃喃不休地作了多少演说，盈篇累牍地写了多少文章，在市场上抛出了多少大书小书，但是，却不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不同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消灭战争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要求一天早晨废除国家。现在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要求一天早晨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自负地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218页。



現”，是“人类意識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貢獻”，而“教条主义者”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懂得接受他們的这个科学礼物。

看来，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正在大力推銷这种礼物。他們說，要創造一个“沒有战争”的新世界，唯一的战略是他們自己所解釋的“和平共处战略”，而他們的这种所謂“和平共处战略”的内容，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拥护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在壟断资产阶級統治下的意大利，在目前和平时期，就拥有四十多万人的压迫人民的常备军队，有約十万人的警察和近八万人的宪兵这类武装队伍，还有美国的拥有导彈的軍事基地。在这样的国家中，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和平与和平共处”，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要求意大利政府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那当然是对的。除此以外，你們是否还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級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同壟断资产阶級实行“和平与和平共处”呢？你們所說的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是否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撤除在意大利的軍事基地，是否意味着意大利的壟断资产阶級会自动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呢？如果做不到这些，那末，在意大利怎样实现压迫阶級和被压迫阶級的“和平与和平共处”呢？推而广之，又怎样能創造一个“沒有战争的世界”呢？

当然，如果能够出現一个“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不是很好嗎？我們为什么不举手贊成呢？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問題显然不在于主观設想，而在于社会規律本身。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一书中說过：“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終久要把它消灭的”^①。

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一书中，又一次說明了这个理想。他說：“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們則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給以結束。”^②

毛澤东同志的《論持久战》說过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为永久和平而战；說过“我們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爭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③。

毛澤东同志在这本书上說，战争是“由于阶級的出现”^④产生的。同时，他說：“人类一經消灭了資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⑤

毛澤东同志的上述論点，是完全符合列宁反复說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論点的。

①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6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465頁。

④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464頁。

⑤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465頁。



在一九〇五年，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年，列宁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①

在一九一五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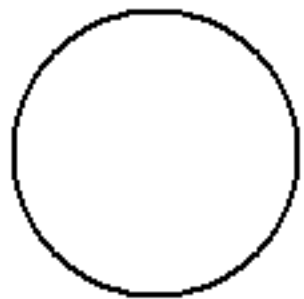
列宁，他作为一个高度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最大的力量研究了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痛斥考茨基那一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谬论，给人类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正确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却一点也不愿意考虑列宁是用怎样的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的，不愿意考虑列宁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任何科学结论。尽管如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别人背弃了列宁，只有他们才是“列宁的化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也许有些人会说，无须你们饶舌，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点；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列宁这些论点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把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当成过时的东西，这是铁托集团首先公开提出的。他们认为，自从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列宁所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用以考察各种战争、判断不同战争性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照他们看来，战争从此已经不是这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什么阶级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性质已经改变



①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530—531页。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

* 这段译文略有订正。这篇文章中，其他引用经典著作的地方，有的译文也略有订正。



的說法，实际上是铁托集团早已有过的說法。

显然，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不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原理，而解除自己的武装，放棄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镇压，不会因此放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也不会因此放棄他們相互間为爭夺超额利潤而引起的冲突。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說法在实际上是力求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施加影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仿佛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者为爭夺市場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这些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比如，美帝国主义者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策动的战争，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究竟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所进行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武装冲突，算不算是战争？如果这不算是战争，那又算是什麼？如果算是战争，那它們同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它的政策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认为，“能够避免地方性的小战争”^①；又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尚未在各处得到胜利，在人类社会，战争也会成为不可能。”^②这大概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們的学說本身”“作一些新的考虑”之后所得出来的結論。陶里亚蒂等同志这些话，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間說的。我們姑且把一九六〇年以前发生的事件擱起不說吧。在一九六〇年这一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不同类型的軍事冲突和武装干涉，其中多数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謂的“地方性的小战争”：

这一年是法国殖民軍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的第六年。

这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吳庭艳继续残酷压迫南越人民，激起南越人民更大的武装反抗。

一月至二月，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同叙利亚发生了武装冲突。

二月五日，美国四千名海軍陆战队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登陆，武装干涉該国内政。

五月一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七月十日，比利时武装干涉刚果；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決議，派“联合国軍”到刚果，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八月，美国支持老撾沙灣拿吉集团挑起内战。

或許一九六〇年发生的事件不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說的范围之内，那末，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事件是否就能够证实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預言呢？

可以考察一下事实：

^① 見1962年1月意共中央新聞宣傳部編輯出版的《意共代表团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的若干发言》一书。



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才被迫实现停火。这个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七年多之久了。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进行的反人民的“特种战争”，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

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服务的“联合国军”（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军队）还在镇压刚果人民。一九六一年初，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美、比帝国主义者唆使其走狗杀害。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向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加丹加省进行了三次武装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葡萄牙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军队，对要求民族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一血腥罪行，仍在继续进行。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在七十二小时内，在吉隆滩被英勇的古巴军民全部消灭。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英国军队在科威特登陆。十九日，法国军队袭击突尼斯的比塞大港。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美国出动军舰、飞机，再次武装干涉多米尼加。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荷兰殖民者的海軍在西伊里安附近海面袭击印度尼西亚的海军。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西伊里安展开了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游击斗争。

一九六二年五月，美国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并企图直接出兵干涉。十七日，美国军队进驻泰国；二十四日，英国宣布派遣一中队空军进入泰国。美英这些军事行动，直接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经过老挝人民的坚决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共同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其“议定书”。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武装船只袭击古巴首都哈瓦那滨海住宅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门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指使沙特阿拉伯出兵干涉。

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不断地武装入侵中国地区；十月二十日，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采取海盗行为，对古巴进行震动世界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祖国主权的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两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剥削、横暴镇压和武装干涉，继续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反抗，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莱人民的反英武装起义。



事实反复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个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真理。现在和将来的事实依然会证实列宁所说的这些真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既然按照他们政策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地区挑起战争，那末，谁也不可能阻止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压迫的战争。

或许，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认为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战争都不算是战争。他们仅仅承认，只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才算是战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

列宁老早就批评过认为“在欧洲以外的战争不算是战争”的这类荒谬观点。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一篇演讲中这样嘲笑地说：“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①

现在，实际上就有列宁所批评的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圈子没有战争，就是天下太平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否在摧残和屠杀人民，是否在进行军事干涉和武装冲突，是否在挑起战争，都不算是什一回事。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这些地方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星星之火”，会闹下大祸，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地方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们具有什么性质，而笼统地武断斥责这些战争。能够说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吗？

还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一说到战争，就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仿佛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以外，就没有其他战争可言了。这个说法也是铁托集团首先发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竟然也同铁托集团唱一个调子。这些人根本不願意看一看现实生活，也不願意想一想历史。

如果这些人的脑子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就会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居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当然，如果这些人的脑子不那么健忘的话，也还可以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苏战争发生以前，这次大战将近两年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进行的。这两年的大战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成为这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强盗的主力军，但是，也不能把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的大战看成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参加这

^①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9—370页。



次反法西斯陣綫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还有英、美、法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可見，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的利害冲突所引起的，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

大战的发生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沒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許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大战絕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

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許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形势繼續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陶里亚蒂等同志說，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已經不能为所欲为了。这話并沒有說錯。实际上，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指出了的。列宁根据对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估計，这样說过：“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經不能为所欲为了。”^①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世界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說帝国主义者已經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是不是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經自行消失了呢？是不是說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梦想和准备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了呢？是不是說帝国主义国家已經不再侵略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了呢？是不是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已經不会再为爭夺市場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了呢？是不是說壟断资产阶级已經不再殘暴地折磨、鎮压本国的人民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說。

不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規律，去观察战争与和平問題，就永远不能了解这些問題。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軍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願就裁軍問題达成協議”，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②。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剝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曾經給以尖銳的批判。

列宁在《无产阶级的軍事綱領》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③社会发展的規律只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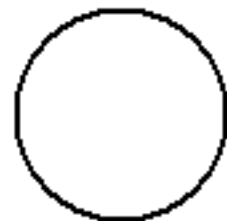
現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說明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所以，他們总是籠統地談和平，籠統地談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軍，压迫者手里沒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們认为这是乱說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正如列宁所說的，他們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調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④。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4頁。

② 見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頁。

④ 《和平問題》，《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9頁。



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所謂“和平”，所謂“和平共處戰略”，實際上是把爭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統治人物的“明智”上面，而不是依靠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和鬥爭。他們用各種辦法束縛各國人民鬥爭的手腳，企圖麻痺各國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圖使各國人民放棄革命行動，從而削弱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助長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戰爭勢力的反動氣焰，增加世界戰爭的危險性。

歷史唯物論，還是唯武器論？

現代修正主義者認為在原子武器出現以後，社會規律已經不起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基本理論已經過時。陶里亞蒂同志的看法也是這樣。關於在核武器和核戰爭問題上，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主要分歧，我們的《人民日報》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論中，已經作了論述。下面，我們準備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適當地、也足夠地估計到新武器、新軍事技術對軍隊組織和戰爭的作用。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話：“隨着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①

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歷來都不是唯武器論者。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說過，“誰的後備多，誰的人力多，誰在人民羣眾中更能支持得住，誰就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又說，“所有這些東西我們都比白衛分子多，都比‘稱霸世界的’英法帝國主義這個泥足巨人多”^②。

為着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再引列寧的一段話。他說：“在任何戰爭中，勝利屬於誰的問題歸根到底是那些在戰場上流血的羣眾的情緒決定的。……羣眾對戰爭的目的和原因的認識具有巨大的意義，這種認識是取得勝利的保證。”^③

充分估計人在戰爭中的作用，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戰爭問題上提出的一个根本原理。可是有些自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却常常忘記了這個原理。當原子武器在第二次大戰末期出現的時候，有些人的頭腦就開始糊塗起來了，認為原子彈能夠解決戰爭。毛澤東同志在那時說過：“這些同志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我們這些同志比蒙巴頓還落后”^④。當時擔任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的英國貴族蒙巴頓，他發表過談話說，“認為原子彈會停止遠東戰爭是一個最大的錯誤”^⑤。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頁。

② 《莫斯科徵收黨員周的總結和我們的任務》。《列寧全集》第30卷，第56頁。

③ 《在羅果日—西蒙區工人、紅軍擴大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31卷，第117頁。

④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3頁。

⑤ 參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的注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6頁。



当然，毛澤东同志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是充分估計到的。他說：“原子彈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①。中国共产党一貫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們一向主張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試驗、制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張銷毀核武器。同时，我們也一貫认为，無論如何，原子武器終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規律，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勝負，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能阻止各国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間，斯大林这样說过：“我不认为原子彈像某些政治家所想像的那样厉害。原子彈能用来吓唬神經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來說，原子彈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壟断原子彈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彈的壟断不会繼續很久；（二）原子彈的使用将被禁止。”^② 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很有預見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經喧嚷一种所謂軍事理論，认为空軍优势、突然襲击，就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种理論的破产。核武器出現以后，一些帝国主义者又在喧嚷这种理論，进行核訛詐，认为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解决战争勝負。可以肯定，他們的这种理論，也一定要遭到破产。可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像铁托集团那样，却替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吹嘘这种理論，用以恐吓各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訛詐政策表现了它奴役世界的恶毒野心，同时表现了它自己的恐惧。

必須知道，首先动用核武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致命的后果的。

一、帝国主义者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其他国家，必然使它們自己在全世界陷于极端的孤立。因为这种进攻是对人类正义的最大罪行，是同全人类为敌。

二、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使本国人民处在对核武器的恐惧之中。帝国主义者坚持核訛詐政策，必将逐步地激起本国人民的觉悟，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他們。参加美国向日本第一次投擲原子彈的一个空軍人員，由于战后全世界人民譴責原子轰炸，曾企图自杀，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本身說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是如何不得人心。

三、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爭夺地盘，扩大市場，搶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奴役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考虑，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結果，同他們追求的实际利益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四、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壟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

^① 《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92頁。

^② 《答〈星期日时报〉駐莫斯科記者亚历山大·韋尔特先生問》。《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莫斯科1952年俄文版，第70頁。



彈，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導彈。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前面所說的，是帝国主义者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必然引起的后果的一些問題。我們历来认为簽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協議是可能的，其重要根据之一，也在这里。

同时，还必须知道，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瘋狂地扩充核軍备的政策，也增加了資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就是：

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被迫承受空前沉重的軍事开支的負担，本国国民經济越来越走向畸形的軍事化，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它的扩軍备战政策，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

二、帝国主义者进行軍备竞赛，特别是进行核軍备竞赛，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壟断集团之間的斗争。

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論》一书中曾說：“軍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軍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已毁灭的萌芽。”^①

現在更可以这样說，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扩充核軍备的政策，正在支配着并且吞噬着北美和西欧，可是这种政策，这种新的軍国主义，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制度自己毁灭的萌芽。

可見，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們实行扩充核軍备政策，結果只能使它們自己反对自己。如果它們敢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結果必将是使它們自己毁灭自己。

結論是什么呢？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謂“人类毁灭”的說法相反，結論只能是：

第一，将是人类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消灭人类；

第二，将是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被人类所消灭，而不是人类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消灭。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的命运今天是不确定的”^②。他們认为，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在核战争的威胁下，談論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的問題已經沒有意义了。按照这种說法，那末，資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規律，到哪里去了呢？列宁所闡述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义这个真理，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說法难道不是真正的“宿命論”、“怀疑論”和“悲观論”嗎？

我們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这样說过：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陣营也已掌握了現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絕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協議，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結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圍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終是我們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給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5頁。

^②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決議》。



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經驗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①

真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嗎?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些自命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他們大肆歪曲、譴責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硬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說成是“人类的廢墟”,把帝国主义制度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論調,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論調。如果这些人讀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就会知道,在旧制度的廢墟上建立新制度,这本来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說过:“资产阶級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級的社会制度”^②。难道恩格斯所說的封建制度的廢墟就是“人类的廢墟”嗎?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写的《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級专政》一文中也說过,无产阶級要“在资本主义的廢墟上組織社会主义制度。”^③难道列宁所說的资本主义的廢墟就是“人类的廢墟”嗎?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說的旧制度的廢墟,說成是“人类的廢墟”,这是用无理取鬧的手段代替严肃的爭論。能够說,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說的“和諧的調子”嗎?能够說,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用能容許的語气进行論爭”嗎?其实,陶里亚蒂同志本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复灭的时候,就說过这样的話:“在我們面前摆着一个偉大的任务,我們应当在法西斯主义的廢墟上,在反动暴政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意大利”^④。

每一个郑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罪恶滔天的手段,使各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經历重大的苦难。但是,这种考虑是为着喚起人民的觉悟,更好地动員和組織人民,找出正确的解放斗争的道路,找出人类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摆脱苦难、获得和平的道路,找出有效地制止核战争的道路。

誰都知道,甚至连美帝国主义者也知道,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絕不是为了侵犯別的国家。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上;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首先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防御战争。

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也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

① 見本刊1960年第8期,第11—12頁。

② 《反杜林論》,第280頁。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1頁。

④ 轉引自1950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一书。



爭。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核优势，也根本不会、不允許、不需要利用核武器去进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核讹詐政策，主張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問題所采取的态度、方針、政策，就是这样。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方針、政策。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核武器問題上，故意歪曲我們的态度、方針、政策，制造一些卑鄙无聊的誹謗和謊言，实际上是为了掩蓋帝国主义者核讹詐，为了掩蓋他們自己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冒險主义和投降主义。应当指出，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冒險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最不負責任的表现。

离奇的提法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論点。这个論点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說的“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論点。

在任何国家中，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没有革命的要求，誰也不能够从外面把革命强加給他們；如果那里沒有革命危机、沒有成熟的革命条件，誰也不能够在那里制造革命。当然，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要求革命、自己起来革命，那末，誰也不能够阻止他們革命，像誰也不能够阻止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南越的革命一样。

陶里亚蒂等同志說，实行和平共处，就是意味着“排除外国为了‘輸出’反革命或革命来进行干涉的可能性”^①。請問：所謂“外国輸出革命”，这是不是說社会主义国家要輸出革命呢？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从来就是这么說的。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这样說嗎？至于說帝国主义国家，它們从来都是对外輸出反革命的。誰能够說，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沒有輸出过反革命呢？人們能够忘記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偉大的十月革命嗎？人們能够忘記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中国革命嗎？誰能够否认直到現在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着我国的領土台湾呢？誰能够否认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涉古巴的革命呢？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国际宪兵，現在不正是在世界各地大力輸出反革命嗎？不正是在資本主义世界力图干涉各国内政嗎？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的国家，不了解“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論点，而在談論和平共处的时候，避开帝国主义者一直輸出反革命这样的事实，籠統地把所謂“輸出反革命”和“輸出革命”相提并論，这种离奇的提法，不能不說是一个原則性的錯誤。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

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坚决谴责战争”，“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列宁从来都是认为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没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现在有人竟然不知羞耻地把自己比做列宁，说列宁、以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同他们一样反对战争的。他们阉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谁都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他主张，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向国际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觉悟的工人们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①。列宁提出的这个法令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件。可是，现在有人竟然敢于歪曲这个文件，割裂这个文件，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压迫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故意地篡改改为“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些人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歪曲列宁主义，歪曲历史，还要振振有词地说别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实质”，这不是一种奇谈与怪论吗？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就是因为我们对一切曲解列宁主义的奇谈与怪论，坚持恢复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原来面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的。有人恶意地把这条路线说成是：“按照这种

^①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9、228页。



‘理論’，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通过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这些人把保卫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要和平就是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屈膝，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取消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只是乞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恩赐”世界和平，而不是依靠世界上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斗争去争取世界和平。他们的这种“理論”，这条路綫，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論中，已经作了说明。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有以下一段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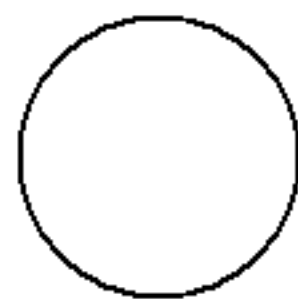
“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现在，在这里，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论点，再简要地重说一下：

第一，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十几年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更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斗争，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孤立的。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那末，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避免核战争是可能的，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二，世界各国人民要保卫住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制止核战争，必须互相支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反对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平等贸易。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有人认为，和平共处将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制度跟着变革，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①；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②。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問題，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問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問題，混淆在一起，根本歪曲了列宁所說的和平共处政策。

第四，我們一向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必須經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我們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問題上，包括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經過和平协商达成協議，实行必要的妥协。但是，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

第五，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調和的。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間，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間，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利害所驅使的，是它們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之間因为实际利益而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經消失，这种說法等于說帝国主义已經脫胎換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塗脂抹粉。

第六，既然資本帝国主义和剝削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那末，誰也不可能保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不会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侵略的战争，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誰也不可能制止已經觉悟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反抗的革命战争。

第七，列宁所肯定和強調的“战争是政策的繼續”这个原理現在依然有效。資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資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資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場。从資本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說来，它們进行战争或者要求和平，都是为了追求或者保持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繼續，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繼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从来否认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說的，“‘战争是平时时期政策的繼續，和平是战争时期政策的繼續’的这一思想始終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④。

第八，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将要到来，消灭一切战争的时代将要到来。我們正在为此而斗争。但是，这个偉大时代的到来，只能是在人类消灭資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个制度消灭以前。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說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將最終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⑤

① 見《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0年第8期，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平——当代的關鍵問題》。

② 見《團結報》196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沒有根据的論战》一文。

③ 《关于目前国际形勢的几点估計》。《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81頁。

④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4頁。

⑤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頁。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

我们的论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相互间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对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这些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考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驳倒这些论点，因此，他们只好依靠肆意歪曲、制造谎言等办法，企图打倒真理。

但是，真理怎么会被打倒呢？那些妄图打倒真理的人，迟早总要被真理所打倒。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一些吗？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自以为世界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运转的，而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发展的。说到这一点，使我们回忆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

“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①

让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包含在自己的主观里的历史唯心论者好好地想想这段话吧！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②；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③。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页。

②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③ 陶里亚蒂1962年4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①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②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③。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④。“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④

五、“我们可以讨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⑤“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⑥，“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⑥。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④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共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③。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⑦，可以“代表人民群众”^⑦，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⑧。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③。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⑧，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⑧。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⑨。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⑨，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

① 陶里亚蒂 1956 年 6 月在意大利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②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 1956 年 12 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④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⑤ 陶里亚蒂 1956 年 3 月在意大利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⑥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⑦ 见意共《再生》周刊 1962 年 5 月 19 日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⑧ 见《再生》周刊 1962 年 6 月 9 日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⑨ 陶里亚蒂 1962 年 4 月在意大利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人們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①。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謂“意大利道路”，所謂“結構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資產階級專政的条件下，通过資產階級民主、宪法、議会的“合法途徑”，“逐步改变国家內部均势和結構”，“使新的階級强行进入国家的領導”^②。至于什么是“新的階級”，他們的說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經濟方面，在保存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預”，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壟断資本。換句話說，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經過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必經過无產階級專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們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階級的革命学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貢獻”^③。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

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是壟断資本主义以前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如果說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貢獻”的話，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資產階級社会主义。他們把自由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壟断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經驗”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較

在資產階級專政沒有被推翻以前，在无產階級專政沒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爭論的最根本問題。在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偉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闡明了这个最根本的問題，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謂“結構改革”，所謂“改变国家內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說：“中国同志要吓唬我們，他們向我們提到考茨基，我們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沒有任何共同之处。”^④是不是我們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沒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們也“請他們允許我們提醒”：好好地再讀一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願意理会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② 陶里亚蒂：《讓我們使討論回到它的真實限度》。



列宁說：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現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經具备了；而苏維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現成关系，……”^①。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②。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須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論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們的生产关系成为統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們的生产关系，都必須使它們在政治上成为統治阶级，都必須掌握国家政权。

剝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剝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們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經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經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現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綱領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沒有社会主义革命，沒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經濟利益可以不經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謂“意大利道路”，所謂“結構改革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綱領“缺乏实际感”呢？

讓我們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統計，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約十万人，有各級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監獄近一千所。秘密的鎮压机器和武装人員都沒有包括在內。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軍事基地和美国的駐軍。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們的提綱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議會等等，却对意大利現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誰、鎮压誰？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鎮压壟断资产阶级呢？还是保护壟断资产阶级，鎮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談論国家制度的时

①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頁。

② 《再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頁。



候，都不应当迴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一九六〇年七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

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嗎？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說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嗎？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嗎？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嗎？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①。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時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們想提醒人們讀一讀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下面两段話：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論上近視、被資產階級偏見俘虜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階級，主要是因为他們不了解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階級斗争相当尖銳的时候，除了資產階級专政或无产階級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資產階級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經驗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經驗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經濟学、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馬克思主义闡明了在商品經濟的統治下資產階級专政的經濟必然性，能够代替資產階級的，沒有别的階級，只有由資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階級，即无产階級。”

“社会党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錯誤，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統治階級的更換而更換。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紀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剝削者手里轉到多数被剝削者手里的現象，能够在旧式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的旧范圍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劇的轉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謬絕倫了。”^①

請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說，根据資本主义社会階級斗争的全部經驗，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經驗，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結論。列宁认为，在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的旧范圍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資產階級的手里轉移到无产階級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說这些話的时候到現在，世界上一切陸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經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闡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嗎？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嗎？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階級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嗎？当然，各国工人階級是經過和平的方式还是經過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②。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資產階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頁。

②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宣言》，第14頁。



級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①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②。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③。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④。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④，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④。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②。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④。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④。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④。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②。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②。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② 《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③ 陶里亚蒂1956年3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④ 陶里亚蒂1956年12月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



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①。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判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②。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③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④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程本身也不可能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②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88页。

③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④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



保障我們有这种进步。”

或許，在一九四八年說的这段話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錯誤和欺騙人民的行为”。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間，陶里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說：“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經濟和社会的綱領的要点”^①。就是說，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經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轉直下，簡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一九六〇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說：“我們在宪法範圍內行动，而且对一切問我們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們請他們看看宪法。我們在我們的《綱領声明》中写过，我們現在重說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結構改革，以便打垮壟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經濟和金融寡头損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階級进入政权’。”就是說，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資产階級宪法的範圍內进行活动，依靠資产階級宪法，去“打垮壟断集团的权力”。

一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們这种意見是“坚定不移的”。他們說：“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經過建立宪法所規定的新国家和經過新的領導階級进入这个国家的領導”^②；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內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④。他們还說：“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階級本质和階級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⑤。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資产階級宪法的範圍內“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記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詞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壟断資产階級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壟断資产階級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廢紙。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資产階級宪法的虛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資产階級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資产階級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絕利用資产階級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錯誤的，这就是列宁所說的“左”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

① 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

②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①，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內，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②。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③。“这个论点就是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④。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⑤。

这里，我們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們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們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們的观点，说我們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們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們的文章中所说的我們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偉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們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們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內，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⑤。

① 《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② 陶里亚蒂1956年3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③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见苏共《真理报》1956年3月7日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0页。



資產階級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銀行家就愈能操纵資產階級議會”^①。

其次，我們主張利用議會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議會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說的：工人階級政党“主張利用議會斗争，主張参加議會斗争，但是他們又无情地揭露‘議會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議會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②。

又其次，我們主張利用資產階級議會的讲坛，来揭露資產階級社会的膿疮，揭露資產階級議會的欺騙性。資產階級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們的議會中容納工人階級政党的代表，同时，他們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騙、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領袖。因此，在进行議會斗争的时候，工人階級政党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問題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拋棄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們把議會看成是超階級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資產階級議會的作用，把議會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議會，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議會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③，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④，“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④。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嗎？

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資產階級选举法，取得議會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議會中都占有議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議席。但是，資產階級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議會，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許共产党的議員成为議會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時間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議會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壟断資產階級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剝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議席。

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階級成为統治階級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階級成为統治階級，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資產階級宣揚議會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資產階級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統治階級，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統治階級，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說：“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8頁。

②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1頁。

③ 陶里亚蒂：《議會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④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綱》。



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階級斗争和革命。”^①

历史告訴我們，当“工人政党”放棄无产階級的革命綱領，墮落成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使自己成为資產階級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資產階級也可以允許这样的党在議會中占有暫時多数的議席，并組織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經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綱領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維持和巩固資產階級專政，絲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階級被压迫被剝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經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階級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們要問，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綱說：必須賦予議會以立法、領導和監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們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領導人所渴望的这种議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誰来賦予？是由資產階級賦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賦予？事实是：資產階級議会的权力，是資產階級賦予的。資產階級賦予它的議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資產階級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資產階級賦予它的議会的权力有多大，議會总不可能成为資產階級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資產階級用以統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資產階級的官僚机构和軍事組織，而不是資產階級議會。

共产党人拋棄了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專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資產階級議會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賦予領導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議會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說：“我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會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②。列宁批評考茨基的道路說：“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③。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談到利用合法途徑和議會途徑的时候說：“我們現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們当时所說的純粹机会主义。”^④

有什么根据可以說，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說，过去是純粹的机会主义，現在忽然成为純粹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話，实际上承认了他們現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別人說他們走的就是議會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說：“我要糾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們說——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議會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⑤他又說：“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議會竞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頁。

② 見《新時代》1912年第46期考茨基《新策略》一文。

③ 《國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頁。

④ 陶里亚蒂1956年3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⑤ 陶里亚蒂1956年6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选和等待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①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②，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③。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④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 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①；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②。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陶里亚蒂 1956 年 6 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③ 陶里亚蒂 1962 年 4 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④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谈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①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即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47页。



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崙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①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②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47、148页。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①，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②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③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缴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時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

① 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② 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利的企业轉到私人壟断資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經濟学家季諾·隆哥的統計，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銀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資產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資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統計，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壟断資本組織。

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資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壟断資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經濟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壟断資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間，名义資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們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資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資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爭夺市場的斗爭，并且作为意大利壟断資產階級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氫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約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銷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 and 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壟断資產階級在国际石油市場上夺得了陣地。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壟断和私人壟断，实际上是壟断資產階級掠夺大量利潤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壟断資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絕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說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壟断資本集团的权力”^①，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間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資本主义已經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資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現在的資本主义叫做“新資本主义”。他們硬說在这种所謂“新資本主义”或資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爭、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和无产階級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沒有用处了。照他們看来，这种所謂“新資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結盟”，从資本主义制度內部，可以解决資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傳播这种“理論”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論”中为他們的“結構改革論”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①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②。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③。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④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⑤。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話。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⑥。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逃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9—430页。

③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1页。

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記住偉大列宁的教訓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問題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結構改革論”，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間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說：

“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闡述这个学說（即无产階級专政学說——本刊編者注）的时候說：资产階級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設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須由工人階級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須用无产階級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階級自己領導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們在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后所主張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別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討論的問題。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說，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議會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們考虑到世界上已經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

請看这些事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經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階級变成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①。正如列宁所說明的，“在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階級专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說的那樣）的思想”^②。

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經驗以后，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問題。正如列宁所說明的，“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毁的”。列宁說，“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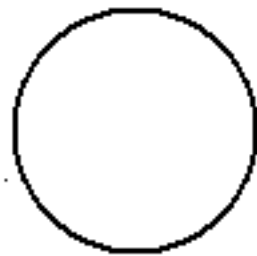
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經驗，馬克思得出結論說，无产階級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簡單地把官僚軍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問題。因为正如列宁所說的：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邏輯推論，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經驗^④。在一八五二年以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頁。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9頁。

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頁。

④ 参看《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6頁。



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經驗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①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經驗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②。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現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議論，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③

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們的綱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謂“结构改革論”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們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統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会改变我們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論”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說，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鉢而已。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他們两人的論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我們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統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們能够取得統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④。他們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④，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誰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說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④，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組織，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組織？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們这类異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9頁。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6頁。

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2頁。

④ 参看《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无非是为了避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①，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②。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③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一九五六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④。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⑤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

①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47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③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①。他們的全部理論和全部綱領，充滿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階級和平”的贊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階級的“和平”，絲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階級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實踐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結論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拋棄和修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說，絕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結論，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階級斗争經驗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拋棄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們也願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謙遜些，記住偉大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訓：“在无产階級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經做过的事情”^②。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偉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階級战略原則，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現代修正主义者和他們的追隨者的根本分歧。

六、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战术上重視敌人

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論点。他們一会儿說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說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輕視”；一会儿說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說这是“因为害怕”。他們喧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們的說法矛盾百出，几乎話无倫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論点。但是，他們的一切說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論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說：“肯定說帝国主义是一只簡單的紙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錯誤的。”^③又說：“如果它是紙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④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

①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綱》。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頁。

③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見《讓我們使討論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里讀書的小學生，他在回答語文課中一般詞匯的釋義的試題時說，紙老虎就是用紙糊的老虎，那倒滿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觀點是不能研究理論問題的。自命為“對工人階級的革命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化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①的陶里亞蒂同志，在回答一個嚴肅的理論問題的時候，卻搬出這樣一個小學生的答案來，這豈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嗎？

毛澤東同志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點，從來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說：

“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②

不願傾聽真理的人比聾子還要聾。誰個說過，用肩膀推一下，帝國主義就倒了？誰個說過，為打倒它不需要花費力氣和不需要進行鬥爭呢？

在這裡，我們願意再引述毛澤東同志講過的另外一段話。他說：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后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人民的決死鬥爭的時候，也還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鬥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时代，出現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③

毛澤東同志這一段話，不但說明了三大剝削階級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兩重性，而且說明了它們在面臨人民決死鬥爭的時候的兩重性。顯然，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分析。

① 見《讓我們使討論回到它的真實限度》。

② 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見《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頁。

③ 見《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題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0頁。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一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

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② 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②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9卷，第283页。



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現時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①

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嗎？

那些企图駁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論点的人，你們应当首先駁倒列宁的論点。你們为什么不直接駁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等論点呢？这不是表示你們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不論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的說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說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出的，是为着通俗地說明问题的本质。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許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來說明问题，有許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說明了问题。

有人表面上曾經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糾纏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們思想上的极端貧困以外，当然还有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何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調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壟断资产阶级的統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軍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們的国民經济納入軍事化的軌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絕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經为他們的老板們現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計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絕境中找到可靠的出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紀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們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創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这些人，与其說他們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說他們是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他們現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搖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們想反对什么冒險主义，他們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險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們反对革命的目的。

^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頁。



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論俄国杜馬(沙皇議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說过:“杜馬內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願,它們对緩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問題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問題更要关心。”^①

現在,我們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說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階級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們更加关心的是,緩和和削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視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偉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們,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說的“在战略上藐視敌人”这个論点痛罵一頓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視敌人”这个論点痛罵一頓。这些英雄們說,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战术上重視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們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須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們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們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們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一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錯誤;或者是輕举妄动,犯冒險主义的錯誤。归根到底,他們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則,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

前面我們已經說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們敢于藐視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們还要說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們敢于藐視敌人,而且因为他們在每一个局部問題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問題上,能够重視敌人,采取謹慎态度。一般說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階級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順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險主义的錯誤,給革命带来損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敗。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們为无产階級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战术上重視敌人。他們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綫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傾冒險主义。他們在这些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偉大的范例。

大家都很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話来結束的:

“共产党人认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②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沙皇国家杜馬的态度的決議(II)》。《列宁全集》第10卷,第45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頁。



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本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求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①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高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②

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一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87页。



远是光辉灿烂的。

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

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②

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

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

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③

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

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

① 《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页。

② 《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俄文第2版，第2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278页。



行斗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

一九〇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如此等等。

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

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①

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页。



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較次要的和暫时的原因而經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終不会改变的”^①。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規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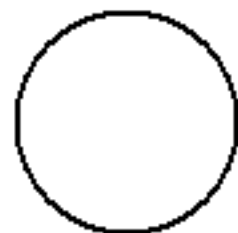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澤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話中，作了概括的說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蔣介石反动集团的統治，已經腐爛，沒有前途。我們有理由輕視它們，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內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問題上(不論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輕視敌人，相反，应当重視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們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輕視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也輕視敌人。如果我們在全体上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胜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不采取謹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爭取一切应当爭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公務人員，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紳士)，我們就要犯‘左’傾机会主义錯誤。”^②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問題，即战略問題，是說得很明确的，沒有絲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問題，即战术問題，也是說得很明确的，沒有絲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視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腐朽的，是沒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輕視敌人而必須重視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統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們在人民中还有欺騙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統治，就必须經歷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統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放棄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們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謹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談，或者盲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頁。

^②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頁。



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末，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①。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②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

一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人民的最終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微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終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222页。



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問題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問題的辯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战术上重視敌人”，說成是“經院哲学”，說成是“两面态度”，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哲学”究竟是什么？他們的“一面态度”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論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們，說过下面的一段話：

“他們都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辯证法，他們是一窍不通的。”^①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說过下面的一段話：

“他們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們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階級一步，更怕跟资产階級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內容的、大言不慚的空談来掩飾自己的怯弱。”^②

請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仔細地讀一讀列宁的这两段話吧！这两段話是真正可以作為某些人的政治鏡子的。

七、在两条战綫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政党。在法西斯統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傳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領導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

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論列宁，都是經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許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經驗教訓；第二，因为世界現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頁。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2頁。



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一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为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②

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③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④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

②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0页。

③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11页。

④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40页。



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①

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

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②。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一，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③。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

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

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④。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40页。

② 见《再生》周刊1962年10月13日《论‘铁托集团’》一文。

③ 中共中央全会1962年12月14日通过的决议。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529、530页。



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当吗？为什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

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

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①

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

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②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92—93页。

②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許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論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針、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純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論具有最根本意义的偉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詳地作了許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說：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說。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证是絕對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①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現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話。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謬論作一个鮮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說的是一种“罪过”。問題是有沒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

有人故意避开我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們引用了一些什么話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們“一段一段的引证”^②。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說我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傳教师的权利来負責傳布教条”^③。他們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語言来攻击我們，究竟說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們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們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話，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別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傳教师”。

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說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們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嘮嘮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語言，他們的許多根本論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襲过来的。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374頁。

② 見法共《新法兰西》周刊1963年1月16日《我們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文。

③ 見《人道报》1963年1月16日《我們的团结和我們的紀律》一文。



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

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研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己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②。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③

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① 《“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2页。



列宁說：“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則行事。他們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① 現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嗎？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

毛澤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們党內提出了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这个著名的命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綫上的斗争的經驗总结。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这个命題，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須时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錯誤；另一方面，必須經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經驗，根据实践經驗来考察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錯誤。

为什么必須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須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說：“馬克思的学說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給予人們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辯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②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經驗，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經驗，所得出的科学結論。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經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經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說过，自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說获得更大的胜利”^③。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說过：“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現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許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敗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

① 《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377頁。

② 《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頁。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4頁。



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①

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②。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本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③。

莫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④

现在有些人，完全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己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⑤。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②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9页。

③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④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10页。

⑤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列宁經常說到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結合起来。他曾經說过：“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靜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階級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組織、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結合起来。”①

列宁这段話，准确地說明了我們必須坚持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澤东同志关于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論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論到認識問題的时候，这样說过：

“就人类認識运动的秩序說来，总是由認識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总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們已經認識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認識为指导，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認識，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認識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②

教条主义的錯誤，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說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剝地搬运外国的經驗，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結果。他們不顾時間、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們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爭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錯誤，也往往輕举妄动，陷于冒險主义的錯誤。

一个党的領導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那末，它就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規律，它在理論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錯誤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絕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

毛澤东同志在我們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強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时候，他指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周圍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他說：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頁。

②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98頁。



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变的內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①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历史。沒有这种結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設想的。

原則性和灵活性

“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統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則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繼續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統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們继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則的政策。

什么是原則的政策？这就是，我們提出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場，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風倒，而拋棄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贊成这个忽而贊成那个，忽而主張这样忽而主張那样，而把原則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說，无产阶级政党必須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們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則，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則。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②这个論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01頁。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40頁。



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① 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棄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許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訂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絕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傳說“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策呢？

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迴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拋棄原则政策。

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許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

列宁說得很好：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說，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話。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②

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籠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篇社論，曾經說过：“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們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們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說：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8頁。

^② 《論妥协》。《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0頁。



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有人把古巴事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①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①

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

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分裂的代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

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22页。



伯恩施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經多次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拋棄了。伯恩施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諾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現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囂張，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們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話，他們的下場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許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謠污蔑的手段，采用挑撥离間的手段，在起勁地鬧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絕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團結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團結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行动，是違反世界上絕大多数人的願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們那种假團結、真分裂的手法，在人們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沒有好結局的。我們曾經劝告那些鬧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馬”，可是有人还不願意接受我們的劝告。他們认为現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馬”。看来，他們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繼續鬧下去。他們既然一定要鬧，他們就鬧下去吧。群众是会給他們做結論的，历史是会給他們做結論的。

一种很有趣味的現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現了。什么現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們，却十分害怕他們所使勁地斥責的所謂“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們为了答辯他們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們不敢在他們報紙、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們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對我們的答辯文章，不敢让自己國內的人民同它們見面，严密封鎖，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們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朋友們，同志們，你們既然肯定我們的文章是錯誤的，何不将这些錯誤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駁，以便在你們自己國內的人民中間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們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們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鎖得铁桶一般呢？你們怕真理。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脱离群众，所以你們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們，同志們，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評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誰是誰非。我們希望你們学习我們的榜样，我們就是这样做的。我們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东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当作我們的回答。有时我們只登載你們的文章，我們不作回答，让讀者們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嗎？現代修正主义的老爺們，你們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內荏，表面上



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①

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 and 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16页。



驗、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在爭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場的有效形式。”^①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們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則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間的分歧。我們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无助于問題的解决的，是无助于团結的。我們一直主張，有爭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論战，回到內部协商的軌道上来。我們現在的主張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間，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們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會議的主張，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討論大家共同关心的問題，是适宜的。

我們当时就提出，要举行兄弟党會議，并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难和障碍，有賴于进行許多准备工作。

我們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間有爭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和緩关系、恢复团結的步驟，即使是微小的步驟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會議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

我們当时就建議，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們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間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談，交換意見，这对于兄弟党會議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

我們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間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間分歧的規定的。我們曾經多次地說明过这些意見。現在，我們再一次地說明这些意見。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們的意見。如果是誠意的話，是言行一致的話，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們历来所希望的。

我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須团結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結起来！

讓我們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結起来！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第 41—42 頁。



红旗

HONGQI

5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五期 ★

目 录

关于目前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

若干問題 范承祥 (1)

論太谷县的农业技术改革 陶魯茹 (19)

題材多样化与作品的思想性 景 元 (28)

談开展批評与鼓励創作 馮健男 (32)

詭辯論和辯证法的根本对立 張世英 (35)

☆ 三月十六日出版 ☆



关于目前帝国主义 矛盾发展的若干问题

范承祥

在目前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有了比较重大的变化；第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问题的愈来愈尖锐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竞争已经由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进展到一些国家组织的集团同另一些国家组织的集团的竞争的阶段，也就是由国家之间的竞争进展到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第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正在用种种办法——首先是用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和所谓经济“一体化”的办法——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仍在增长；第四，西欧各国工农群众争取民主、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现在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发展；第五，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所谓“不发达国家地带”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同时，它们对这一地带的剥削和掠夺达到了历史上未有的高度。

这五个方面的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里，提出下列五个问题，作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参考。

一 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近年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十分深刻的、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英国的地位相对地削弱了，西欧国家、特别是“共同市场”六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力量相对地加强了。一九六一年，“共同市场”六国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点九，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比英国大一点三倍。六国的钢产量达七千三百三十万吨，相

当于美国钢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四，大于英国二点二六倍；汽车产量达四百一十一万辆，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大于英国一点八倍。在出口贸易方面，六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比美国多百分之五十四点五，比英国大两倍左右；它们的进口贸易占资本主义世界进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比美国大一倍，比英国大一点六倍。六国的黄金外汇储备，高达一百六十六亿美元，而美国黄



金储备到现在已经不到一百六十亿美元，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储备数字都比英国大。从国际收支方面来讲，六国在一九六〇年盈余八十亿美元以上，而美、英则都有亏损。从各方面看，六国的经济实力合在一起，已使英国瞠乎其後，而几与美国旗鼓相当。

上述六国不仅在力量上大有增强，而且已经组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因而它们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国绝对依赖和唯命是从；反过来，美国现在有些地方还需求助于六国，而六国对美国的反抗态度也日益强烈。前者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一九六〇年末开始的美国同西德进行的财政谈判，美国要求西德对它承担长期财政援助的义务，为西德所拒绝；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开始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的谈判，以及经过几次谈判所缔结的设立额外储备基金的协定，实际上是美元和英镑要求法郎、西德马克及其他西欧货币的支持，否则美元和英镑就站不住。后者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不久前六国为了反击美国对它们的某些商品的歧视，竟提高了五种美国商品的进口税。从各种经济意义上说，目前“共同市场”六国集团已经开始形成一支堪与美、英相抗衡的力量。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在指出美国和西欧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时写道：“现在欧洲人觉得他们的大陆在许多方面几乎同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他们要在西方同盟中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在参与“西方的全球政策”和在解决最重要的经济、军事战略和政治问题上同美国完全平等。英国力谋保持自己的核大国地位，法国专心于建立自

己的“独立核打击力量”，西德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核武器。法国与西德结成轴心，并在这个基础上筹组西欧“政治联盟”，作为对美、英争夺西欧领导权的资本。英、法、西德谋求摆脱美国政治、军事控制以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地位的做法，大大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报刊已在公开批评其西欧盟国的“叛变”行为。

美国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优势的确有了相对的削弱，它在经济上的困难的确实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但是，是否可以說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之外，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或中心了呢？

事实很清楚，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相当时间之内，美国在西方国家（及日本）中，毕竟还是具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根据美国《幸福》杂志一九六二年八月号的估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每年营业额在三亿美元以上的大工矿企业，美国有一百六十七家，英国有三十家，西德有二十二家，法国有十一家。又如，美国目前还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重要矿产资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使资本主义世界矿产原料市场受着美国的操纵。

资本输出的能力是衡量帝国主义力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美国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输出能力最大的国家。战后美国对外投资总额曾经超过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总和，现在仍然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九六〇年底，美国政府和私人对外投资总额达七百一十四亿美元，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美国私人资本每年平均向世界各地输出达四十二亿美元以



上，而英国则每年平均不到十亿美元。美国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在英国、在西欧其他国家和在日本等国投资设厂，就地制造商品，一九五九年美国私人直接投资控制的国外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达三百五十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商品输出总值的一倍多。特别在“共同市场”成立后的四年期间，在西欧开设的美国公司就有一千二百多家。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在英国的私人直接投资达三十一亿九千四百万美元，在法国达七亿四千一百万美元，在西德达十亿零六百万美元，在日本达二亿五千四百万美元。

美国在战后建立起的一套维护其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军事、政治、经济机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分崩离析的情况虽然越来越显著，但是目前还能够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并且仍然在美国的操纵和控制之下。这些机构在控制资本主义世界方面的作用虽已大大削弱，而且还会继续削弱，但是在目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效力的。

现在，西欧六国合在一起虽然可以与美国抗衡，但它们相互之间也有不少经济上的利害冲突，可供美国利用来削弱它们对美国的抵抗。这些国家虽然力图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但在实际上一时还不能完全彻底地摆脱。

在政治上，美国的指挥棒虽然目前在西欧已不如过去那样灵敏，但是，美国对许多西欧国家的内政外交仍然有重大的影响。西德因为是战败国，在政治、军事上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也在大力扶植西德军国主义，正如同它在远东大力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一样。

美国还在经常利用西欧国家互相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来达到它企图继续控制的目的。美国正在策划把西欧“共同市场”纳入它的轨道。美国对英国的控制也在加紧。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事件后，美帝国主义更加趾高气扬，不仅更加不愿与其西欧盟国平起平坐，而且更加凶恶地压迫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指挥棒之下。同年十二月，美英拿骚会谈的结果，以及后来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对法国所施加的压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压力已经遭到了法国公开而坚决的抵抗，法国不仅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而且破裂了关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布鲁塞尔谈判，从而狠狠地打击了美国 and 英国。现在美国还不死心，它还在加紧施展外交手腕，图谋分化法国和“共同市场”其他五国——特别是法国和西德——的关系，孤立和打击法国，压迫戴高乐屈服。

美国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新殖民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采取各种方法，进行了新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在军事上，通过提供“军事援助”，签订军事条约，设立军事基地，组织军事集团，对别国进行军事占领或半军事占领；在经济上，以“援助”方式，大量输出资本，租借和开发资源，从而控制和剥削那些受“援”国家；在政治上，诱胁一些国家签订各种奴役协定，并在一些国家中收买反动势力，建立傀儡政权，进行颠覆和干涉活动，排挤原来在这些国家的旧殖民主义者（例如，在刚果，在非洲许多国家中），使它们变成美国实际上的附庸。

由此可见，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对西欧的



力量对比虽然相对削弱，但它迄今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或中心，仍是现代最大国际剥削者和现代最大新殖民帝国。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掠夺，保护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利益，采取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种办法，粗暴地干涉许多国家的内政，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它仍然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它的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

变，也绝不会改变。低估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及其危险作用是不正确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和妄图奴役世界人民的计划，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全世界人民的当前任务就是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统一战线，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二 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的趋势正在加强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力量对比的上述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间重新组合的问题。

今天在帝国主义阵营里面，已经从个别国家之间的对立竞争发展到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竞争。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愈来愈深刻的一个主要标志。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成为三种不同形式的国家集团。第一种形式是西欧“共同市场”。这是一个以法国同西德为首的六个西欧国家政府之间组织起来的经济、政治集团。它有着相当严密的一套超国家机构，并且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政治目标——统一欧洲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外交。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过不少国际卡特尔和国际托拉斯。但是那些都是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组合，最多是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本身从来没有正式介入。而这次“共同市场”却是六国政府之间的组合。这六个国家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这六个国家的国家垄断组织又互相勾结，达成了许多国际协议，特别是法国和西德的垄断资

本互相渗透，互相交织，构成了以巴黎——波恩轴心为核心的“共同市场”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共同市场”是六个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国际组合和同盟，是在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集团。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上，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第一次。

自从“共同市场”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以来，六国已经根据“罗马条约”，在降低内部关税、取消内部贸易限额、建立对外共同关税等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去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现在正在酝酿成立所谓“欧洲政治联盟”。其排他性与日俱增。这对于六国以外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英国，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种形式是欧洲小自由贸易区。小自由贸易区是以英国为首的七个欧洲国家（英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葡萄牙）政府之间组成的集团，但是，它只是七国暂时联合在一起同“共同市场”六国进行讨价



还价的一个集团。因为英国早先提出成立由“欧洲经济合作局”十七个成员国组成所谓“自由贸易区”计划来同“共同市场”抗衡的手法已经失败了；瑞典、丹麦、奥地利、瑞士这些小国个别地同“共同市场”竞争也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所以它们几个国家就联合在一起，组成小自由贸易区，来同“共同市场”斗争。但是，它同“共同市场”是有区别的。七国只是分阶段地取消相互间工业品的关税，农产品并不包括在内，而“共同市场”是把农产品也包括在内的。小自由贸易区对外不采取共同关税，而“共同市场”的对外关税却是共同的。小自由贸易区没有一套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不像“共同市场”那样有法院、议会、部长级的理事会等机关。它也没有打算搞什么“政治联盟”（当然，七国中的某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创议成立小自由贸易区，也是有一定的政治打算的）。此外，在政治上，英国、挪威、丹麦、葡萄牙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而瑞士、瑞典、奥地利则是中立国；而“共同市场”六国却都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总之，小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有着极为有限的目的的临时组合。

第三种形式是美国集团（如美洲“争取进步联盟”等）。英联邦也基本上属于这类形式。这种集团实际上是建立在宗主国同附庸国那样的关系之上的。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把一些地区垄断起来，不让别人挤进去。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战后出现的像“共同市场”之类的国家集团呢？这里，需要弄清三个问题。第一，这类国家集团的出现，是说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联合趋势加强了，还是

矛盾趋势加强了？第二，“共同市场”是不是符合所谓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的趋势？第三，“共同市场”的矛头在现阶段上究竟针对着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集团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列宁讲过，帝国主义之间的协议和联盟都是强盗的协议、强盗的联盟，他们没有一种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真正的、长远的利益。列宁还说，帝国主义的大国集团，不管看来多么巩固，只要神圣的私有制利益要求它们闹翻，这些集团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闹翻。^①很显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是不可能建立什么“阶级团结”的。

“共同市场”六国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的趋势，正是如此。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它们的力量对比颇为悬殊，因而它们的利益也不一样。它们有暂时需要相互勾结的地方，也有根本利害相互矛盾的地方。

暂时需要相互勾结的地方是：他们都希望通过“共同市场”来解决自己的市场问题。西德希望利用“共同市场”来扩大自己工业品的销售场所，进入非洲的法属殖民地，占领法国工业品市场，利用法国来恢复它的军国主义；法国则想在西德推销它自己的农产品，借助西德的资金来“开发”法属的非洲，同时也可以利用西德的资金和技术来把自己的工业化向前推进一步；法国西德联合起来，还

^① 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1—342页。



可以在政治上向美国和英国讨价还价；意大利可以输出失业；荷兰、比利时想等到法国、西德、意大利把关税扯平以后向法国、西德扩大商品输出。正是因为这样，六国才都愿意有“共同市场”。

但是，它们利害矛盾的地方也很多。第一，它们的经济结构都差不多，都是重工业发达的国家，因此碰在一起就要尖锐冲突；第二，各国的农业政策很不一样，因此在农业问题上冲突非常尖锐；第三，在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谁都怕对方在这个联盟中称王称霸，小国尤其怕大国控制；第四，在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小国想把英国拉进来作为一个平衡的力量，大国就想把英国排挤在外（法国现在不准英国进来，西德三心两意，但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却拼命地想把英国拖进来，而意大利则两边利用来取得它自己的利益）。

“共同市场”内部的矛盾现在已经很尖锐，今后还会向更尖锐的方向发展。第一，“共同市场”迄今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也就是说还没有碰到过危机的阶段，因此大家还可以分点肥。但是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当危机到了，大家没有肥可以分了，矛盾就要更加暴露，更加尖锐。第二，现在“共同市场”还只是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谈判，已经很困难。将来还要搞什么经济“一体化”，统一金融、财政、货币政策；搞什么政治“一体化”，统一国防、外交；到那个时候，问题就会愈多愈复杂，困难就会更大。第三，布鲁塞尔谈判破裂之后，围绕着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的内部斗争

将会更加复杂化，可能拖几年不能解决。

对美国集团和英国集团来说，“共同市场”更是六国对它们加强经济、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特别是加强市场争夺战的一种工具。一个英国经济学者说得好：“共同市场”六国的共同想法是，第一步先把六国市场打成一片，并用共同对外高关税壁垒保护起来，不许别人进入，以便六国积蓄力量；借助国家机构，加紧对广大人民的榨取，加紧生产和资本的兼并集中，促进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技术的改进，从而加强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为向外扩张市场打下基础；第二步就要逐步争夺整个西欧市场；第三步再向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与美、英、日等国争夺市场，同时也向“不发达地区”扩张。事实上，“共同市场”成立之后，我们首先就看到，六国集团，主要是其中的法国和西德，在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核大国地位问题上），同美国、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之间的斗争猛烈展开，规模较前更大，程度更激烈。美国除继续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它目前拥有的军事、政治优势来对法国和西德施加压力外，还提出“扩大贸易法”和建立什么“大西洋共同体”的对案，企图借此拆掉六国的关税壁垒，并把六国重新置于美国控制之下。英国在“共同市场”成立之前坚决反对；成立之后组织小自由贸易区与之抗衡；在利用小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进行谈判失败之后，又单独申请参加“共同市场”，力图挤到里面去“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在布鲁塞尔谈判破裂之后，英国一方面严厉谴责法国，另一方面并未放松设法破坏“共同市场”的种种策划。美英的这些企图已经并且还在继续



遭到法国和西德的顽强抵抗。

“共同市場”等国家集团出現后，美、英、法、西德之間以及六国相互之間，爭夺殖民地和所謂“不发达地区”的斗争也有了更加激烈的发展。这个问题，我們在后面还要专门談到。

上述种种情况說明，“共同市場”的出現，实际上已使西方世界分裂成为上述三类国家集团。所以，“共同市場”的成立，不是表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联合趋势的加强，而恰恰是标志着帝国主义陣营的四分五裂以及北大西洋集团的分崩离析的空前严重危机。

关于第二个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能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現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經濟生活国际化的問題。

首先，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追求高额利潤的目的，决定了壟断資本一方面要限制現代科学技术的大規模运用和生产力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現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促进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后十几年来，美国及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壟断資本，由于运用現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实行自动化，采用大規模生产方法，改組工农业的結果，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些国家的壟断資本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竞争能力和攫取更高的利潤。

其次，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愈大，产品愈多，銷路問題就愈严重，市場問題就愈紧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愈尖锐。“共同市場”之类的所謂“一体化”的措施，从經濟上說，是为进行爭夺市場的斗争服务的，它不能真正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因此，“共同市場”并不是符合現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經濟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趋势的产物，而是六国壟断資本勾結起来、重新瓜分內部市場和爭夺外部市場的产物。

关于第三个問題，应当指出，“共同市場”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正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一样，确实具有反动的、侵略的性质。它的确有对付社会主义陣营的一面，因为帝国主义陣营同社会主义陣营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对抗性的，不可調和的，而且現在也在尖锐地发展着。但是，正如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一再指出的，帝国主义彼此之間的矛盾比起它們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突出。在現阶段，“共同市場”面对着的最迫切、最现实的矛盾，不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而是在一个一天比一天縮小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場上同美国、英国竞争的矛盾，是在帝国主义陣营內同美国、英国爭取平等地位的矛盾。今天“共同市場”的头子們在反共和所謂“欧洲人的欧洲”的旗帜下，实际进行着反对美国控制、排挤美英在西欧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斗争。

有些人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日益“团结”、“联合”起来。这种說法显然是只看到一些表面現象并为它所迷惑，而沒有看清問題的本质。問題的本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两大陣营之間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沒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并沒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規律，也并沒有



有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

事实上，自一九五八年“共同市场”成立迄今，真正急着要对付“共同市场”的，首先是美英帝国主义。肯尼迪公开承认“共同市场”是对于美国的一个“最大的挑战”。麦克米伦也一直在煞费苦心地企图找到对付“共同市场”的最好的方法；在布鲁塞尔谈判破裂之后，英国统治阶级正在为如何才能找到最有效的破坏“共同市场”的办法而焦思苦虑，意见纷纭。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法国《世界报》上有一篇文章，暴露了法国统治集团对于“共同市场”的看法和希望，大意说：一、面对美国，欧洲已经不再是靠人施舍的乞丐，而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二、法国有人担心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之后，会变成美国在“共同市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三、美国希望“共同市场”是走向“大西洋共同体”的第一阶段，但是，恰恰与美国的希望相反，统一六国的一切机构都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四、“共同市场”应该导向一个有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欧洲整体，而不是导向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大西洋整体”。布鲁塞尔谈判的破裂，证明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戴高乐和他所代表的法国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想法。

由此可见，“共同市场”的成立，在现阶段，

首先是为了同美、英争夺经济、政治霸权，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工人阶级，破坏民族独立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专门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才组织的。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就“共同市场”对第三国的关系而言，或者就“共同市场”内部的关系而言，都是矛盾的趋势在增强。“共同市场”的产生是帝国主义矛盾和分裂的结果，它的成立又更进一步加剧矛盾的发展，使矛盾和分裂更加剧烈起来。它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加深了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的状况。那种认为“共同市场”的成立，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联合趋势的增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正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的翻版。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这种论调时曾经指出：“毫无疑问，现时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①列宁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认识战后出现的各种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挽救不了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的主要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有了空前高度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对于国家

机器的控制比过去更加直接，更加全面。很

^① 《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2卷，第97—98页。



多大壟断資本家亲自担任政府的重职，亲自——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通过代理人——掌握和制訂国家的經濟政策，并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国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它們对内干預、調节資本主义的經濟，提倡什么“有計劃地預先控制生产和循环”，企图以此消灭国内經濟的矛盾，从而造成“沒有危机的高漲”；对外实行所謂經濟“一体化”，打破国界，扩大市場和資本活动的領域，企图以此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从而造成一个新的“美妙的”帝国主义的新世界。

西方主要国家的这些做法，是否像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学者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吹嘘的那样，能够阻止資本主义經濟烂下去，并证明資本主义制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呢？

我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其所以这样积极地发展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主要是由于：战后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益瓦解，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襲击越来越頻繁，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与資產階級的斗争愈趋尖銳，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个方面爭夺霸权的斗争愈趋激化——这一系列的新情况，使得資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都发展到了空前尖銳、深刻的程度，資本主义的总危机有了进一步的巨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剝削，加紧本国經濟的軍事化，以暂时緩和經濟危机，同时对外进行侵略擴張，鎮压和瓦解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提高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能力，这些国家的大壟断集团就更加全面地控制国家机器，使之更有效地为

壟断資本的利益服务。这是战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原因，是壟断資本主义垂死掙扎的反映。

西方各国壟断資本集团通过国家机构所采取的控制經濟生活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办法是实行所謂調节性措施，就是由政府通过預算或稅收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或調整銀行利率、信貸条件来适应經濟上的需要。第二种办法是建立国有企业，由国家把私人企业收买为国家所有或由国家直接投資来办厂。第三种办法是用国家津貼、訂貨、采购、信貸等来控制生产。第四种办法是国家經濟的軍事化。第五种办法是从各个方面来鼓励企业的集中和兼并，来加速資金积累，刺激投資，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加强商品的竞争能力。它們想利用这些办法来調节經濟，解决經濟困难，使資本主义經濟維持一定的繁荣，使危机不发生，使資本主义經濟不要烂下去。但是，它們的这些办法是徒劳的。因为：

第一，这些办法在一定情况下虽然起过一定程度的作用，能把危机推迟一点，或者把危机襲击的范围和它的幅度稍为缩小一点（例如英国在过去十几年中，就屡次通过交替提高或减低銀行利率和膨脹或紧縮信用的办法来調节經濟的发展，减少經濟危机襲击的程度。又如，美国战后在很大程度上靠扩軍备战来維持經濟。西欧許多国家都采取政府投資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新工业部門），但是，这些办法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暫时的。它們不能緩和資本主义經濟的根本矛盾——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因而也不能緩和市場购买力縮小同生产力擴張的矛



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愈来愈深化，从而为新的更大的危机准备条件。

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统一的、为整个国民经济所遵循的计划。所谓资本主义的计划性，不过是表现为资本家“有计划地”攫取利润而已。国家干预的结果，经济军事化的结果，只能使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一天一天地畸形发展，使许多非生产性的、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片面地发展，而许多与军事无关的但较重要的工业部门陷于停滞以至衰落。同时，把大量资财投入军事生产，结果只是使这部分国民财富不能再回到再生产领域中来，这个情况正如同饮鸩止渴一样。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也加剧了各垄断资本集团相互间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尖锐的竞赛，它们都要求参加政府去分赃，争夺有分配权力的席位。

第三，到现在为止，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实际上是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来替资本家谋求更大更多的利润。英、法、西德、意大利战后实行国有化的例子都说明，这种措施的目的只是要国家利用国家资金（人民所缴纳的税款），来高价收购那些不能给垄断资本带来适当利润的企业，由国库承担资本家的亏损；来维持那些经常赔钱、却对垄断组织有需要的各种企业（如动力、交通运输）；来承担设立新工业部门的主要费用和一切风险。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的重新分配的有力工具，结果只能更加加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不可能和缓它。

第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由于经济的畸形发

展，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成千上万农民的被迫离开土地，市场问题空前严重，经济情况就越来越不稳定，垄断资本集团就必然千方百计地用加重赋税、高涨物价等办法把所有的经济负担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同时，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垄断资本集团也就要加紧向人民的民主权利进攻。这一切，必然引起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

战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并不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逃脱危机的规律。例如，美国尽管在战后十几年来一直实行国家调节经济的办法，一直在实行着经济军事化的办法，但是它并不能逃脱五次危机的发生，而每一次危机同下一次危机的间隔愈来愈短。美国的企业设备经常开工不足，利用率只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工业生产增长率大为减缓。失业的人数经常在四、五百万之间。经济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股票市场不断发生风暴，股票价格曾多次暴跌。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推测美国在一九六三年又会发生战后第六次的衰退，也就是第六次的危机。英国也是在战后积极实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机构调节经济最突出的国家之一，可是，英国经济基本上一直是处在停滞的状态，战后已经发生过七次国际支付的危机，几乎每两年要发生一次。英国的工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失业增加到战后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九十三万人）。西欧大陆各国也是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地方，西欧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危机，但是在每一次美国危机的影响下，都免不了要发生一系列局部性的、不同程度的危机。去年西欧



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不妙。“共同市场”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减慢了；有些企业不但没有出现生产的增长，反而还出现了生产的绝对下降。小自由贸易区七国的经济增长平均停留在百分之一左右，基本上也是停滞的状态。从一九六二年的西欧经济情况来看，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已经减慢了，开工不足比以前严重；第二，对外贸易的逆差比过去扩大；第三，私人投资已经开始下降；第四，金融市场很不稳定，股票暴跌。这几条都证明危机的影子已经开始在笼罩着西欧了。这些情况证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能够排除经济危机，并不能够扭转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趋势。

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和一些经济学者寄希望于所谓经济“一体化”，认为实行了这种“一体化”就可以刺激生产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吹嘘“共同市场”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就是由于“共同市场”这个“一体化”措施所致。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事实上，过去几年“共同市场”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较快，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恢复战争创伤的过程比较长。第二，垄断资本利用新生产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工业的改组。第三，战后开始进行、迄今尚未完成的农业的大改组。第四，除美、英以外的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而集中精力于国内工业投资。第五，美国第二次大战后对西欧的投资比战前要多得多。第六，各国还有一些各自特有的具体的原因，例如意大

利的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流入西德，有助于西德经济的发展；两次法郎的贬值加强了法国输出贸易的能力，在法国境内和阿尔及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量发现，使法国工业有了较廉价的动力；意大利工资低、劳动力多，增加了它的商品竞争能力；等等。

至于说“共同市场”成立以后，六国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也不是事实。根据西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拿“共同市场”成立前的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同成立后的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两段时间来比较，在前一段时间六国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而在后一段只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出口贸易来说，前一段时间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后一段只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即以增长最大的六国内部贸易来说，前一段时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也比后一段时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大一些。这里还必须指出，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一九六二年是更加下降了。

我们并不否认，“共同市场”的成立，经济“一体化”的实行，对于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刺激作用也只是暂时的。六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相互之间的国界限制，对内相互撤除了关税壁垒，对外开始建筑共同关税壁垒，当然，相互之间的贸易就会扩大一些，这在一定期间对于刺激生产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为了加强竞争能力，就不能不合并企业，淘汰效率较低的企业，扩大效率较高的企业，并增加投资，特别是第一部类的投资，以革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就可带动第二部类产



品的暂时增加，增加就业，增加社会购买力，从而促进市场的暂时扩大。

但是，“一体化”的刺激作用究竟只能是暂时的、有一定限度的，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不能取消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高法则，不能打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框，不能够消除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矛盾又会以更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生产力越发扩大了，市场越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产品了，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又会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为了保障最高利润，这个所谓“一体化”的“共同市场”，就将被迫更进一步加强对国内人民的超额剥削，更进一步加强六国内部相互之间的争夺，更进一步加强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夺市场的

斗争，更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甚至不能排除在这一系列疯狂的争夺战基础上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事实上，“共同市场”各国目前已经在开始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了。开工不足的情况已经出现。西德已经感到生产设备的能力过剩，不少企业部门的生产已经开始下降；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已经下降；法国和西德汽车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也开始降低。同时，大量解雇工人的现象也已发生。“共同市场”领导人之一马若兰就公开承认：六国经济“已达‘繁荣’的末期。”

总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所谓经济“一体化”的办法，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续命汤，而是它垂死挣扎的表现。历史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的英明论断的完全正确。

四 经济“一体化”实施的结果是 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

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公然宣扬说，“共同市场”成立、六国经济“一体化”之后，西欧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处境有所改善，因此，它不单只对资本家有好处，而且对工人阶级也有利。他们还公然宣称，西欧的阶级矛盾可以通过“一体化”而得到缓和。这些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表面看来，现在西欧国家（包括“共同市场”六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在某些方面好像比过去有了一些改进。人们之所以得

出这样的表面印象，主要是由于：一、战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比较充分的就业状态（其原因已在上面第三节中作了说明），许多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工作，同时工人经常加班加点；二、赊购办法的普遍推行，工人大量预支了购买力；三、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国家机器，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措施，来软化和收买工人阶级，缓和阶级斗争的形势。

实际上，西欧各国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程度正在日益加深。这表现在下面一些情况上。



第一，生活費用不断上漲。据初步計算，自“共同市場”成立以來，西德物价上漲了百分之十四，法国上漲了百分之三十八，意大利上漲了百分之十八，荷兰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三。

第二，捐稅負擔奇重。据英国的材料，“共同市場”国家制造业工人一年繳納的捐稅占其工資的份額，西德为百分之十五点二，荷兰为百分之十点四，比利时为百分之六点九；至于間接稅还要更重。

第三，在“共同市場”成立之后，六国工人的实际工資提高得很少，而且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的国家（如法国）不仅沒有增加，反而还有下降。現在西德、英国、法国都借口对外貿易上的竞争太剧烈，都在提倡冻结工資，减低成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不仅沒有停止，反而有加强的趋势。根据羅馬条約，“共同市場”各国还要統一工資和社会福利待遇，統一的结果，当然是高标准向低标准看齐。所以今后工資和社会福利还有减低的趋势。

第四，壟断資本集团为了减低成本，加强竞争能力，还通过生产合理化、自动化等方式大大地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超額剝削。据最近材料，“共同市場”六国一般工业中，每个工人每年生产率的指数，如以一九五八年为一百，則一九六一年西德增加到一一五，法国一二二，意大利一二八。壟断資本集团实行的“赶快制”大大提高了工人們的劳动强度。工人們的劳动日也是长的。

第五，劳动强度的大大提高使得职业病

和未老先衰的情况在西欧工人中相当严重，現在資本主义国家工人超过五十岁的就很难找到雇主。工伤事故空前增加，一九五九年，法国的工伤事故有二百多万起，西德一九六一年工伤事故达三百万起，每天平均有十六个工人因工伤事故死亡，意大利仅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工伤事故便达五十八万起。

第六，“共同市場”各国的失业問題，这两年来已經开始轉趋严重。原因是：一些工业部門因生产过剩而大量解雇工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倒閉；根据“共同市場”委员会副主席曼舒尔特的估計，在今后几年內，由于农业改組的结果，六国还将有八百万中、小农民要破产。

第七，为了加强剝削，六国政府已在加紧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进攻，企图加强对他們的政治控制。例如，戴高乐在一九五八年上台后不久，就頒布了几百条各种各样的法令，来限制人民的权利；阿登納政府正在准备通过所謂“紧急状态法”，进一步剝夺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西欧經濟“一体化”的结果是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剝削，而絕不是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所謂經濟“一体化”并沒有能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貧困化的理論，相反地，却更加证实了这个理論的生命力。那些拚命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論为“庸俗”、为“宿命論”的人，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正因为如此，“共同市場”六国以及西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正在加剧，它具有如下的几



个特点：

第一，工人罢工的规模比以前扩大，次数比以前频繁。一九五九年六国罢工人数已达八百万人次，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万人次，一九六一年又增加到三千五百六十万人次。连西德这样过去罢工比较沉寂的国家，现在也开始有了罢工。在六国之外，罢工运动现在还席卷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农民群众的斗争也有很显著的发展。法国和意大利一九六一年曾经爆发了规模相当大的农民示威运动。

第三，广大群众斗争的政治性有了增强。有的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威胁，有的是为了反对垄断资本政权，有的是为了支持反对氢弹运动。不少非无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乃至政府公务员都参加了罢工。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所谓西欧经济“一体化”是在打击着人民群众日益广泛的阶层，为广泛地团结所有反垄断资本的力量共同斗争创造着条件。西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因所谓“一体化”的实行而趋于衰退，恰恰相反，斗争是更加激烈了。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应该利用有利的形势，坚决支持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以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正义要求，同他们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不断揭露和打击垄断资本，为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创造条件。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特别需要大力支持农民运动、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

把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农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直接同盟军。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德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曾经在一八五六年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①列宁也一再强调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体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因而保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些看不起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落后，“容易被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政党利用”，因而不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不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斗争的看法和做法，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当前阶级斗争日益剧烈地进行着的时候，必须警惕和揭露各种麻痹工人阶级思想的阴谋和所谓“阶级合作”的政策。现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吹嘘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提倡什么“劳资共同管理”，鼓吹什么“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等等，企图使各国工人阶级接受改良主义。同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论调，说什么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无须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变政权的性质、只要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工会等）参与制订垄断资本的所谓“经济计划”，就有可能改变这种“计划”的发展方向，使它有利于工人阶级，从而达到限制垄断组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454页。



織权利、实现深刻社会經濟改革的目的。这些散布阶级合作的幻想的論調显然是錯誤的、有害的，是适合壟断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凡

是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場上、坚决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都应该反对这些观点，坚决同这些危害革命利益的观点进行斗争。

五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 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走向新的高漲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说什么现代帝国主义的新現象是：絕大部分的殖民地都独立了，因而世界上已經沒有多少殖民主义好反了。他們說，帝国主义現在所希望获得的是能够接受大量制成品的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大市場，已經不像过去那样需要殖民地了，因而它們也用不着进行爭夺殖民地和“不发达地区”的斗争了。这些都是睁着眼睛說瞎話，完全不顾事实。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地区”的压榨和剝削比过去更加厉害，它們之間在这一地带爭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已經达到战后以来空前激烈的程度。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既要搶夺工业发达国家的市場，也要搶夺殖民地国家的市場的。这两个市場，对于帝国主义來說，都是必要的。

战后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高漲，帝国主义被迫在繼續使用旧殖民主义手法（直接的政治經濟控制与残酷的軍事鎮压）以維持其統治的同时，更多地使用所謂新殖民主义的手法，来建立或保持自己在“不发达地区”的旧有势力范围。

所謂新殖民主义手法，就是在形式上給

予殖民地以政治独立，而在实际上則加强經濟、政治、軍事控制。現在，全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数虽然已在战后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它們的經濟仍然受着外国壟断資本的控制，帝国主义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加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控制。美国主要是靠組織軍事集团、建立軍事基地、派出“和平队”、收买当地上层分子、搞什么“粮食用于和平計劃”、大量輸出資本来維持自己的傳統势力范围（如拉丁美洲、菲律宾等），并擴張新的势力范围。英国主要是靠英国訓練的大批土著文官、帝国特惠关税制度、英镑区机构以及大量資本輸出，来巩固自己的联邦和殖民地体系。法国則主要靠建立“法兰西共同体”、同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密切合作、以及大規模資本輸出，来維系所謂法郎区的稳定；目前更企图通过所謂“共同市場联系国制度”，把“法兰西共同体”进一步束縛得紧些，使参加“共同体”的国家和其他“不发达国家”分离开来，对沒有参加“共同市場”的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則施加压力，进行新的渗透活动。

不論是美国的关税法案也好，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也好，法国的“共同市場联系国制



度”也好，表面上都好像是为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不发达国家”的产品保证销路，但是，实际上得到好处的，还是那些控制着原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山、油井的欧美殖民主义者。而且，这些办法正是为了使“不发达国家”继续片面地保持和发展原有的单一作物经济，使它们永远保持作为欧美殖民主义者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身份，使它们继续保持对于原来宗主国的依赖。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仍然是继续有着迫切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在政治形式上对殖民地作些让步（例如给予独立或自治），而在实质上却必须确保继续控制的原因。

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懂得了新殖民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或技术手段实行间接而狡猾的统治，并且把它看成是目前威胁它们的最大危险。

列宁很早就曾警告说，殖民统治可以在政治独立这种骗人的形式下存在，因此，“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欺骗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①。这段话在今天还是完全适用的。

战后殖民主义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越来越沉重。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近年来“不发达国家”每年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的损

失超过了二百亿美元。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之间，每年从“不发达国家”汇回美国的私人投资收益达十五亿美元左右，而同期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直接私人投资（包括利润再投资）仅为七亿七千万美元。这样巨额的经济和财政的剥削，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此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压低初级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结果，“不发达国家”从不等价交换中所受到的剥削大大加重。根据《金融时报》计算的物价指数，原料价格一九六一年底比一九五二年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三，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工业成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却上升了百分之十。这个剪刀差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每年还要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私人投资和政府的经济“援助”、贷款等，付出越来越多的利息、利润和还本。上面这些沉重的剥削大大削弱了“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能力，并使得这一地带的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化。

战后殖民主义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老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帝国主义国家正在酝酿着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斗争。

战后十几年来，美国垄断资本一直凭借它的经济优势，打着“反殖民主义”的幌子，向亚、澳、非三洲的英、法势力范围渗透。它已经排挤了不少英、法的势力。一九五〇年美

①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0页。



国对英镑区的投资，占英国对该区投资的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六〇年即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美帝国主义的排挤下，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出口贸易，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即趋缓慢，迄今没有多大的好转。最近美国提出“大西洋共同体”的计划，其目的之一就是想将英联邦和“共同市场”都套进为美国所主宰的经济体系中去，以便于美国垄断资本向英、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更大的扩张活动。它要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瓦解英联邦，以便由美国来接收英国的遗产。

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加剧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东南亚、在西亚、在非洲的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在刚果，已经发展到了公开火并的地步。两年来，以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为背景的加丹加独裁者冲伯，同美国的侵略工具“联合国军”，连续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斗争激烈的程度可以概见。

除美国之外，目前西德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渗入拉丁美洲及亚非地区。西德最近两年计划通过所谓“援助”向殖民地附属国地带输出的资本，五分之三在亚洲，五分之一在非洲，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在拉丁美洲，就是最好的说明。西德垄断资本与美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矛盾已经开始尖锐起来。法国和西德一方面在“共同市场”的范围内互相利用，来剥削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但另一方面，法国对西德过多渗入它的前殖民地的企图却防范得异常严密。近几年来，

西德输往这些“共同市场”非洲联系国的货物，只占西德出口总额的百分之零点五，而西德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也只占西德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一。由于这种情况，西德已经表示不愿多摊“共同市场的非洲开发基金”，而想单干。西德已经着手同一些前法属殖民地的“共同市场”联系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协定，结果引起了法国垄断资本的深刻不安和不满。

为了对付“共同市场”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地带”的活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在纷纷策动组织各自的殖民地附属国经济集团，以与“共同市场”的联系国集团对抗。在美国幕后策动之下，拉丁美洲就出现了两个区域性的经济集团：一个是包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中美洲关税同盟；另一个是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巴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九国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在英、法默许之下，非洲蒙罗维亚会议成员国（包括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塞内加尔等二十国）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决定成立关税同盟，建立共同关税，要定出促进贸易、开发经济的统一政策。在亚洲，日本野心勃勃，也想建立太平洋与亚洲经济集团。所有这些都证明帝国主义者重新瓜分殖民地附属国的问题，现在又提上日程了。这将使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不发达国家”正在受着帝国主义空前残酷的剥削，同时又是目前帝国主义者在重新分割“不发达国家地带”的残酷斗争中被宰割



的对象。它們是不会默默地听凭帝国主义者任意宰割的，它們已經起来进行坚决的反抗，力爭保卫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所組織的国家集团反感如此之大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們当中的某些人也紛紛提出不要任何帝国主义的支持，而要完全由“不发达国家”自己团结合作，組織經濟集团来抵抗帝国主义經濟集团的原因。

总之，不論是已經取得某种程度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或者是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他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它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們的民族革命任务还远未完成。他們今后的主要任务仍是要繼續同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和統治进行斗争，爭取彻底的解放，发展独立的民族經濟。

事实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他們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繼續当作自己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这几年来，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以雷霆万鈞之势，繼續高涨。在亚洲，南朝鲜、日本、越南南方和老撾等地，遍燃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烽火，文莱人民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亚洲人民要求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从亚洲滚出去。在非洲，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普遍开展。从一九六〇年到現在，二十三个国家已經贏得了独立；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經過七年多的武装斗争，

取得了民族解放的偉大胜利。現在，已經获得独立地位的非洲国家和人民，正在为保卫主权、巩固独立而繼續斗争；还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非洲国家和人民，正在为实现独立而坚决战斗。在拉丁美洲，古巴人民經過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的反动統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整个拉丁美洲广大群众日益革命化，各阶层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反对本国反动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压迫的爱国民主斗争中組成的統一战綫和統一行动越来越扩大，斗争的声势比过去更見浩大。这些情况說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加重对这些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侵略、压迫、剝削和掠夺，只能使它們同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并且激起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更大的反抗和斗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目前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源泉，世界上任何反动力量也不能够阻擋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 * *

以上五个問題，都是牽涉到現代帝国主义的根本問題，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斗争問題。必須正确地、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和革命的根本原理来研究、認識这些問題，分析帝国主义矛盾发展中的这些最新現象，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对于确定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



論太谷县的农业技术改革

陶魯笏

太谷县是山西省晋中盆地主要产粮区之一，百分之九十的耕地种植粮食作物。全县有四十万亩粮田，平川和山区大体上各占一半。太谷县的粮食产量在合作化时期基本上是逐年增长的，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了一个高峰。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八。这是在此以前从未有过的最高纪录。以后两年的粮食产量，主要由于接连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连续下降。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开始回升，比一九六〇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到一九六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三。这一年是太谷县售粮最多的一年，也是口粮、种子、饲料留得最充足的一年，而且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还都留了储备粮。

一九六二年太谷县是不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获得丰产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一年，在七月十四日以前一直没有下过透雨，以至不得不先后组织五次抗旱斗争。

那么，为什么干旱比较严重又是在连年大灾之后，还能够如此大幅度地增产呢？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切实地贯彻执行了

党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二是经过两个冬春的整风整社，对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作了适当的调整，加强了领导核心，改进了经营管理工作；三是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坚持进行的农业技术改革，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前两个原因带有普遍性，已为许多地方的事实所证明，这里不准备多谈。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是第三个原因。也就是要以太谷县在农业技术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初步成就，来说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并且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来总结太谷县的经验，以便在今后贯彻执行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更有成效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

在山西，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旱灾。所谓“十年九旱”，是当地普遍流传的俗语。为了从根本上战胜旱灾的威胁，早在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太谷县人民就和全省人民一道，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水利建设高潮。水利



建设和其他农业基本建设的大发展，形成了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而公社化的实现，反过来又促进水利建设和其他农业基本建设的更大发展。当时，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曾经号召全省人民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以下简称四化），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并且确定洪洞和太谷两县为电气化的试点县。在“四化”口号的鼓舞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太谷县经过五年持续的努力，已经建成中、小型水库十七个，抽水机站四十八处，修旧井、打新井四千八百一十五眼，开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全长四千零三十二华里。以上共做土方和石方五百一十四万方，使水浇地面积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三万九千亩迅速发展到了二十五万亩，其中有保证的水浇地由四万亩发展到十一万二千方。五年来，太谷县农村电气化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现在，全县十二个公社都程度不同地使用了电力，七百一十一个生产队有五百三十八个使用了电力，占百分之七十五点六。全县共架设输电线路一千零二十七公里，安装供抽水用的电动机一千八百七十七台，共计六千九百四十八瓩，初步构成了一个电力排灌网。在发展电力排灌的过程中，电力的综合利用也发展起来了。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生产队，普遍使用电力碾米、磨面、打场、脱粒。同时，用电力切草、轧花、榨油、加工副食品以及打井等也正在日益发展中。全县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农户，用电灯照明。

年售电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二十五万度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一千一百万度，其中农村用电占百分之七十，全县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用电五十七度。在机械化方面，全县拖拉机陆续增加到五十二个标准台。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由于加强了经营管理和设备维修，一九六二年机车出勤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全年耕地三十五万亩次，占可机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在化学肥料方面，太谷县近两年每年平均使用化学肥料三百万斤左右，集中使用于平川水地，多的地方每亩达到三十斤以上。所有这些，标志着太谷县的农业，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正在向现代化的道路迈进。

太谷县在一九六二年取得农业大幅度增产的事实，证明了为机械化、电气化初步装备起来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具有强大的抗灾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并且还显示出了一种新的趋势。这就是：整个农业生产将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不断前进，而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可以肯定，农业生产的这种新的水平，不但是过去个体的小农经济所望尘莫及，而且也是在仅仅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而没有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情况下所不能比拟的。这一点，从全县范围来看，已经相当明显，从一些“四化”程度比较高的公社和生产大队来看，就更为明显了。

以侯城公社为例，这个公社拥有两万九千多人口，“四化”程度在全县是最高的。就电气化来说，全社每人平均全年用电量已经达到九十四度。同时，在广泛应用现代农业



科学和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方面，这个公社做得也比较好。因此，这个公社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全县是最突出的。全公社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八，比全县一九六二年增长幅度高百分之二十五·五；平均亩产粮食三百七十四斤，比全县一九六二年平均水平高一百零三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产量一千斤，比全县平均水平高一百二十七斤。棉花、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增产幅度，在全县也是最高的。所有这一切说明，农业技术改革的发展，正在为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开辟着日益广阔的道路。

再看看侯城公社所属的杨家庄大队的情况，就更加令人鼓舞。这个大队包括有三个自然村，一千六百多人口，“四化”的程度在全公社又是最高。就电气化来说，全大队每人平均全年用电量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度。在广泛应用现代农业科学和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方面，由于得到山西农学院（院址就设在他们村旁）的直接帮助，收到的成效尤为显著。因此，这个大队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显得突出。从一九五八年起，五年以来，粮食产量直线上升，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八；平均亩产量达到了六百五十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将近四百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大队是在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年年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了粮食产量逐年上升，经济收入连年增加，社员生活显著提高的，而且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

一年大。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因为国家基本建设占用土地一千一百零五亩（其中有一部分蔬菜地），这个大队的总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而粮食总产量却由八十五万八千斤增至一百八十六万斤，总收入也由二十四万二千元增至四十八万七千元；人口净增百分之二十七，而售给国家的粮食却由十四万五千斤增至五十三万五千斤，售出的蔬菜也由二百万斤增至六百四十一万斤。

但是，有人说，“杨家庄好是好，就是太冒尖了，没有代表性”。全县广大的公社社员是不是这样看呢？不。恰恰相反，他们从杨家庄那里得到启示，得到鼓舞。学杨家庄、赶杨家庄的口号提出来了。杨家庄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被重视了，被推广了。一九六二年全县出现亩产粮食四百斤以上的生产队四十九个，出现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产量千斤以上的生产队一百六十一个。这些生产队虽然都还没有赶上一九六二年的杨家庄，但是其中有些却已经超过一九六〇年或一九六一年的杨家庄了。由此可见，杨家庄的成就和经验，不是没有代表性，而恰恰是体现了党中央所指出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因此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毫无疑问，以杨家庄为榜样而掀起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必将继续推动太谷县所有的人民公社不断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从而使农业生产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太谷县的农业技术改革，在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有有力地巩固了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物质生产状况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又促进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还是以侯城公社为例，这个公社的社员对国家和工人阶级给予他们的支援体会得比较深，因此，国家整体的观念、工农联盟的观念也就比较强。在那里，社员们都很关心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完全懂得只有工业生产发展了，人民公社才能得到更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因此，这个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总是完成的又早、又快、又多、又好。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名叫胡培荣的社员，是富裕中农成份，前几年经常闹退社，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拥护者了。他说：“人民公社实在好，拿棒子撑我也不出去了。”为什么思想上本来有动摇的富裕中农，有了这种转变呢？重要的原因是，侯城公社大多数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富裕中农。在这个公社里，由于集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工分值高，特别是由于党组织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关心集体、先公后私、爱护公共财物等等新的社会风尚便逐渐形成了。

太谷县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在短短的五年内，农业技术改革要想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而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抓住农业技术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促进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同时，农业技术改革越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就越是扩大，农民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热情就越是高涨，工农

联盟也就越是巩固。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条根本路线的正确性，在这里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二

应该怎样来全面地理解农业技术改革的内容呢？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农业技术改革发挥更显著的增产效果呢？

农业技术改革，中心是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用现代的技术装备来武装农业。用拖拉机耕地，究竟能不能增产，有些人曾经是有怀疑的。可是现在太谷县的农民们却确信无疑了。他们亲身体会到，用拖拉机耕地，可以及时地普遍地进行伏耕、秋耕，并且耕得深，对恢复地力和防止土壤盐碱化，都很有好处。在同样的条件下，用拖拉机耕种的土地，比用畜力耕种的土地，每亩可增产粮食二十至三十斤。

但是，太谷县目前由于拖拉机的机具不全，或者适应性差，只能深耕不能浅耕，只能粗耙粗耨不能细耙细耨，所以，机耕最宜用于伏耕、秋耕，而不宜用于春耕。如果头年用拖拉机深耕，第二年春天再用畜力浅耕和细耙细耨，增产效果就更大了。正因为如此，太谷县的农民，并没有因为有了拖拉机，而忽视耕畜的繁殖和饲养。他们懂得了机、马、牛相结合是一个重要的增产之道。

电气化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怎样呢？可以电力灌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从太谷县



看，电力灌溉增产的作用最为显著。使用电力抽水的水井，一般比普通的水井深得多，因而水源充足，不怕干旱，而且可以降低地下水位防止土壤盐碱化。它还有一个好处是，用水方便，可以按不同作物的需要适时灌溉，增多灌溉次数，从而解决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以及上下游之间相互争水的矛盾。在山西，一般用河水自流灌溉的保证水浇地，一年浇四次就算不错了，而用井水电力灌溉的保证水浇地，每年却能浇六、七次以至十次以上。一九六二年太谷县用井水电力灌溉的保证水浇地共有八万七千亩，平均亩产粮食达到了四百二十二斤。所以，在使用电力灌溉的地方，普遍流行着一句新农谚：“不怕天老爷恶旱，就怕电碾子不转。”这就是公社社员们对电气化的最热情的赞颂。

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业增产不仅有直接的作用，更重要的在于使用机械和电力，可以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和畜力，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用于精耕细作，从而发挥更大的增产作用。据侯城公社统计，一九六二年仅抽水、玉米脱粒、米面加工、电动打场等四项，就节省了六十二万个人工，因而每亩地的平均投工数，比高级合作社时期增加了七个；节省了六十一万个畜工，大部分用于田间配合拖拉机耕作，因而耕、耙、耨等都更精细了，送肥、打场和运粮等也更及时了。太谷县每到夏季，又要收、又要种、又要锄，劳动力特别紧张，因此常常出现麦子收打迟、复播迟和秋苗锄得少、复播面积少的“两迟两少”的现象。现在，在侯城公社已经可以做到麦子适时收打，可按节令完成复播任务，秋苗可以多锄一遍，复播的面积也多了。

许多事实证明，只要气候条件适合，一亩地由一年一茬改为一年两茬，加上水多、肥足、选育良种、深耕细作等条件，产量往往可以提高一倍以上。

农业技术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的改革，同时还包含现代农业科学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在发展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选育良种、合理密植、作物栽培、倒茬轮作、防治病虫害等方面应用现代农业科学，都属于农业技术改革的内容，而且都有显著的增产作用。而这些也正是人们所熟悉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八字宪法”是把现代农业科学和我国农民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经验结合起来提炼而成的，是实现农业增产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太谷县在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方面，曾经走过弯路，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不够实事求是，甚至把老农经验一脚踢开。在纠正这些缺点之后，他们对农业“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就更加注意调查研究、摸索规律，而对改良土壤和选育良种尤为重视。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试验、总结、推广，再试验、再总结、再推广。例如，在改良土壤方面，他们针对山区、盐碱地区、卤土地区、新水地、井水地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里切外垫、起高垫低、铺沙压碱、铺沙盖卤、平整土地、划小甲畦等不同办法，坚持进行土地加工。改良土壤虽然费工多，但是增产也显著。以铺沙为例，每铺一亩地就要用五十个工，但是产量却可以提高一倍以上。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进展，改良土壤的规模就可以逐年有计划地扩大。在选育良种方面，他们在山西农学院的帮助下，五年来全县培育、繁殖、推



广了小麦、谷子、玉米、高粱、棉花等五种作物的三十七种优良品种，全县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采用良种，发挥了显著的增产作用。

楊家庄大队一九六二年种了一千三百八十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四百八十七斤，其中高额丰产田亩产达到八百多斤。这可以说是在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农业“八字宪法”的综合成果。这个大队在一九五七年水地小麦只浇水两三次，一九六二年浇水增至七次以上。一九五七年每亩施用一般农家肥料三十多担，一九六二年每亩施用优质农家肥料八十担，化学肥料四十多斤。他们的经验证明，在灌溉次数多，水量有充分保证的条件下，使用化学肥料越多，农家有机肥料也必须相应增多，才能保护地力，并且更好地发挥增产效果。所以，他们始终没有因为化学肥料增多，而放松或忽视农家肥料。特别是种子，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推广，一九六二年已经全部改用“华北672”、“太谷303”、“农大183”等小麦良种，小麦生长茁壮，颗粒饱满，能抗锈病，不怕倒伏，每亩平均可增产五十多斤。密植，曾经是这个大队争论比较多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试验和总结，他们已经摸索到在保证水浇地里播种小麦的合理密度。由此可见，楊家庄大队所以能够获得小麦大面积丰产的成果，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个大队的“四化”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也显然是同他们认真推行农业“八字宪法”，重视农业科学的应用分不开的。

太谷县的经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农业技术改革的内容必须有全面的理解，不能孤立地抓机械化、电气化，而忽视

农业科学的广泛应用，忽视推行农业“八字宪法”。相反地，必须利用机械化、电气化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更积极地推行农业“八字宪法”。可以肯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业“八字宪法”结合得越好，农业生产的水平就越高。太谷县的经验还证明，农业“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都有丰富的内容和它本身的规律，而各个字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构成一个整体。同时，在“四化”的新的条件下，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容必然会引起新的变化和发展。这就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科学技术上进一步探讨研究，把农业“八字宪法”的全面运用提高到更高的科学水平，从而发挥更大的增产作用。

三

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呢？

首先，必须把国家的计划和群众的积极性恰当地结合起来，采取积极的量力而行的方针。

太谷县在过去几年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不但取得了丰富的正面经验，同时也取得了有益的反面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集中起来，最主要的是，在群众的建设热情和革命干劲一经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发扬人们的积极性，而避免盲目性；必须有一个切实的统一计划，并且认真地按照它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制定这个计划的出发点应当是：既要反映人们的积极性，又要依据国家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积累的实际可能性；既要为长远利益打算，



又要照顾当前利益。一句话，就是必须量力而行。在这里，所谓量力，就是既要考虑到国家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又要考虑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计划同国家计划衔接起来，才能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国家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以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矛盾，从而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太谷县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有些时候就不是这样做的。一方面，他们的水利化和电气化的建设计划，指标过高，战线过长，脱离了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各项计划指标下达之后，又层层加码。问题更严重的是，当时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层层加码的现象，不但不进行必要的纠正，反而给以支持和鼓励。这样就更加助长了盲目性的发展，以致造成了被动局面。人们的本心是想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可是，事与愿违，急于求成反而更慢了。

中共太谷县委经过检查和总结，深刻地认识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没有全面规划，不实行量力而行的方针，不坚持和发扬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的精神，是不行的。因此，他们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按照先平川、次丘陵、后山区的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平川地区，又选择水源充足、有经济作物、收入较大的地方先搞，然后逐步扩展。在用电方面，先生产，后生活。在生活用电上，又先粮食加工，后家庭照明。例如，杨家庄大队一九五八年已经开始用电力灌溉，但是在四年之后，即到一九六一年，在生产有

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社员才家家户户安装电灯。全县普遍安装电灯，也只是一九六二年的事。太谷县五年来电力建设共花了九百四十万元，其中国家投资三百一十万元，公社投资六百三十万元。在公社投资中，有一百六十万元是银行贷款，其余都是自己的积累。侯城公社只有六个大队所借的贷款还没有还清，其余十八个大队不仅全部还清，而且队队有积累，几乎户户有存款。太谷县的水利建设工程，也由于坚持了上述的方针和步骤，并且重视勘察设计和施工质量，所以基本上没有出过“废品”，而且最近两年都陆续开始受益了。这一切说明，这样做，建设发展的速度不是慢了，而是更快了。

其次，必须坚持土洋并举的方针。

太谷县的电气化是以电力排灌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实行土洋并举的方针，在短短五年之内，电力灌溉的发展，就不可能这样快。现在全县有一千九百一十眼电力灌溉的机井，其中就有九百六十一眼是利用旧井和原有的解放式水车改装的。买一部小型的电动水车需要五百元，而改装解放式水车只要三十元就够了。太谷县的机井几乎全部是小型的，每个机井可灌溉耕地五十亩左右。这种小型机井同大型深水机井比较，灌溉面积只相当于后者的十分之一，而且现代化程度也差，只能算是半土半洋。但是，它的好处是，投资少，建设速度快，受益时间也快，能够迅速地普及。当然，在普及的基础上还要逐步提高，半土半洋还要继续向完全现代化发展。大型深水机井虽然投资多，但是坚固耐久，效率更高，从长远看，无论在人力方面、用电方面、电气器材方面、占用



土地方面等等，都更节省得多。因此，在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还应当逐步更新设备，改用大型深水机井。现在，有些生产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太谷县对于农具的改革和农副产品加工工具的改革，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总之，实行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由低到高、循序渐近的办法，这就是太谷县所采取的方针。

第三，必须加强经济核算，降低生产费用。

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但是也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有些地方增产多，开支大，收入增加得并不多。因此，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生产费用，保证增产又增收，是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太谷县的实践证明，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费用，必须从上到下树立经济核算的观念，建立必要的经济核算制度。同时，还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一，继续抓紧机械、电气设备和水利工程的配套工作，使它们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二，建立和健全农业机械和农村用电的管理系统，办好县营的综合机械厂，抓紧机械、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使机械、电气设备提高利用率，降低损坏率。三，充分利用机械化、电气化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和畜力，发展多种经营，增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四，发展农业动力机械的综合利用，使拖拉机站也为农副产品加工和农村运输服务，逐步成为各种农业机械统一管理、综合利用的农业机械站。太谷县的拖拉机站已经开始这样做，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每亩耕地的机耕费，已经由过去的一元五

角降低到一元一角四分，而且拖拉机站全年核算还有盈余。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农业技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

在太谷县可以看到，由于机器的使用，部分地代替了手工操作，在农活定额、劳动管理和技术管理等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矛盾。诸如：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新技术和老经验的矛盾，青年和老农的矛盾等等。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必须在经营管理上摸索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和新的具体政策，特别是技术政策，以鼓励青年和老农、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等各种人的集体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必须学会把现代农业科学和老农传统经验结合起来，以现代农业科学为指导，去总结老农的经验，使其中有用的部分，经过研究和整理，上升到科学的水平；必须提倡青年学习新的技术，同时，也要教育青年尊重老农，向老农学习有用的传统经验。对于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及时加以解决，就可以推动农业技术改革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四

目前广大农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正在进入一个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新的形势，给党的领导提出了些什么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呢？

从太谷县来看，第一件事，要加强对大自然的调查研究，并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出长期的全面的农业技术改革规划。只有作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



究，才能使农业技术改革的规划更加切合实际，才能使拖拉机站和机耕队的設置、电网的設置、水利工程的安排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等等，都更加經濟、合理。現在，太谷县在山西农学院的合作和帮助下，正在制訂今后五年到十年的农业技术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长期规划。应当指出，有了长期的全面的规划，还必须要有集中統一的领导，必須強調按照統一的國家計劃办事，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长期规划的順利实现。

第二件事，要建立一支农业技术改革所必需的又紅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下决心使自己逐步地从外行变成內行，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加强对农业技术改革工作的领导，积极地培养新生力量。为此，就必须善于同科学技术人員团结合作，既要耐心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又要虛心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識；就必须实行党中央所提倡的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結合的领导方法，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总结群众的經驗，总结实际的經驗。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断地获得必要的經驗和知識，才能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人員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断地壮大科学技术队伍。

第三件事，要随着农业技术改革的发展，坚持不懈地改造农民的旧思想、旧习惯。毛澤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論人民民主专政》的名著中就指出，“严重的問題是教育农民”。农民是带着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进入新社会的，因此难免要同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发生抵触。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自发

资本主义倾向，常常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頑强地表現出来的。在农村中，只有使个体生产的小农經濟全部改变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彻底改造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才有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沒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把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也作为不断地教育、改造、提高农民的过程，是办不到的。太谷县的实践表明，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要求人們重視集体劳动，重視人与人之間的协作关系，重視工农之間和城乡之間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太谷县的实践还表明，在长期的和平的建設环境中，人們往往容易強調技术，而忽視政治，忽視客观存在着的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而这种階級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是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存在着。因此，为了彻底改造农民的旧思想、旧习惯，就必须坚持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階級路綫，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就必须按照新的情况和新的内容，进一步地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經常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进行革命傳統教育、階級教育和工农联盟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技术改革工作順利地进行，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公社制度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号召我們，爭取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時間，在全国範圍內，基本上实现农业技术改革这一偉大的历史任务。能不能办到呢？可以預断，只要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是一定能够办得到的。



题材多样化与作品的思想性

· 景 元 ·

鲁迅的《一件小事》，其实并不是一件小事，或者说它的题材是“小”的，但它所写的形象却异常高大，包含的思想异常深刻。契诃夫的《万卡》写的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页，但这细小的题材却表现了多么深刻的思想内容！这事实一方面说明了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不能以题材的大小论高低，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在优秀的作家那里，总是注意并善于从即使是小题材中，也尽力发掘出更深广的社会意义，反映和表现时代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如果说，把写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对立起来的狭隘观点，妨碍社会主义文艺花园的丰富和充实，那么，忽视从日常生活题材中提炼和开掘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思想，题材的多样性并不能保证开出的都是绚丽灿烂的花朵。在反对题材问题上的片面狭隘观点时，认真注意到后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文艺创作中的题材与主题思想的关系，不能简单化。把题材与主题思想等同起来，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选择什么题材与表现什么思想，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

说它有联系，因为题材对作品内容有一

定的制约作用。描写重大题材，表现工农兵群众革命实践中的巨大事件，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可以更有方地反映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英雄，总是产生于改造世界的尖锐斗争中。严酷激烈的战斗环境，使英雄人物的革命的思想、斗争的智慧、高尚的品质、坚强的性格，得以最充分地展开。正是在革命农民与反动势力的剧烈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朱老忠式的农民革命家才得到鲜明的刻画；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产生了像临牺牲前高呼“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的革命战士李有国的形象；在复杂危险的敌我斗争环境里，展现了机智勇敢的人民侦察兵杨子荣等的动人风姿；在土改的群众运动暴风雨的场景中，描绘出觉悟了的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等的群像；在合作化运动的深刻社会改造的斗争画面里，塑造出革命的新一代——梁生宝等令人喜爱的人物。读者从这些英雄人物的战斗和成长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前进的步伐，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脉搏，从而取得对生活的更深的认识和理解，领受到更大的教育和鼓舞。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重大题材的日常生活题材，至少在程度上难以与之相比并。忽视题材在思想容量上的客观限



度和差别，否定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区别，将从逻辑上走到题材无差别论。唯其因为我们看到并承认这种不同题材思想容量上的差别，所以我们强调重大题材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反映时代的脉搏，生活的激流，题材需要选择，重大题材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

从来伟大的革命作家都永远是生活在革命斗争的深处，站在历史的前锋，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蓬勃的朝气，涌溢的热情，磅礴的气势，概括着时代，以新的先进的思想、新的英雄形象，给生活带来震惊和激动，推动和鼓舞群众去思索和斗争。我们的时代、斗争的无产阶级更需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这种要求，必然在那些真正自觉的永远保持革命意志的作家那里，得到有力的响应。严肃的责任感和战斗热情，促使他们去反映群众的伟大斗争，把自己的珍贵的劳动，奉献给人民，即使他不熟悉这些题材，革命的义务感也推动他努力去熟悉。

说它有区别，因为题材终究不等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一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与价值，主要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艺术概括能力和技巧。题材思想容量的客观可能性，只有通过作家的认识、发掘才能表现出来。同一题材，由于认识的不同或发掘深度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性质和不同思想水平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就会有成败工拙之分。如果缺少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刻的思想和足够的艺术力量，重大题材可能处理得平庸。反之，如果有正确的世界观指导，深刻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技巧，即使通过生活的细小侧

面，也可以反映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美，以至透过生活的一个波澜或枝叶，有力地揭示生活的底蕴。我们从现代一些优秀作家的笔下，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从看来平凡、普通的地方，发掘出新人物、新思想、新品质的萌芽的才能。描写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使细小事物与深刻意见密切结合，生活插曲与时代主调谐和交融，同样可以引导读者深入地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真理。

正确认识题材与主题思想的关系，对于揭露反对描写重大题材的错误论调和批评题材问题上的片面狭隘观点，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繁荣文艺创作，我们在强调写重大题材的同时，又提倡题材的多样化。

然而，社会主义文艺提倡题材多样化，要求开拓更广阔的题材领域，显然是为了更充分和多方面地反映时代精神和表现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而不是为多样而多样。开拓题材领域与坚持作品思想性的要求，应当统一。如果把提倡题材的多样化了解为放松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特别是在描写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中引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或庸俗无聊的趣味，这不是正确的理解。

对于作家来说，选择题材，塑造形象，这并不是目的。人们说，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这话很值得咀嚼。即使是描写细小题材的作品，缺少思想内容，也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在描写日常生活题材的时候，以生活琐事本身为目的，不厌其烦地将家庭纠纷、孩子哭闹、尿布、饭巾等作琐屑的描写，其结



果，只能产生内容空虚，缺乏思想价值的作品，不但对读者没有教育意义，也谈不上什么美感。不仅如此，琐事屑节的堆砌，往往把生活涂成灰色，歪曲生活的实际面貌。至于作者凭借这些描绘，以发泄空虚伤感的思绪情怀，表达低级猥亵的生活情调，其错误则更加严重了。显然，沿着对生活琐事的自然主义描写的途径，是很容易走到这一步的。文艺总是阶级的“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高尔基）。庸俗、消极、感伤、猥亵的思想情感从来都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它只能是没落阶级的意识、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情绪和革命意志衰退的人的心情表现。这种思想情绪在文艺上反映出来，只能起着败坏革命情绪的有害影响。

把文艺的教育性与娱乐性对立起来，未免狭隘，对于种花修草，山水记游，要求过高，也属不当。但如孤立地强调娱乐，单纯要求赏心悦目、小巧轻松，弄得毫无时代气息，成为鲁迅所反对的“小摆设”，与我们对题材多样化的要求，也不相符。人民需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积极的健康的作品，因为它可以鼓舞人们的意志，引导人们热爱生活，而不需要那种使人意志消沉、“玩物丧志”的一味“软性”的作品。

生活琐事、山水花草不是不可以写，问题是如何写，通过它表现什么思想内容。作家选择日常生活题材，然而作家的兴趣不在于生活琐事本身，而在于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旧社会中一个黄包车夫看来平常的行

为，引起鲁迅的注意，是作家从中看出了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和灵魂的美。沙皇制度下一个小童工的平凡的遭遇，深深激动了契诃夫，是因为作家从中看到了人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指出过，十七世纪荷兰绘画所喜爱的日常题材不能单从它本身去了解，他们所以乐于取材于身边的平凡事物，因为这一切是他们刚从与自然作斗争和同外族统治作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荷兰画家是本着“高尚的民族感”画这一切的。在我国，古人画松竹梅兰，也寄寓着高尚的社会情操，写游记，则常抒发着积极的生活见解，这优秀传统，值得重视。一件作品对于社会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什么思想内容，通过形象所包含的意蕴给予读者以什么思想情感上的影响。作家的职责，作家的艺术力量，就在于他应该和善于从种种日常生活中认识和发现它的深刻含义，并通过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对读者进行教育。革命的作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的严肃的任务。

鲁迅曾经说过，作家“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但是他又说：“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是相反相成的。就题材说，革命的作家，从革命的思想出发是“什么事情”、“什么材料”都可以写的，然而同时正因



为他是一个严肃的革命作家，在选定一种题材，进行创作时，却不能不根据思想内容的需要进行严格的取舍，提炼出那最能表现主题思想的典型材料，而撇弃那“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材料。其实，选材的过程也是开掘主题的过程，开掘得深，自然选材就严。有时所以会将琐屑的事情填成一篇，就因为开掘得肤浅，而这一点不能不与作者的立场观点联系起来。如果是真正的革命作家，那是不会以描写琐屑的事情为满足的。

“开掘要深，选材要严”，这也就是艺术概括、提炼和典型化的要求。描写日常生活题材，并没有减轻艺术概括的任务，勿宁说更加重了这种工作，因为它不容易。即小见大，从微知著，做起来并不简单。需要作家认真地研究题材，认识题材，进行精心地构思，而最根本的是作家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因而具有洞见幽微的能力，能从生活的一枝一叶中见出那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来。果戈里也曾说过：“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须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这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

认为要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是过高的看法，未必是妥当的。如果说，题材的大小，不能作为

衡量作品思想性高低的标准，那么，题材上的区分，也不能当作对作品思想性要求宽严的根据。当然程度上的差别是存在的，前面说过，或种题材的思想容量有一定限度，要求写家庭生活的作品与写革命斗争的作品，具有同样的思想意义，显然不切实际，那种脱离题材基础，生硬“拔高”主题的做法，我们一向反对。但是如果一篇描写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生活的作品，没有正确揭示人与人的新的关系，没有刻划出新人物的精神面貌，这种作品的社会意义就很值得研究。承认不同题材思想容量的差别，与要求作品具有可能更高的思想性并不矛盾。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在充分重视描写重大题材的同时，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题材领域，不断开拓得更宽广，在描写日常题材方面，出现了不少有内容的作品，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园地。当然，从现有的成就看，还远没有达到充分反映光辉多采的现实生活，满足群众多方面欣赏需要的要求。实现题材多样化的要求，还有待作家们的努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使开拓题材领域与提高思想并进，使题材的多样化成为在社会主义思想原则下的多样化，创作出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作品来。



談開展批評與鼓勵創作

馮健男

熱情地贊揚优秀作品，給予這些作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肯定和闡明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和特色，幫助作家藝術家明確認識自己應該發揚的地方，是我們文藝批評工作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也是一項經常的任務。贊揚是一種鼓勵；它鼓勵作家藝術家朝着正確的方向，以更飽滿的創作情緒，為人民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列寧在讀到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母親》的第一稿時，就熱烈而準確地贊揚它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高爾基在讀到革拉特珂夫的長篇小說《水泥》的初稿時，稱贊它的作者第一個以勞動為題材並寫出了勞動的本質意義；魯迅在發現和扶植新生力量，肯定和贊揚青年作家的新成就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意義，也是我們都知道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繁榮與提高，其中也包含了我們的文藝批評的鼓勵的成效。

但是，並不是任何的贊揚都能起鼓勵創作的積極作用。舞台上演出了壞戲，出版物上印出了壞作品，如果不作批判，反而大聲贊揚，這樣的贊揚，反映了批評家思想觀點上的問題，它只能起到對錯誤的思想和錯誤的創作傾向的“鼓勵”作用，並把讀者和觀眾引到不正確的地方去，這是錯誤的贊揚，

有害的贊揚。空洞的贊揚，沒有恰如其分地具體地分析作品的長處表現在哪裏；這表現了批評家缺乏辛勤勞動，缺乏嚴肅認真的研究精神，這種贊揚，不僅對讀者沒有教益，而且對作品的作者也不能有所幫助。過分的、片面的、不準確的贊揚，例如把在思想上藝術上並不是很完整的人物形象，說成是典型形象，把某一作家在藝術方法上的某種並不成功的新嘗試，說成是新成就和新貢獻，這種贊揚，在批評家來說，可能由於種種原因，出於種種考慮，但是，這對於創作決不是正確的鼓勵；歸根結蒂，它的作用，不可能是積極的，而只會有損於作家藝術家的不斷進步和不斷提高，甚至還有可能像魯迅所說的把作家“亂捧”而“捧殺”了的。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捧場，是同我們的文藝批評根本不相容的，是革命的作家批評家歷來所堅決反對的。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指導下，恰如其分地指出作品的缺點錯誤，和實事求是的肯定、贊揚作品的優點，是我們文藝批評的統一不可分的兩個方面。作家不僅需要贊揚的鼓勵，也需要批評的鞭策。

作家藝術家很希望在思想觀點、深入生活、發掘主題、塑造形象等方面，得到人們，



特别是得到文艺批评家的帮助和忠告。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是复杂的、曲折的。要正确而又艺术地反映这种生活，需要经过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劳动。作家艺术家很想知道，他们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呢。文艺批评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不仅可以鼓励他们的创作情绪，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肯定自己的方向，认识自己应该致力和发扬的地方。同样，文艺批评恰如其分地指出作品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可以防止他们再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且更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应该努力克服和改正的地方，找寻克服困难的道路，同自己作品中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以便更健康更迅速地成长起来。

积极要求进步和提高的作家艺术家，总是以衷心欢迎的态度，来对待正确而又严格的批评。富尔曼诺夫在《恰巴耶夫》的创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高尔基巨大的帮助，其中包括严格的批评。他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高尔基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主要“不是赞扬我的，而是更多地在我身上，指点我”，“他劝我要更多地去撕掉、烧掉正在写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重写”。高尔基这样不客气，是不是会伤害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呢？不，恰恰相反，富尔曼诺夫认为：“亲爱的而且严厉的”高尔基“骂得真好，也真能鼓励人……”。好的批评家往往是严格的，而严肃的作家艺术家，也总是欢迎严格的批评，并把它当作

对自己的一种鼓励。

一个作家艺术家，假如他的创作有缺点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帮助，他自己又觉察不到，或者虽然多少觉察到了，但仍然不够深刻，于是错误得不到纠正，创作得不到提高，甚至路子走得不对，他的创作是不能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的。相反，积极要求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一经批评家诚恳地、如实地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帮助他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他反而会精神焕发，心情愉快，可以努力使自己的创作进入新的境界。

把对缺点错误的批评同对作家艺术家的鼓励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批评缺点和错误一定会影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情绪，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里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作家艺术家不是虚心求教的，不是闻过则喜的，他从正确的批评中看不到鼓励，反而会认为这种批评妨碍自己的创作积极性，这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作家艺术家对待批评缺乏正确的态度。有时，批评的问题涉及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观点，例如涉及到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批评缺点错误会破坏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情绪，那么，这种情绪是必需破坏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无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来说，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是应该彻底破坏的，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文艺批评是文艺领域中的一种思想斗争，批评家有责任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作家艺术家也同样应当主动参加这个斗争，才能使自己经常保持健康的饱满的创作情绪。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批评的态度既粗暴，发言又武断，使得作家艺术家“敬而远之”，这是批评家应当注意的问题，作家艺术家不必因为这类批评而影响自己的创作积极性。简单粗暴、不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是我们从来反对的。

我们需要的是战斗的、切实的文艺批评，也就是旗帜鲜明、分析深刻、说理充分的批评。在批评工作中，我们既要坚决反对简单生硬的态度，也要坚决反对含糊糊、模棱两可，只说好、不说坏，以空洞的、过分的赞扬代替切实的批评的态度。坚持原则，热情待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文艺批评，总是会受到要求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欢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永远不能废弃。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并不等于放弃批评或拒绝批评。批评工作者的原则性，扶植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的责任感，是丝毫也不能削弱的。

为了真正鼓励创作，问题不在于侧重于表扬还是侧重于批评，而在于应该怎样表扬和怎样批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如恩格斯评论《城市姑娘》、《新与旧》，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弗明茨·封·西金根》等），从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进步文艺批评家那里（如别林斯基对于《死魂灵》的分析，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奥勃洛摩夫》的评价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赞扬作品中成功的部分，总是具体分析它成功在哪里，为什么是成功的，它在思想内容上、艺术方法上究竟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有什么社会意义，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有什么价值，代表了怎样的一种方向，等等。他们批评作品的缺点错误，也总

是首先抓住思想本质方面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联系中进行考察，把产生错误的根源深刻地揭示出来，说明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对艺术方法上的缺点，也给予深刻的理论分析。他们经常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概括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来，如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思想倾向与形象的关系，典型与时代的关系，等等，把作品的成败，提到这些方面来分析评论。这样的批评，能够打开作家艺术家的眼界，启发他们的思想，鼓舞和引导他们前进。我们的文艺批评家应当继承这种传统，学习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批评工作的水平。

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复杂的劳动。批评工作者不但要尽力帮助作家艺术家，也要在提高自己水平的过程中，从作家艺术家那里求得帮助。文艺批评这个不能缺少而又相当复杂的工作，必须由批评工作者和作家艺术家共同作好。在我们的批评工作者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的关系。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经常进行创作问题的讨论、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正常的，必要的。批评家在理论方面具有长处，他有责任帮助作家总结经验，对作家艺术家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给予分析与概括，使之提到理论的高度，并进而争取能总结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一些规律来。作家艺术家也可以主动提出一些创作上感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批评家一齐进行研究，并向批评家提供材料，让批评家对实际创作过程有具体的了解，帮助他们把批评工作做得更好。



詭辯論和辯證法的根本對立

張世英

詭辯論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形而上學觀點，它從來就是和辯證法根本對立的。它孤立地抓住事物的表面和片面的東西，抹煞事物的本質，混淆事物的界限。它貌似辯證法，以辯證法作幌子來反對辯證法，反對客觀真理和具體真理。

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西方哲學史上，古希臘哲學家的素朴辯證法和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都曾經同詭辯論進行過激烈的鬥爭。但是，由於這種辯證法是原始的、不完備的，或者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因而不可能徹底駁倒詭辯論。只有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產生以後，才從理論上粉碎了詭辯論，揭穿了它的騙人的外衣，同詭辯論徹底劃清了界限。

古希臘素朴辯證法的宇宙觀，正如恩格斯所說，是由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第一個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他主張一切皆流，一切皆變，萬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他認為，萬物的流轉變化是有着客觀的規律性和必然性的，人對於這種規律性和必然性的認識，就是真理；真理不能單靠感覺獲得，但可以通過思想、理性去把握。

赫拉克利特的這些光輝的辯證思想，曾遭到極大的歪曲。赫拉克利特的學生克拉底魯就是把他的辯證法歪曲成為詭辯論的一個例子。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而克拉底魯竟歪曲成“連一次也不可能”^①。照克拉底魯看來，事物既然永遠在流轉之中，瞬息萬變，人們就不可能對任何事物有確切的肯定，不可能獲得任何知識。

針對克拉底魯對赫拉克利特辯證法的這種歪曲，列寧指出：“這位克拉底魯把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弄成了詭辯，……他說：什麼都不是真理的，關於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說出什麼來。從辯證法中得出否定的（而且僅僅是否定的）結論。赫拉克利特的原則恰巧相反：‘一切都是真理的’，一切東西中都有（部分的）真理。克拉底魯只‘動了動手指頭’便回答了一切，他說：一切都在運動，關於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說出什麼來。”^②

列寧這段話鮮明地揭示了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與克拉底魯的詭辯的對立。辯證法認為，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的，但又具有質的相對穩定性；客觀真理是存在着的，人們有能

^{①②} 《拉薩爾〈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90頁。



力把握客观真理。反之，诡辩论则把运动变化的观点，歪曲成否认事物有任何质的规定性，从而引申出否认客观真理、否认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错误结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诡辩论的哲学思想本质，并实际运用了诡辩论的哲学家，是诡辩论学派（亦译作智者派）。他们原来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些职业教师，教人演讲术和辩论术，帮助人在争辩中获胜。诡辩论学派的思想学说并不统一，政治态度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早期（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论学派，代表了奴隶主民主派的利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和素朴的辩证思想。它在动摇当时的宗教、法律和道德的传统权威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期（公元前五世纪末和四世纪）的诡辩论学派，大都代表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抛弃了早期诡辩论学派的合理思想成分，继承和夸大了他们的相对主义观点，把辩论术变为一种颠倒黑白、使人陷入迷惘的概念游戏。但是，不论早期或后期的诡辩论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抱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哲学观点。

诡辩论学派最早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曾经提出一个有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①。在普罗泰戈拉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客观事物，一切都是我的，是主观的。“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②，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常存的。一切事物都只是相对于与主体的关系，大小轻重皆非事物本身所固有。^③普罗泰戈拉（他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就是诡辩论学派的诡辩论的哲学基础。

诡辩论者在进行争辩时，不是全面地正确地分析一件事情的各种论点，而是把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抽出来作为论据，至于别的观点则一概撇开不管。例如关于偷窃的行为，诡辩论者如果站在反对偷窃犯的一方，他可以把偷窃说成是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他站在偷窃犯的一方，他也可以把偷窃说成是正当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正当、不正当，只是相对的，一切都以对自己有利与否为转移，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

同诡辩论进行过直接而尖锐的斗争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竭力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诡辩。

柏拉图主张有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就是“理念”。“理念”是思想，即理性的东西。他认为理性与感性相反，感性的东西是主观的、相对的和不确定的，因而不是真实的；只有理性的东西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它是唯一真实的。诡辩论者之所以否认客观真理，把一切都看成只是主观的、相对的和不确定的，就因为他们只承认有感性的东西，不知道有理性的东西，不知道有“理念”。

柏拉图企图以主张有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来同诡辩论者的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由于他把作为真理的“理念”看成是在感性的、个别的有限之物之外，认为在感性的、个别的有限之物之中并没有客观真理和绝对真

①②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3页。

③ 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4页。



理，他就从另一个极端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理性和感性的辩证关系，用绝对主义来反对相对主义，因而也就不能真正同诡辩论者的相对主义划清界限。

不过，在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中，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这就是他所表述的关于“理念”的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认为，两个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有”与“无”、“同”与“异”、“一”与“多”、“无限”与“有限”，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理念”，就是真理。

柏拉图认为，他所讲的对立统一与诡辩论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不同。诡辩论者不了解对立面的统一，把对立面割裂开来，认为一物在一种主观的观点下是此物，在另一种主观的观点下是他物。例如，一种东西对这个人甜的，对另一个人是苦的，苦和甜是以人的感觉来决定的，没有任何客观性。柏拉图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只有按照客观的观点去指明一物是此物，也是他物，这才是真正地把对立面结合起来。彼此对立的双方，都是在客观上统一起来的。柏拉图从客观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对立面的统一，并以此反对诡辩论，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他所谓客观的东西乃是“理念”，而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这样一来，在诡辩论者那里，是由人的感觉来决定的东西，在柏拉图这里，不过是换成为由思想来决定的东西罢了。柏拉图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使他不可能从客观物质世界的观点出发去把握事物本身的对立统一，也就不可能同诡辩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诡辩论者在当时虽然由于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的反对而声名狼藉，但诡辩论的思想观点并没有真正被驳倒。这种思想观点，在以后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古希腊罗马奴隶制衰颓时期的怀疑论，就是与诡辩论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一脉相通的。怀疑论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一切都是虚假的”^①，“死与生之间并无分别”^②。怀疑论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下判断，既不能肯定它，也不能否定它。

怀疑论不理解正面与反面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它完全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因此，它实质上也是一种诡辩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系统地批判了诡辩论的一个哲学家，他所批判的对象主要就是古希腊的诡辩论。

黑格尔了解到诡辩论与主观唯心主义的联系。他主张根据“客观思想”或“纯概念”的观点去理解对立面的统一。他说：“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技艺，好像它是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③所谓“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的“技艺”，就是指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诡辩论，所谓“属于概念的客观性”的辩证法，就是指黑

① 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6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2页。

③ 转引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格尔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純概念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詭辯論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而他的辩证法則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具体概念”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揭露了詭辯論的形而上学实质的哲学家。黑格尔所謂的“具体”就是“多样性的統一”。他认为，辩证法坚持主張事物是具体的，詭辯論却是从具体事物中任意抽取一个片面，就把它当做事物的根据。至于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哪一个片面当做根据，則由詭辯論者“自由选择”^①。这样一来，詭辯論者就可以“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最坏或最无理之事物說出一些好的理由”^②。所以黑格尔說：“詭辯的本质乃在于承认孤立的片面的抽象原則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原則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③ 詭辯論者所寻求的根据，“并不包括事情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根据，而其他特殊的諸方面又有特殊的根据；但是沒有一个穷尽了那构成諸方面的联系和包含它們全体的事情本身，沒有一个是充足的根据，即概念”^④。这里所謂“概念”，就是指作为“多样性的統一”的“具体概念”。黑格尔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辩证法从事物的諸方面的联系和有机統一中看事物，它把作为“多样性的統一”的“具体概念”看成事物的真正根据和本质；詭辯論与此相反，它从事物的“多样性的統一”中随意抽取一个片面作为論辯的根据。

黑格尔还进一步从“对立面的統一”的观点反对了詭辯論。他认为，詭辯論者根本不理解对立面的統一，他們把否定看成了“外

在的”、“單純的”、“空洞的”否定。

与此相反，黑格尔认为，按照真正的辩证法的观点，肯定的东西本身包含有否定的方面，而否定的东西也保存着肯定的方面；否定不但不使一物成为无，而且使它成为更丰富、更具体的东西。^⑤

黑格尔对詭辯論的批評无疑地包含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他认为，辩证法从“多样性的統一”中看事物，而詭辯論只是随便抽取其中一个片面作根据；辩证法真正把否定与肯定統一起来，而詭辯論則把否定看成單純的、空洞的否定。

但是，黑格尔的这些論述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他的辩证法就不可能同詭辯論彻底划清界限。

黑格尔虽然經常強調辩证法要从客观的事物本身去考察事物，但是他认为客观事物的本质就是“客观思想”或“純概念”。这样一来，黑格尔所要求用以理解对立統一的所謂“客观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沒有超出人的主观的思想范围。

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柏拉图的辩证法有所不同。他強調絕對即在相对之中，无限即在有限之中。但是，黑格尔认为矛盾发展只能在有限的、相对的东西中进行，而他所謂的至高无上的、无限的“概念”——“絕對理念”，則是絕對完滿的、沒有矛盾、沒有过渡的。这就表明，黑格尔为了建立关于絕對完

①④ 《大邏輯》。格洛克納編：《黑格尔全集》第4卷，1928年德文版，第577、581頁。

②③ 《小邏輯》，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72、188頁。

⑤ 參閱《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頁。



滿的“絕對理念”的唯心主義體系，最終不能不違背自己所強調的辯證思想，把絕對與相對、無限與有限割裂開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的辯證法不可能真正克服詭辯論的相對主義。

在哲學史上，唯一能戰勝詭辯論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把辯證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在同一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詭辯論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他們就曾經對利用哲學史上的詭辯論來歪曲辯證法的一切機會主義派別，進行過尖銳的鬥爭。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採用折衷主義的詭辯手法來歪曲辯證法。他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時，根本不去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抽象地、主觀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壟斷、競爭等有“好”和“壞”兩方面。壟斷、競爭等都是“從神心裡分泌出來的”“好東西”，“不好的”只不過是“壟斷的現實和競爭的現實”，以及它的“悲慘後果”^①。因此，在蒲魯東看來，無產階級無需根本觸動資本主義制度，只要消除它的“壞”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決。

針對蒲魯東對辯證法的這種歪曲，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蒲魯東“從來也不理解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義的

界限”；他的觀點，“也像歷史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構成”；一切“科學中的江湖騙術和政治上的隨機應變是與這種觀點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②。

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腦們，在一系列的根本上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他們承襲了哲學史上的一切詭辯論的衣鉢，變本加厲地用詭辯來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他們為了取悅於資產階級而無恥地歪曲了辯證法。在他們那裡，“辯證法正在變成最卑鄙最下賤的詭辯術”^③。

列寧繼馬克思、恩格斯之後，高舉唯物辯證法的旗幟，同機會主義的詭辯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他在許多哲學著作和政論文章中，把辯證法和詭辯論鮮明地對立起來。他指出，詭辯論是“離開事變的內部聯繫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④，為了同詭辯論作鬥爭，必須“研究事件及其發展的全部具體情況”^⑤。

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詭辯論的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出，唯物辯證法與詭辯論是根本對立的。

一切詭辯論者都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他們認為真理的標準，不過是主觀的需要和效用。自古希臘的詭辯學派用“人是萬物

① 參看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447、449頁。

② 《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373、374頁。

③ 《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第211頁。

④⑤ 《俄國的休特古姆派》。《列寧全集》第21卷，第99頁。



的尺度”这句名言把这一点加以概括以后，一切诡辩论者，无一不是采用这一哲学根本观点：一切都由我的主观来决定。今天有需要把事情说成是正面，就把它说成正面，明天有需要把事情说成是反面，就把它说成反面。正面和反面，完全由主观方面“灵活运用”，客观实际情况可以置之不顾。在诡辩论者看来，概念不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是由人们主观随意决定的。因而，他们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否认概念的确切内容。列宁把诡辩论的这一特点称为对“概念的灵活性”的“主观的应用”。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①

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任何客观的具体事物，都包含有正面和反面，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也必须是对立面的统一，必须是灵活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主张概念的灵活性，并不像诡辩论者那样，否定概念的确切内容。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中矛盾的双方，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而反映事物的概念就有它的确切性，只有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时，一个概念才转化为另一个概念。所以列宁说：“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②

可以看到，诡辩论之所以具有辩证法的

外貌，易于同辩证法相混淆，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也谈论“概念的灵活性”，谈论事物的正面和反面。但是，它所谓的“概念的灵活性”，无非是任意地玩弄概念，它和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

诡辩论的另一特点是相对主义。诡辩论者既然认为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的标准只是人的主观需要。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没有任何绝对性，只是相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非之间是没有界限的。

诡辩论者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割裂开来，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这是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他们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因为“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③。

唯物辩证法把真理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真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可是，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于它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唯物辩证法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列宁指出：“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

①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的)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的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於主觀主義和詭辯說來,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斥絕對的。”^① 列寧在這裡又一次非常鮮明而尖銳地指出了辯證法與詭辯的根本對立。

可以看到,詭辯論之所以具有辯證法的外貌,易於同辯證法相混淆的另一原因,就在於它也主張真理的相對性。但是,詭辯論是在否認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的前提下主張真理的相對性的,它和辯證法是根本不同的。

詭辯論的又一特點,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問題,抓住事物的一個片面,把它夸大为全體,當作事物的本質。

任何具體事物都是複雜的統一體,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正如列寧指出,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就是由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構成的”^②。要認識具體真理,必須全面地觀察問題,從事物的发展過程中,從事物的各个方面去觀察事物。如果任意擷取事物的一個方面,把它作為論證的根據,並以此作出結論來,這就是玩弄詭辯術。

詭辯論者還常常隨意抽出事物的幾個片面,把它們拼湊起來,或者把根本不同的觀點無原則地調和起來,給人以全面性的外觀,但實質上都是折衷主義的表現。任何事物都有許多規定性,其中有的是本質的,有的是非本質的,必須進行具體分析。例如,玻璃杯既是一個玻璃圓筒,又是一個飲具,此外,它還可以用來壓紙,可以用來裝蝴蝶,如此等等。但是就其作為一個飲具來講,什麼“圓筒形”、“玻璃制成”、“可以壓紙”、“可

以裝蝴蝶”等等,都是不重要的,或者是不相關的。布哈林用“玻璃杯既是一個玻璃圓筒,又是一個飲器”的例子來說明“工會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这是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方面湊合在一起。列寧指出,布哈林“對問題不作絲毫具體的研究,而純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從季諾維也夫那里抽一點,從托洛茨基那里抽一點。這就是折衷主義。”^③

詭辯論之所以具有辯證法的外貌,易於同辯證法相混淆,就在於它在表面上也談論全面性,仿佛既看到這一方面,也看到那一方面。但是,它不是對事物的各方面進行真正全面的分析,不是在事物矛盾發展的總體上,把握對立面的統一,而是折衷主義的大雜拌。列寧指出:“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這樣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嚮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④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詭辯論就是根據主觀需要,否認客觀真理,隨意抽取具體事物中的一個片面,把真理時而說成是這樣,時而說成是那樣。一句話,詭辯論是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也是相對主義的。很明顯,它和唯物辯證法是根本對立的。

① 《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38卷,第408頁。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第210頁。

③ 《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32卷,第85頁。

④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38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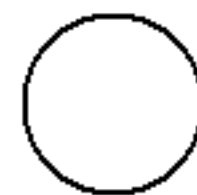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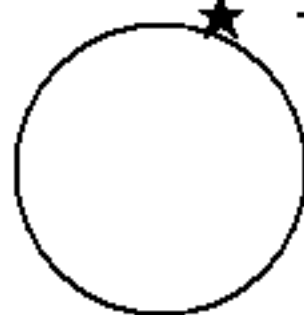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



目 录

尼赫鲁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貨色?本刊評論員 (1)

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有 林 (10)

高尔基的革命傳統和战斗精神以 群 (20)

我国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场管大同 (28)

一个很好的革命傳統陈展超 (36)

正确地对待考据楊永志 (39)

☆ 四月一日出版 ☆



尼赫鲁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

本刊评论员

一九五五年一月，印度国大党在阿瓦迪召开的第六十届年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目标的决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口号。自那时以后，国大党装模作样地在国内开展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加强了宣传。印度国内某些修正主义者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也大卖气力，为尼赫鲁的行径吹捧，说什么尼赫鲁确在奉行社会主义政策，印度已经在实现着“社会主义”，等等。

凡是看到印度的现实并承认事实的人，当然都能知道尼赫鲁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形式之一。作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工具的国大党，把社会主义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他们屁股后面的“印章”却告诉人们，这完全是为了适应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的需要。尽管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解释尽量闪烁其词，故弄玄虚，但这种宣传很快就露出了马脚。连尼赫鲁的忠实信徒、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赫·德·马拉维亚，在他一九五八年所写的《喀拉拉邦》一书中也曾天真地抱怨

说：所有解释“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大作中竟没有一处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含义包括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终止”。“他们的企图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迥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西提出来，……在他们的手中，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同共产党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罢了。”^①

所谓“计划化”方法

究竟什么是尼赫鲁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内容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需要从考察印度实施的所谓“经济计划化”着手。

尼赫鲁一九五八年在国大党《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基本看法》一文（这是一篇写给国大党领导人看的、用来统一观点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社会主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在那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实行某种“计划化”，就是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用“计划化”的方法来“减少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实际上，尼赫鲁在更早一些时候，例如他在一九四四

^① 《喀拉拉邦》，印度新德里人民出版社1958年英文版。



年所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宣传过这种观点。印度宣布独立后，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权就已经按照尼赫鲁的这种观点着手实施所谓“经济建设计划”。到目前为止，已进入所谓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真正的计划化经济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绝不可能实现经济计划化。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近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却不断宣称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方法已经日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所接受，并且成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条件。他们并且用印度实施“经济建设计划”这类事来宣扬印度“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印度的所谓“经济计划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印度各界人士对于国大党政府所采取的“计划”措施及其后果曾不断地有所评论，这些评论及其所透露的经济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些问题。

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和印度联邦议会正式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式样社会”以后不久，《印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曾说：“国内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这就是，除了中央政府中的少数领袖以外，其余的人对于计划或计划的目标都没有什么同情，而把两者都看作是‘尼赫鲁的标新立异的想法’”。这篇评论又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民

众，甚至连执政党的二、三流领袖都不知道计划是怎么一回事”^①。

印度尼赫鲁政府的所谓“经济建设计划”包括两个部分，即属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国家的“国营”部分和属于私人垄断资本的私营部分。“国营”部分由政府投资，私营部分主要由印度大垄断集团和外国资本控制的私营企业投资，政府加以资助。在一个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掌权的国家里，像这样的“经济建设计划”，当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我们说“协调”发展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的，就是尼赫鲁政府苦心培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和少数官僚特权阶层服务的。

根据尼赫鲁政府公布的数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两个所谓“五年计划”期内，在印度国民经济的投资总额中，“国营”部分略超过私营部分。“国营”部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和农田水利等几个方面，并兴办了一些炼钢厂、机器厂等。这些实际上是为了替私人垄断企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为这些企业提供机器装备、原料和半成品等。印度的所谓国营企业，早在宣布独立以前的殖民政府时代就存在了。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殖民政府曾公布一项关于工业的声明。这个声明说：“除了军需工厂、公共事业和铁路以外，具有全国重要性的基本工业，如果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来投资的话，也可能国营”。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

^① 见《印度时报》1958年7月10日“国内一周”。



的这种做法。在印度宣布独立的初期，国内私人垄断集团虽已形成，但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仍面临着资金、技术、装备、工业原料等方面的困难，私人资本，特别是垄断集团，仍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以便通过它，筹措大量资金，进口机器、装备、工业原料等，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关于这一点，甘·达·比尔拉垄断集团的《印度斯坦时报》曾经说得很清楚：“国家所建立的三个炼钢厂共需六十亿卢比，但在目前印度资本市场情况下，私人资本要筹集一亿卢比来建立一个企业都很困难”。它又说：国家举办三个钢厂，其大部分产品将由私营企业加工，这将为它们“提供本世纪初纺织业景气以来最大的工业机会”。印度财政部长德赛也说：“在过去四——五年中，私营扩大了四——五倍，如果没有公营，私营就不能获得这个成就，因为谁会给它们必要的钢铁和机器呢？”^①甚至连印度大资本家甘·达·比尔拉本人也这样说：“那些认为公营部分妨碍私营部分发展的人是目光短浅的。公营部分即使在目前也已经给予私营部分很大的推动。公营部分将成为私人企业的动力。”^②这里我们附带提一下：这个比尔拉确是颇有“远见”的，在印度大资产阶级中，他是较早资助国大党、参加“国大党运动”的一个人，他很快认识到“国大党运动不是群众运动，如果国大党执政，实际权力将掌握在资本家集团手中”^③。后来事实也证明果然如此。

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底止，尼赫鲁政府宣告“完成”了两个所谓“五年计划”。执行这些“计划”究竟对谁有利呢？印度许多资产阶级

报纸和国会议员指出，“计划”执行以来，印度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下层人民的处境更困难了，贫富悬殊更加扩大了，“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了。

据印度中央统计组织所作的一项调查，在一九五——五二年度，在印度人口中，年收入在二百卢比以下的（即在最低收入水平之下，陷于饥饿状态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一九五六——五七年度，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最近，据印度计划委员会在一篇社会分析的文章中透露，印度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落入只占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的手中；另一方面，有百分之十的人的收入不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T. T. 萨姆尤尔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经济评论》上算了如下一笔账：“百分之二十的富有者所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波多黎各为五十六，印度为五十五，英国为四十五，美国为四十四。”这就是说，印度少数富有者攫取国民收入的份额，比英国和美国还高。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国会联邦院辩论预算拨款时，各反对党议员纷纷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损害了中小企业的利益而加强了很少几家大垄断集团的地位。人民社会党议员古鲁巴达斯华米揭露说，印度每个月有近一百家小公司倒闭，然后为一些大财团所收买。仅仅八家大财团今天控制了印度全部公开性公司实收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七，它们总共控制了八十五亿卢比，其中两

① 见1960年5月18日印度《政治家报》。

② 见比尔拉1959年4月2日在印度加尔各答联合商业银行股东大会上的讲话。

③ 见德巴约蒂·柏尔曼《比尔拉家族的秘密》一书。



家控制了五十亿卢比。他在举出这些事实
后說：“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执行計划的
第一个十年中，极少数人的财富是增加得多么
厉害！”^①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在印度的所謂
“計划化”經濟中，究竟是哪一种規律在起作
用：是資本主义經濟規律，还是社会主义經
济規律。

尼赫魯政府在早些时候的工业政策決議
中，曾規定过限制私人資本創辦某些工业企
业。实际上，限制私人資本創辦的一些部門，
大都是私人資本当时所无力經營或者不願意
經營的。执行了两个“五年計划”，私人壟斷
資本有所加强以后，“限制”逐漸地消失了，
原来不允許私人創辦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門，
如石油、肥料、鋁等，都向私人开放了。私
人企业“国有化”的問題被无限期擱置了。第
三个“五年計划”的报告更明确提出，在經濟
建設中，“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都有“充分
发展的机会，而且在許多方面它們的活动是
相互补充的”。

印度的国家壟斷資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官
僚壟斷集团，它同时又为私人壟斷集团服务。
看来，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非常懂得如何
利用国家机器替自己謀利，他們熟练地运用
“假公济私”的办法攫取国民財富。印度私人
壟斷集团的首腦及其代理人，不仅参加“国
家計划”决策和諮詢机构的工作，而且直接参
加“公营”企业的管理，担任重要企业的董事
或董事长，例如，塔塔担任印度国际航空公
司的董事长。“公营”企业的經理和技术人員
往往要从私营企业調用，或者公私兼任。許
多政府高級官員的子弟以及退休的官員、軍

官等在私营公司任职，領取高薪。同时，大量
“公营”企业以“股份公司”或“混合股份公司”
的形式同私人康采恩合伙。这类“公私合营”
企业的数目不断增加。有的“公营”企业还把
一部分股票在市場上拋售，轉入私营企业之
手。总之，尼赫魯政府通过国家壟斷資本这
条渠道，利用各种形式，使国民收入源源不
絕地流入資本家和官僚們的腰包。

帝国主义資本的附庸

印度的“經濟計划化”，不仅是替少数剝
削者造福而严重損害人民利益，而且替外国
壟斷資本謀利而严重損害印度民族的独立。

实施“經濟建設計划”，需要解决資金問
題。尼赫魯在《基本看法》一文中不得不承认：
印度很穷，而且有变得更加貧穷的趋势，沒有
多余的資金进行投資。尼赫魯政府用来实行
“經濟建設計划”、发展国家壟斷資本主义的
資金，除了依靠在国内通过財政稅收、发行公
債、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等殘酷盘剝人民”

^① 見1961年4月25日《印度斯坦时报》。

• 根据尼赫魯政府公布的数字，第一个“五年
計划”期間，尼赫魯政府依靠国内債務（包括公債
和半强制性的民間儲蓄等）所筹措的資金为五十
多亿卢比，占計划开支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六，財
政赤字为四十二亿卢比，占百分之二十一。第二
个“五年計划”期間，国内債務增加到一百一十八
亿卢比，財政赤字增加到九十四点八亿卢比，分
別占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以上。第三个“五年計
划”的“公营”部分基本建設投資和事业費總額
中，来自增稅（广大人民所負擔的商品稅）和国
内債務的共占五分之二。增稅部分比第二个“五
年計划”提高百分之七十以上。

又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度时报》一
篇文章的报道，一九六二年印度財政赤字达十八
亿九千万卢比，公共債務占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
之六十二，借債占國家岁收的百分之二十。



以外，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

印度的国家壟断资本企业，除了一部分是从英国殖民政府所接收和贖买的产业外，大部分都是依靠外援兴建和扩建起来的。如年产鋼各为一百万吨的魯尔克拉鋼厂和杜尔加柏鋼厂，是依靠西德资本和英国资本建立的；波保尔重型电气设备厂，是依靠英国资本建立的。铁路、港口、水利工程、发电等是美国支配的世界銀行提供貸款和技术設備扩建和新建的。帝国主义资本的“援助”附有苛刻的条件，这在印度当然并不例外。

在印度三个“五年計划”的“公营”部分投資中，外援的比重越来越高。据印度资产阶级經濟学家辛諾艾計算，印度第三个“五年計划”外援的数目将相当于計划投資总額的百分之五十四。^① 英国壟断资本在印度的喉舌《資本》周刊在評論这点时說：“可以公平地說，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計划都是依賴資金来源的这个部分(按指外援)，假如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計划将被毀棄。因为印度的外汇儲备已經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②

《印度快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报道，印度从現在到一九七〇年，需要外国經濟援助的数目，据估計約在一百三十亿美元上下，其中将近半数要由美国以貸款或“援助”的方式提供。(这个数字，跟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經濟顧問約翰·普賴尔·刘易斯在印度历时一年的調查所得出的数字相差不多。)

事实上，正如一九六二年八月号《亚洲团结》所載《外援和印度經濟发展》一文所說的，如果大大削減或停止外援的話，那末在印度将立即引起經濟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

閉，生产減縮，工人失业，通貨膨脹无法控制，就是說，将使整个国民經济生活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尼赫魯政府要那样不擇手段地爭取外援，把爭取外援特别是美援作为首要的国策。这个政府为了討到美援，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反华反共，直至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大財閥比尔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在《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文章公开說，向中国发动“战争使我們得到西方一切友好国家的巨大同情，这样我們能期望将来得到更多的援助”。而美帝国主义也就以美援作为釣餌，使印度反动統治集团充当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亚非地区兴風作浪，并借此控制印度經濟和市場。为了这个目的，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通过世界銀行糾合了西德、英、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組織了一个所謂“援印俱乐部”。这个新殖民主义組織，成了印度經濟的无上权威，尼赫魯政府必須仰承它的鼻息。印度現在是世界上得到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尼赫魯政府已获得美援六十五亿多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一九五九年尼赫魯政府积极反华以后获得的。

但是，完全可以想像，由此而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巨大的，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能够付得起的。上引《外援和印度經濟发展》一文憤憤然地說：“过分依賴外援造成了国耻”。一九六一年七月，正当美国答应对印度提供十亿余美元的“援助”之后，《印度时报》駐华盛

① 見1960年8月19日《印度斯坦时报》。

② 見加尔各答《資本》周刊1960年7月7日社論。



頓記者伏拉在发回新德里的一篇题为《带有条件的援助》的新聞中写道：“美国現在坚持，在要求援助以前必須证明这是值得的。……美国专家首先要研究求援国的預算，它的工程、計劃及其結構。他們将要审查財政政策，以便发现用什么来制止通貨膨脹；他們还要审查它的經濟政策，以便考察它是否热心于吸引資本。”自从有“援印俱乐部”以来，这个組織每年总要开几次会来审查印度的經濟計劃和它的国际收支情况，并按年度和按情况給予“援助”。每次开会，都要指手画脚地对印度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提出指責、批評和建議，如要求改善外国私人投資的条件之类。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援印俱乐部”會議休会，会上沒有决定向印度提供的外援的数量，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印度市場的股票暴跌，金融騷动。由此可見，外援对于印度經濟具有多么大的权力！

由于乞求外援，尼赫魯政府不能不向外国壟断資本节节让步。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外汇儲备迅速消耗，財政开支不断扩大，而工农业生产又一度停滞和下降，資金越来越困难，这种让步尤其显著。国有化的政策实际上取消了。正式宣布允許外国投資者可以将賺到的全部利潤汇回本国。对外国資本实行免税、降稅或延长創业期免税权年限等措施。一九六〇年六月，尼赫魯政府同美国簽訂在新德里建立“投資中心”的协定，作为美国資本侵入印度的情报和聯絡机构。为了报答“援印俱乐部”的“援助”，尼赫魯政府还不断采取措施，欢迎和鼓励外国壟断資本投入印度許多重要工业部門，如工业机器、有色金屬、电力、工作母机、化肥、石

油等。

特別要提一下的是，外国資本和印度資本（包括国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营的企业迅速地增长了。合伙經營，是外国資本滲入和控制印度經濟的重要手段。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手段保持自己在印度的經濟地位。美国壟断資本接踵而至，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在印度宣布独立后的头三年，尼赫魯政府同外国資本合作的項目只有几十項，一九五八年增至一百零九項，一九六〇年增至三百九十項，一九六一年增至四百零二項。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大資產階級同外国壟断資本勾結的狂热程度。

据印度儲备銀行公报（一九六二年十月）极不完全的統計，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底，外国在印度的企业投資总额（不包括銀行），由二十五点五八亿卢比增加到六十九点零五亿卢比，即几乎增加一点七倍。其中，英国資本虽仍居首位，但美国資本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英国。一九五九年后的变化趋势更是如此。

外国壟断資本从印度获得的利息和利潤是惊人的。尼赫魯本人也說：“英国公司現在（在印度）賺得的利潤比在英国統治时期还多”^①。据《印度斯坦时报》特派記者报道，到一九六二——六三年度（即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尼赫魯政府所欠外債将达一百五十二点零七七亿卢比，应支付的利息将近五亿卢比。另据印度儲备銀行公报公开发表的也是极不完全的統計，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外国資本直接控制的公司所得利潤达

① 印度《閃电》周刊1963年3月2日。



二十七点六八亿卢比，其中汇回本国的达十八点四六亿卢比，占全部所得利潤的百分之六十七。利潤再投資为數甚少。这个事实从另一方面說明了印度缺乏建設資金的原因何在。

帝国主义終究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資本的掠奪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沒有真正的經济主权和經济独立。宣布独立后的印度，虽然在形式上冲破了殖民地的政治外壳，但是并没有实际改变它的經济內容。相反，随着帝国主义“援助”的增加，特別自一九五七年以后，印度經济实际上进一步殖民地化。

事实充分說明，尼赫魯政府用所謂“計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植起来的买办性的国家壟断資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分，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樣，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經济独立发展的力量，像某些經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和人民利益为敌、阻碍国家經济独立发展、使印度經济淪为外国壟断資本附庸的一种力量，正好像它不仅沒有限制私人壟断資本的发展反而是帮助私人壟断資本的发展一样。这种买办性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正是当前印度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它的发展表明尼赫魯政府是彻头彻尾代表印度反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外国壟断資本的利益，严重損害印度广大人民的利益，包括印度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至于在这样的經济基础上，会产生怎样的内外政策，自然不难作出判断，关于这一点，我們在这里不准备来談論它。

尼赫魯的新宗教

帝国主义学者和一些現代修正主义者差不多都认为，帝国主义資本“援助”不发达国家，是这些国家經济上所必要的。他們胡說什么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奴役和剝削，現在已經变成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所謂“經济援助”。他們把論证这种“援助”的必要性的“学說”，这种替新殖民主义辯护的反动理論，定名为“不发达經济学”。然而他們也无法否认，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向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許多“援助”，而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經济情况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日趋恶化。印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們不得不为此作一点辯解，說什么受援国必須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才能使“援助”發揮預期的作用。美国一位資產階級經济学家、現任美国駐印度大使約翰·加尔布雷思，他认为这些条件应当是：一、人民有“相当程度的写讀能力”以及一个“相当大的受教育的优秀分子集团”(应讀作：有相当多的有文化的奴隶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知識分子)；二、“相当多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措施”(应讀作：有相当多的压制和欺騙人民的反动措施)；三、“一个可靠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应讀作：有一个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政府)；四、“对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应讀作：要死心塌地地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①。对美国大使的这种看法，尼赫魯和他的政府怎样評价，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是尼赫魯政府也好，美帝国主义分子也好，他

① 見美国《外交季刊》1961年4月《經济援助的积极看法》一文。



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会向人民說明真实情况。例如，尼赫魯把印度“有变得更加貧穷的趋势”的原因仅仅归之于印度“人口的不斷增多”。

我們在一开始时提到的《喀拉拉邦》一书的作者，倒是多少向讀者說明了一点真实情况的。他在一九五八年所写的这本书中这样說：“如果我們把英国人統治期間所遺留下的因素撇开不談，那末，使印度人陷入日益严重的灾难中的唯一根源就是国大党的十年統治。”“人民和国大党之間”出現了“日益加深的敌对性的鴻沟”。“我們面臨着一場把整个国家都席卷在里面的經濟和政治危机”。他并且說：“英国用尽了举国的武力也沒有能够制服群众由于飢餓和痛苦而激发起来的正义憤怒和行动。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印度政府就不会激发起同样的憤怒情緒”。

国大党和尼赫魯提出所謂“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口号，就是同这种情况密切有关。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尚未終了的时候，印度公众对于国大党統治就表现出强烈的不滿，經濟和政治危机日益显露。而印度民主进步势力的影响則越来越扩大，在选举中与国大党对抗。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成就，特别是作为印度邻邦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在印度人民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乞灵于“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企图拿它作为自己殘酷專政的一种甜蜜补充手段，給自己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行徑塗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借以欺騙人民，从而保全自己的統治。

尼赫魯迫于国际国内的情势，他正像《喀

拉拉邦》一书所引用的国大党的一位前任首席部长——汉努曼撒亚——所說的那样：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抄襲了一些政治思想，又从俄国和中国抄襲了一些观念，像十六世紀印度莫臥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一样，自創一种新的宗教——在尼赫魯就叫做“社会主义”，来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战。尼赫魯一面用“社会主义”的口号粉飾自己，一面又把科学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論。他在《基本看法》一文中誹謗說，共产主义崇尚暴力和消灭个人自由，它“只想通过暴力，实际上就是想通过破坏和毁灭来实行改革。法西斯主义曾具有这一切暴力和大規模屠杀的恶劣方面”。尼赫魯这样說，其目的显然是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威信扫地。

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絕，但他們又企图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来招搖撞騙——这就是国大党阿瓦迪年会決議的由来。

那末，尼赫魯的新宗教即他所說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

照尼赫魯看来，現代的资本主义已經变了。他說：“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民主无疑地減輕了它的許多弊病，而且現在它实际上已經不是前一两代那样的资本主义了。”^①但它本身还有待克服的缺点。“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了某些社会主义成分，而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基本特点。”“我认为下面的看法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的許多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吸收，因此它們之間巨大的距离正日益縮小”^②。社会主义的什么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了呢？尼赫魯认为，这

^① 見《基本看法》一文。



就是计划化的方法。计划化可以消除资本主义本身的缺点，因为它是“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巩固基础和加快发展速度以使社会全面发展的方法”^①。

这就是说，在尼赫鲁看来，他们的“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制度不是别的，它就是一种吸收了“计划化方法”、而同时又保存了“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我们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接受”计划化方法，或者“吸收”计划化方法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尼赫鲁所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能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些都不过是奇谈怪论；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样做甚至也谈不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的结果只是使印度经济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尼赫鲁口头上说用“计划化方法”来“使社会全面发展”、达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是用所谓“计划化方法”来发展官僚买办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制造印度的贫困，并且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或遏制社会主义的影响。如此而已！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共产党人应当“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②。但是，印度国内的一些修正主义者，不但不揭露尼赫鲁集团把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狭隘阶级利益冒充为印度全民族利益的无耻企图，反而不断地向印度人民宣扬什么尼赫鲁集团的政策代表了印度全民族的利益，要印度人民无保留地团结在尼赫鲁的周围。他

们对于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要印度共产党人和印度人民相信，尼赫鲁的确是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支持。他们这样做，是帮助反动资产阶级来腐蚀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之百般吹嘘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本身并不认真对待。一九五六年五月，即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决议后不久，尼赫鲁的后台老板之一、印度大财阀甘·达·比尔拉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次有六十个美国银行家和工商业垄断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上，特地解释了尼赫鲁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说：印度的资本家对尼赫鲁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而且能够得到各种好处”。并说：尼赫鲁政府所企图取得的不外是美国已经取得了的东西，印度的道路就是走美国“福利国家”的道路。^③

这位印度大财阀的解释，真可算得上是一针见血！尼赫鲁新宗教的欺骗作用，当然不可能在印度人民中保持多久。企图用这种新宗教来欺骗人民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他们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同他们的如意算盘相反，恰恰只会进一步暴露自己的丑恶面目，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从而加速自己的破产。

① 见《基本看法》一文。

②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③ 见1956年5月3日《印度斯坦时报》。



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

· 有 林 ·

目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项基本革命原理，都在遭受着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空前严重的歪曲和糟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論陣地，因此它特别遭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猖狂攻击。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右翼社会党人一样，在篡改这项基本原理时，都在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国有化問題上大做文章。他们极力鼓吹实行以国有化为中心的一套所謂“改革”，是无产阶级反对壟断资本的新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由国家投资创办企业、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以及通过财政、信贷种种方法实行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控制等等），国有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资产阶级国有化的现状、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本质、资产阶级国有化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方面提出一些材料和看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早就有了“国有经济”。资产阶级国家一诞生，便把封建国家经营的壟断企业接收过来，并把它們由原始

的手工工場改革成现代化的企业。同时，出于战争、财政和经济上的需要，资产阶级国家又通过投资创建和收买企业的办法，逐步扩大了国有经济。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范围都很有限，它主要是兵工厂、邮政、电报和铁路等企业和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资产阶级国有化便被作为拯救濒于破产的大资本家的措施而加以较广泛的实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经济危机中，投资二千五百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下同），收买了破产的意大利贴现银行和同它相联系的一些工业公司；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中，又投资近一万四千四百亿里拉，收买了作为意大利金融资本活动中心的三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和同它相联系的许多工业企业。这些银行和企业，当时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又如德国政府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期间，为了挽救濒于破产境地的大银行和大企业，曾大量收买它们的股票。据希特勒政府的经济部长沙赫特的一次供述，在一九三一年德国政府控制了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德国银行，并从而控制了许多股份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



国有化虽然有了較多的发展，但是，整个說来，那时国有化的規模还是很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国有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以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可以看出，在这些国家里，国有企业的比重都比較大。

战后，英国在实行资产阶级国有化方面走在最前头。它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便通过了英格兰銀行国有化的法令，接着又連續在大約三年內通过了五次国有化法令。到一九五一年便陸續把英格兰銀行和煤炭、电力、煤气、国内运输等部門和部分冶金企业实行了国有化。采取国有化措施后，如下一些部門和企业变为国有：約一千五百个矿井和一些煤炭加工、制磚企业；铁路以及铁路車輛和铁道部門的附屬旅館，內河船只通过的运河和港口业务，大汽車站；煤气厂和煤气管道；大約五百家电厂以及輸电系統；国际有綫电报和无綫电报体系；航空站和全部民航机。此外，还有一些原子能工厂和兵工厂。据估計，目前英国的国营企业約占全部工业的五分之一；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接近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奥地利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化規模比較大的国家。它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和一九四七年三月，連續通过两个国有化的法令，把大多数煤炭企业、最主要的冶金工厂、有色金属工厂、采矿企业、煤矿、电站、制鋁企业、氮肥制造业和一部分机器制造企业国有化了。目前国有企业在几种产品的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鋼铁生产和煤炭开采的百分之九十八，鋼材生产的百分之九十，有色金属生产的百分之九十四，石油开采和提炼的

百分之九十一，电力工业的百分之四十六，机器制造和鋼结构制造的百分之三十一。国有企业的产量約占全部工业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八。在金融方面，于一九四八年把联合信用、信用机关和农业銀行等三家奥地利最大的銀行收归国有。

法国在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期間，曾把某些經濟部門和某些部門的主要企业国有化。这主要是：煤炭工业、电力的生产和分配、煤气的生产和分配、国民工商等四家大銀行和为数頗多的保險公司。在法国，目前大約有六百五十个国家壟断资本企业和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整个国营工业的生产能力約占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十。

在意大利，国有化的程度在战前就比較高，战后意大利政府通过工业复兴公司、机械工业投資基金和其他机构，繼續收买破产企业的股票。仅在一九四七——一九五五年，在这一方面便付出二千多亿里拉。意大利議会在 一九六二年秋天通过的私营电力企业国有化法案，今年一月已开始实施；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壟断資本組織——国家电力公司。据統計，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壟断資本組織——工业复兴公司所屬的企业的生产量，占全国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占鋼产量的百分之五十点五，占鋼材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同时，它还掌握着一部分电力生产；国家碳化氨公司控制着全国甲烷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二，炼油的百分之三十；国家电力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电力生产；机械工业投資基金和科涅公司分別控制着部分机械制造和采矿工业。根据大概的



估計，目前意大利国家壟断資本企业以及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在国家經濟中的比重，約占百分之三十。

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較多地采取了国有化的措施，目前也有很大数目的企业完全或部分属于国家。国家参与了許多专业信用机构，并在許多工业部門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国家壟断資本企业和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的产量，在煤矿业中占百分之二十六，在炼焦业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五，在铁矿业中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制鋁业中占百分之七十二，在小汽車制造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造船业中占百分之三十。一九五八年，国有企业 and 有国家資本参加的企业的資本，达四十九亿二千七百万馬克，約占西德全部股份資本的百分之十八点三。

二

工人階級的各式各样的叛徒，极力利用战后資產階級国有化发展較快的情况为資本帝国主义制度进行辯护。右翼社会党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硬把資產階級国有化叫作“建立社会主义經濟的最重要的經濟政治措施”，把資本主义的国有企业称为“社会主义成分”，硬說国有化“完全消除資本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剝割人的現象”。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說，資產階級国有化“是用非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消灭私有制”，是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

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嗎？让我们透过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对象、方式和后果来看看資產

階級国有化具有怎样的性质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对象来看，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是一些极端落后因而已經获利不多的部門。例如，在英国的工业部門中，最先实行国有化的是煤炭工业，这个部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进入了衰落时期，到实行国有化前，基本上还是沿襲着十分落后的开采方法，装备已經非常陈旧，机械化几乎沒有实行。在这样的設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生产率自然是低下的。一九四五年每个工人的平均开采量仅为二百一十六吨，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其他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地低于英国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二年的水平。英国铁路部門的状况和煤炭工业差不多。一九四八年有八千多台机車（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超过了使用期限。据一九四七年統計，在总数約一百二十五万辆貨車車廂中，大約有二十万辆正在或等待修理，而且車輛的数量在一年一年地减少。英国鋼铁工业的技术水平也是落后的，高炉的生产率几乎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鋼铁冶炼一工时的产量大約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些部門由于投資大而获利少，越来越使企业主处于亏损和破产的境地，同时，这些部門处于落后状态，势必影响到其他工业部門的发展和其他壟断資本家获取高额利潤。因此，占有这些落后企业的資本家早就想在不受大損失的条件下，甩掉这些包袱。而国家为了整个壟断資本的利益也需要把这些落后的企业拿过来加以整頓改造。国有化不仅使原企业主脱离了破产的險境，而且保证他們获得了比以前更可靠的收入，并且对整个壟断資本的扩



展和获得高额利润也是有利的。

第二，是一些遭到战争严重破坏而资本家无力恢复的企业。例如，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收回了被德国垄断资本强占去的大批被战争破坏了的的企业，但是，由于战争的摧残，资本家已无力来占有这些企业；特别是没有力量对它们进行投资，使之恢复过来并可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它们拿过来。奥地利资产阶级赞同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是具有极端自私的动机的。这就是，企望资产阶级国家来恢复和重新装备这些企业，以便获得低价的商品和服务。

第三，是那些实行国有化后能为垄断资本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动力的部门和企业。意大利今年实行的电力国有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国家的电力供应，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于工业、特别是化学等新兴工业进一步扩展的要求。由于电力垄断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获得更高的利润的条件下，才肯大量投资扩大生产设备，才肯把大量的电力输送到缺乏电力的落后地区，这就同所有用电的垄断企业获得足够的廉价动力供应的要求发生了矛盾。为了满足垄断资本家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要求，意大利统治集团实行了电力企业的国有化。出于上述目的而实行国有化的，还不止是意大利的电力企业。像某些国家有些银行的国有化，主要也是为了使垄断资本家们能够获得条件优惠的贷款而实行的。英国的电力国有化，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四，是一些军事以及同军事直接有关的企业。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主要是出

于扩军备战的需要。

资产阶级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对私人资本家的企业进行高价收买而实现的。以意大利为例，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意大利政府曾经在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按危机前交易所的所谓“正常”价格高价把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罗马银行的全部股票收买过来。这个国家在一九六二年秋天通过的电力企业国有化法案规定，按资本加利润的原则付给电力资本家高达一万五千亿里拉的补偿费。而且对尚未付完的贖金，还要付给百分之五点五的利息。战后奥地利政府的法令规定的对全部国有化企业的补偿费，比原来的股份资本多二点六倍；对电站的补偿费则比原来的股份资本多五点五倍。英国的铁路公司以价值五亿英镑的股票，从政府换得约十亿英镑的公债券，煤矿工业的原资本家所得到的四亿英镑的补偿费，也超过了被收归国有的矿井价值的许多倍，汤姆斯·蒂林公司更以四百四十二万英镑的股票换得英国政府二千四百八十万英镑的补偿费，即用六英镑债券换一英镑股票。资本家从公债得到的高利比原来的股息要多得多。例如英国铁路公司的股东，在国有化以前多年以来差不多就没有从自己的股票中得到什么好处，只有在个别的年份他们才偶尔得到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的股息，而国有化后，他们获得的收入则约达百分之五。实行国有化对原企业主来说，实际上只是改换了一下名义，国有化后的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都要交给他们，有许多企业的利润甚至全交了还不够。例如英国的铁路部门从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八年



間，每年平均利潤为二千八百多万英鎊，而每年拿出付給原股东的利息，則高达四千五百万英鎊。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論断：“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壟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門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①。英国艾德礼政府的燃料和动力大臣辛威尔曾不得不承认，英国的“采煤工业已病入膏肓，許多人将高兴摆脱煤矿。”他說：“政府必須剝夺某些煤矿所有者的財產，但是，难道他們就未因此而狂喜嗎？”英国工党前領袖盖茨克尔在《社会主义与国有化》的小册子中也曾招认，英国政府为实现国有化所进行的补偿，使壟断資本家获得很大的好处，“只是所表現的形式是利息而不是利潤或紅利罢了”。

资产階級国有化不仅对出让企业的資本家有利，而且对整个壟断資本家都是有利的。资产階級国家經營企业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保证壟断資本家取得高額利潤。它执行有利于壟断資本家的价格政策，使所有的壟断資本家都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廉价的原料、材料和动力等，从而降低自己产品的成本和提高利潤。例如英国在一九三八——一九五七年間，加工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增长了百分之二百零四，可是电力的平均价格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铁路運費也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一九五二年英国煤炭工业开采的煤，有一半是以賠本的价格出售的。法国的煤炭部門实行国有化后，煤价一直低于成本費。当然，优惠的价格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它只提供給壟断資本企业。按照法国的电费分級标准，在一九五一年电化企业和电力冶炼业用电一度收費一点零八

法郎，而住戶消費者使用一度电却要花二十六法郎。西德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国家发电站所生产的电力，百分之七十供給工业企业使用，只有百分之三十供給个人消費者。但从这百分之三十所取得的利潤却比从那百分之七十所取得的还多。不仅如此，壟断資本还从国有企业获得有利的訂貨。国有企业的訂貨，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秘密訂貨对大壟断資本特别有利，通过这种办法，它們可以从中取得比公开承包多得多的利潤。英国的威廉·丹尼兄弟公司承包的建造英吉利海峡新火車輪渡的訂貨，便是很好的例子。这艘輪渡的造价，最多不过一百零八万六千英鎊，可是英国运输委员会却花了一百五十万零九千英鎊。资产階級国家的国有企业用低价向壟断資本家提供商品，用高价向壟断資本家买进商品，給了壟断資本家以极大的利益。据法国的材料，法国鋼铁和化学等工业部門的壟断資本家，在一九四七——一九六〇年期間，便通过这种形式获得高达三万亿法郎的好处。

资产階級国家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处于大壟断資本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从国有企业領導机构成員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有化后，原来的企业主搖身一变成了国有企业的領導者；别的壟断資本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尽力向国有企业的領導机构伸張自己的势力。結果坐在国有企业管理局和公司領導位置上的，不是壟断資本家就是他們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艾德礼在議會回答质詢时曾供认，当时英国各国有化中央管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0頁。



理局的一百三十一个委员中，有将近一半是过去私营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其余的委员中有三十多个是爵士、地主和将军。又据同年英国的另一个材料透露，在国家运输公司的十三个理事中，有七个是私人公司的董事。管理煤矿工业的，全是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法国，实行国有化后，原来的管理人仍然留在企业的理事会里，从而继续掌管着这些企业。特别是在银行管理处的，差不多还是原先那些人。在奥地利，国有化的银行，实际上是大垄断资本家所支配的信用机关，因为他们这些银行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这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实权，也是操在大垄断资本家的手里。在西德的国有企业中，领导人员也是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占绝对优势。至于意大利，情况更是如此。这个国家的国营企业，除了一小部分如铁路、军事工业、邮政和城间电话等由国家直接管理，大部分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对这些企业，国会无权监督，它们也不受政府的管理。根据今年一月九日罗马《晚邮报》的报道，意大利各政党已经达成协议，由电力垄断资本家、金融寡头迪卡尼约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由大垄断资本家掌握着领导权，就使企业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经营。为了欺骗群众，垄断资本集团也常常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中摆上几个所谓“工人代表”，但这完全是一种装饰品。因为第一，决定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手里；第二，这些所谓“工人代表”，都是由垄断资本集团培养和挑选出来的忠实于它们的工具；第三，如果有哪个“工人代表”表示一点不驯服，垄断资本

家便可随时把他换掉。因此，摆上装饰品这丝毫也不妨碍垄断资本集团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资产阶级国家为垄断资本服务，不仅是通过收购企业的形式，而且还通过卖还国有企业的形式。被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企业，很多都是经过国家大量投资而改变了原来的陈旧落后状况的。对许多企业来说，实行国有化，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利用国库资金（即人民缴纳的税款），来替资本家更新固定资本，来为他们承担投资的危险。战后以来，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交替采取了把国有企业归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措施。例如英国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取消了黑色冶金和部分公路运输业的国有化。奥地利在一九五七年把联合信用和林德尔两家国有银行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出售给私人，其中绝大部分被垄断资本家买了去。西德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间，国营企业恢复并大大更新了固定资本，于是国有企业便成了各垄断资本家争夺的对象，并有许多国有企业和股份被“非国有化”。在意大利，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工业复兴公司建立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先后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国有股票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就是在没有实行国有化而用政府投资创办的方式建立国有企业的美国，也采取了把国有企业卖给垄断资本家的措施。战后不久，美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建立的企业，大部分都变成为大垄断资本的财产。国有化是国家对私人企业进行高价收买，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则是以低价出售。如美国犹他州日内瓦城的一个大工厂，费了国家两亿美元，而美国钢



铁公司用四千八百五十万美元便把它买去了；共和钢铁公司购买芝加哥附近的冶金工厂花了三千五百万美元，而国家为这个厂花的钱却是九千一百万美元。今年一月中旬，英国政府卖给垄断资本家的三个国营钢铁公司，财产总值为八百五十万英镑，而垄断资本家买进这些企业却只花了五百七十万英镑。就在同一个时候，英国政府卖给另一家垄断公司的两个国营炼铁厂，实际价值是二百六十万英镑，而卖价却只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可见，无论是国有化还是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都是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资产阶级国有化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它给垄断资本带来极大的好处，但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它所带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右翼社会党人所吹嘘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消灭了剥削”的谎言是何等的虚伪和无耻。国有化后，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例如，英国的煤矿工业，在沒有改变技术装备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每个工人每年的平均采煤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六。国有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化，工伤事故不断增加。英国一九五五年有三分之一的矿工受过伤，有四百二十五人死亡。采煤工业中每年登记患肺尘埃沉着病的有四千人次，每年有七百到八百名矿工死于此症。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依然很低。一九四八年，即英国工党执政的时期，工党分子弗伦

西斯·威廉斯就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工人提出：“国有化对于工人阶级决不意味着他们所期待的较轻松的时代的到来；它意味着号召工人更加紧张地工作，而不要任何补偿”。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中，也处于比以往更加不利的地位。资本家在“社会利益”的借口下，肆意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如果进行反抗，资本家便以国家行政官员的身份来进行镇压。

资产阶级国有化不仅给国有企业中的工人，而且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在实行国有化（以及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去填满垄断资本家的钱袋，而这就必然加剧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付给原企业主补偿费（据统计，英国资本家从整个国有化部门获得的补偿费总额高达二十五亿英镑左右）而大量增发国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进一步贬值，物价更加高涨；为了支付国债利息（一九四七年一年英国煤炭工业的原所有者便获得了一千五百一十二万英镑利息；电站的股东们一九四九年一年获得的利息高达一千三百万英镑左右）、贴补国有企业的亏损（这是由于廉价供给垄断资本家商品和服务而造成的）和更新收归国有的企业的设备而扩大政府预算开支，势必加重劳动人民的税负。以英国为例，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年间，工人和职员直接税和提成，增加了将近九倍；目前各种税负，几乎占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同时期内，英国的零售价



格上漲了一倍还多。由于稅負加重和物价暴漲，工人的实际工資並沒有多少提高。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資仅及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五八年后也提高很少。法国劳动人民現在为了挣得一九三八年时所挣得的錢，就必须比一九三八年多做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

資产階級国有化对广大劳动人民具有不利的后果，列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深刻地論证过了。他指出：“在保持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壟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剝削和压迫，增加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軍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潤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資本家繳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① 現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列宁这一論断的正确。

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有化的性质。資产階級国有化所以完全有利于壟断資本家而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是因为資产階級国家是壟断資本的馴服工具。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美化資产階級国有化，首先是因为他們歪曲了資产階級国家的性质。他們把資产階級国家說成是一种超階級的东西，說它“不再是資本主义社会中某一階級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維護这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了”，或者像右翼社会党人所說的，已經是“为全体社会服务的”机关了。

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美化資产階級国家，但是，人們看到的事实

却是，資产階級国家从来就是“管理整个資产者階級共同事务的委员会”^②，是資产階級压迫和剝削劳动人民的机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壟断資本完全把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不仅在政府机关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还亲自出馬任国家要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趋向。美国是号称“民主社会”的榜样的，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統治机构被壟断資本牢牢地把持着。在肯尼迪政府的主要成員中，大資本家占一半多，其余的也都是他們的亲信。意大利范范尼的所謂“中左”政府中的二十四個部长(包括总理)，有十九个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其余的几个，也都来自实际上代表資产階級利益的党派。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壟断資本家不亲自出馬，而仍然基本上由它的代理人来执政，在非常情况下，甚至可以让右翼社会党人出来做一下擋箭牌。但这絲毫沒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資产階級专政国家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因为右翼社会党人同样是壟断資产階級的奴僕，另一方面由于壟断資产階級掌握着国家的經濟命脉、是經濟生活至高无上的統治者，因而只有它們才有力、有权力决定資产階級国家的根本政策，而不論是誰上台执政，都不过是它們的意志的具体执行者。恩格斯曾經指出：“現代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頁。



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转成为集体的资本家,愈益剥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顶点。”^① 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怎么可以设想资产阶级国有化能够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不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呢? 怎么可以设想能达到什么“社会平等”的目标呢?

三

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历史作用、区分资产阶级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不同性质,是分析资产阶级国有化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资产阶级国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客观趋向。它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就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便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同时,资产阶级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促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化。这些,无疑都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国有化虽然为社会主义准备着物质前提,在客观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促进的作用,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认为,资产阶级国有

化是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它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名义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手段,资产阶级国有化不是削弱(更不用说消灭)了垄断资本,而是加强了它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控制。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从革命的观点去看待资产阶级国有化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可能通过什么资产阶级国有化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国有化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就决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就是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的。他说:“在革命的环境下,在革命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在革命时期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我们的四月代表会议是估计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银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②。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完全相反,他们不区分资产阶级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根本不同的性质,而是把它们混同起来;不是抓住资产阶级国有化造成的有利条件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企图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国有化和其他所谓“改革”“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宣扬,资产阶级国有化不是一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



般的改良的措施，而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措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他们还说要争取全部生产部门国有化来废除垄断资本的统治。其实，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全部生产部门国有化也是幻想。正如大量事实所表明的，垄断资本家只是在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下把某些已无厚利可图的部门高价卖给国家，而决不允许去“化”占绝大多数的一帆风顺的部门的。特别是那些关键性的部门，他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持。资产阶级国有化只能在不仅不影响反而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对国家经济生活控制的条件下实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通过资产阶级国有化“过渡”到社会主义，设想了种种方案，但就是缺少最根本的一条，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他们公开地叫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起始阶段”了。

粉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实质，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并不是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创造。早在四十多年前老修正主义者就这样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总危机。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都发生了革命的危机。为了引导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右翼社会党人极力宣扬资产阶级国有化，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社会化委员会”（德国以卡尔·

考茨基为首，奥地利以奥托·鲍威尔为首），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群众。等到资产阶级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以后，这个“委员会”便毫无结果地完蛋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资产阶级国有化又被右翼社会党人作为解救资本主义的药方提了出来，而且叫嚷得比以前还要卖力气。然而，高潮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是由于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极端尖锐，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集团一方面比过去更多地实行改良的措施（如国有化、社会福利），来缓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另一方面则加紧欺骗宣传，说什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过去，它已经变成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等等，它们还大力指使它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加紧散布种种幻想，以涣散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濒于灭亡的命运。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资产阶级国有化问题上的甚嚣尘上的叫嚷，就是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发出的。如果说，当年老修正主义者使用欺骗人民的手法，没有能够达到他们阻止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反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叛徒面目，那末，在今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已经更加觉醒的时代，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可耻企图就更加注定要归于失败。



高尔基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

以
群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斗志昂扬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是“一切活完了历史所给的时期的人物”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在那些年月里，高尔基曾经收到国内外不少人的来信。有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写信给高尔基，以满怀信心的语调，深信生活的前进，最终会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然而，也有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写信给高尔基，发出种种敌视的叫嚷、诬蔑和咒骂。

在所有的叫嚷和咒骂之中，最激怒高尔基的，是某些外国的知识分子或流亡在外国的白党侨民知识分子责备他不写“真实”。有的“劝告”他说：“俄国因为布

尔什维克的罪恶而要灭亡了，这是你所应当写的”。有的甚至干脆指责他“看不见真实”。当时高尔基回答得很干脆，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真实本身就不是单一的，在苏联境内就存在两种真实，“其中的一个真实——是你們的、陈旧的、衰老的”，这是一个“愚笨的、卑小的、邪恶的真实，它为居住在苏联境内和境外的颓废派所喜爱的”；而另一个真实则“是年青的，血气旺盛的，充满着无尽藏的精力的，它热望向着自己的崇高目标前进，毫不回顾”，这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斗争的真实，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复兴的基础”^①。

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社会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旁观者，他必须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服务，因而，对于所谓“真实”，也就决不是无判断、无抉择的。用高尔基的话说来，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所面临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流血冲突越来越频繁”的年代，是“全世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年代^②。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高尔基认为一个革命的作家在接触到文学与真实的复杂问题时，他“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真实？第二，我们为什么需要真实？需要什么样的真实？什么样的真实较为重要？那个

① 《论犬儒主义》。《高尔基政论集》，时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311—312页。

②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正在消亡的真实呢，还是我們正在建設的真实呢？”^①自然，具体地回答这些問題，是需要各个作家在創作实践中按照具体的情况加以細致的考虑而后才能作出的，但从总的原則上却必須做出坚定的回答，这就是高尔基所說的那句响亮的話：“我們正处在反对巨大的旧世界的战争状态中；旧的真实滚开吧！我們必須确定自己的真实。”^①

近年来，“写真实”已經被某些現代修正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的頹廢作家当作一个时髦的口号，然而，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不經過作家的选择和判断的所謂“純客观的真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所不能也不敢回答的，恰恰是高尔基当年所提出来的問題：什么是真实？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真实？他們，不論怎样善于花言巧語，顛倒是非，但只要接触到这些根本性的問題，他們必定就无法躲閃，就不能不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出他們的真面貌。群众就会揭开蒙在他們身上的伪装，看清他們本身原是旧真实的一部分，于是对他們喊道：滚开吧！

自然，在社会矛盾还是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激烈地发展着的时代，即使是先进的誠实的作家，要清楚地分辨真实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态度，也并不是輕易的。正如高尔基所說：“因为人們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②，现实中充滿着矛盾。对于作家來說，选择真实和判断真实的“复杂”和“困难”也正在这里。高尔基說，“人們受到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小市民阶层的

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的吸引”^③，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而义无反顾，坚决地清除自己身上的“衰老的个人主义”和陈腐的习惯势力，那么，要判断什么是真实，我們的时代、我們的群众需要怎样的真实，确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因此，高尔基总是反复地要求革命作家要有远见，提高阶级的警觉，关心现实，注視未来的发展。

作为革命的文学，描写过去的社会生活也是需要的，但是，批判地描写过去的最主要的意义也就在于肯定新现实、贊揚新事物，支持新事物的成长和发展，离开了这个目标，那么描写过去也就不可能产生深远的意义。作家如果脱离了当前的现实，忽視了未来的发展，也就不可能看清过去社会的真实面貌，而只能成为一个历史陈述的怀恋者，自然也就根本算不得革命的作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尔基常常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把“扩大視野、認識当代的现实”作为首要的任务^④，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必須和现实更密切地結合”，“应该积极地深入当代生活的問題，而当代的主要内容便是社会革命”^⑤。建

① 《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談話》。《文学論文选》，第130頁。

② 《談手工艺》。《文学論文选》，第180頁。

③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論文选》，第270頁。

④ 《和青年作家談話》。《文学論文选》，第294頁。

⑤ 《論文学及其他》。《文学論文选》，第106頁。



設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斗争，就是通过斗争达到改造旧现实、創造新现实的目的，因而是一种社会革命，这种革命的領導任务是无产阶级所承担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共产党宣言》）的斗争，因而，它不仅宣布旧世界的死刑，而且要創造新世界，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一切，都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所不曾出現过的。因此，高尔基总是不断地強調革命作家要接触新现实，熟悉新现实，并了解它的意义，預見它的未来。他說：如果作家“自己不理解而且不对群众的革命目标和任务发生兴趣”，那就不可能求得人民大众对他的了解，正是“这些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劳动而成为现实的目标和任务，使生活具有了不断地而且蓬勃地进行創造的性质，从而产生了无数的新事实，新題材”①。革命的作家如果不了解新的现实——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和新事，他的創作源泉就必将枯竭，自然也就根本談不到什么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现实并不是風平浪靜的，如高尔基所說，是“狂風暴雨般的现实”，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现实。在高尔基看来，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就必然仍旧存在“各种不可調和的矛盾之間的斗争”②，这是誰也掩盖不了的实际生活中的真实。而革命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敏銳地反映这些矛盾和斗争，用鮮明的形象将它們表現出来，使它們成为

文学上的真实。

对于那些在改造过程中尚未清除掉的“坏的事实”，不用說，必須有“憎恨的热情”，“必須无情地揭露它們”，但是，革命作家的最迫切的任务还在于“闡明和描写我們的现实中一切稳步成长着的、本质上重要的、新鮮的、‘良好的’事物”。这是高尔基一貫的精神。在他看来，作家們所以需要了解旧事物，并不是为了旧事物本身，而是为了“从实际中、从过去的、衰亡了的事物与現在的、新生的事物之間的悲剧性斗争中去发现新事物”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只有不为大量存在的旧事物所迷惑，而能从腐朽的旧事物的霉烂发酵的烟雾之中发现属于未来的火苗，这才是揭示了真实，因为这种从旧基地上闖出来的火苗迟早是必成燎原之势的。

高尔基自己是这样的作家，他也不倦地教导青年們这样地观察现实。他指出：在当时苏联国内的实际生活中，“还有許許多多应该受到嘲笑、必須与之斗争的現象”④，他认为：看不到这些，就会忽視阶级斗争的存在，忽視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必要，而安于现状，对现状妥协。但是，革命作家的首要任务还在于看清社会发展的动力，看到社会矛盾中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他所說的“我

① 《談手藝》。《文学論文选》，第222頁。

② 《論剧本》。《文学論文选》，第253頁。

③ 《論初学写作者》。《文学論文选》，第64—65頁。

④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408頁。



們毕竟还有更多应该加以表扬的人物”，“我們有值得歌颂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越来越多”，这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他断然地说：“需要歌颂，需要！”^①这种歌颂不是为了美化现实、劝告人们满足于现状，而是为了鼓舞人们改造现实的斗志，促进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重要的新事物更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

实际生活永远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这种矛盾或斗争有时表现得很尖锐、很激烈，有时则又表现得很隐晦乃至很曲折，作家要分辨新生的事物和陈旧的事物，美好的事物和丑恶的事物，成长着的事物和衰亡中的事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高尔基反复地指出，作家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他说：“艺术的主要使命正在于上升到高于现实的地方，从新人类的始祖工人阶级所提出的那些美好目标的高处来观察当前的事情”^②。高尔基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他的特点就是不仅是一个对于过去和现在的现实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也是一个对于未来满怀远大理想的艺术家，他主张“文学高于现实，能够稍稍居高临下地去看现实，因为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③。高尔基认为：“我们的作家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必须高瞻远瞩，从高处——而且只有从高处——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一切龌龊的罪恶行为、它的各种血腥意图的全部卑鄙性，才能看清专政的无产阶级的一切英雄工作的伟大”^④。

然而，一个作家要高瞻远瞩地看现实，并使自己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比实际生活更高，并不是可以凭空得来的，自然也不是可以依凭某种偶然的因素而求得的，他只能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恰如高尔基所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我们创造了最高的精神高峰，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过去，指出一条走向未来的唯一的捷径，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大道”^⑤。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对年轻一代的最正确的教导。革命的作家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发展中的现实的高处，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看前进中的现实，然后才能解决什么是本质的真实，什么是浮表的真实；什么是主要的真实，什么是枝节的真实；什么是发展着的真实，什么是衰亡中的真实。而高尔基自己就是以毕生的精力来为本质的、主要的、发展着的真实唱赞歌的革命作家。

革命作家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做好文学工作，将文学作为武器来为革命事业服务。然而，他们却又不能仅仅做一个不与闻外事的文学家，高尔基说得好：“我们苏联作家决不能只做一个作家，决不能只做一个职业文学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参加国内

①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408页。

② 《论剧本》。《文学论文选》，第245页。

③ 《和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第307页。

④⑤ 《论短视和远见》。《文学论文选》，第280、279页。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富有毅力的人”^①。这也就是说，革命作家必须同时是一个革命的战士。因为“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②。

“生活在阶级社会的条件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政治之外’的”^③。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纯粹的艺术”、“全人类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高尔基以他全部的作品来证明：几世纪以来，人类都生活在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之中；尤其是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趋向灭亡的资产阶级正在以最愚蠢、最残暴的挣扎来维护它的统治地位，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在以最坚决的血腥斗争来推翻敌对阶级的黑暗统治。高尔基曾经庄严地问道，“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作家要“保持中立”是可能的吗？自然，他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他设想，“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必须为了时代的革命要求而牺牲自己吗？’”他肯定地回答说：“是的，必须改造自己，认清为社会革命服务是每个正直的人的切身事业，认清这种服务能给个人带来快乐。‘战斗中就有快乐！’”^④。对于一个革命的战士说来，生活的意义就是为革命服务，而高尔基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只有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作家才能面对真实，勇敢地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而一切公然地或躲躲闪闪地维护垂死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作家，是决不敢、也不可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

实的，因为承认真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即将灭亡，就等于宣告他们自己的死刑。高尔基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文化史——即阶级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⑤，而现代文学艺术兴替演变的历史事实也总是证明：资产阶级的旧文学“随着作为它的老顾客和消费者的那个阶级的衰亡而悲惨地衰落下去”，而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又随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发展而迅速成长起来”^⑥。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敢于面对真实，勇于反映真实，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担当改造世界的革命任务，用文学的武器来加速腐朽的真实走向灭亡，促进生气勃勃的真实扩大阵地。恰如高尔基所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斗争中，革命作家的使命就是同时担当“产婆”和“掘墓人”的双重任务^⑦，从意识形态方面，一面催促新事物的诞生，一面消灭和埋葬旧事物。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形势面前，宣传“各阶级之间的和平妥协底可能性，只有由于进化，由于政治经济关系底渐进的、缓慢的发展才能达到人类底‘幸福、和

①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406页。

② 《论文学及其他》。《文学论文选》，第109页。

③ 《再论机械的公民》。见《瞿秋白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1页。

④ 《论文学及其他》。《文学论文选》，第110页。

⑤ 《谈手艺人》。《文学论文选》，第181页。

⑥ 《论剧本》。《文学论文选》，第245—246页。

⑦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第264页。



平的生活’”的說教，“除了害怕社会革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根据”^①。因而，傳播这种說教的文学自然沒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它不是掩盖真实，就是篡改真实，因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正是和他們的說教相对立的。

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是艰巨而重大的阶级的、党的事业，它負有揭示社会发展的真实，并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因此，高尔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求着我們文学家必須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社会行为負严格的责任”，因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已經不是仅仅把作家“安置在现实主义文学历来所有的‘世界和人們的裁判者’、‘生活的批判者’的地位上”，而且給作家以“直接参加新生活的建設、‘改变世界’的过程的权利”^②。具有这样的权利的革命作家，就不仅要對文学事业負責，而且要对整个革命事业負責。他們所選擇、所反映的真实，都必須对革命事业有利。而在这一点上，高尔基正是一个杰出的身体力行者。

文学工作确实是需要独创性的工作，是最富于个性的工作，然而，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經驗和成就看作“个人的所有物”，高尔基认为“那就錯了”。因为作家的經驗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东西”，而今天的“体现了群众的理性和意志的布尔什維克党所創造的新的现实生活”，正是党給予作家的“最好的礼物”；离开了这个基础，創作上的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所以，他认为：“我們的創作

按其形式應該是个人的，而按其基本的领导思想則应当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的”^③。这就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应当屬於阶级、屬於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道理說得十分明确了。

由于革命的作家應該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他反映生活的真实，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就都不是目的不明或沒有目的的，他必須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十分明确的目的——为革命事业服务。因而，作为革命的作家，就不仅要清楚、正确地了解过去的真实和现在的真实，而且还要满怀热情地設想未来，为促使未来的理想的真实的实现而不遺余力地斗争。高尔基常常恳切地教导年輕的一代：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他认为这是“时代的革命的命令”，因为“要确切而清楚地知道你在为反对什么而战斗，就必须知道你所希望的是什么”^④。这也就是说，革命的作家必須明确地意識到：自己是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斗争。

任何时候——特别是阶级斗争激烈、尖锐的时候，在文学的队伍当中，总会出现一

① 《論现实》。《高尔基論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頁。

② 《苏联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359頁。

③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閉幕詞》。《文学論文选》，第369、370頁。

④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409頁。



些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利害的个人主义乃至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有的经常动摇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之间，有的干脆从革命的营垒走向反革命的营垒，有的在反动的阵线当中转来转去，伺机换投新主子，而这类人渣的最漂亮的借口往往是“超阶级”或“非政治”。高尔基曾经指出，在本世纪初的欧洲文学界中，“许多人曾经狂热地和长篇大论地拥护艺术自由、创作思想自由，曾经百般断言文学之超阶级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文学之独立于社会政治以外。”^①

不仅当年的欧洲存在这样的人物，高尔基还指出：即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期间，也还存在类似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完全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满足于那帮助他们显露头角、取得方便地位的东西，满足于那巩固他们的个人主义者天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的东西。”“他们已习惯于对个人生存的意义没有自豪之感的生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存自己渺小的琢磨得很不好的才能之暗淡的光辉、模糊的光彩。他们不懂得，个人生存的意义是在于加深和扩大劳动人类千百万群众生存的意义。”^②像这样的作家，在过去，只能成为脱离实际生活的“自我反省”或“自我表现”者，绝对不能反映出什么社会生活的真实；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更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在和未来，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真实的反映者和描绘者。

尽管，在高尔基活着的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就早已建立起来，伟大的列宁已经给

苏联无产阶级提出了最崇高的目标，而千百万的无产阶级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坚强地战斗着；但与此同时，也还有不少如高尔基所说的所谓“稳健”的人、“冷静的聪明人”存在，“他们不参加战斗，只会巧妙地坐享胜利的果实”^③。这就是高尔基常说的“小市民阶层的过去”的继续。对于这些现象，高尔基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把物质福利、安逸和舒适‘不顾一切地’当作偶像崇拜的人”，那些“即使在资产阶级文化普遍崩溃的今日，依然继续相信有可能安度个人稳固、轻松和‘美好的’生活”的人，他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过去的历史使人养成的和教会所支持的利己主义”，而“兽性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传染全世界的一种疾病”，高尔基说即使苏联也“还存在着被摧毁了的小市民阶层的许多余孽，他们或多或少地巧妙地装扮成‘社会的动物’，甚至爬进共产党员中间去，用尽狡猾、伪善和撒谎的力量——他们从许多世纪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力量——来保卫‘自我’”^④。这是高尔基对当时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最敏锐、最深远的剖析，他表现在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方面的坚定的革命战斗精神，正是以这种科学的剖析为基础的。作家如果没

① 《苏联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333页。

②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词》。《文学论文选》，第367—368页。

③ 《和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第303页。

④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第268—269页。



有这样的战斗的科学精神，也就看不出什么真实，自然更谈不到在作品中反映出什么真实。

曾經有一些人別有用心地把高尔基描繪成所謂“人学”的宣傳家乃至人性論者，但是，事实是怎樣的呢？高尔基从来不把“人”看作一个和諧的整体，而总是看作斗争着的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少数“脑满肠肥”的人，另一方面是多数“饥寒交迫”的人；或者一方面是卑微、渺小、只看见“自我”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偉大、勇敢而坚强”的新人。这是高尔基对“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尽管，资产阶级派遣了不少“聪明”的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来宣傳“爱邻人”、“爱人类”、“各阶级的和平合作”、“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諧”，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說：“这一切都没有使资产阶级获得‘各阶级的和平合作’和它所希望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諧’”^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他們长期的經驗中明白对资产阶级讲“和平”、“合作”、“和諧”，就是安于奴隶的地位，对资产阶级放棄斗争，就意味着投降。所以他們坚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的真理。而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阶级观点，就不可能发掘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发掘出社会的真实。

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断地宣傳文学有所謂“永恒的主题”，如爱、死之类，似乎这些主题不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而是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社会的发展而

独立的。高尔基指出：所謂“永恒的主题”实际上只是“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产物，只是由于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某些“个人”有“悲剧性的孤独軟弱的感觉”，他們“习惯于这种可詛咒的侮辱性的生活”，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而不看社会。他认为：“万物是在变化着的”，“‘月光下沒有永恒的东西’，如同在阳光下一样”，而在无产阶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們原来的意义。”^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家只有坚定地运用无阶级的观点，才能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之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什么是虛假的“真实”；因而，才能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它的每一个斗争、每一种发展的意义。而文学的主题正是作家从实际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发掘出来的。那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的主题将从何而来呢？

总之，在高尔基的心目中，文学上脱离阶级关系而独立的抽象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而，超时代、超阶级的文学主题是不存在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文学自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正是永远值得我們尊重和学习的高尔基的革命傳統和战斗精神。

①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論文选》，第265頁。

② 《和青年作家談話》。《文学論文选》，第296—299頁。



我国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

管大同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的。

市场是个历史范畴。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们各自的生产物转化为商品，商品的交换形成市场。列宁说：“‘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在地方范围内是统一的，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它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是处于分割的、孤立的状态。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专业化，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消除了市场的封建割据状态，把“市场联结起来，把它们结合成大的民族市场，以后又结合成世界市场”^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成了社会的行为，而交换以及产品的占有，仍旧是个人的行为，各别的私人的行为”^③，这就必然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交换中的无止境的竞争。

社会主义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社会生产组织成为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社会主义的基本经

济规律，要求整个社会经济服从于统一的目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要求生产和交换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否则，国民经济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的再生产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的继续，流通形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同时，它又对生产发生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求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且也要求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实

- ① 《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83页。
-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42页。
-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9页。
- ④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页。
- ⑤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8页。



行着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产品中的一部分生产资料，是通过内部调拨进行交换的，但是，社会产品中的全部消费资料和小部分生产资料，是通过市场进入生产的消费领域和个人的消费领域的。社会主义集中统一的经济，必然要求市场有高度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商业才能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 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并且同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影响、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

首先，市场的交换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它虽然要求市场扩大，但是，扩大的结果，只是加剧市场的矛盾和斗争。恩格斯说：“斗争已经不仅发生于个别的地方的生产者之间；地方的斗争本身也发展到了民族斗争的规模，发展成为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以及世界市场的产生，使斗争普遍化，同时使它具有空前未有的剧烈性。”^①这种市场斗争，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反映。社会主义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市场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使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市场。

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正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会从市场上反映出来。但是，这两种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是公有化程度有所不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不断地得到调整 and 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生产都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之下进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农业需要通过计划流通相互交换产品，才能进行再生产，而且不能不以商品形式来进行这种交换。这种商品交换，也正是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来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加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盟。

其次，市场反映着社会分工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工的发展由盲目的市场自发力量所支配，各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相互排挤和对立，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在农业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反映在市场上和价格上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计划来组织国民经济，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经济单位之间实行有计划的劳动分工。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是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它是联系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桥梁，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这个市场在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统一的计划指导之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商

^① 《反杜林论》，第286页。



品流通，使城市和乡村、各个地区、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到协调，成为相互支援、密切协作的一个整体，以保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密切协作和按比例发展。

再次，市场反映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资本主义一方面使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最低水平，市场不能销售生产过剩的商品，爆发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上的交换关系遭到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通常是生产一时赶不上需要的矛盾，反映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矛盾。当人们认识到这种矛盾以后，可以经过不断的调整而逐步地加以解决，从而使市场更好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逐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的统一。

二

解放以前，我国的市场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市场。它操纵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处于半割据状态，城乡对立，交流阻滞，投机盛行。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的势力，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投机势力的斗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建

立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这时候，我国国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一个是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形成的有组织的市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所形成的无组织的市场，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是对立的，又是联系在一起。国家根据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无组织的市场加强领导、管理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既然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存在，它就会经常干扰有计划的商品流通。因此，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着尖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总路线，采取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消灭，个体经济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

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是由三条商品流通渠道组成的。即：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

这三条商品流通渠道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流通是生产的继续，流通形式必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适应。在我国，不仅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工业，而且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同这种情况相适应，需要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同时，在农村经济还是集体所有



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貿易也就有存在的必要。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商业的主体和領導力量，它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統一的計劃，領導全国統一的社会主义市場，組織全国的商品流通。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經濟，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国家委托的購銷业务，完成国家規定的購銷計劃，同时，在国家計劃的指导下，积极地、适当地和灵活地开展供銷合作社的自营业务，并領導农村集市貿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都是社会主义商业，它們的購銷活动，組成社会主义有計劃有組織的市場。集市貿易主要是农民之間互通有无、調济余缺的交換形式，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集市貿易有两重性：一方面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經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計劃市場、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因此，要通过有力的經濟措施、正确的行政管理和广泛的政治教育，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的市場既然还包括集市貿易，就不能說是社会主义的統一市場。这里，应当看到，我国的集市貿易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場是不同的。它的范围受国家的控制，市場上的購銷活动受国家的領導和管理。一切投机倒把、轉手販賣、居間剝削、自由玩弄价格、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計劃經濟的資本主义的活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打击。这种集市貿易是适应我国农村經濟的需要，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在我国，計劃經濟已經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占

統治地位，但是，在生产領域和流通領域，还需要在比較小的範圍內有一个計劃外的补充，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和人民生活多种多样的需要。

我国的对外貿易，是由国营商业經營的。我国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的形成，对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貿易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只有国内市場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計劃性，我們才能根据发展国民經济的需要和可能，有計劃地組織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开展内外交流，平衡內銷和外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我国的国内市場是統一的，但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資本主义經濟虽然已經不作为一种經濟成分存在了，但是，还存在着資產階級分子，还存在着其他剝削階級分子，他們还正在被改造的过程中。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的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市場上来。特别是在集市貿易和自由价格还存在的条件下，自发的資本主义势力必然会在一切有机可乘的場合下滋长，冲击計劃市場和計劃价格。同时，資產階級的影响也会浸入到社会主义經濟內部和工人階級內部来。因此，必須按照党的方針政策，正确地运用經濟力量和行政力量，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同市場上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同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作斗争，同一切貪污盜窃分子和資本主义的經營作風作斗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場的統一。



三

我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方针政策的统一。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的统一的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统一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①这也是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的商业工作，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分配、财政和信贷、市场和物价等方面的统一政策，正确地组织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所谓统一，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指在正确的方针政策下，矛盾不断地得到调整 and 解决。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之间、全局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就会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只有正确地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达到真正的统一。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就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同志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②中央的方针政策，兼顾了中央和地方，兼顾了全国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国家、集体和个

人的利益，照顾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同时，在物资、商品和物价等方面的管理上，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制度，把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经济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样，就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第二，是计划的统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也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分配和交换。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统一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的矛盾不是由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调节的，它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的。国家计划建立在全面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商品流通计划不能脱离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它只有在正确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中，在国民收入正确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统一的综合平衡计划，必须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兼顾，适当分配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地区。在制定和执行计划时，又必须瞻前顾后，既照顾今天，又要注意明天，既照顾当前需要，又要注意长远利益；把重点和一般结合起来，既抓住重点，又要照顾一

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般，考虑相应的各个方面；既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薄弱环节，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问题，避免片面性。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愈完善，就愈有利于商品流通计划的顺利实现，愈有利于加强国内市场的计划性，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性。

第三，是物资调度和商品分配的统一。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由社会主义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全国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统一调拨和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各类商品都按系统经营，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把社会产品有计划地用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物资调度和商品分配中，同样要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例如，在农产品的收购中，既要照顾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需要，留有余地。在手工业产品的收购中，既要保证国家对重要产品的计划收购，又要允许一部分次要产品的自产自销。在农产品的供应上，要使经济作物区得到必要的粮食，在原料的分配上，要照顾工业先进地区和先进企业的需要。在工业品的供应上，要保证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适合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要优先供应农村。此外，在商品分配上还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华侨和侨眷等特殊需要。也就是说，在商品的供应上，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要求，能得到适当的安排，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合理地解决矛盾，使社会主义国内市场达到高度的统一。

第四，是货币和物价管理的统一。全国的货币投放，由国家统一规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节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国家物资的调拨价格、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都由国家统一规定，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统一的合理的调整，任何企业不能随意改变国家规定的价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危机和价格波动经常破坏着市场的稳定。社会主义消灭了货币资本的私人垄断，从而使有计划的货币投放成为可能。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来调节货币流通量，就有利于稳定市场价格和协调供求关系。这是保证市场统一的重要条件。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业品同农产品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要意义。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应当根据各自的价值，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使农民愿意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双方有利的条件，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国营企业的工业品的价格应当大体接近于它们的价值，才能使各个企业正确地进行经济核算。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规定各种产品的价格，既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又有利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因此，统一价格政策和价格管理，也就是以价值为基础，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交换关系。

统一货币管理和价格管理，可以使货币投放和市场商品供应量相适应，可以使供求关系得到协调，可以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批发和零售之间，保持合理的差价，保持物价的稳定。统一货币管理和价



格管理，也是同市場投机势力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建国以来，我們运用这一手段，在打击投机倒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此外，劳动力調配和工資制度同市場也有密切的联系。我們必須对劳动力統一管理，在城市和乡村之間、生产領域和非生产領域之間、生产各部門之間作有計劃的安排，合理利用劳动資源。同时，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則，統一工資制度和奖励制度，掌握工資水平和工資总额，使工資水平和物价水平相适应，使工資总额和商品供应量相适应。这样，才能保障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保证市場物价的稳定。因而，劳动力和工資的統一管理，也是組織社会主义的統一国内市場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要实现真正的統一，必須在集中統一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部門的、各經濟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要有全国的統一計劃和全国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有地方适当的灵活性，和承认地方一定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进一步促进国民經濟的发展。

四

統一的国内市場不能片面地以行政区划加以分割，应当按照合理的經濟联系，組織全国的商品流通。这对促进商品流轉，节省流通費用，加强城乡之間、地区之間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各类商品的流通，在地区上构成一定的經濟联系。这种經濟联系的形成，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有社会經濟的因素，与行政区划

不完全一致。許多商品的流通，还要受生产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制約。例如，有些日用工业品，某些地区原来可以自己生产，但是，因生产水平所限，有的品种不足，有的质量較差，所以，仍然需要向工业比較先进的地区进货。

要有計劃地組織商品流通，必須很好地研究傳統的經濟联系。过去的經濟联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和市場壟断，由于封建势力的割据，由于資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有許多是不合理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大多被摒棄了。在社会主义經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經濟联系。但是，由于近年来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由于城乡关系和其他經濟条件的变化，也有一些变成不合理或不尽合理了。对于这些，应当根据当前經濟条件逐步地加以改变或調整，建立新的适应当前需要的购销关系。

不过，如前所述，合理的經濟联系，大多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和生产水平、消費水平等条件为依据。这些客观条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随着經濟制度的变革而立即改变，它与行政区划的改变是两回事情。在仍然适应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度內，它是合理的，或基本上是合理的。例如，有些城市，有一定的生产水平，也生产不少的日用品，但是，多銷往較小的县鎮，本市消費水平較高，它所需的日用品反而多向先进的工业城市进货。这种情况，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应当认为是合理的。否則，不仅在商品銷售上不能与居民的消費水平相适应，还会在生产方面，出現有些地方生产



力閑置，有些地方浪費原料、材料和勞動力的不合理現象。又如，以耕牛的流轉為例，過去江南有所謂“生在江西，養在浙江，用在江蘇，死在上海”之說。江西多山區，小牛放牧至二、三歲運銷浙江；浙江多水稻，耗力重，一般用到八歲賣給江蘇；江蘇土質較松，田間勞動力較多，這種牛仍可用三、四年，再賣給上海宰殺食用。這是適合這些地區的自然條件的，因而，這種流轉也仍然是合理的。

合理的經濟聯系，大多也是合乎商業企業的經濟核算的。許多商品流轉的路線，是經過長期的實踐所形成的。任意改變，就會造成增多中間流轉環節、擴大流通費用、增加商品損耗以及出現相向運輸、迂迴運輸等損失和浪費。

合理的經濟聯系，一般是體現地區與地區之間等價交換關係的。但是，這不是說，每一筆交易都同時有等價的商品與之交換，往往有的季節出多進少，有的季節又進多出少，有時是甲地供應乙地，乙地以別種商品供應丙地，丙地又以另一些商品供應甲地。大城市與各省區之間的商品關係，這種情況更多一些。這體現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的廣泛聯系，也正是社會主義統一的國內市場所要求的。當然，在某些時候也可能會出現不平衡的情況，這就需要商業部門有計劃地組織交流，積極地加以平衡。但是，如果片面地、機械地強調本地區進出平衡，把商品流通變成了以物易物，這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商品流通原則的。

要合理地組織商品流通，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批發機構的設置，要服從商品流

轉的合理需要，不應受行政區劃的限制。批發的範圍，必須按照商品的合理流向劃定，不受省界、市界、縣界的限制。國營商業的批發機構要設立在地區的經濟中心，確定其供應範圍，使基層批發商店和基層供銷合作社能按照計劃，選擇與它有密切聯系的地點進貨。基層供銷合作社，一般可按集鎮設置。這樣，就便利以集鎮為中心形成的零售商業網進貨。有些地方，也可以按人民公社設置。總之，應當允許跨縣、跨專區、跨省的合理供應辦法，以加速商品流轉，減少中間環節，減少商品損耗，降低流通費用，克服人為的障礙。

在國營商業的批發企業之間，在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之間，在批發企業和零售企業之間，還應當實行計劃分配商品和選購商品相結合的制度。基層國營商店和基層供銷合作社，可以按照商業計劃，直接向生產單位進貨。這樣，就有利於商品流通適應市場的需要，充分利用傳統的經濟聯系，加速商品流轉，減少積壓。

對一些小手工業品，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還可以繼續實行各地區之間直接採辦的辦法，實行“廠店掛鈎”，以及在某些大中城市設立傳統的小手工業品的批發市場，基層商店可以直接向這些批發市場進貨，以減少中間流轉環節。應該積極地發展城市同鄉村之間、地區同地區之間合理的經濟聯系，反對城市同鄉村之間、地區同地區之間不合理的分割市場的現象。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各種形式的物資交流會，也可以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溝通情況，加強聯系，組織協作，並且可以使一些計劃外的商品，通過購銷合同，實行有計劃的交流，避免市場的盲目性。



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

陈展超

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革命事业，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对工作的基本态度。

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有时做这个工作，有时做那个工作；有时在领导机关工作，有时到基层单位工作；有时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有时做一般的工作；有时脱离生产岗位，担任干部，有时又回到生产岗位中去，从事生产劳动；有时做比较熟悉的工作，有时担负完全生疏的工作；有时在熟悉的地区工作，有时在生疏的地区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

对于革命者来说，干这干那，上来下去，是常有的事。革命老前辈说得好，这乃是“家常便饭”。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以党的、人民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体现了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

随着革命的发展，党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任务，确定不同的主攻方向，并且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对干部进行全面的、有计划的安排。我们每一个干部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必须从全局出发，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服从调动。

在这方面，革命老前辈树立了榜样。党和人民需要他们干什么工作，他们就尽最大力量把党和人民委托的工作做好，不怕困难，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搞武装斗争。那时候，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原来是种庄稼的农民，或者是开动机器的工人，或者是刚离开学校大门的革命青年，或者是从事社会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总之，他们都不是武科出身，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打仗经验。但是，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他们在党的号召下，从头学起，积极投身到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去，拿起枪杆子，打击敌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同志久经锻炼，久经考验，从完全不懂得怎样打仗，而成为精通军事艺术的高明的指挥员。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党的中心任务。我们党有不少军事干部，又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岗位。他们有打仗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就是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前去迎接困难的任務，经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终于由外行变成了内行，掌握了经济建设和科学文

101



化建設的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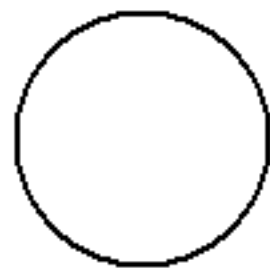
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革命老前輩不仅能够干这干那，而且也能够上来下去。例如，在抗日戰爭时期，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壮大革命队伍，扩大抗日根据地，許多同志离开原来担任的負責工作崗位，率領一小部分武装，插到敌后去发动群众，組織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許多在上层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下到基层单位，做具体工作。他們下去以后，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样地表现了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誠的高貴品质。

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員，他的义务是为人民办事。因此，他能够干这干那，能够上来下去。这是旧社会的統治阶级所绝对办不到的。旧社会的統治阶级和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根本不可能为人民办事。尽管他們以“人民的公僕”自夸，但是，怎么也掩藏不住他們的一心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真正目的。就“上”“下”來說，他們认为这是攸关个人升官发财、荣辱得失的大問題。在他們的眼里，“上”，是个人的高升、走运，“下”，则是个人的下降、倒霉。因此，他們只能“上”，而不能“下”；只能“大”，而不能“小”。这是他們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了的。作为人民勤务員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必須随时警惕、清除剝削阶级的等級地位观念的影响，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革命和建設事业，有許多战线，許多行

业。在每一条战线、每一个行业中，又有不同的工作崗位，工作范围有大有小，責任有輕有重。但是，各种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在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同志关系，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員。这里沒有貴賤之分，尊卑之別。無論在哪一条战线，哪一个行业，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都是革命的一种分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同志在接見全国群英会代表的时候，曾經和群英会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傳祥这样說过：“我們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員，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員。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革命分工也就是革命的需要。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自己同革命的关系。一方面，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干这干那，上来下去，特别是下到基层去，到革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当革命需要自己在一个时期內相对地稳定在一个崗位上的时候，又能够安下心来，尽最大的努力把 work 做好。而不論哪一种情况，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分工和需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

革命者，由于各人的实际情况不同，工作能力有大有小，但是，只要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就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为革命做出自己的一分貢獻。能力大的同志，



固然可以負起工作範圍較大、責任較重的領導職務，作出較大的貢獻；而能力小的同志，也可以做好各種具體工作，作出較小的貢獻。貢獻雖然有大有小，但總是一分貢獻，對革命都是有利的。劉少奇同志說：“我們，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我們的這一部分，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分，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分。大小雖然不同，但都是整個偉大事業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當然要儘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點，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樣光榮的。”^①

革命者不僅要不斷地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覺悟，而且還有責任努力提高工作能力，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革命實踐是一所偉大的學校。一個革命者，在這所偉大的學校里，自覺地經受鍛煉，既可以提高思想覺悟，又可以增長工作才能。列寧說得好：“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②對於革命者來說，任何一種革命實踐，都是鍛煉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機會。革命者在上來下去、干這干那的過程中，能夠獲得各方面的經驗和知識，鍛煉得更老練、更成熟，從而能夠更好地處理各種問題。

一般地說，在上層領導機關工作，需要經常注意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和典型試

驗，在基層工作需要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學習時事，關心全局。但是，就干部的鍛煉來說，在上層機關工作，主要是在學會如何通觀全局，如何做好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方面，得到較多的鍛煉；在基層單位工作，主要是在具體實際工作方面，得到較多的鍛煉。對於每一個干部來說，基層工作的鍛煉可以說是一個基本訓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從一個普通戰士做起，都必須自覺自願地加入到戰士的行列中去，向工人學習。^③初參加革命的同志，缺乏實際工作經驗，階級鬥爭知識較少，政治修養較差，組織上就有意識地讓他到群眾的革命鬥爭中去經受鍛煉、考驗。有些同志長久在上層機關工作，參加群眾實際鬥爭的機會少了，又需要下到基層單位去，從群眾的革命鬥爭中吸取新的養料。

我們黨的大批干部，就是在革命實踐鬥爭中，在群眾運動中，鍛煉出來的。他們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既能文又能武，忠心耿耿地為革命而工作。實踐證明，讓干部干這干那，上來下去，經受各種鍛煉，邊干邊學，在實踐中增長才幹，這是

①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修訂2版，第54頁。

② 《悼念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頁。

③ 參看《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219頁。



培养干部的一种好制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必须发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基层，也就是不脱离群众；只要条件许可，就要到基层去经受锻炼。下去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到车间，或者生产队；有的时候是由省到县，或者由县到公社；有的下去担任实职，有的则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去帮助工作；下去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

期的。

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不断地发展，党对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适应这种情况，每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学习革命老前辈的榜样，发扬他们的既能干这干那，又能上来下去的优良传统，努力在实践中自觉地加强锻炼和修养。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而每一个同志也就会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得到锻炼和提高。

正确地对待考据

杨永志

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占有丰富的、经过严格审订的材料。对于古典文学、哲学史和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这样。这些科学研究需要依据历史文献。为了作出科学的判断，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审订：辨别文献真伪，校勘文字正误，注疏文字含义，诠释典章制度，考辨人物身世等等。这些辨伪、校勘、训诂，是古典文学、哲学史和历史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作。过去和现在，勤恳地、认真地从事考据的学者们，在校勘、训诂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在科学研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把考据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摆得不恰当，片面地夸大它的作用，无目的

地进行各种考据工作，却会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害处。以古典文学的研究来说，就有人忽略了对主要的关键性的问题的探讨，而进行了烦琐的、无意义的考证。对宋玉笔下的虚构人物登徒子的考证可以作为一个例。考据者根据史书上曾有过关于孟尝君和登徒直的一段故事的记载，断言“登徒子或许可能是登徒直的下一代，或是同姓的后一辈”。考证登徒子是不是“登徒直的下一代”，对于研究《登徒子好色赋》这篇作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鲁迅就曾反对过把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当作历史真实人物来考证。他在《阿Q正传》序中指出：企图考证阿Q的姓名、家谱和籍贯，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历史癖与考据癖”



的人才才会做这种考证。^①

考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等工作，都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

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搜集了历代的小說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据。但是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仔细地考证了《水浒传》的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和續水浒传等各种版本。他指出，續水浒传两种版本“立意正相反”：一是清初“遺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澤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另一是“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懾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②。鲁迅通过版本的考据，向讀者說明各种版本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中，詳尽地对法兰克語言进行了考证。他考证法兰克語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研究日耳曼部落的历史。他說：“在关于法兰克方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們将要证明，法兰克人是分裂为許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③。他所以有选择地、集中地考证法兰克語言，就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发展，对研究德国古代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恩格斯在对語言进行考据的同时，又考察了法兰克王国统治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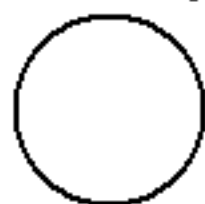
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地方行政和軍事制度等上层建筑。《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这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的典范，而不是像有人說的它“完全是一部考据书”。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一书中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贡献，他闡明了德国古代的历史过程及其規律性，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单是考据，那就绝对不可能作出这种贡献。从恩格斯这本书中，可以清楚看到考据只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从这本书中可以学到考据与理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学到考据为理論研究服务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規律性。考据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在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掌握大量的资料，并对它进行理論概括。把考据当作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并不是降低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恰如其分地估計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被审訂的那些材料，只是反映事物的各个侧面，而科学研究则要“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

① 参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2—75頁。

②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237頁。

③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頁。



概念和理論的系統”^①。也就是說，必須通過理論思維和邏輯分析，才能透過事物的現象揭示它的本質和規律性。考據可以為達到這個目的提供條件，但只是考據卻達不到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目的。作為一種手段，考據絕不能代替科學抽象和理論分析；而且比較起來，它只是一種次要的手段。正是因為這樣，古典文學、哲學史和歷史科學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停留在考據上面。

在我們的古典文學、哲學史和歷史科學的研究隊伍中，有少數人專門從事考據，或側重考據，給考據工作以一定的地位是應該的、必要的；但是不能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不應該輕視理論研究。認為只有考據才是“實學”，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或者把考據看作目的，為考據而考據，實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學術觀點，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清代漢學家學風的影響。

清代漢學家的考據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在考據方法上也有若干可取之處。但是，漢學家大都脫離當時的社會實際，一生在故紙堆里扒疏，並且認為只有這樣的考據才是實在的學問，而探討義理則是空疏。因此，他們不能從社會實際或歷史實際出發作理論的概括，很少作出理論上的貢獻。而且，就在考據方法上他們也有很大的缺點，煩瑣便是一個突出的表現。我們對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應該批判地對待。

有人過分地推崇清代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仿佛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是我們

們應該無批判地仿效的。這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只能給科學研究工作帶來害處，它可能把科學研究工作局限於考據的狹窄範圍之內；同時，也會給考據工作帶來害處，它可能使人重復清代漢學家煩瑣考據的錯誤。我們的历史學家、古典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史家當然不能做漢學家，而應該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展開研究工作。我們的學風，應該是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的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的學風。就是考據工作者也應該批判地對待清代漢學家的考據方法，避免煩瑣的舍本逐末的毛病，尽可能地提高考據工作的水平。對待清代漢學家的遺產，正如對待其他歷史遺產一樣，我們應該遵循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②。只有經過批判的總結，才能正確地繼承這份遺產。

我們要大力提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的學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既反對排斥資料的空談義理，又反對輕視觀點的煩瑣考據，而主張把義理和考據、觀點和資料正確地結合起來；既反對抹煞考據的作用，又反對夸大它的作用，而主張給它以適當的地位。這樣，考據才能夠為探討客觀規律的理論研究服務，才有利於科學研究的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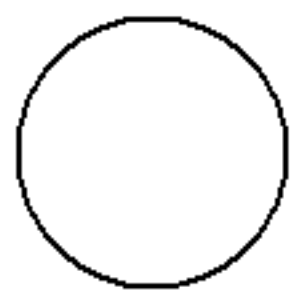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0頁。

②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頁。



红旗

HONGQI



7-8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七、八期合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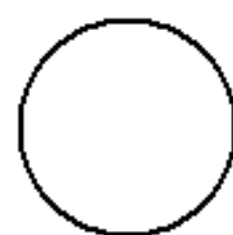
目 录

- 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 薛暮桥 (1)
- 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陈华癸 (10)
- 深入生活, 提高音乐创作质量 马可 (19)
- 谈落实 唐平铸 (25)
- 平凡工作与远大抱负 苗作斌 (28)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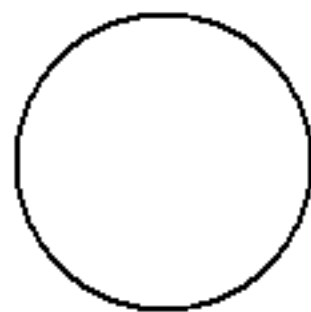
-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31)

☆ 四月十六日出版 ☆



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

薛暮桥



价格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价值规律通过价格的变动，自发地调节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在那里，价格的涨落像“寒暑表”一样，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情况的各种变化，它向资本家指示生产发展和商品流动的方向，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通过国家计划来决定的。商品的价格，也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但是，国家在决定商品价格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慎重地考虑价值规律所能起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价值规律的要求，来制订正确的价格政策，以促进生产发展，便利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价格政策是属于主观性质的东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制订它，修改它；价值规律是属于客观性质的东西，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在制订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须对价值规律进行认真的研究。

决定价格的客观因素

在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人们在规定商品的价格时，不论是否认识到价值规律，客观上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决定价格的客观因素，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商品的价格主要决定于它本身的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商品的价格必须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以保证商品在交换的时候，能够基本上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条规律仍然要起作用。在我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这两种所有制的产品仍然必须采取商品形式来进行交换。国家用工业品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农产品进行等价交换，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保证。不论是不利于国家或者是不利于农业集体经济的不等价交换，都将损害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因而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国家为了保证商品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必须使商品的价格，按照各自的



价值，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例如，国家必须根据各种农产品的价值来规定它们的价格，在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使农民愿意根据国家计划和有利条件，生产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的价格，也必须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等价交换，才能够使各个企业正确地进行经济核算。

二、货币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如果发生变化，商品的价格也将跟着发生变化。价格反映商品的价值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决定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如果货币贬值，物价就普遍上涨。当市场上流通着金币银币的时候，货币的价值决定于金银的价值。现在，各国市场上流通的是纸币，很多国家的纸币事实上已经同金银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主要决定于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数量。如果货币发行数量增加到远远超过市场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限度，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会同货币的发行数量反比例地下降。这种现象，就是一般所说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计划来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货币发行量和货币流通需要量之间的平衡的主要方法，是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当然，上面所说的几种平衡，也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所以，在货币发行量同货币流通需要量出现不平衡现象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国家计划来进行适当的调节。

三、商品的供求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供求平衡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供求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所以，商品的价格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它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跌价；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这种商品的人就增加，购买这种商品的人就减少；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这种商品的人就减少，购买这种商品的人就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这条客观规律的盲目作用，来保持或者恢复商品供求之间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依靠正确的国家计划来保持商品的生产 and 需要之间的平衡。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仍然是暂时的、相对的。但是，某些重要商品，即使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它们的价格也不一定会发生波动。因为我们的生产资料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分配的，它们的价格可以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资料虽然还是采取商品形式来进行分配的，但是，国家供应的商品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价格，因而它们的价格也可以基本上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在某些主要的农产品或主要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的时候，国家仍然可以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等办法，使它们的价格不致上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价值规律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在某些场合，国家也可以主动



采取調整价格的办法，来更快地达到供求平衡。在国家向农民购买计划收购以外的农产品的时候，或者在职工同农民、农民同农民之間进行交换的时候，价格基本上是由买卖双方議定的，因而价值規律在这里还要起一定的作用。

我国的市場价格，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的计划价格。计划价格由国家制訂，一般不受一时一地市場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国家在制訂计划价格的时候，除了必須尽可能使商品的价格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以外，还必须考虑商品在全国範圍內和較长时期中的供求状况，适当利用价值規律所能起的作用。例如，国家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某一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来影响这一种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数量；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某一种消費品的銷售价格，来影响这一种消費品的銷售数量。对于国营企业生产的商品，有时也必须适当調整价格，通过这种办法来达到增产節約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可以通过調整价格的办法，来影响某些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利用这种办法来調节国家、职工、农民之間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通过調整价格来保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間的平衡。

在我国，除了国家的计划价格以外，还存在着不是由国家计划規定的集市貿易价格。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的主体是国家的计划市場，在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經濟，特别是存在着农民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的农业生产）的条件下，集市貿易仍然是计划市

場的必要补充。计划市場是按照国家的计划价格来进行交易的。集市貿易的价格，基本上由买卖双方自己議定，因此，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价值規律的影响。当某些商品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集市貿易价格背离国家计划价格的現象是会經常发生的。在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保持平衡、国家的计划价格在市場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集市貿易价格稍稍高于或者低于计划价格，这种現象对指导计划收购以外的农副产品的交流，調节某些不能納入国家计划的三类物資的生产和供应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市場商品供不应求，集市貿易价格同计划价格的距离过大，它就会冲击计划市場和计划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计划市場和计划价格的稳定。所以，我們必須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集市貿易价格，使它同计划价格不致发生过大的距离。

制訂价格政策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訂价格政策的时候，应当充分研究价值規律所發揮的作用，并且考虑社会主义建設对价格政策所提出的下列要求：

一、我們的价格政策，首先应当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便利物資交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大体上符合它的价值，即符合于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应当使各种商品的价格之間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它們进行交换的时候，能够基本上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应当使每一种商品的价格保持合理的购



銷差价、批零差价、城乡差价、地区差价。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应当同它们的质量相适应，做到优质优价，分等論价。这样来制訂价格，才能保证各生产单位、經營单位在正常生产和合理經營的条件下，能够收回成本并且得到适当的贏利，从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

社会必要劳动量，就是生产一件商品平均所花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在这种基础上制訂的价格，使中等水平的企业能够得到合理的贏利，先进的企业能够得到較多的贏利，落后的企业少得贏利甚至还要亏本。这种价格，有利于鼓励先进企业，鞭策落后企业，督促企业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如果某些商品的价格訂得过低，就有可能影响企业生产这些商品的积极性；如果价格訂得过高，就不但会損害使用这种商品的单位或个人的利益，而且会使企业不注意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这两种情况都对国家不利。同样质量的商品，原則上应当只有一种价格。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高低不齐，中小城市有許多种工业品的成本，一般要比大城市高一点。为了保证中小城市的市場供应，在一定时期內，把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适当提高一点，也是可以容許的，但是，提高的幅度一般以不超过合理的地区差价为原則。有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过分落后，或者經營管理不善，以致商品的质量差、成本高，它們要求按照自己的成本来規定商品的价格，这种要求，無論从国家的利益或者当地人民的

利益来看，都是不合理的。

前面已經說过，在制訂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須慎重地研究各种商品(工业品与农产品、工业品与工业品、农产品与农产品)之間价格的比例关系，尽可能使各个生产部門在生产国家所需要的任何一种商品的时候，都能够收回成本，并且得到适当的贏利。如果某几种商品的价格訂得过高，某几种商品的价格訂得过低，就有可能影响这些商品有計劃、按比例的生产，因而不利于保持国民經济的平衡，特别是市場供求的平衡。

在制訂价格政策的时候，还必须适当安排各种計劃价格之間，特别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消費品的銷售价格之間的比例关系。农产品收购价格是消費品銷售价格的基础，因为在消費品中，不但粮食、副食品等农产品的銷售价格决定于它們的收购价格，而且絕大部分輕工业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它們的銷售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要稳定消費品的銷售价格(这是物价稳定的最重要的标志)，就首先要稳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工业品是其他企业的生产資料，它們的价格对生产发展和物价稳定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也不宜于輕易变动。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品的价格对冶金工业品的价格，原料、材料工业品的价格对加工工业品的价格也有重大影响，必須統一安排。

同一种商品的收购价格和銷售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間，以及城市价格和乡村价格、产区价格和銷区价格之間，必須保



持适当的差額，有些商品，還必須保持適當的季節差價，使經營這些商品的單位能夠得到適當的贏利。如果差價過小，就可能使經營單位的商業活動發生困難，影響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流。如果差價過大，就不利於督促經營單位改善經營管理，減少流轉環節，降低流轉費用，甚至有可能引起私商的投機活動。

二、我們的价格政策，应当有利於安定人民生活，合理調整各階層人民的生活水平，鞏固工农聯盟，並且保證國家得到適當的積累。我們在規定价格政策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到各種商品在生產和流通方面的要求，儘可能符合前面所提出的各項原則。但是，國家在調整各種商品價格的時候，必然要影響到國家和各階層人民的分配，因而不能不同時考慮物價變動對分配所產生的影響。

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安定人民生活，必須努力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特別是主要生活資料的價格的穩定。當然，由於生產條件經常發生變化，各種商品的價格必須隨時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但是，在調整商品價格的時候，必須有升有降，儘可能地保持原來的物價水平，同時，還要慎重考慮物價變動對各階層人民生活的影響。

職工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決定於工資水平，另一方面決定於物價水平。所以，改善職工生活，既可以採取增加工資的辦法，也可以採取降低物價的辦法。在我國，一般是採取穩定物價的辦法，同時，隨着生產的發展逐步提高職工的工資，來逐步地提高職工

的生活水平。農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決定於農業的生產水平，其次，決定於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的銷售價格。如果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而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的銷售價格不相應地提高，或者前者提高的幅度比較大，後者提高的幅度比較小，農民的實際收入就會增加。我們對農民的价格政策，是根據等價交換的原則制訂的，它兼顧了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如果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工農業產品的價格曾經存在着剪刀差，那末，在一定時期內，隨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而逐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鼓勵農民增產的積極性，這是必要的。但是，這並不是說農產品的價格應當無限制地提高，以致發生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反剪刀差。如果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過多，就不得不相應地提高消費品的銷售價格，這樣，就不能保持物價的穩定，從而不利於安定職工和農民的生活。

价格政策，除了保證職工和農民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以外，還應當保證國家取得一定的積累。沒有積累，就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保證工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國家的積累，是工人和農民在生產勞動中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的生產勞動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為自己的勞動，大體上相當於他們所得的工資；一部分是為社會的勞動，這就是國家的積累。後一部分也就是工人所創造的價值中，除去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和工資以後的剩餘部分，大體上相當於企



业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和利润。农民的劳动同样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自己所得的劳动报酬，一部分是国家和集体经济的积累。国家的积累一般是通过税金的形式取得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价格的形式取得，就是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订得稍稍低于它的价值，这个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成为国家的积累。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中，可能要扣除一部分国家积累；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中，也可能要加上一部分国家积累。国家从农民方面所取得的积累，绝大部分仍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用在农民身上，所以，这样的交换，总的来说，仍然是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

当我们在调整物价的时候，还应当考虑到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我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会相应地增加货币投放，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就会相应地增加货币回笼，压缩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如果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就会使工商企业减少赢利，甚至发生亏损，从而减少财政收入；如果提高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而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会使工商企业增加赢利，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供应农业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的农业生产资料，其价格的涨落，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收支，影响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当然，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合理安排，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和财政收支的平衡，都应当通过

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来予以保证。但是，在调整物价的时候，也必须慎重考虑到对这几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三、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计划市场，限制和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巩固计划价格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防止集市贸易价格过多地脱离计划价格。如果集市贸易价格比计划价格高出很多，不但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而且也不利于巩固农业集体经济。因为农业集体经济的产品，除了自给部分以外，大部分要按照国家的收购计划和计划价格卖给国家，而农民家庭副业经营的产品，除了自给部分以外，大部分可以按照集市贸易价格在集市上出售。如果后者收入过多，就有可能引起农民不重视集体生产，片面地发展家庭副业。所以，不论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或者是为了巩固农业集体经济，都有必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控制集市贸易价格。

我们控制集市贸易价格的主要办法：第一，是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保证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这是最根本的办法。第二，是合理控制货币流通量，特别是对农村的货币投放量，保持农民的购买力同国家对农村可能供应的商品量之间的平衡。如果农民手里有多余的货币不能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他们就会不愿意出售自己多余的农产品，从而影响农产品的收购和市场供应，引起集市贸易价格的上涨。第三，是国营商业



改进市場的供应办法。同时，供銷合作社除了按照国家計劃做好代购代銷业务以外，还要积极地正确地开展自营业，有計劃地組織城乡之間、地区之間的物資交流，来逐步地代替私商的販运活动。并且通过这些办法来有计划地調节集市貿易价格。第四，是国家对集市貿易的行政管理。集市貿易的价格，原則上应当由买卖双方自由議价，但是，如果发现投机商販操纵物价，就应当通过經濟措施或者行政措施予以限制和打击。

集市貿易价格过高，和与此伴随的各地地区的集市貿易价格差距过大，还会助长私商的投机活动，甚至会引一部分落后的农民棄农經商，因而导致資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我們除了加强市場管理，严格取締私商的长途販运以外，还必须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的购銷活动，来有计划地平抑集市貿易价格，縮小地区之間的过大的差价，以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只要集市貿易价格接近于国家的計劃价格，只要城乡差价、地区差价縮小到使私商的长途販运无利可图，我們就能够有效地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商业不論在城市或者农村市場，都占有巩固的領導地位。

怎样保持市場和物价的稳定

在价格問題上，我們除了合理制訂各种商品的价格以外，还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物价的稳定。物价的稳定，不但有利于安定人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国家、企业和集体經濟单位的經濟核算，保证生产和交換能够正常地

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核算，仍然是通过貨幣的形态来进行的。所以，为了保证正确地进行經濟核算，必須尽可能地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然，所謂稳定物价，主要是指保持一定的物价水平，而不是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冻结起来，即使发现不合理的現象也不进行調整。采取冻结物价的办法，不但不利于生产发展和商品交換，而且也不能使物价保持真正的稳定。在物价发生不合理現象的时候，进行合理的調整是完全必要的。調整物价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进行，不宜采取大量提价或者大量降价的办法，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升有降，逐步进行調整，避免物价的剧烈波动。物价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它常常是整个国民經济問題的反映。因此，有許多物价問題，只能随着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

我們为了保证市場和物价的稳定，必須采取各种措施，来尽可能地保持各种商品、特别是主要生活資料的生产数量同需要数量之間的平衡，并且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間的平衡。在某些主要生活資料供不应求的时候，我們究竟是依靠价值規律，通过涨价的办法来恢复供求的平衡呢，还是依靠国家計劃，通过計劃供应的办法，来保持供求之間的暫时的平衡，然后通过增产計劃来达到更好的平衡呢？我們认为，应当采取后一种办法，而不能采取前一种办法。因为，前一种办法使收入多的人的需要能够得到充分滿足，而不能滿足收入少的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甚至有可能引起市場



投机活动；后一种办法则不但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都得到必要的保证。当然，在任何场合都拒绝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对于某些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如烟、酒和某些高档商品等，必要时也可以采取提价的办法来限制消费，增加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

对于稳定物价来说，保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间的平衡，比保持个别商品或某些商品的供求平衡更加重要。如果某些商品的供求不平衡，至多只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商品价格的稳定；如果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不平衡，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物价的稳定，特别有可能引起集市贸易价格的波动。因为，如果社会购买力过多地超过了商品供应量，就会使国家不得不减少商品库存，或者增加货币发行，这都将为下一年度的平衡带来更多的困难。城乡人民的购买力，总有一小部分在当年不能实现（这部分未实现的购买力表现为人民持有的货币和在银行的储蓄），这种现象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因为商品供应不足，当年不能实现的购买力过多，就要转移到下一年度去实现，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一年度的市场供求的平衡。

为了保证社会商品供应总量同社会商品需要总量之间的平衡，首先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特别是增加主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增加市场商品的供应，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市场商品不断增加，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

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从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同生产水平的提高相适应；而且，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应当比生产水平提高的幅度要小一点，这样，才有可能增加积累，以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因此，国家在努力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适当地控制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是用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社会购买力也可以用国家计划来控制，因此，即使出现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有可能使它恢复平衡，这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购买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职工的购买力，这决定于职工人数和工资水平，也就是决定于职工的工资总额。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地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如果工资总额增加过多，超过了国家对职工可能供应的商品数量，就会引起许多商品的供不应求，甚至引起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对职工显然是不利的。第二，是农民的购买力，这主要决定于他们出售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如果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固然增加了，国家可能供应的商品也同时增加，所以，这不会引起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如果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可能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而国家并不能因此就增加商品供应。国家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对农民增加财政信贷投放，也会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如果农民的购买力增加过多，超



过了国家对农民可能供应的商品数量，就会引起集市貿易价格的上漲，从而影响农副产品的收购，使国家、职工和农民受到損失。第三，是社会集团购买力，包括国家的基本建設投資、事业費、办公費、国防費、福利費，等等，以及集体經濟的某些开支。这些开支也必須加以控制，以免影响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間的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合理控制社会购买力的問題，实质上是人民生活同国家建設的統籌兼顧問題。在生产的不斷发展中，人民生活必須逐步有所改善，国家建設的規模也应当逐步扩大，以进一步加速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必要的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它經常关心改善人民生活，常常会出现許多商品一时滿足不了需要的現象。因此，如何合理控制社会购买力，适当安排消費和积累的比例，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訂国民經济計划时必須經常研究的問題。

* * *

为了制訂正确的价格政策，我們必須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規律，既充分利用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有利于我們的一面，又严格限制它的不利于我們的一面。我們調整价格，使它接近于商品的价值，大体上符合等价交換的原則，有时候甚至有意識地使某几种商品的价格稍稍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值，以影响这几种商品的供求关系，这就是利用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有利于我們的一面。我們在許多商品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采取計划供应等办法来防止物价的波动，特别是保证主要生活資料价格的基本稳定，就是运用社

会主义經濟規律来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不利于我們的一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因此，价值規律还一定要起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統治地位的是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在生产 and 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而不是价值規律。因此，就存在着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客观条件。不認識价值規律发挥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和不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客观可能性，这两者都是不正确的。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在制訂和掌握价格政策的时候，必須反对两种錯誤傾向：一种傾向是，不研究价值規律，違反价值規律主观地規定商品的价格。在市場物价发生不正常現象的时候，不懂得运用价值規律来主动地、合理地調整物价，而采取簡單的行政措施来冻结物价，或者根据片面的認識对物价进行无原則的調整。这种办法，不但不能解决市場物价問題，相反地，有可能使市場物价更不正常。另一种傾向是，不坚持通过国家計划来調节物价和市場供求关系，盲目地順从价值規律。在市場供求不平衡的时候，不采取計划供应、計划收购等办法来尽可能地保持物价的稳定，而放松对物价的計划管理，听凭价值規律来影响物价，甚至企图通过物价的漲落来恢复供求的平衡。这两种傾向，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缺乏正确認識的結果。为了正确地制訂和掌握价格政策，我們必須在实际工作中很好地研究价值規律，自觉地运用价值規律，让价值規律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 陈 华 癸 ·

现代农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①。无疑地，人们获得农业生产知识的最基本的活动是农业生产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解决生产问题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

在原始的农业生产中，人们只会种植少数几种作物。这些作物都是些半野生的品种，用火耕杖种。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管理作物，保护土壤，而是边开垦、边丢荒，经营着生产水平很低的农业生产，过着不断迁移的半定居的农业社会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人们逐渐地积累了较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知识，也改进了一些生产工具。农作物的种类丰富了，半野生的植物品种逐渐地为人们自己在生产中培育出来的植物品种所代替。金属农具代替了木石器。无计划的丢荒农作变成为固定的、有计划的休耕轮作。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要求

保持地力长期不衰，也要求土地每年提供较多的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提高了，人们逐渐地取得了精耕细作的知识和技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从原始农业发展到近代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全部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获得，都是人们依赖于生产活动，逐渐地认识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性的成果。

与此同时，人们从工、农业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逐渐地了解了自然界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从而产生了关于各种自然现象的统一的自然科学知识。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起，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为近代和现代的自然科学。近代和现代的自然科学，一方面同生产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相伴地发展着；一方面又走着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自然科学的各个分科遂逐渐形成。人们吸取和利用自然科学各个分科的成就，去研究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促使了现代农业科学的产生。因此，现代农业科学，是农业生产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现代农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1页。



高着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进农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现代农业科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可以用农业化学的发展及其对于农业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来说明。

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肥料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意义。公元十四世纪我国王禛著的《农书》中，已经记述了多种多样的有机肥料和矿质肥料，包括蹄粪、苗粪、草粪、火粪、石灰和泥粪等等。^①在这以后，西欧在十七世纪发现了硝土的肥田作用，十八世纪由于智利硝土的开发，而使硝土成为一种肥料。这个时期，也正是化学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科学而飞速发展的时期。到十九世纪，化学已经伸入生物学的领域，促使了植物生理学和农业化学的形成和发展。十九世纪农业化学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阐明了植物从土壤和肥料中吸取的营养料主要是一些简单的无机化合物，而在这些简单的无机化合物中，含有植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之中，有些是土壤中含量比较丰富的，植物用之不竭，有些是在土壤中比较贫乏的，不能满足农作物高额丰产的需要。在农业生产中施用肥料，主要就是补给植物所需要的在土壤中比较缺乏的营养元素。农业化学的这项重要发现，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化学工业相结合，产生了化学肥料工业。早期的化学肥料工业，除直接开发和利用富含硝酸钠的智利硝矿外，还从骨粉和海鸟粪中提制过磷酸钙。接着，开发了各种磷矿，用来制造更多的过磷酸钙，并且开发了钾矿，制造硫酸钾和氯化钾。在二十世纪初，化学合成氮肥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合成氮工业也就诞生了。化学肥料工业提

供了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学肥料的物质条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这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在自然丰度相等的各种土地上，这相等的自然丰度能被利用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农业化学的发展如何，部分地要看农业力学的发展如何。”^②二十世纪以来，农业化学和为农业服务的化学工业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化学化，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样，现代农业科学的其他分科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生物学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它是研究生物的遗传变异、生长发育和物质代谢的科学。自从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以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知识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遗传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一直到十九世纪，人们主要是依靠自然的恩赐和朴素的配种和培育知识得到一些较好的农、牧业品种。而随着遗传学和有关科学的发展，创造和选育新品种，才进入了实验科学的阶段。通过系统选种，杂交育种，以及化学引变和辐射引变等专门的选种育种的科学实践，不断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些优良的新品种。

关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物质代谢的知识——植物形态学和生理学——是栽培农作物的科学基础。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一般

^① 《农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24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1页。



地可以分为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两个阶段，两阶段又各分为若干分段。农作物在每一阶段和分段各有特点，要求不同的环境条件。因此，在阐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阶段和各分段以及它们对于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之后，人们就能够比较正确地总结先进的栽培技术经验，揭发其实质，同时还能够相应地提出新的栽培技术措施来。现代饲养家畜的先进技术，也是生产实践经验和动物生理学知识相结合的成就。

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和微生物学的研究，阐明了植物病虫害的本质，摸清了各种病虫害发生发展的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和有机化学在合成农药方面的成就相结合，创造了许多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技术，将农业生产从对病虫害无能为力状态中解放出来。在家畜、家禽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人们从研究陆地表层地质运动的规律和地面生物的生命运动的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揭发了土壤和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并且发现了成土母质、气候、植被、地形和水文等是影响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自然因素。合理的轮作换茬，可以创造优良的植被条件；平整土地，可以改善地形条件；深耕和施肥，可以改善成土母质条件；灌溉、排水和保墒耕作，可以改善水文条件。研究土壤肥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有关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理论和应用，是土壤学和有关科学的任务。土壤学和有关科学的科学成就是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合理利用土地的科学基础。

化学、物理学和数学是生物科学的基础知识，从而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农业生产的化学化，除化学肥料的应用外，还包括杀虫剂、灭菌剂和除莠剂等等的应用。最新的物理学和数学的成就，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也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对于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农作物的抗逆防灾，均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建立在现代技术科学和工业技术力量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完成人们用双手和陈旧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所无法完成的生产技术活动，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密切结合，互相推动的。农业科学来自农业生产实践，它反过来又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农业科学还从起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整个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吸取丰富的滋养。

二

现代农业科学所以能够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因为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各项成就，通过特定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更准确、更迅速地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研究特定的生产技术措施的增产效益，探讨同农业有关的客观世



界的各種規律。

農業科學技術產生和發展的历史證明，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實踐中積累生產知識的過程是十分艱難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提高的速度很慢。在農業生產實踐中，探討特定的技術措施的增產效益，只能從觀察這項技術措施對於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可見形態和最終產量來判斷。但是，這樣的判斷是很難作為定論的。因為，同樣的技術，應用在不同的土地上或者在不同的年景里，對於農作物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不一致的。只有經過人們大量的、多次的、甚至幾代的生產實踐，才能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比較準確地判斷這個特定的技術措施的增產效益及其適用的條件。

現代農業科學研究則不同。它除了從農業生產實踐經驗中吸取豐富的滋養外，還從整個的自然科學領域中吸取滋養。農業生產過程是十分複雜的，它包含自然界的種種運動形態，而且這些運動形態互相關聯和互相轉變着。這些運動形態包含生物學的变化，也包含含蓄在生物學的变化之中的化學、物理的变化，以及造成生物生活環境的土壤、水和氣候的变化。自然科學的每一種學科，都是分析單個的運動形態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變的運動形態的。農業科學利用自然科學的各項專門成就，進行專門的農業科學研究，不僅能夠觀察農作物整體的变化，以及周圍環境對農作物所起的綜合影響，還能夠更深入地分科研究包含在農作物整體变化和環境的綜合影響之中的各個因素的变化，

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對於農業豐產所起的實際作用。

在農業科學研究中，可以通過特定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對象——特定的運動形態、特定的增產因素或環節——相對地孤立起來加以研究。我們也可能有效地控制環境條件，一方面使得研究對象在已知的環境條件中生活和運動，盡量減少未知因素的干擾，另一方面又可以研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特定的環境條件之間的制約關係。因此，在科學研究中，對於原因和結果之間的本质聯繫，比較在複雜多變的生產實踐中更容易理解，從而能夠較快地、較準確地作出科學的判斷。

例如，種植豆科植物，一般需要肥料較少，而且能提高土壤肥力，對後茬作物有增產效益。早在公元六世紀，我國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中就寫道：“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①。農民從生產經驗中認識到，豆科植物只有在它的根上生長根瘤時才產生肥效。各種豆科植物種植在不同的土壤里，有的生根瘤，有的不生根瘤。在原本不生根瘤的土地上種植豆科植物，如果要它生長根瘤，可以採用土壤接種法，即將原本能生根瘤的土壤和種子拌在一起播種。這是長時期農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而農業科學研究對於總結這一生產經驗，並加以提高，起了顯著的作用。科學研究發現，在上述生產實踐中，最本質的因素是一種在土壤中生活的細菌（根瘤菌）侵入豆科植物，使後者形成根

① 《齊民要術》，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頁。



瘤，根瘤菌在根瘤中生活，发生共生固氮作用。共生固氮作用将空气中的氮气（这是一般高等植物不能利用的氮素物质）变为植物的氮素营养料，直接地营养了豆科植物，还间接地改善了后茬植物的营养条件。对共生固氮作用的本质的阐明，导致根瘤菌肥料的制造和应用，这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科学研究专门地研究了包含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的微生物的运动规律。虽然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这一微生物的运动规律也不简单，但比起通过种植豆科植物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来总结这一经验，是简单得多了。而且，由于根瘤菌是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培养根瘤菌需要农业生产环境所不能提供的工作条件。如果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实践的直接经验，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微生物学研究），是无法创造出制造和应用根瘤菌肥料的现代技术来的。

又例如研究合理施肥，为了判断特定的农作物在特定的条件下，究竟从土壤中取得多少磷素养料，从施用的肥料中取得多少磷素养料，从而判断特定的肥料或施肥方法的增产意义，研究工作者们就利用含有较高的磷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肥料进行科学试验，从植物所吸收的放射性物质的比例来判断这种肥料或施肥方法的实际效果。经过研究，发现许多植物在幼嫩时期吸收土壤中的磷素养料的能力很弱，主要依靠吸收优质磷肥（如过磷酸钙）中的养料来满足它的生活需要，植物长大以后，吸收土壤中磷素养料的能力加强，可以完全或大部分靠土壤中的磷素

成分满足生活需要。这样，就阐明和发展了一项丰产技术措施，即在不少情况下，施少量过磷酸钙作为种肥，是十分有效的施肥方法。

这些都说明，利用农业科学去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探讨和掌握与农业有关的客观规律，可以大大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加强人们的洞察力，易于比较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

农业科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要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使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同时在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是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总结和提高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充分发挥农业科学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是进行长远的、基础农学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揭示新的科学规律，掌握新的农业科学知识，从而使农业科学对原本不能够起指导作用的问题变为能够起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农业科学对当前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国的农业生产，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现代的农业科学已经积累了许多确切的知識。这些知識的应用，是高产



量、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組成因素。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面对生产实际，运用这些知識研究和总结丰富的农业生产經驗，解决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些知識的大部分还没有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在种子方面，现代的良好繁育科学已經掌握了利用杂种优势的科学技术。这项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够提高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产量，在有些国家已經被广泛应用。而在我国，目前还处于技术准备阶段。又例如，在植物保护方面，现代的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已經揭发了許多病虫害的发生規律，并且創造了不少有效的防治方法。但是还需要經過大量的、针对各地不同情况的試驗研究工作，才能使这些防治方法在广泛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农业科学研究的这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力量。这样，經過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就能够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达到现代化的水平。

然而，这还不是农业科学研究的全部任务，还必需进行另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包含在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規律，有很多是我們現在还没有确切掌握而又急待掌握的，这些也是我們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其对提高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作用来说，不一定能立竿見影。但是，就其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蕴含着农业科学研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巨大潜

力。这也可以用关于豆科植物和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的研究的历史經驗来说明。当人們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了根瘤菌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人工培养根瘤菌的技术以后，接着也就創造了制造和利用根瘤菌肥料的生产技术，保证豆科植物結根瘤，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共生固氮作用的增产效果。然而，另外有一些非豆科的植物（如楊梅、木麻黄、橙木等等）也結根瘤，根瘤中也生活着特定的微生物（但不是根瘤菌），也发生共生固氮作用。对于这种特定的微生物，目前我們还没有掌握人工培养的方法，因此也就不能够制出相应的微生物肥料应用于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科学知識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除了动員足够的科学技术力量来充分研究、运用农业科学知識于当前农业生产实践外，还必需保证以一定比例的力量来进行許多新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农业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須保持实验科学的严谨精神。

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总结先进的农业生产經驗，使之上升到理論，再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这是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农业科学，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一项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活动。

先进的生产經驗包括着某些自然規律的正确运用。总结和提炼先进生产經驗的科学任务，就在于說明在这个或那个先进生产經驗中究竟是如何地运用着自然規律的。进行



这项科学活动，当然首先要调查研究应用这些先进生产技术所引起的农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和有关的环境条件特点，用现有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这些现象，并且去粗取精，加以提炼，揭发出这些先进生产经验的科学实质。这样做是必需的。但从实验科学的要求来说，这样做，只达到了科学活动的假说阶段。进一步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验研究来考察假说的正确性，并作必要的修正。这样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才能够有力地指导生产实践，发挥先进生产经验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坚持田间试验的方法，是贯彻实验科学精神的中心环节。田间试验，是农业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切农业科学理论和技术措施都需要通过田间试验的考察。只有在农业科学理论或特定的技术措施为田间试验结果所证明时，才能认为它是反映了自然的和生产的客观规律。

进行田间试验，主要是用对比的方法。用田间试验的术语来说，采用某种特定技术措施的田块称为处理区，不采用这种特定技术措施的田块称为对照区。田间试验的目的，就是对比处理区和对照区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产量的差别，对这种特定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作出判断。

当然，在田间试验的实施中，也还需要排除一系列的实际困难，才能够从试验中得出清楚的结果，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因为两试验区的土地条件（土质、肥力、地形、水

文等等）和环境条件（如气候、光照、病虫害等等），总难免有些差别。即使在两区中所采用的农业技术措施完全相同，两区中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产量也不会完全一样。田间试验的经验指出，在一般的试验条件下，由于两区田地本身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产量差别，通常在百分之五至十之间，甚或更大些。如果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达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或一倍以上，不论是通过一般的生产实践或田间试验，都不难作出肯定的判断。然而，更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并没有这样大的幅度，而是增产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十分宝贵的不可忽视的增产幅度。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逐步提高，主要是依靠这类幅度不很大的、这样和那样的增产技术措施的综合增产效果的逐步积累。如何能够将增产幅度不很大的特定技术措施的效果，和由于两区田地本身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幅度差不多的产量差别区分开来，从而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就成为做好田间试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田间试验的科学实践中，已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即田间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采用这些方法，就能够有效地解决这项困难的，但是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

田间试验不仅能够考察单一的增产因素的增产效益，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考察多种增产因素的综合效益。特定的技术措施的增产作用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要求一定的条件。在许多情况下，特定的技术措施要和另一些特定的技术措施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显



著的增产效果。如果我们在生产实践中或科学研究中，把这些增产技术措施一个一个孤立地加以比较，有时往往得不出什么有益的结果，甚至会作出不正确的判断。针对这种情况，在基本上阐明了有关技术措施的增产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多因素的田间试验，能够帮助我们以较小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比较正确的科学判断。例如，在有很多种土壤上，单施氮肥能够增产，单施磷肥却不能增产，只有在施氮肥的基础上加施磷肥，才能获得施用磷肥的增产效果（亦即在氮肥增产的基础上施磷肥进一步提高产量）。这样，如果只进行单施氮肥和单施磷肥的田间试验，就只能得出施氮肥能增产、施磷肥不能增产的错误结论来。而只有正确地进行研究氮磷联合效用的多因素田间试验，才会得出符合上述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

任何田间试验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得的结果，严格而论，只是在这特定的试验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规律。由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条件变化很大，如果把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得到的田间试验的成果，直接地在很大范围内推广应用，是有一定的盲目性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由于这种盲目性而造成损失，还必须进行区域试验（即区域性的田间试验）。根据土壤、地形和气候的区域性特点，在各个区域选择确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区域试验，是将科学研究成果多、快、好、省地推广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的重要环节。区域试验既是鉴定性的，也是试探性的。即

使是区域试验的成果，也还需要通过千百万人在生产实践中最后地加以考验和发展，才能够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因素。

还需要指出，在农业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同等地重视包含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物质运动的实质和这些物质运动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一般而论，同样的规律决定着土壤中磷素的变化和植物的磷素营养。但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种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对于磷肥的需要量和施用方法却是有很大出入的。在长江流域的紅壤上，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很显著；在它附近的冲积土上，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小些。在同样的冲积土上，种稻、麦，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小，或者不增产；种油菜、紫云英，施磷肥的增产效果就比较大大。显然，关于植物磷素营养的科学知识，只有这样具体化之后，才能起指导合理施肥的实际作用。研究农业生产过程中特定的物质运动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作用，也主要是采取田间试验和区域试验的方法进行的。

要做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使其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特定问题时，需要掌握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吸取和利用自然科学中一切有用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科学研究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紧密联系起来，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及各种



边缘学科的发展，对于农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并将产生更大的作用。如从植物营养的研究来看，在十九世纪中期，微生物学还处于大发展的初期，还没有伸入农业科学的领域。当时，在初步揭发植物的无机营养规律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土壤供给植物养料的能力(或称为土壤的化学肥力)，理解为土壤中含有植物营养元素总量的多少，以及它们溶解性的大小问题，并且主要是以化学变化的规律性来解说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变化的规律性。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变化，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土壤中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因此，只有在十九世纪末叶，微生物学伸入农业科学领域以后，农业化学和土壤微生物学的知识相结合，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理解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显然，对当时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微生物学知识就成为研究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所必需具备的自然科学知识。

然而，这还不是解决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所必需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到二十世纪初，生物化学又诞生了，而且很快地伸入到农业化学的领域中来。生物化学

有力地阐明了各种营养元素在植物体中的变化规律，和它们对构成植物体质和经济性状所起的实际作用。接着，生物物理学又诞生了。作为生物物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方法，是揭发植物、土壤和肥料三者之间的物质运动规律的有力手段。因此，要研究关于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运动规律，现代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就必须同时具备现代化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不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做好。

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日趋专门化。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得到更好的保证，以便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就必需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建立起农业科学研究的各种专门学科，并且要求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深透地掌握一门科学的理论和实际，以及相应的试验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实行农业科学研究的分工与协作，在积年累月、锲而不舍的科学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科研成果，解决我国农业技术改革中所提出的综合技术任务。

更正

本刊一九六三年第六期第十一页右栏倒数第十行“据统计”，应为“据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统计”；从倒数第三行“国家”起至倒数第一行“工业”止，改为“机械工业投资基金和科涅公司分别控制着部分机械制造和采矿工业。今年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电力生产”。



深入生活，提高音乐创作质量

馬 可

音乐创作像任何文艺创作一样，需要作家具备生活、思想、技巧三方面的修养。这三个方面是辩证地体现在创作过程中的。典范的作品，就是作家在这些方面成熟的表现。艺术家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面的起码修养，不论是怎样的天才也很难写出艺术作品来；任何一方面的严重缺陷，都会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于某一个作曲家说来，哪一方面的修养特别不足，与其他方面不相适应，那么，提高那一方面的修养就成为他提高创作质量的关键。但从我们今天音乐创作的实际情况来说，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生活修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音乐艺术是有特殊性的，音乐家并不需要像文学家那样深入生活，只要感染感染气氛和听听民歌就够了。这个论点关系到音乐美学上一些根本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音乐的特殊性是什么？由于这种特殊性，音乐家和生活的关系是否就应该疏远一些、间接一些才好呢？

一切艺术都是以形象思维反映生活现实的，音乐的特殊性在于它赖以进行形象思维的手段不同。音乐是以声音（或者确切地说，是用“乐音”）为材料来反映生活。音乐家必须，也只能在以声音为材料的范围内去

反映生活，创造形象。以声音为材料创造艺术形象，是有它自己的困难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找到模特儿，可是描绘音乐形象的模特儿就不能在生活中直接找到。音乐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这是客观现实在作曲家主观上的反映。如果作曲家对现实生活没有丰富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如果作曲家不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和战斗的姿态去对待生活，无法获得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他就无法正确反映现实，也就无法创造出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见解：音乐既然是以声音反映现实，那么，音乐家只要从音响世界中感受生活就够了。这些同志未尝没有一片热忱和良好的愿望，他们以高度职业敏感的耳朵来谛听这个世界，两手不离开谱纸，随时记下一切自然界的音响，人们的语言音调、感情音调和各种民间音乐的旋律。这种热忱是可贵的，这种劳动也决不会白费；但是，忽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忽略了从音响世界以外去感受丰富的生活，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些同志可能以为：全面观察生活只是文学家的事，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既要描写外形，又要揭示内心，既要绘声绘色，又要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其他方面的艺术家就可以不同，美术家的眼睛里只要有色和光，音乐家



的耳朵里只要有声波的振动就够了，或者说这样就至少在主要方面把握了生活真实。

诚然，客观世界是通过声、光、色……等物质运动现象被我们所感知的，但是，这些现象就是在自然界中也从来不是互无关联的孤立存在；至于在艺术反映的主要对象——人和各种社会现象——方面，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人的思想感情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也不是一些彼此孤立的存在。从感受者方面来说，任何人的感受器官都不是光电管、拾音器、寒暑表之类的机械的综合，而是更高级的认识手段。人的感官感受通过高级神经活动的联系，能够得出客观世界的完整映象，能够透过事物现象认识其本质；但如果离开了这种联系，疏远了这种联系，就很容易作出片面的或歪曲的认识。因此，全面地观察生活不仅是文学家的事，也是一切艺术家的事。各种不同的艺术家应该有各自高度专业敏感的器官，但不能只依靠它来感受生活，更不能只依靠它来概括生活、创造形象。贝多芬晚年失听，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如果一个人生来仅有一副素质优异的听觉器官，决不可能成为音乐家。音乐表现生活的材料是声音，但音乐家去感受和认识生活却不能只依靠声音，或主要依靠声音。音乐家在生活中更多地注意音响世界是必要的，可是这只有作为全面认识生活的一个方面时才有积极意义。不适当地只从专业技术角度去感受生活，常常会成为进一步深刻认识生活的障碍。比如我们长期没下农村的同志到了农村中，可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这时候如果不去了解农村中所有制的变化，群众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道

德品质上的变化，而只沉溺于民歌音调和语言音调的揣摩中（人民生活形态的诸种变化，并不一定立竿见影式地反映在这些音调中），并指望从这里表现出新鲜的人民生活气息，能不能够成功呢？我是有些怀疑的。

认为音乐家体验生活只要感染一下气氛，浅尝辄止，这是片面强调音乐的特殊性的另一种表现。不错，音乐是一种以表达感情见长的艺术，要求它像造型艺术那样地描绘形象，或者像语言艺术那样具体而微地状写思想或实体的运动细节，都是不公允的。然而，能不能因此就把各种艺术排出一个它们与生活关系密切程度的程序表来，而将音乐排在末位呢？是的，有过一种这样的程序表：在这个表上，艺术按照它与物质世界联系的程度，分成七个等级，而音乐是因为它与物质世界联系最少，所以居于艺术中最高的等级。这个表是黑格尔排的。黑格尔在这里是把艺术作为他的“绝对精神”演化的一个过程（按照这个过程，艺术将演进到宗教），而给音乐以这样“高”的估价。唯心主义者由于音乐似乎是“与物质世界联系最少”因而对它青眼相看。我们是唯物论者，不会相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彻底澄清唯心主义艺术观的漫漫迷雾，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认为音乐家不需要深入生活，或者只要到有“气氛”的地方嗅一嗅就足够的观点，多少是受这种迷雾缭绕着的。

什么是“气氛”？它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根据我们的艺术家们的习惯，大概是指生活中富有抒情性或戏剧性的场合吧。当皓月东升，山林里响起恋歌；当雨后乍晴，田野间回荡着劳动号子；或者当红旗招展，锣鼓



喧天，人们正集会进行挑战比赛；……我们的作曲家感动了，行李卷儿还没有打开，就马上进行一首交响乐的构思。并不是说这种感动不是真实的和可贵的，我们也不是一般反对作曲家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匆匆进行创作构思。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作曲家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这种生活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那么，就不会因为这种触发而激起创作灵感，写出深刻感人的乐章来。而且，这些场面固然是生活感情的某种高潮，但它不是唯一的高潮，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如果讲感情，那么，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但当一个老农和你促膝谈心终宵，摆出了他一生的经历，最后在晨曦中默默地久久地注视着一个人的挂像，你没有为之深深激动么？当生产队已经收工，劳动号子已经停歇，暮色中还有人在田里拔除还没有锄净的杂草，这时候，你的心里不曾引起过波澜么？（这些时候，在音响世界里有什么音乐的素材呢？）……生活是斑斓多采的，但就每一个细部来看，它并不总是唱着那么高昂的调子。它往往是无声无息的，一锹一锄极平凡的劳动。正是这些平凡的劳动，才构成了我们伟大的、多采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日常平凡的生活基石，单纯依靠在有“气氛”的场合嗅一嗅它的气息，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是靠不住的。当然，不能要求一支曲子概括全部生活，但是，却只有在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把某一生活侧面反映得更深厚，更有力。

至于说到感情，我们是承认感情的，也承认音乐是以表达感情见长的艺术。但无论

怎样也不能用这一点来证明音乐是与生活现实联系最少的一种艺术。

什么是感情呢？感情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个人的感情总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紧密联系的。过去有些音乐美学家善于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玄虚的文章。他们把感情抽象化，似乎有一种一般的爱，一般的恨，而音乐家就是这种感情特别发达的人。他们讲过许多故事，证明越是伟大的音乐家，越是具有这种非凡的天赋，以至早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就显露出奇妙的才华，写出了不朽的作品；生活么，不过是对天才的世俗折磨罢了。对于这些人所讲的绮丽而又哀婉的故事，我们除了要纠正那些被故意夸大和歪曲的部分以外，必须指出这样一点：历史上任何伟大作曲家任何时期的作品，其所表现的感情内容，从来没有超出他在写作时的生活修养和世界观所及的范围，往往没有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度，而毋宁说是与这些恰相适应的。莫扎特六岁时写的小步舞曲，没有超出童稚的单纯和他当时所受的音乐风格的教养。贝多芬的九个交响乐，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遭遇史，但更应该看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十九世纪初叶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自由解放的精神的反映。法国革命歌曲在他的音乐中迴响着，德国民间音调在他的音乐中閃爍着，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呼声在他浩瀚绮丽的乐章中高唱着，岂不正因为他所抒发的感情是这样“世俗的”，所以才获得了他的历史地位么？

“可是贝多芬并没有去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呀！”有些青年同志曾经这样议论。那意思



是說，可見音乐創作的根本問題不在于什么生活啦、思想改造啦那一套，而是一种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技术加感情的升华。是啊，貝多芬沒有背起行李卷儿去“體驗生活”，可是，这个穷乐工的儿子，在潦倒的一生中，受尽了歧視、凌辱和剝削，他的坎坷遭遇，几曾是我们解放后长大起来的年轻同志所能想像的！一方面，今天我们革命的音乐家不能只以貝多芬为榜样，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貝多芬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以至对反动统治者說出“如果我能够像一个將軍那样懂得战术，如同我是一个作曲家懂得对位法一样，那我就要给你们点顏色看看”那样的豪語，而对人民的态度則是“我的艺术就应当只为穷苦的人们服务”。他是站在那个时代民主革命的先进人物行列中的。

如果說外国古典作曲家的事談来終究有些隔閡，那么我们中国現代作曲家的經驗总是比較亲切和易于理解的了。冼星海在回忆他青年时期在巴黎苦学的一段經歷时写道：

“我写自以为比較成功的作品《風》的时候，正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間七层樓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間房子的門窗都破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風，我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那知風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吹灭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战听寒風打着牆壁，穿过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己，借風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青年时代的冼星海，就是这样在生活的

磨炼中怀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写出他早期的优秀作品《風》。当他回国以后，馬上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不断地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发見了音乐上許多的問題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他繼續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思想上和艺术上更趋成熟的作品。

并不是說我們今天的作曲家必須再跑到巴黎的小房子里去让風吹一吹，也不是說如果不挨冻受餓，就成不了一个偉大的艺术家，这里只是证明，一个革命的音乐家，必須具有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任何感人的音乐作品，都不是作曲家心灵的游戏，都不是什么虚无縹緲的感情的升华，而是有血有肉的生活的結晶和先进的世界观作用的结果。一个艺术家当然不可能将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都去尝遍，但他对于所要表现的題材，总要有直接的感受和相应的知識修养，而且这些感受和修养越是丰富，理解越是深刻，作品才越有可能得到成功。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感受和修养，而且也无心去追求，只靠“气氛”来熏，恐怕是熏不出什么能够耐人寻味的东西来的。

* * *

有的同志认为音乐創作可以利用民間音乐素材作为原料，而民間音乐是飽含生活气息的，音乐家只要予以艺术上的加工，不一定要再到生活中去体验。其实，这个问题毛澤东同志早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中給我們作了解答。他告訴我們說：“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們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創造出来的东西。我們必須继



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到生活这一唯一的源泉中去学习、体验、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没有根基于生活的创造就没有艺术，模仿和硬搬只会使艺术停滞、灭亡。音乐工作中对遗产的继承、发扬和利用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说在每项工作中都需要对生活有正确的理解，都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作曲家采用民间曲调进行创作，不过是以之作为素材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民间曲调本身而是作曲家对生活的理解。甚至于在那种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民歌改编工作中，也不能不体现着改编者对生活的理解，而这可以说是改编后的作品的灵魂。我们有些作曲家，研究了一些以民间音乐为素材的典范作品，但只是从艺术手法上，而没有更进一步地理解这些手法怎样体现了作曲家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于是也按照某种范本从印出的乐谱中搜选一点民歌素材，进行各种高度专业化的加工，加一个动人的标题，认为这就是精致的艺术作品。我一点没有轻视这种劳动的意思，只是觉得这未必符合真正艺术创造的规律。因为这种做法不是走的从源（生活）到流（艺术成品）的路子，而是从流到流的路子。艺术家不能指望仅仅从已有的艺术作品（哪怕是最优秀的作品）中解决自己艺术创作的全部问题，不能指望仅仅从艺术中观察生活。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从生活中观察艺术，再从艺术中观察生活。不经过从生活

到艺术又从艺术到生活的反复的验证，也就不算真正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有许多优秀作品，其创作过程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例如歌剧《洪湖赤卫队》，大家无不为其富有表现力和地方色彩的曲调所感动。自然，你可以作这样的技术分析，指出剧中某些曲调与洪湖地区流行的民歌、戏曲音乐有怎样密切的关系。但如果只是这样，那就非常不够，那就仿佛是说它的作者们不过是在搜寻民间曲调方面有耐心的幸运儿。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据作者们的自述，他们全团先后曾三次深入洪湖地区，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斗争和劳动，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经历过这样一段生活以后，当地民间音乐的所谓“色彩”、所谓“风格”在作者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与群众生活情感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技术风格。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作者们不去考虑什么风格的追求，风格却在笔下涌现了；不去考虑民间素材的运用，素材却源源而来。民间曲调在这里已经成为作品有血有肉的一个部分，不是装饰，不是作者猎奇或者侥幸的产物。

这样岂不是提倡写任何东西必须要到现场去体验？是的，从总的精神来说，是提倡这个。然而一个人怎能为了改编几首民歌而去旅行全国，或者为了处理历史题材而回到古代？问题不在于要作曲家去做这些不可能的事，而在于从认识上明确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正确认识了这个关系，就会下决心去深入生活，就会争取一切机会去作现场的经验（如果没有可能，也会积极地从间接方面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82页。



了解)，而不是指望从艺术中解决生活问题。许多民间曲调，如果只从技术上来看，它是何等“简单”“贫乏”，而当你到现场中去观察时，它却又有怎样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表现力！这种生活现场观察体验，对于一个音乐家的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的启发，看来是无形的，又没有什么足以令人倾心的技术性；可是，决不能低估它的意义，决不要轻视这种启发。我们有些音乐家就是因为忽视了在生活现场中观察体验艺术，而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以图“提高”，结果是高则高矣，但大大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风格，脱离了群众。

总而言之，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生活修养是一个艺术家最根本的修养；对于我们今天大多数音乐家来说，深入生活是提高创作质量的关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生活正在大步跃进，日新月异，人们只要思想一停滞，就会被生活甩在后边。在音乐家中，虽然有不少人过去曾参加过群众斗争，但要表现今天的新鲜气象，要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就必须再到生活中去，依靠过去的“资本”是远不够用了。我们一些更年轻的同志，有些从红领巾时起就在新社会里长大，除了学校和家庭外不大熟悉社会，更不熟悉旧社会，因而也不能深切体会到群众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决心和气薄云天的革命精神，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到生活中锻炼和学习了。更重要的是，不仅为了学习生活知识和生产知识，而是为了在群众斗争中进行思想改造。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长大的人，脑子里也会自然而然地长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论年轻的或年

长的，都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

在明确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关系，在明确了音乐家也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原则以后，考虑音乐的特殊性和音乐家体验生活的诸种方式就是妥当的和必要的了。没有必要让所有的艺术家都采取同一方式去体验生活，没有必要让艺术家在生活中忘掉自己的业务。归根到底，作为一个艺术家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还是为了要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为人民服务。如果完全脱离了业务，又怎样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作曲家为了广泛吸收这方面的营养，常需要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多处跑跑，扩大眼界，增加见闻，但这不应该与有重点地深入生活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到处浏览才是作曲家体验生活的最好方式，而在一个地方多呆几天，就会失掉新鲜感觉，这对于音乐创作是没有好处的。

深入生活的方式、方法要以多样化的形式来解决。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条件，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方式。音乐家在深入生活中如何根据音乐的特点进行形象思维，如何把生活形象变成音乐形象，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总的说来，在思想上更加明确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丰富创作的源泉，进行思想改造，是创作出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的关键。我们今天比过去的艺术家有着更好的客观条件，因此更应该下决心作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



談 落 实

· 唐平铸 ·

落实，是做好任何事情，完成任何任务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尤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各个革命时期，都要制定一些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所必需的具体政策，特别是近几年来，党中央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在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是我们进行各种具体工作的准则，是我们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使这种从群众中来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一项根本任务。我们说的落实，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就不可能达到做好工作、改造现实的目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切正确的方针政

策，只有当它变成千百万群众的实际行动的时候，当它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显示威力，成为改变现实、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可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是一个落实的问题。

怎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得到落实呢？首先是要很好地研究和深刻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曾经说过：“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①这是就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而说的，其实一切工作也无不是这样。我们对待党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在干部中，首先是要在党委内部认真地讨论研究。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而不那样规定；为什么要这样要求，而不那样要求；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那样做的坏处又在哪里。特别是对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党委更应当反复地深入地进行研究，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都摆出来，进行讨论争辩，最后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思想认识上一致了，才可能有行动上的一致。只有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有切实的保证。

有一种作法是不好的，党的方针政策提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1页。



出来了，下达了，党委本身不去很好地讨论研究，对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就去讨论具体措施和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讨论或者不应当讨论，而是说，应当首先弄清楚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如果不先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无法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左右摇摆，犯错误。有的同志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似乎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他们不经过认真研究就会了解，因此，他们的任务只是布置下面如何执行。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是集中了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来的，一个领导同志，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经验 and 思想政治水平，可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个人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去认真地进行研究，就难以全面地、深刻地领会；如果再凭着自己对方针政策的一知半解或者片面理解去办事情，那末，他就免不了要使党的方针政策走样，使工作受到损失。

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有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仅领导干部要理解，而且要使广大群众也理解。毛泽东同志说过：“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又说：“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

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②党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它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而是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提高制定的，它已经不再是群众意见的原始形态了。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所理解，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就必须一字一句、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向群众进行透彻的说明。不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把党的方针政策切切实实地交给群众，要想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地彻底地贯彻执行，那是不可能的。

要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既不能不问情况，照抄照转；又不能标新立异，自搞一套。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③在贯彻执行党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时候，不分析研究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和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只是机械地照抄照转，生搬硬套，即使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那也是一定落实不了的。但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其目的只是、也只能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成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它在实际工作中真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②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

③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正开花结果，落到实处。因此，决不能片面地理解“从实际出发”，而离开、甚至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这里说的从实际出发，是指按照具体情况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来处理实际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决不是那种强调“情况特殊”，借口“结合实际”，不执行或者擅自修改党的方针政策；更不是那种从狭小的局部利益出发，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来代替党的方针政策。如果那样，就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党的方针政策是党的生命，是我们进行任何一项工作必须遵循的指针。我们必须坚决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下级党组织根据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将党的方针政策加以具体化，按照正常手续，作些必要的补充规定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补充规定决不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使自己的规定和党的方针政策对立起来。

落实的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加强具体指导，防止和克服指导工作的一般化的毛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下达了，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一般的布置上，缺乏具体安排、具体措施、具体指导，缺乏经常的、反复的检查、督促，那仍然是落实不了的。

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切实实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人做，用什么方法做，采取些什么措施，一些可以预见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等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做到事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为

了加强具体指导，保证工作落实，最重要的一点是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切实地督促检查。领导干部深入下去，由于他们的水平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观察问题比较全面，因而便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便于抓住先进经验，及时总结推广，指导全面；便于培养提高干部。而对领导干部本身来说，也只有亲自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正确指导，避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要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地贯彻执行，是不容易的，这需要经过不断的十分艰苦的努力，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反复地讲，反复地做，有时甚至讲几十遍、几百遍，做几十次，几百次，才能够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里重要的一条就是抓住不放，坚持到底。一个方针，一项政策，一件工作，一个任务，抓住了就不能轻易放掉，要长期坚持下去，随着情况的变化发展，使工作一步一步地更深入、更仔细，成绩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扩大。养成抓住不放，坚持到底的精神，这是我们各项工作落实的一个重要前提。

落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是对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一个全面的检验。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面向实际，反对空谈，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贯彻到群众中去。



平凡工作与远大抱负

苗作斌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怎样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实现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抱负，创造出不寻常的成绩，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这是许多青年人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早就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的许多英雄人物，也给我们做出了具体榜样；雷锋同志以他战斗的一生，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正是要我们学习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沿着雷锋同志所走的道路前进。

雷锋同志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出现的英雄人物。他在党的细心培育下，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亲切启示下，真正做到了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的立场、思想、品德和风格，充分反映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面貌。雷锋同志的这种高尚品质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基本最突出的，是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安于平凡工作，甘心做革命的螺丝钉的伟大的忘我精神。

雷锋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懂得“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根本道理，树立了终身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壮志雄心。同时，他又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从不拒绝任何细小的事情，从不挑挑拣拣，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总是无条件地根据工作的需要，从自己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着手，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凡是有益于人民的事，不管它多么平淡无奇，多么为人所司空见惯，他都认为是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积极去做。正因为这样，他在极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闪烁着共产主义光彩、感人至深的事迹。雷锋同志这种模范行为，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要想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卓越的成绩，要想对祖国、对人民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平凡工作。

列宁说过：“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①这一句为大家所熟知的話，告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5页。



诉我们一个真理：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从细小的平凡的工作开始的，都是由无数细小的工作积累而成的。我们国家的伟大建设是这样，每个人的一个创造、一个成就也是这样。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比壮丽、无比辉煌的，但是这壮丽、辉煌的图景，正是与种种平凡、细小、简单、具体的工作分不开的，正是由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在工作中的重大成绩，杰出创造，那也是他在集体的帮助下，平日辛勤劳动的集中表现，是他在党的教育下，长期修养锻炼的自然结果。我国古语中有这样一类的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这些话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要想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首先就要安于平凡工作，从日常工作一点一滴做起。心安而后才能专注；专心致志，刻苦钻研，埋头苦干，而后才能有所创造，才能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一心只追求惊天动地的业绩，而不安于或不愿意做日常的细小工作，认为做这些工作，就是浪费青春，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违反事物正常发展规律的想法，因而就不能把事情办好，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伟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好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样，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一个人对于革命事业是不是有贡献，

首先就是看他能不能发挥螺丝钉的作用和怎样发挥螺丝钉的作用。如果是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决心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那末，尽管他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平凡的，细小的，但是他的精神却是伟大的，高尚的，值得学习的。雷锋同志从没有想过哪个工作不重要、不光荣。他不论做什么工作，不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严格地按照党的要求、人民的需要去做。我们正是从他这种对待党交给的各项工作的态度上，从他完成任务的行动中，看到了他那对人民事业的无比热忱，他那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安于平凡工作，甘心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决不是说可以胸无大志、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满足现状。充沛的精力是由伟大的目的而产生。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末，他的工作就必然会因为缺乏明确的远大的奋斗目标而变得毫无生气，只要工作任务一般地完成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不再有什么更高的进步要求和力争先进的积极性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甘居中游、意志衰退的表现，为每一个革命者所不取。雷锋同志，既安于平凡工作，又有远大理想，所以，他才具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他才坚持不懈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他才永远不满意自己“在生产上只能作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达到每天的定额”，总是以最高标



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他才不仅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一切任务，而且还积极主动地寻找各种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去做。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指导下，他的生活才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丰富多采，天天向上；他的工作才热气腾腾，总是充满一派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由此可见，安于平凡工作和树立远大理想，两者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安于平凡工作，才能切实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把理想变为现实；有远大理想，才能高瞻远瞩，充分认识自己眼前工作和伟大事业的关系，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工作，都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我们党从来就反对那种没有理想、庸庸碌碌、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不动脑筋的庸人和懒汉，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抱负和壮志雄心；同时又指出，远大抱负、壮志雄心只有通过每个人艰苦的、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劳动这条路，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人走上错误的道路，不是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空谈家，便是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者。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广阔的天地，供人施展才能，实现远大抱负，创造不平凡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不能为人民做出重大的贡献；能不

能获得人民的尊敬和器重，主要不在于他做什么工作，而在于他以什么思想和态度对待工作。雷锋同志的工作地区、工作岗位、工作部门，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变化，但是，不论在哪里，他把什么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成为先进的、模范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这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的心。用雷锋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只长着一个心眼，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正因为有了这颗赤诚的心，他就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顽强的革命战斗精神，战胜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人民创造出优异的工作成绩。向雷锋同志学习，正是要学习他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一丝不苟地、创造性地做好党和人民指派给的任何工作。

真理向来都是老老实实、平凡朴素的。有许多道理，我们早就知道，早就懂得。但是把这些平常的、熟知的真理，贯彻到日常行动当中去，使之化为活生生的实际，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严格的刻苦的精神，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雷锋同志做的各种事情，并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惊险稀奇，而是很普通、很平常的，每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到。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像雷锋同志那样，“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处处听毛主席的话，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是这样，在任何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可以成为出色的人民勤务员。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前言

一 批判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任务

崇拜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的经济主义

各国机会主义者称兄道弟，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

二 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

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独立和纯洁

三 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反对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

革命的爆发和策略路线的分歧

无产阶级应不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怎样对待群众的暴力革命行动？

半途而废，还是不断革命？

对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两重估计

四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的威信操纵会议，散布错误影响

经过斗争，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决议

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工会中立论

不应当把德国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

五 在革命低潮时期同修正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

“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哲学

从康德出发，回到休谟和贝克莱

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能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判断一个人、一个哲学派别，不能根据他们自己挂的招牌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斗争的序幕

六 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取消派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和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
同取消派是不能统一的

七 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反对合作社问题上的改良主义
在战争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叛徒面目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巴塞尔宣言

八 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反动派驱使各国工人互相厮杀
维护巴塞尔宣言，揭穿“保卫祖国”口号的反动实质
社会沙文主义是社会党内熟透了的资产阶级脓疮

九 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庸夫俗子不懂得“战争是政策的继续”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超帝国主义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机会主义“理论”

十 反对社会和平主义

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宣传革命，就是愚弄群众
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
阶级压迫还存在的时候，要求“废除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十一 反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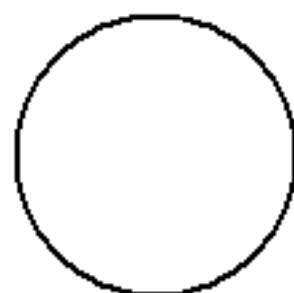
民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批判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十二 团结左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国际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团结革命派的重大成就
同考茨基派可以实行某种妥协，但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决不停止斗争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

十三 为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必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可是资产阶级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誰在決戰時刻拒絕武裝起義，誰就是可恥的叛徒

十四 經過鬥爭，爭取實現和平與和平共處

取得暫息時間，鞏固蘇維埃政權
實現和平共處，我們這方面沒有障礙
贏得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十五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

劃分馬克思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首要標志
考茨基歪曲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把革命暴力化為烏有
不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就有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

十六 在革命浪潮的基礎上，建立和鞏固第三國際

無產階級英勇堅決的革命鬥爭和機會主義者卑鄙無恥的叛賣活動
新型的、革命的國際和腐朽的、黃色的國際
只有同機會主義派別決裂，才能加入第三國際

十七 批判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工人運動內部的兩種錯誤思潮
普遍規律和民族特點相結合
領袖、政黨、階級、群眾和黨的紀律
必須善於掌握一切鬥爭形式
革命者的妥協和叛徒的妥協
既要具有革命熱情，又要保持冷靜頭腦

十八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期，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 機會主義派別的鬥爭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形勢和任務
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
對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批判
合作化——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十九 堅決支持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

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支援世界革命
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無產階級要領導民族民主革命
世界的命運，決定於人口的大多數

結束語



前 言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时候写道：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

事情正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反对了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之流，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这个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马克思逝世之后，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领导下建立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得到了广阔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和它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工人运动内部来腐蚀工人阶级。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表现。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修正主义者公然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从一八九六年开始，伯恩斯坦发表了許多文章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各国机会主义者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附和伯恩斯坦主义。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采取了调和态度，后来也堕落为可耻的叛徒。这些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修正主义者既然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列宁就不能不给予坚决的回击，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论著中，揭示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列宁说：“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①同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把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使无产阶级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资产阶级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一样，总是相互结合、相互交替地用刽子手的镇压方法和“神甫”的欺骗方法来对付被压迫阶级，维持它们自己的统治。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中，资产阶级侧重于用一些微小的改良和虚假的让步，来麻痹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的许多领袖产生了对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合法性”的盲目崇拜，同时，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路人也混入了工人运动的队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时的工人运动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②。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阉割了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革命内容。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鄙陋的唯心主义来代替战斗的唯物主义；他们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减弱并可以消除，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鼓吹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主要是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引诱群众离开革命道路，阻止群众准备进行革命决战。在大战期间，他们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掠夺战争。十月革命后，他们恶毒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苏维埃政权，贩卖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的敌人。

显然，由于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背叛所引起的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决不是什么枝节问题，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篇论文中，列宁写道：“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各种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刻性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③

列宁批判了那种同机会主义调和的企图，认为“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走狗去奴役工人。”^④他说：“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页。

②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页。

④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9页。



及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①

经过长期的、艰巨的、尖锐的斗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切根本问题上，彻底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摧毁的真理。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壟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社会主义将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粉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同伟大的同盟军农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建立不同内容的工农联盟，同时还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影响进行不断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创建了完全新型的、同机会主义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反对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终于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还创建了第三国际，团结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

下面是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历史情况。

一 批判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任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轻的列宁就踏上了革命征途。当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暴戾恣肆、穷凶极恶的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劳动群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没有丝毫政治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①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下，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傳播起来，出現了第一批馬克思主义小組。但是，当时馬克思主义小組和工人运动很少联系，它們还没有了解到必須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傳鼓动工作。摆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任务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把各个零散的馬克思主义小組統一成为一个工人政党，以便领导无产階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在俄国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只有偉大的列宁才最深刻、最透彻地理解到了这个历史任务。一八九四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本书中，列宁这样說道：“当工人階級的先进代表領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領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傳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战变为自觉的階級斗争的坚固組織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階級（和世界各国无产階級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

列宁如此明确地向俄国无产階級和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战略任务，并且为实现这个战略任务同各种反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銳的斗争。

当时，民粹派是妨碍馬克思主义傳播、妨碍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建立的主要障碍。民粹派否认資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階級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階級；蔑視人民群众的偉大力量，主張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普列汉諾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給了民粹派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远沒有完成从思想上粉碎民粹派的事业。这一事业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彻底批駁了民粹派的理論观点和政治綱領，闡明了工人階級是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階級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俄国工人同农民的联盟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推翻地主資产階級的主要手段的思想。列宁指出，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經放棄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轉而主張同沙皇政府妥协，他們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之友”，而是富农階級的代言人。

列宁粉碎了民粹主义思想，也彻底地批判了“合法馬克思主义”。“合法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資产階級的利益。“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司徒卢威，辯护并贊美資本主义，号召大家“承认我們不文明，去向資本主义領教”。列宁指出，这些人是資产階級的自由派，他們把馬克思主义变成資产階級的改良主义，抹杀階級矛盾，拋棄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

崇拜自发性，醉心于經濟斗争的經濟主义

继“合法馬克思主义”之后，經濟主义流行起来，它是“合法馬克思主义”的后裔。一八九七年，列宁被沙皇政府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他密切注視着經濟派的活动。一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278頁。



八九九年，一部分經濟派分子发表了宣言，他們主張工人进行經濟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列宁看到了这个宣言，就把流放在附近各地的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开会，會議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书》。接着，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我們的綱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等。流放期滿后，列宁侨居国外，一九〇二年写成了有名的著作《怎么办？》。在这些論著中，列宁痛斥了經濟主义者背棄馬克思主义的行为，号召馬克思主义者同經濟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展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

經濟派的基本錯誤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他們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产生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們責难馬克思主义者“輕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列宁批判說，工人群众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会、必須同厂主作斗争、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輸到工人中間去的。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們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是，資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淵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多。因此，經濟派反对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識灌輸給工人，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資产阶级傳播他們的思想影响。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們运动进程中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資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沒有中間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資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与否——加强資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②列宁指出，輕視革命理論的作用，輕視党的作用，其結果就是埋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沒有革命理論，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③，“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④

經濟派說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銘是“为改善經濟状况而斗争”，說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資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貴”，說什么工人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們現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⑤。他們还为自己辯护說：“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各个阶级的經濟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⑥。列宁反駁道：“从經濟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經濟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結論，因为一般說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

①②④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350、336頁。

③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頁。

⑤⑥ 轉引自《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8—349、358—359頁。



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把无产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斗争，就是使工人永远限于奴隶的地位，永远不能扫除沙皇专制制度，永远不能埋葬资本主义。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②社会民主党如果局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就等于政治上自杀。“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政治斗争，那就等于河没有水”^③。

当然，经济派也不是绝对否认政治，他们还说什么应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列宁指出：经济派的“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④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就是力争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来改善劳动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工联主义的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它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工人阶级绝不是“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必须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高度，把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是，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经济派既然鼓吹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是“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因此，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⑤。“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⑥。

列宁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中，系统地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指出了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性作用，把理论的作用和党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论证了党是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根本原理。

各国机会主义者称兄道弟，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

经济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的俄国变种，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第一个以最完整的形式，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④⑤⑥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9、373、445、457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8页。

③ 《论〈PROFESSION DE FOI〉》。《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从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一八九九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法国社会党领袖米勒兰，作出了实践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福将军一起担任部长的职务。国际工人运动中到处都出现了同革命派相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可以比做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②

伯恩斯坦派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革新”的呢？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我不仅不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存于社会主义里‘内在的经济的必然性’，而且反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给与社会主义以纯唯物的基础”。

二、“随着资本家人数不断相对地减少，无产阶级幸福的不断增长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就成为不断发展生产的唯一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由于欧洲各工业国财富的惊人增加，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和工业上卡特尔的兴盛，地方或特殊部门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较长期间内，不是可以认为像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的经济危机大概不会到来了吗？”“不再有从纯经济的理由来推断这种危机的发生的确实根据了。”

四、“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社会民主党，与其用不合法的手段和革命，还不如用合法手段，会使它的发展更顺利得多。”

五、“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③。

列宁读了伯恩斯坦的书以后，立即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实践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④。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6页。

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7、51、59、72、3、5页。

④ 《给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① 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就是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之庸俗化，就是企图用争取改良来代替革命斗争，就是企图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

列宁透彻地说明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他说：“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争，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有时敌人主动退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分割和更容易地击溃进攻者。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采取不正确的步骤和不犯可耻的错误。”^②

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阴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③

列宁揭穿了伯恩斯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革新”和“批评自由”之类的调调。伯恩斯坦派所谓“革新”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来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④。伯恩斯坦派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抛弃完整周密的理论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伯恩斯坦派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无能，只不过是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法。列宁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⑤“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正教’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教徒’。我们明白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而且毫无意义。”^⑥

列宁无情地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列宁认为必须用创造精神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9页。

②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5卷，第57页。

③④⑥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6、187、187页。

⑤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来研究馬克思主义，用革命斗争的实际經驗来丰富馬克思主义。他說：“我們决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願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門科学向前推进。”“需要独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局部方面，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二 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

列宁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扫除思想障碍的同时，又进行了創立党的巨大組織工作。

一八九五年秋天，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俄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最初萌芽。一八九八年，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地的“解放斗争协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还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来，党内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很盛行。

在流放期间，列宁周密地考虑并拟定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的、战斗的、革命政党的计划。列宁认为，要建立统一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就必须从思想上同经济派彻底划清界限，必须把党的建設放在馬克思主义的巩固基础上。他說：“在統一以前，并且为了統一，我們首先必須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②因此，建党工作应当从创办一个宣傳革命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党的机关报开始。这个报纸应当通过代办員网同各地方組織建立密切联系。他說：“沒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話。”^③经过列宁的努力，终于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出版了《火星报》。《火星报》和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培养了先进无产者忠于革命理論、对机会主义毫不調和的精神，因而“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④。《火星报》把零散的馬克思主义小组連成一气，进行了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建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列宁同孟什維克（它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是经济派的直接继承人）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絕大多数政党，是在资本主义比較“和平”发展的时期成立的。它們的綱領沒

①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頁。

② 《〈火星报〉編輯部声明》。《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頁。

③ 《我們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4頁。

④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409頁。



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党的组织原则服从于“合法”活动和议会斗争的需要，党内没有统一的纪律。议会党团可以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党的中央工作机关也可以实行和党中央委员会不同的路线。这些党也不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的组织实际上成为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中的不坚定分子，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地涌进第二国际的各国党中，使党内的机会主义滋长起来。这样的党，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俄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呢？在党纲问题上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党章问题上列宁同马尔托夫等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草案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作用。这种机会主义错误遭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草案中才加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重要的条文，并在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后来列宁指出，这个党纲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列宁还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观点出发，主张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党纲草案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条文都是由列宁提出的。

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一伙人，打算照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老办法。和这些人相反，列宁认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做法。一八九九年，列宁曾经指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①一九〇一年，列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党，这个党“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战”^②。

建党路线上的这种严重分歧，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章问题的时候，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关于党章第一条，列宁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③马尔托夫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但主张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等人还反对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自治制”，说党的地方组织可以不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没有定形的、成份复杂的、涣散的党。列宁同马尔托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必须坚持党员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成为两个对立的派

① 《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3页。

②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列宁全集》第5卷，第285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列宁全集》第7卷，第11页。



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后来列宁写道，“从一九〇三年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①

在讨论党章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赞成列宁的条文。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拼命破坏大会决议，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普列汉诺夫开始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很快就变成一个十足的孟什维克。在他的帮助下，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编辑部的领导权，使新的《火星报》成为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在新的《火星报》上，孟什维克竭力宣传党内必须容许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存在，必须让“每个罢工者”、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有权自行宣布为党员。他们攻击列宁，说列宁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说什么列宁要在党内建立“农奴制”。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批判了孟什维克，同时也批判了第二国际在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

列宁指出：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认为组织关系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抽象的承认而已。”^② 列宁还指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到处都表现出来，导致组织的瓦解。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就是“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③。孟什维克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否认组织在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这是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规定了为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组织原则，全面地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列宁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以便卓有成效地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能够而且应当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其他组织。党应当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取得千百万群众的信任。党应当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应当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列宁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党，无产阶级就能所向无敌地进行斗争，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④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根本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改良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②③④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396、410页。



主义政党，它是建立在馬克思主义牢固基础上的党，是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党，是坚决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党。有了列宁领导的这个党，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就有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一个反对国际机会主义的坚强堡垒。

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保持布尔什維克的独立和纯洁

正当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急忙出来为他们在俄国的同道孟什維克撑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維克。

一九〇四年五月，考茨基在孟什維克的报纸上宣布，他赞成馬尔托夫，反对列宁，并且歪曲事实，責备列宁不应该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把孟什維克“开除出”《火星报》编辑部（实际是落选）。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报纸几乎都站在孟什維克一边，对于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间的斗争作了歪曲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向国际无产阶级说明俄国党的真实情况，揭穿机会主义者的欺騙宣传，是一项重要任务。一九〇四年八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代表提出了由列宁参加编写的报告，题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说明材料》。报告中指出，列宁提出的党章所以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惨痛教训，由于德国党章的第一条没有要求党员属于党的一个组织，就被那些捣乱分子广泛利用了。一九〇五年六月，列宁给《莱比錫人民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考茨基“提供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现存关系的情况，根本不合事实”。“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讲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目前的斗争中，一贯是有所偏颇的。当然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偏颇的人最好不要过多地说自己不偏不倚，以免落个虚伪罪名。”“我们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一言：同志们！假如你们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就不要相信所谓的不偏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叙述的关于我们党的分裂的任何一句话。你们唯一需要的是文件，真正的文件。”^①列宁号召布尔什維克向外国工人的一切小组和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党员，大力宣传布尔什維克党的立场。

第二国际除了在宣传方面支持孟什維克外，还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但是决议没有说明这种统一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会后，一九〇五年二月，第二国际的执行局（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成立一个以倍倍尔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来“调停”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间的争执，求得“统一”。接受这种“仲裁”，就等于承认第二国际（实际上是德国党）有权干预俄国党的内部事务。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调停”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停止争论”。这就是要布尔什維克停止揭露孟什維克，取消布尔什維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坚决拒绝了这种“仲裁”，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98、499、500页。



提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执，应当由俄国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一九〇五年六月，国际局又一次提出“仲裁”。列宁回答说，国际局的“调停”只有在两派谈判有了结果以后才能进行。

由于列宁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纯洁，并且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一天天扩大。

三 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反对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

革命的爆发和策略路线的分歧

列宁在一九〇二年曾经预言：“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果然，在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搏斗开始了。

促使这次革命到来的是一九〇四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这是沙皇俄国同日本为侵略中国和朝鲜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总爆发。对于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堕落成为护国主义者，主张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布尔什维克则相反，猛烈地抨击沙皇政府进行的侵略战争。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实行的是“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②。列宁认为，促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会削弱沙皇制度，加速革命风暴的到来。“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③

事变的发展，正是这样。战争加深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群众的斗争情绪迅速高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的军警在彼得堡屠杀和平请愿的工人，造成了几千名工人伤亡的流血惨案，这就大大激怒了劳动群众。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十月，爆发了全俄总政治罢工。在斗争中，工人群众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二月，莫斯科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同沙皇的军警进行了激烈的街垒战。在这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县份的农民起来反对沙皇地主的统治。六月和十一月，先后发生了“波将金”号铁甲舰和其他地方水兵的起义。很多城市的驻军发生骚动。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俄国。为了直接领导俄国革命，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迫切要求各个政党表明自己的态度，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一月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0页。

②③ 《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第32、35、34页。



九日事件以后不久，列宁就指出，当时的根本任务是武装无产阶级和农民，准备并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列宁的领导下，一九〇五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会议，也通过决议，制定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孟什维克的策略，是害怕斗争，害怕胜利，力图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支配，叛卖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发展，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提到了首要地位。彻底批驳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这是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必要条件。于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这本书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无产阶级应不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这个革命的领导，而无产阶级只能作个助手，不要力求领导和独立地展开整个民主运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

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这种荒谬论调，指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希望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残余，力图防止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使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①不这样做，那就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转到和资产阶级做买卖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②。“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的、但是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③

无产阶级要保证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把农民当作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列宁指出，由于只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

①②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36、79、5页。



的同盟軍，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給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①另一方面，“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領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东西。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②列宁批駁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发动农民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縮小革命的規模。列宁說道：“誰真正了解农民在必勝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說革命的規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縮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資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規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規模。”^③无产阶级为了同农民結成巩固的联盟，就必须提出和实行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綱領。

怎样对待群众的暴力革命行动？

在革命中应当采取什么斗争形式，孟什維克是模稜两可的。他們說还不知道武装起义是否已經成为必要，是否已經刻不容緩，最好是爭取召集縉紳會議或国家杜馬一类的代表机关。同孟什維克的意見相反，列宁认为，人民的武装起义，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民主革命运动已經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力設法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列宁指出，必須創立革命軍队，“革命軍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偉大的历史問題，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組織就是軍事組織。”^④列宁号召“馬上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工人以及其他等人中成立战斗队。讓他們立即組織三人至十人以至三十人的队伍。讓他們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誰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輪枪、用刀、用浸了煤油的放火布片等等武装起来。”^⑤

为了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列宁提出了旨在发揚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瓦解沙皇制度的政权机关的革命口号。这些口号是：举行群众政治罢工；立刻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立刻組織“革命农民委员会”，用革命手段实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为止；等等。这些口号的精神是藐視政府和現行法律，不受沙皇政府的限制，不受現行法律的限制，由群众采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自动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在号召群众举行起义的同时，列宁反复教育群众必須拋棄立宪幻想。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政府在革命的压力下，宣布召集布里根杜馬，企图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列宁指出：在

①②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83、45、85頁。

④ 《革命軍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頁。

⑤ 《給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列宁全集》第9卷，第330—331頁。



当时的情况下，参加布里根杜馬，就是帮助沙皇政府欺騙人民，使人民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維克确定了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事变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在革命高漲的形势下，布里根杜馬流产了。布尔什維克领导工人群众拿起武器，在十二月发动了起义。

列宁认为，必須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这个政府应该是工人和农民专政的政府，应该实行工农革命专政，其任务是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阻碍革命前进的斗争，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綱領。

在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孟什維克认为社会民主党原则上不应当参加这个政府，而应当把政权拱手让給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与此相反，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可以而且应当的。这个政府应当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綱領即民主革命的綱領，并且应当繼續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一方面要无情地打破一切反革命的企图，一方面要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参加这个政府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們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記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

半途而廢，还是不断革命？

列宁預計，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民主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一定会拚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战利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为爭夺政权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列宁教导說：“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記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記新的斗争。”^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是怎样呢？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展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拋棄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农民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偉大同盟軍的原理，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及其俄国同伴孟什維克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隔着一个漫长的停顿时期，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列宁批駁了这个观点。他指出，民主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經济制度范围的革命”^②。同时，列宁又指出，要对整个民主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說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③。“我們將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們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④列宁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他說：“我們必須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須尽快地結束这一步，爭得共和制度，无情地击潰反革命，并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⑤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

①②③⑤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12、33、44、24頁。

④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頁。



态度》这篇论文中列宁说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

对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两重估计

俄国革命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逐渐由高涨时期转入退潮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应该怎样评价，应该怎样来接受这次革命的教训，布尔什维克又和孟什维克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埋怨“不合时宜”的政治罢工，说它引起了武装起义，说什么起义失败的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是“游戏的冒险性”等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②

普列汉诺夫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阻止过巴黎工人的起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经警告过法国工人，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是，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③列宁说，马克思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仍然热情洋溢地歌颂公社的业绩，他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被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④而普列汉诺夫又是怎样呢？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工人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并没有发出过任何警告；当起义已经失败了的时候，他却又嘀咕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责革命的群众。机会主义分子普列汉诺夫怎么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相比呢？真是有天渊之别！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起对革命横加诬蔑。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写道：“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决不只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为了使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取得教训，为了使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感到耻辱，我们要公开声明：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一九〇五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⑤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

②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全集》第11卷，第153页。

③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4页。

④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522页。

⑤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5卷，第43页。



列宁深刻地总结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教训，指出：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根本改善群众的生活；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必须孤立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受到了巨大的政治锻炼，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型，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后来，列宁指出，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总演习。而在这次革命中，列宁所写的《两种策略》一书，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武装着党和工人阶级去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四 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斗争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以后的几年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不断地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工人群众甚至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了发展。同时，这几年接连发生侵略战争，国际关系非常紧张，军备竞赛空前加剧。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国际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的国际会议。列宁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的威信操纵会议，散布错误影响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机会主义立场，起了恶劣的作用。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党是历史最长也是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第二国际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可是，德国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却利用这种威信，竭力对其他党散布错误影响。各国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一味附和德国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这些人有一个特性：“非常胆小”，“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①。

德国党为了操纵大会，还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会议开始时，他们利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由德国党的代表担任全体会议的主席，并派出自己的重要成员来担任大会最主要的几个委员会的领导，如由修得功担任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的主席，由考茨基担任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书记。大会还规定各国有不同的表决权，大国是二十票，小国只有两票。德国党一方面让党内极右翼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大卫、列金、谢德曼、福尔马尔等人出席大会；另一方面，又用尽一切办法，阻挠左派特别是卢森堡参加大会。但是，卢森堡最后还是出席了大会，不过不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而是作为波兰党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页。



代表参加的。

出席大会的俄国代表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其中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还有工会的代表。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孟什维克。

在这次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占了多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有以卢森堡、马尔赫茨夫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以蔡特金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

斯图加特大会就是在国际革命派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举行的。

经过斗争，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的决议

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列宁亲自参加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

提交会上讨论的共有四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决议草案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这些决议草案都具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

爱尔威的决议草案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所有战争都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应当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第一，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第二，他不懂得，是不是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第三，他“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①。列宁说，斗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

同列宁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反，福尔马尔等人借批判爱尔威的错误，宣扬机会主义观点，说什么反对战争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应当用加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制止军事冲突，而不应当用罢工来反对战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对爱尔威的批判，“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比较平静安宁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經驗”^②。列宁说，对爱尔威观点的机会主义的批判迫使人们承认，在爱尔威的思想中有一线灵活的东西，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那就是他主张群众的革命行动。虽然爱尔威的观点整个说来是“英勇的愚蠢”，但是福尔马尔等人的主张却是“机会主义的怯懦”^③。

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战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后才能消失。可是，草案却把帝国主义战争的概念，偷换为“防

^{①②}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74、75页。

^③ 《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1页。



御的”和“进攻的”战争的概念，这就给护国主义者留下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隙。关于用什么行动来反对战争，这个草案和第二国际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一样，实际上只是承认议会斗争形式。

列宁召集了有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参加的会议，并和卢森堡一起对德国党的草案提出了修正，删掉了德国党的草案中有关防御战的段落，对草案最后两段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修改后的这两段话是：“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政治形势而定。”“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发生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迅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促使资本主义统治的迅速崩溃。”

经过修改，原来的倍倍尔的决议草案面目为之一新。列宁说，“这个决议真正有了丰富的思想，并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决议既具有正统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用福尔马尔的眼光阅读不了这个决议，而幼稚的爱尔威思想的狭窄框子也容不下这个决议。”^① 经过列宁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一致通过。

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工会中立论

殖民地问题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又一个问题。

机会主义分子荷兰代表万一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不去唤醒殖民地受压迫群众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而只是列举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殖民地可能做到的“改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建议本国政府签订国际条约，为殖民地居民规定一定的权利。这个决议草案甚至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② 这一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到多数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受到了左派的坚决反对。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企图使万一科尔的观点成为大会的意志。他们还猛烈地攻击左派，说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没有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

列宁认为，万一科尔的观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社会主义者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

①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65页。

② 转引自《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70页。



打倒资本主义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①

经过尖锐的斗争，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或者深受殖民政策之害的小国的代表，在大会表决时争得了多数票，通过了一个较为正确的决议案。

大会还讨论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

机会主义者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竭力支持这个决议案。普列汉诺夫为工会中立的主张辩护，说“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

列宁彻底批驳了工会中立论。他指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狭小范围内，使工会不同社会主义发生任何联系。工会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它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列宁根据无法反驳的客观事实说：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带来了恶果，它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张目，并使德国的工会领袖极明显地倾向了机会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和各国党的革命派一起，在会上进行了反对工会中立论的斗争。大会通过的决议，在原则上否定了工会中立论。

· 不应当把德国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

斯图加特大会上所有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都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对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列宁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② 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反对护国主义的强大武器。在这次大会上，右派和“中派”虽然占了多数，但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团结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终于战胜了机会主义。

会后，列宁论述了对德国党的机会主义政策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他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③。“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我们不应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通过错误的例子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④ 列宁认为，斯图加

① 《巴尔干和波斯的变化》。《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3页。

②③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5、69页。

④ 《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0页。



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对德国工人运动所下的这样一段評語：“德国在平靜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就绝对需要法国人竞争的刺激，而这种竞争是不会少的。”^①

五 在革命低潮时期同修正主义者进行理論斗争

“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哲学

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失敗以后，俄国轉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宁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革命虽然暂时失敗了，但是列宁依然对工人阶级力量满怀信心，相信新的革命必然来临。早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列宁就說：“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蝕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② 列宁到日内瓦后写的第一篇論文中說：“我們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們把我們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軍事进攻遭到失敗而頹丧，决不会張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結局連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③ 列宁在国外出版了《无产者报》，从事聚集、团结、教育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个时期，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大举进攻，有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攻击馬克思主义，辱罵革命，贊美叛变行为。一些知識分子革命“同路人”，由消沉頹廢到蜕化变质。他們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形成了广泛的統一战线，向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础——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討伐”。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波格丹諾夫、尤什凱維奇等人，在一九〇八年連續出版了《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实在論》、《从現代認識論来看辯证法》、《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等书。他們企图以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即馬赫主义）哲学来“修正”馬克思主义哲学，把最反动的哲学观点当成了时髦的理論，康德主义、休謨主义甚至貝克莱主义都成了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哲学。他們說，“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辯证法也是神秘主义，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神”。

① 轉引自《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9頁。

②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189頁。

③ 《政治評論》。《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423頁。



这些在事实上完全背棄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百般狡賴，不敢公开直率地反对被他們拋棄的观点。列宁說：“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①。列宁在給高尔基等人的許多信件中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者的哲学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謬、有害、庸俗、說教的作品”^②。

这时，揭破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粉碎他們在哲学上的囈語，成为特別迫切的事情了。同时，革命喚起了新的阶层参加政治生活，許多新的工作人員加入了党，他們不可能一下子具有坚定的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理論斗爭提到了首位。列宁說：“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訓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別說来，是把包括哲学問題在內的基本理論問題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③在这場斗爭中，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論工作，写了《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經驗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从康德出发，回到休謨和貝克莱

馬赫主义认为，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人們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列宁指出，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导致荒謬的唯我論，认为只有一个高談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列宁批判了馬赫主义的不可知論，指出：物是不依赖于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决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差別只存在于已經認識的东西和尙未認識的东西之間；人們認識的过程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比較确切的知識。認識是由許多方面和許多阶段构成的过程，其中每一单个阶段都有相对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包含有絕對真理的种子。“人类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够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給这个絕對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識的增加时而擴張、时而縮小。”^④实践是檢驗真理的标准。我們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檢驗这些映象，区别它們的真偽。把实践标准作为認識論的基础，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而把經院哲学的无数臆說一脚踢开。

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間的时

①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6、134頁。

② 《給阿·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5頁。

③ 《我們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頁。



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經驗批判主义的这两个創始人在哲学上的“发展”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馬赫写道：“我应当万分感激地承认，正是他的（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作了我的全部批判思維的出发点。但是我沒有能够始終忠实于它。我很快又回到貝克萊的观点上来了”，后来“又得出了和休謨的观点相近的观点”。馬赫主义的信徒們波格丹諾夫之流沒有他們的老师坦率，他們一方面坚决地脫离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又顛倒是非，閃爍其詞，硬說他們在哲学上“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硬說他們和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稍微“补充了”馬克思的学說。

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能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嗎？

馬赫主义者吹嘘他們的哲学是“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其实，他們不过是同自然科学中的一个落后的流派相联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这就动搖了傳統物理学的一些陈旧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辯证法，經過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于电子的发现，他們就說什么“物质消失了”，存在着“沒有物质的运动”，科学原理不过是一些“符号”和“記号”等等。馬赫主义者同他們站在一起，利用这些荒謬的論断来否定哲学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消失的是我們認識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而不是物质本身。傳統物理学所认定的一些物质的“絕對”特性，現在被证明是相对的。但物质是在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观实在，这是絕對的。无論是电子的发现或者其他什么新的发现，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然走向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辯证唯物主义，但是，它所經歷的道路是曲折的。列宁写道：“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辯证唯物主义。分娩是苦痛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廢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經驗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經驗符号論、經驗一元論等等，都是这一类廢物。”^①

判断一个人、一个哲学派别，不能根据他們自己挂的招牌

馬赫主义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妄想成为无党派的哲学。列宁說，“在一切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条紅綫那样貫穿着‘駕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們之間‘陈旧的’对立的愚蠢願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②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謊言和糊塗观点，其他的路綫是沒有的。所謂哲学上的无党派性，只是可耻地掩飾着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奴

^{①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30、360—361頁。



顏婢膝而已。哲学是一門有党性的科学，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們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問的帮办。在馬赫主义的認識論的抽象議論后面，隐藏着阶级斗争和阶级思想。馬赫主义者的客观作用，就是效劳于反动势力。列宁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們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棄以及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① 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列宁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者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們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們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論問題、他們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們过去和現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隨者。

根据这个标准，列宁对經驗批判主义作了概括的評價：第一，这种哲学用新的謬論、术语和詭計来掩飾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旧錯誤，它在全部認識論問題上是反动透頂的。第二，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們并没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謨和貝克莱。他們的哲学只不过是无数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路綫。第三，这种哲学与現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学派即反动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相联系。第四，这种哲学也是有党性的，它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是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們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偉大革命斗争的序幕

一九〇八年四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列宁写的《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发表了。在这篇著名的論文中，列宁說明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系統地揭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内容和实质，指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意义。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者敌視馬克思主义，他們在哲学、政治經济学、阶级斗争学說等方面全面地篡改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者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跑，胡說唯物主义早已被駁倒了，并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靜的）进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证法。

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修正主义者竭力用“經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論、关于资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潰的理論，宣傳阶级矛盾有緩和下去的趋势。列宁坚决駁斥了这种謬論，他說，修正主义者用片面的事实，代替普遍的現象，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內，只有最近視的人，

①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379頁。



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①。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者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胡说在民主制度下，“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因此不能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列宁认为，这种观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是一致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②

列宁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修正主义政策的实质：“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③

列宁极高地估计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偉大意义。他说：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斗争，将来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偉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④

六 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反动派对革命运动的迫害大大加强了，同时，在农村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富农经济发展的改革。革命运动陷于低潮。但是，列宁指出，由于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一九〇五年革命所由产生的深刻原因并没有消失，它们会推动群众重新进行革命斗争，因而新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规定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推翻沙

①②③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18、19、21页。



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列宁指出，在反动统治加强的条件下，不可能立即举行总政治罢工或武装起义，必须用迂回手段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必须采用防守的策略，即更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聚集力量，从而准备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以进攻的策略代替防守的策略。列宁指出，党必须“竭力有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集合和团结起来，学习斗争的本领，伸展自己的手脚，——同时要不屈不挠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党的组织，首先和主要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指导合法组织中的一切工作，才能使这些工作具有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①。为了实行有秩序的退却，重新积蓄革命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必须一方面反对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主张取消党的取消派，一方面反对拒绝利用合法机会的召回派。

取消派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孟什维克被反革命的暴力所吓倒，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了取消派，提出了建立“公开的工人党”或者“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他们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列宁指出，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然而，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了资产阶级的错误的道路，引上了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自己的党，也不取消它。取消主义则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②取消派为了实现这种投降政策，采取了分裂党的行动，他们脱离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群众集会上反对党。列宁在《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说，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③。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④。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派成为取消派，在当时俄国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

① 《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7—258页。

②③④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7—138、148、142页。



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①

在对待合法活动的界限上，列宁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界限。他說：“我們希望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公开活动的机会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則希望在斯托雷平的統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範圍內。我們爭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为此而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这一活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則爭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統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②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純洁和統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會議通过決議，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

“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和隨風轉舵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还反对了以波格丹諾夫等人为代表的“左”傾空談家——召回派。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馬，是反动透頂的、黑帮一立宪民主党的杜馬。召回派要求从杜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們还拒絕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认为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無論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

列宁指出，由于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因而不存在抵制杜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馬，必須利用杜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宣傳社会主义。为了准备革命而利用議會讲坛，这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所产生的必要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馬，“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討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組織性。”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③ 召回派拒絕利用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在秘密組織里閉关自守，使秘密組織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的机会。他們事实上拒絕党去领导广大非党群众，妨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认为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一九〇九年六月，召回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組織。

列宁后来在論及反对召回派的斗争时說道：“在所有被击破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間，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军队’損失得最少，他們的骨干保护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

① 《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3頁。

② 《論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6卷，第85頁。

③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列宁全集》第15卷，第409頁。



小(就其分裂的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穿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到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的工作。”^①

当时,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他宣称:“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②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指出,“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③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二年間,组织了八月联盟,联合了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来反对列宁。但他又标榜“非派别性”,说什么“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并且污蔑列宁“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④托洛茨基这种自欺欺人、装腔作势的叫喊,不过是公然替取消派辩护。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一贯随风转舵、左右摇摆的不光采的历史。托洛茨基忽而是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又主张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昨天同“经济派”合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他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今天‘借用’这一派别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⑤,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⑥。

同取消派是不能统一的

第二国际一贯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宁要反对俄国党内的取消主义,必须同支持取消主义的第二国际作斗争。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又一次讨论俄国党的统一问题。在会议上,曾经提出两个计划:一个是卢森堡提出的,她采取了调和态度,要求无原则地恢复所谓党的统一。列宁批评了卢森堡的错误。另一个计划是考茨基提出的,他主张“安排共同交换意见”。国际局就考茨基的提案通过了决议。列宁对国际局的这个决议,表示可以接受,同时指出了考茨基在会上发言说俄国党“已经消失”的错误。列宁指出,“必须把已经成为国际局决议的考茨基的决议案和他的发言分开来看”,这是“好决议和坏发言”^⑦。

一九一四年七月,由国际局主持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个恢复俄国党的“统一”的会议。参加会的除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外,还有一些其他派别集团。会议本来只是为了交换意见,但是在考茨基的把持下,却通过了一个恢复“统一”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页。

②④ 转引自《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42、344页。

③⑤⑥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42—343、346、326页。

⑦ 《好决议和坏发言》。《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0、529页。



这一決議案的表决。列宁认为，同取消派沒有任何妥协余地。“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棄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①“只有同取消派完全决裂并彻底克服这种离开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才能实现党内的真正統一”②。

七 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反对合作社問題上的改良主义

一九一〇年八月，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另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团结左派，争取通过了一些基本上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決議。

列宁亲自参加了关于合作社問題的委员会，在这个問題上，同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这个期間，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工人参加合作社已經比較普遍。在这个問題上，机会主义观点已經相当流行，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大会对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会开幕以前，公布了三个关于合作社的決議草案。一个是比利时党提出的，一个是法国党少数派盖得提出的，一个是法国党多数派饶勒斯提出的。

列宁分析了这三个草案，指出这里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綫：“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綫，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的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会成为純粹的商业企业。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綫。它模糊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問題，脱离这个斗争来談合作社的意义（即把无产阶级和业主对合作社的看法混为一談），用籠統的詞句規定合作社的目的，这些籠統的詞句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③

饶勒斯就是代表后一条路綫而反对无产阶级路綫的。列宁坚决反对饶勒斯的主張，并且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草案和对小組委员会起草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但是都沒有通过。为了避免局部性問題的爭論，列宁在大会上贊同了小組委员会的草案。由于革命派的坚持，草案中包括了这样一段話：“合作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即夺取政权和經济上的权利并实现所有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公有化。”这个草案成为大会一致通过的決議。

哥本哈根大会还通过了反对軍国主义和战争的決議，这是鉴于斯图加特大会以后的三年

① 《几个爭論問題》，《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7頁。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3頁。

③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5頁。



間，各国軍备竞赛有增无已，战争危机日益加剧而作出的。決議包含了斯图加特大会关于軍国主义問題的決議的基本論点，特别是經過列宁修改的那一部分。決議还指出，“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各国有組織的社会主义无产階級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机会主义分子虽然在表面上也投票贊成这个決議，实际上，他們已經一天一天走上公开的沙文主义的道路了。

在战争問題上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叛徒面目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国际形势更加緊張了。一九一一年，法国和德国为了爭夺摩洛哥几乎发生了战争。同年，爆发了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一九一五年，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这些事实表明，更大規模的战争正在酝酿着。

这种局势，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明确表示态度。机会主义者在这一重大問題上开始暴露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支持資產階級政府的扩軍备战政策，向群众散布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會議，竟然通过了贊成政府扩充海軍的決議。決議中写道：“代表會議現在认为最近的目的就是維持足够的海軍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意大利社会党的右傾改良派比索拉蒂等，公然支持資產階級政府同土耳其的战争。瑞士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分子爱利斯曼等人，投票贊助政府阻止工人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巴登議會党团，投票贊成資產階級政府的預算。德国工会領袖列金訪問了美国，十分羨慕美国的資產階級民主，羨慕每个議員能够得到全套最新設備的专用房間并配备由国家发給薪水的秘书等等。他还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討好資產階級的“祝賀演說”。

列宁尖銳地批判了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公然背叛工人階級的行为。他指出，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竟然追随資產階級政府的战争政策，主張增加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海軍，这就說明他們轉到沙文主义方面去了。列宁非常贊同意大利社会党把比索拉蒂等开除出党，认为这样做完全正确。关于爱利斯曼等人，列宁写道，这些人“决不是通常投到敌人方面去的普通逃兵，他們不过是平庸的市民，是滿脑子立宪民主幻想的、习惯于議会的‘鸡毛蒜皮’的机会主义者。階級斗争的紧急关头到来了，……这些庸夫俗子就張皇失措，滾到泥潭里去了。”^①列宁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中写道：列金的活动表明，“美国資產階級的手法是‘用溫柔的方法杀害’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德国机会主义的手法是用拒絕社会主义来討好‘溫柔’可爱的民主資產階級。”“我們不应该用‘表面乐观的’詞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种現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政党明显的病态，而应该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历史比較长的运动的經驗中学习，学习有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②

① 《在瑞士》。《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0頁。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0、253頁。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巴塞尔宣言

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后，劳动群众反战情绪更加高涨，欧洲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巴尔干战争和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第二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历时两天，欧洲各社会党都有代表参加。会上只讨论了反对战争威胁的问题，几乎没有有什么争论，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有名的巴塞尔宣言。

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有关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来反对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利用它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战争将造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各国王朝的野心而互相厮杀的犯罪行为。宣言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提出警告：“让各国政府永久记住，在目前的欧洲局势和工人的激愤情绪下，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想一想，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列宁很重视巴塞尔宣言，认为宣言“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巴塞尔宣言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①。

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在会上公开反对这个宣言，主要是迫于群众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情绪的压力。

巴塞尔大会以后，在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继续高涨的压力下，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大会，都分别通过了反对战争威胁的决议或者表示反对军备竞赛。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七月，当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时，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群众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或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集会。

但是，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只是空喊和平，或者用和平主义的纲领来限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竭力给群众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德国反动政府在为和平而奔走。这个党的机关报竟把德皇说成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他们又秘密地同政府勾结，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将支持政府。他们并企图把引起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冲突的全部责任推给俄国。法国社会党和其他社会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包括俄国的孟什维克在内，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反对德国。这样，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实际上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基本原则，帮助了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使帝国主义得以更无顾忌地进行战争。

（未完待續）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4、186页。

